谨以此书献给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和北伐战争胜利80周年

"铁军"军长　抗日名将

张发奎传

王心钢　著



张发奎，骁勇无比，百战沙场，在北伐战争时期赢得“铁军”将领荣耀；

张发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抗日战场指挥会战使得日寇闻风丧胆；

张发奎，性格刚烈，嫉恶如仇，曾三次反蒋一直不为蒋介石重用；

张发奎，豪侠仗义，待人宽厚，叶挺、贺龙、叶剑英等曾是其生死战友；

张发奎，一个纯粹的职业军人，与中共有亲密无间的合作关系，也有兵戎相见的血腥一击；“不事二君”的品性，注定了其性格的复杂性。

本书作者“十年磨一剑”，打造了这部厚重的人物传记，体现了“史诗性”的艺术追求，视野开阔而层次分明，场面宏大而结构紧凑，情节紧张而高潮迭起，人物饱满而情感丰富。


ISBN 7-80689-454-3
9 787806 894545 >
ISBN7-80689-454-3
K·66 定价:38.80元

“铁军”军长　抗日名将

张发奎传

王心钢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发奎传/王心钢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5.10

ISBN 7-80689-454-3

Ⅰ.张…　Ⅱ.王…　Ⅲ.张发奎-传记　Ⅳ.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11945号

张发奎传

©王心钢　著

终　　审：罗立群

责任编辑：姜　蓓

封面设计：吕唯唯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层

电　　话：0756-2639346　邮政编码：519001

邮　　购：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www.zhcbs.net

E - mail：zhcbs@zhcbs.net

印　　刷：台山市华宁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21.25　字数：360千字

版　　次：2005年11月第1版

　　　　　200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7-80689-454-3/K·66

定　　价：38.80元



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发奎将军

富貴不能淫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銘勳世兄屬
張發奎書

张发奎手迹

长河落日

碧血黄沙

透沏的号角

催开生命之花

心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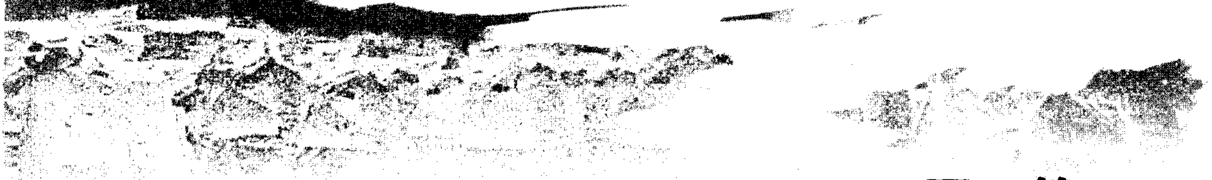
战士要不倒在沙场

便是回到故乡



——题　记

目录
CONTENT



开　篇

在血与火交织的20世纪的前50年，在饱受列强凌辱的神州大地，是否还有一块安静的地方，放得下一张书桌？

无论是农村还是乡村，当时一个热血青年的最好选择，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让多少人流离失所；战争，又让多少人挺起脊梁。而革命，宣告的是帝制的灭亡，昭示着的是一个全新中国的诞生。

无论你是否记起抑或遗忘，时间总是在提醒你，上溯60年，有一场悲壮而伟大的抗日战争，再上溯20年，则酝酿着一场风云际会的北伐战争。“北伐”与“抗日”，成了现代中国的两个主题词，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

我们和平地活着，早已远离战争，远离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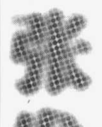
然而，我们毕竟是从过去中走来，我们在向前行的同时，有时不妨停下来想一想，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曾经发生过什么，那些曾经与我们一样年轻的祖辈们又是如何生存与奋斗的……

这里，我给你讲一个人的故事，一个曾在“北伐”与“抗日”中叱咤风云的英雄的故事。他的名字，也许你很陌生，但他亲历过的大事、结识过的人物你一定熟悉。

他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孙中山身边忠诚的警卫营营长；他随蒋介石两次东征陈炯明，曾赤着膀子在枪林弹雨里，救过老蒋一命；他在1926年的北伐战争中所向披靡，攻克汀泗桥，血战贺胜桥，打得北洋军阀闻风丧胆。由于教科书的“误会”，不少人只知道叶挺的独立团被誉为“铁军”，殊不知叶挺独立团只是他的部属，真正的北伐“铁军”应该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真正的“铁军”将领，就是这位担任四军十二师师长、四军军长的张发奎。几

十年后，一向骄傲的“少帅”张学良回忆起当年与张发奎部队血战时，也不禁甘拜下风。

1927年8月1日，爆发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的主力，几乎都来自于张发奎的集团军，贺龙、叶挺、叶剑英、聂荣臻和陈毅等中共名将，都曾是他手下的将领。甚至为是否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张国焘与周恩来等大吵了一顿，周恩来还平生拍了第一次桌子。由于身为四军参谋长叶剑英的“建议”，张发奎没有率部追击起义部队，而是与之平行南下，并在广州制造了轰动一时的“张黄事变”。中共借此良机，再次组织起义，这就是著名的广州起义。中共两次起义都在他眼前发生，这一回彻底惹怒了老张，他的血腥一击，致使广州起义宣告失败，他也因此走向人生低谷，成了欧阳山小说《三家巷》笔下的反面角色。不过，张发奎在国民党众多高级将领中，对中共还是持一种“开明”的态度，抗战期间，他身边有一个受周恩来直接指挥的中共特别支部，工作长达10年之久；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示意各战区司令长官通电反共，他是在全国12个战区或相当于战区的司令长官中，惟一没有发出反共通电的人。这一点，中共对他持肯定的态度。






张发奎是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他和许多爱国将领一道，激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主动请缨抗敌。他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二兵团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和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等高级职务，率部转战于华东、华中和华南，参加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战、桂南会战与桂柳会战等重大战役，其部与日军苦战、血战，付出巨大牺牲，有力地打击和迟滞了日寇的进攻。虽然他在北伐时期与汪精卫有过较深的私谊，但汪精卫成了大汉奸后，他断然拒绝了汪精卫的拉拢利诱，表现出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日本投降后，他被指派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接受了昔日威风凛凛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等人签署的降书。由此，他作为令人敬佩的抗日名将，名留史册。

然而，张发奎是个纯粹的军事家，“不事二君”的传统品格，注定了他政治上的矛盾性。他一生以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自居，对蒋介石违背中山先生的言行特别不“感冒”。抗战前，他力挺汪精卫，两次成为反蒋急先锋；甚至在大陆解放前，他还劝代总统李宗仁，学张学良把老蒋“软禁”起来，可惜的是老李没这种气魄。由此张发奎彻底失望了，1949年秋，蒋家王朝退出大陆之际，他既不愿去台湾，也不愿留在大陆，更没有选择留洋，而是

选择了香港这块“飞地”。无论如何，香港仍是中国的土地，留在这里，心中踏实。那一年他才53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然而，他的后半生就这样默默地度过了，直至1980年3月10日，病逝于香港。

张发奎出生于粤北大山中的一个贫寒农家，身上涌动着客家子民淳朴好强的基因。在家乡人眼里，张发奎要不是因为14岁时被迫独自离家出走，也许很难成就他以后的丰功伟业。但时势造英雄，张发奎所处的时代，正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时代，也是军阀混战、内忧外患的年代。张发奎的出走，无意中给他抓住了一个历史机遇，使之终于在时代的熔炉中锤炼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在家乡人的记忆里，将军先后回来过4次。尽管他指挥千军万马，每次回来其官衔好像都在上升，但他仍是个和蔼宽厚、知礼重教之人，每当走到离村子一里多地时，他便主动下马，步行入村，对父老乡亲以礼相待；尽管他在家乡扯起电话线，敢和重庆的蒋介石对骂“娘希匹”，但当一个小战士从楼上大意地把一盆水泼到他的身上时，他只是抹了抹脸上的水，淡淡地说了句：后生仔，别这么粗心。说罢，便无事似的继续走他的路，空留下一个吓得像木头般呆立的小战士……

张发奎永远是家乡人的骄傲。在他病逝后，家乡人仍保留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等着他“回来”。1992年11月9日，根据将军生前的愿望，年逾八旬的张夫人刘景容女士，携定居美国的儿子张威立、女儿张丽芳等亲友，护送将军的骨灰，千里迢迢，从香港奉回家乡安葬，终于圆了将军“回家”的夙愿。

面对着将军的陵墓，我不由忆起几年前到湘西凤凰县拜谒沈从文之墓时，墓旁的一块麻石题着黄永玉的一句话——“战士要不死在战场便是回到家乡”。将军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他经历了民国史上许多的重要战争，出生入死，屡立战功，无愧为一位“摧锋陷阵，如铁之坚”的铁将军。“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与众多漂泊老死在海外的国民党要员相比，将军无疑是幸运的，他用不着像于右任老人那样站在孤岛上望大陆而太息，而是选择了回家，安静地回到了故土。

将军回来了，这次他再也不走了。他安静地躺在父母的身边，与家乡的山水融合在一起，永远守望着自己的家乡，守望着自己的父老乡亲。

第一章　家境贫寒，报考陆军校

一、出身贫寒，求学县城

南岭之南有一个小县叫始兴，它位于广东省北江上游、浈江中游地带，县内四周崇山峻岭环绕，贯通绵亘，墨江河自南而北，穿过重重峡谷，流入始兴小平原，其纵横交错的支流，滋润着全县大部分肥沃的田地，使这个小小的山区县赢得“粤北粮仓”的美誉。作为母亲河的墨江，因而成为始兴的代称。

始兴是古代岭南交通要冲，向为兵家必争之地。三国吴永安六年（公元263年）置始兴县，甘露元年（公元265年）设始兴郡。由于历代屯兵、储粮的需要，在始兴小平原主要村落，逐步建立了储粮、屯兵的所营。有意思的是，久而久之，这些村落遂以所营定名，形成至今犹存的“五所”（吴所、周所、罗所、沈所、黄所）、“五营”（千家营、上营、高营、刘镇营、外营）的格局。各所营沿墨江自东至西，每隔三五里，或依山傍水，或隔河相对，组成了一条互为依托照应而又交错统一的人口分布和农业生产线。

进入始兴境内，万山迭叠，莽莽苍苍，中间始兴平原，稻海逐浪，村舍生辉，农产品和林产品成为始兴经济的两大支柱，素有“南山木，北山竹，遍地谷”美称。

每天，县城太平镇码头上人来人往，停泊着几十条货船。黄昏，来自上游的木排顺水漂下，前前后后有30多条，每条木排上照例站着三两个精壮的水手，夏天时水手个个穿一条粗布黑裤头，肩上斜披一条长约2米的水布，他们吆喝着把木排靠岸，常引得江边吊脚楼上的大姑娘小媳妇支开木窗伸出头来痴看。

夜幕降临，吃饱喝足的水手，闲来无事，便坐在木排上唱着咸水歌，挑逗着岸上的女人。客家女人并不怯生，有大胆的，放声应和，相互斗歌，形成墨江上最迷人的一景：

男：落水洗衫唔得"燥"（干），冷水烫鸡唔脱毛。
　　哥哥无钱来连妹，好似饿狗追飞雕。
女：鹧鸪唔嫌茅草蓬，鲫鱼唔嫌乱石窿。
　　只要哥哥情义好，老妹唔怕哥家穷。
男：先打酒壶后打盖，打错主意连错妹。
　　先前晓得甘（这么）好事，老妹帮钱哥唔爱。
女：先打酒壶后打梁，打错主意连错郎。
　　先前晓得甘大事，"肯过"情愿守寡较清香。

唱归唱，口袋里没钱，水手们是不敢上岸的，要等卖了货从广州回来后才来找相好的，何况次日放排，得起大早。

1910年的一天，天蒙蒙亮，刚下过一场小雨，空气格外清新。城墙外，不时传来此起彼伏的鸡啼声。早6时，漆黑的城东门隆隆而开，张发奎父子俩匆匆走出城门，跨过护城河上的吊桥，向墨江边的码头奔去。

满脸络腮胡的船老大盯了眼刚刚发育、身子只有一米五高的张发奎："就是这愣小子？"

"正是。"张发奎的父亲张居之赔了个笑脸，拍了下儿子的脑袋，"快叫刘老板。"

张发奎虽然个头不高，但身子结实，晒得黝黑的皮肤泛着一层油光。他瓮声瓮气地叫了声："刘老板好。"

船老板摆了摆手："说好了，带他到广州，一切我就不管了。"

"是。一路请您老多费心。"张居之从长袍中摸出一把银元放到船老板手心上，又把背着的包袱放到儿子肩膀上，叮嘱说，"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不混出人样来别回来见我！"

张发奎眼睛有些潮，叫了声"阿爸，我走了"，便头也不回地跳上了木排。

船老板吊着嗓门喊了一句："开排啰——"

十几条木排排成一条龙，顺流而下。

黑黝黝的河水急急地奔流着，两岸黑压压的藤萝紧贴水面匆匆后退，而县城那高大的青砖城墙愈来愈远，父亲的身影早已隐没在淡青的晨雾中。张发奎坐在木排上心事重重。记得小时候，父亲就告诉他这依城而过的河叫墨江，其发源地就在家乡清化的山林里，乘木排沿江而下，就可到大城市广州。

张发奎祖辈世代耕山务农，父亲张居之，字竹溪，因家计困难，外出谋生，当过船夫，以拉船为业，挣钱养家餬口，可见他的家境并不富足。清末年间，得亲友介绍，张居之在始兴县衙门谋到了一个当刑房小吏的差事，虽收入微薄，仅能餬口，但也算是个吃皇粮的角色。在县城，张居之娶了普通人家女萧氏，并生有四男三女；儿子依次为：发奎（字向华）、发萱（字贵斌）、发明、发荫（字勇斌），按照张氏五修谱宗字派（世辈），“发”字为“41”辈：

世辈：文 明 兆 昌 大，德 隆 永 发 祥。
世数：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熙 朝 宗 治 化，盛 世 绍 联 芳。
43 44 45 46 47，48 49 50 51 52。
美 绪 垂 金 鉴，嘉 猷 庆 璧 光。
53 54 55 56 57，58 59 60 61 62。
家 声 常 克 振，风 度 万 年 扬。
63 64 65 66 67，68 69 70 71 72。

张发奎原名逸斌，字向华，出生在始兴县城，出生那天是1896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或许是猴年出生，他身上真有几分猴性。他天性聪明，从小调皮捣蛋，屁股上没少挨父亲的板子。

张发奎的祖居地是现在的始兴县隘子镇彩岭（又称矮岭）村张屋。这里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林海如涛，群峰竞秀。过去，把司前、月武、隘子这一带统称为清化地区。其风土人情与平原地区迥异。别看这里是山区，直到解放后才通公路，却是出人才的地方，当年被举为始兴“四大家族”的官、华、张、饶四姓，前三姓都是出自这里。矮岭村处于一个圆弧形的山间丘陵小谷地中，周围低山环绕，土地肥沃，张村与陈村，隔河相对。



张发奎将军出生地——始兴县隘子镇彩岭村全景

张发奎虽是城里出生，但年幼时跟祖父生活过一段时间，懂事后常与父母在清明回乡扫墓，十分喜爱山里钻、泥里滚的农家生活。他学步未久，就爱跟着祖父下田去玩，常与日光和新鲜空气接触，晒得皮肤黝黑，个子不高，却十分健壮。他和其他山里孩子一样，一年到头很少穿鞋，赤着足，在碎石锐利的山路上行走，如履平地。

父亲从小就告诉他，始兴县城古称陈坊，今叫太平镇，从元代定为县治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并给他讲了不少有关县城的典故。可张发奎对这些历史掌故兴趣不大，他喜欢的是城里有高大的城墙有护城河，粮店、糖铺、打铁房、棺材店等店铺一家挨着一家，街上天天总是这么多人，各种小食让人眼馋。下午放学，他爱在街上流连，迟迟不肯回家。父亲说他属猴的屁股尖，一会儿都坐不住，讨打。父亲是管犯人的，脾气自然好不到哪里去。

张发奎8岁那年，进入一家蒙馆读私塾。私塾先生姓张，与父亲是同房兄弟。他上课时除了给学生讲《三字经》、《四言杂字》、《百家姓》和《千家诗》等启蒙课外，还爱讲一些张氏的历史。他告诉学生，现居清化的张姓人家，都是源于中原地区的客家人的后裔。迁移的原因，主要是连年战争，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大举南侵。

刚受启蒙的孩子哪里分得清先生讲的这一段历史，他们感兴趣的倒是他们的祖先竟是从北方跑来的。张发奎打断先生的话，大声问道："先生，我们姓张的是从哪里来的?"

"问得好。"先生掏出一本发黄的线装书，摇头晃脑地解释道，"始兴张氏族谱云：'我张氏本姓姬：自黄帝孙挥公制弓教民，受黄帝赐姓后，易姬为张。溯张氏源流出自山西太原；因世远年湮，宗巨族大，后裔散居九洲。'这就是说，大概是在西晋末年至唐初的第一次客家人大举南迁时，张氏的九十五世祖张君政由河南洛阳来韶州别驾，因家居曲江、始兴，是为曲江、始兴张氏开创之祖。"



先生见学生们听不大明白，把话题一转，说："始兴张姓祖先中，最著名的应是唐朝开元盛世的名相、初唐杰出诗人张九龄，他的故居就在隘子墟西约 6 里地的张屋，现尚有古色古香的唐砖结构的张文献公祠，人称丞相书堂。先祖九龄公，7 岁时能文，30 岁时擢进士第二。有一次，唐玄宗在东宫举文学士，他名列前茅，被授予左遗相。开元四年秋，九龄公辞官回家，见岭南交通落后，便向朝廷建议修大庾新路，也就是现在南雄的梅关古道，并亲自带领百姓修路，终于完成这条沟通南北陆路交通的干线，福泽后代。"






说到兴奋处，先生把教鞭一敲，道："九龄公为官刚正不阿，举善除恶，任贤登能，很早就识破安禄山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坚持主张杀他以绝后患。可惜皇帝不听，最终酿成'安史之乱'之祸。九龄公去世后，皇帝才深知他的可贵，每逢宰相推荐人才，必问：'有没有像九龄那样的风度?'九龄公的诗更是不得了，你们看看，《唐诗三百首》中就把他的《感遇四首》摆在第一位。"接着，先生摇头晃脑地吟咏起张九龄的诗句来，"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众学生也跟着先生念了起来。

应该说，因张氏出了个张九龄，张氏宗族历来重视对子弟的教育。在私塾，先生给张发奎他们启蒙，就讲九龄公的故事，教学生背他的诗词。张九龄的品格对张发奎的影响很大，后来他在家乡办的一间学校，就叫风度小学，并重修了在韶关纪念张九龄的风度楼。

那时正值庚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清政府在废科举，兴学堂，办新政。始兴县城也于 1908 年办起了新式小学，叫县立高等小学堂。张居之就把儿子张发奎接来，送到新式高等小学堂就读，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将来好光宗耀祖。由于是新式小学，除了国文，还有新式学科，如数学、博物、英

文等。张发奎对此甚感新鲜。他天资聪明，接受能力强，虽然有些调皮，但成绩名列前茅，深受老师喜爱。课余，他是个“孩儿王”，常带着一群同学和弟弟妹妹打打杀杀，玩得特疯。

他在高等小学堂读了近3年，这3年是他最快乐的时光，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同学溺毙事件”，致使他被迫辍学。

二、同学溺毙，黎明出走

那是19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夏蝉高鸣，暑热难耐，放学后，张发奎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偷偷跑到县城边的墨江上游泳。

一到江边，小伙伴们把书包放在土堆上，一个个脱个精光，噼噼啪啪地下水，嚷叫着看谁最先游到对岸。张发奎游技不错，一个扎猛可潜游十几米远。他一马当先，很快游到河的中间。由于这几天下了一场暴雨，上游洪水暴发，江水湍急，他游得比平时有点吃力。

忽然，背后有人猛喊：“不好了，阿李仔抽筋了，快来帮一把。”张发奎回头一看，落在几米远的阿李仔在水中挣扎了几下，很快沉入水底。

张发奎猛吸一口气，忙回头救人，可是水太急，阿李仔一下被打远了十几米。张发奎顺流而下，奋臂直追，好不容易把阿李仔捞上岸，但他已不省人事。周围的船家帮着抢救，有人牵来大水牛，把阿李仔倒伏在牛背上，想把他肚里的水压吐出来，可惜晚了，他已经两眼翻白，断了气。

筋疲力尽的张发奎知道这回闯了大祸，一时呆坐在岸边的沙石上，不敢回家。

阿李仔的家长李淑是当地有名的豪绅恶霸，他听到宝贝儿子被溺死后，大发雷霆，一口咬定是张发奎所为，跑到学校要求校长胡秀项开除张发奎的学籍，并声言要找张发奎的父亲张居之算账，为儿子报仇。

张居之只是县衙里的一个小吏，哪里是李淑的对手。他生恐儿子为李淑所害，只得忍痛将家里仅有的两亩地变卖，作为儿子逃命的盘缠。他找了一个熟悉的船老板，托他把儿子带到广州，于是便有了开头的一幕。

船老板虽然长得粗眉粗相，内心却是很细，他也是清化老乡，同情张发奎的遭遇，开导他说：“孩子，树挪死，人挪活，咱们客家人生来就是浪子本性，只有敢出去闯，方能做大事，成大业。就拿这条浈江水路的航运，就是始兴人闯出来的。”

接着，他给张发奎讲起了水路航运的兴衰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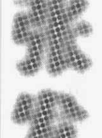
当年，贤相九龄公奉诏开凿大庾至雄州新路后，为进一步沟通南北交通，又到始兴县城外搭厂备料，建造船只，试航浈水。由于当时浈水河床沙砾淤塞，河床深浅宽窄不一，时而一河数流，时而数流合一，试航失败。次年，为畅通河道，九龄公在南雄、始兴调集民工2000多人，挖河堵坝整治航道，历时两年多，终将浈水疏通，试航成功，从此大量建造船只通航。浈江与赣江上游的物资经梅岭陆路40余公里中转后，粤赣南北水运衔接，商业贸易逐年兴旺。自此，浈江货运一直归墨江船只承接载运，由于这些船既载货又载客，故称“客货民船”。

船老板见张发奎听得有些兴致，便教诲说:：“华仔啊，跟你讲这些，不是要你将来当船民，而是告诉你人的一生，就像脚下这条江，有涨有落，有险滩急流也有宽敞河床，你只要咬紧牙关闯过去，就会到达目的地的。你要学你的先祖九龄公。”

张发奎插了一句：“我哪有九龄公这么有学问？”

船老板语重心长地说：“不能文可以武嘛，你这么年轻，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只要你不自暴自弃，会有所作为的。你记住我这句话，没错。”

两天后，张发奎谢别船老板，踏上了广州的土地。这次航程，让他心里踏实了许多。





三、多事之秋，打工羊城

1910年，张发奎踏上广州的土地，正是风云际会的年代。

广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从周夷王八年（前862年）的“楚庭郢”算起，广州建城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这次战争，发端于英帝国主义对广东的侵略和进攻。因此，也可以说中国近代史是从广东开始的。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导致了中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丧权辱国的中英《江宁条约》，打开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神州大地，呈现出租界林立，洋人横行，百业凋零，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

侵略激起反抗。压迫引爆斗争。面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目睹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有志之士，纷纷于危难中奋起，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广东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的地方，受害尤深，因而广东人民对侵略者的反

抗也开始得最早，最激烈。广州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显示了广东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威力；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更是一次惊天动地的壮举，席卷东南半壁山河。历史的汹涌潮流，把康有为、梁启超推上了变法维新的领导地位。以“百日维新”为标志的政治改良的失败，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力量跃到了历史前沿。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成立中国同盟会，其“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地权”的民主革命纲领，建立共和国的崇高理想，吸引了一大批进步青年。他们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奋勇斗争。

应该说，对于当时的历史形势，年纪尚轻又生活在粤北边远县城的张发奎仍是朦朦胧胧的。广州，是张发奎踏上社会的第一站，也是他将来发迹的重要城市。而此时这个都市吸引他的，却是高大密集的楼房，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群，满街乱跑的汽车。

他穿着母亲连夜赶做的布鞋，怯怯地走在大街上，举目无亲，人地生疏，揣着父亲提供的地址，转了一整天，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姓张的本家叔叔。

本家叔叔在广州做生意多年，路子较广，问明张发奎到广州的缘由后，对他的遭遇深表同情。他皱了皱眉头说：“既来之，则安之。广州是大城市，是花花世界，你文化水平不高，又无特殊谋生技能，我看，就先到饭店跑跑堂，打打杂，找碗饭吃，扎下根，以后再谋发展，怎么样？”张发奎初来乍到，见本家叔叔肯收留他，高兴得直点头。

张发奎有一身蛮力气，老实肯干，人也机灵，很快得到本家叔叔的喜爱。不久，本家叔叔把他介绍到广州增步工艺局当学徒，学习染织。

打工的日子容易过，张发奎刚刚能听说些广州话，转眼又是新年了。191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同寻常的一年。这年4月27日，广州发生了一件惊天大事。

那天下午，张发奎还在上班，猛听得总督府方向枪声四起，随即街上响起尖利的警笛声，市民们吓得四处乱躲，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踏踏踏”地匆匆而过。后来，张发奎听熟悉的青年学生讲，才知道孙文、黄兴领导的革命党人起义了。

原来就在前几天，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策划起义。由于内奸告密，广州全城戒严，清兵四出搜捕。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黄兴于4月26日召集会议，决定坚持发动起义的既定方针，将原来拟定的十路进袭计划临时改为四

路，集中兵力攻打总督府衙门，并决定次日举事。

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领队伍从小东门指挥部出发，直攻两广总督衙门，双方从下午5时多一直激战到次日凌晨。由于敌众我寡，起义最终失败。这次起义中，先后牺牲的共有80多人。事后，有人收殓死难烈士的遗骸，共得72具，把他们合葬于城郊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使张发奎印象颇深，让他第一次知道什么是革命党人什么是孙中山和他的同盟会。有位青年学生还告诉他，起义虽然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清廷政府一定会被推翻的。果真同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首义取得成功。11月9日广东光复。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的成功，无疑对年轻的张发奎的思想有着深刻影响。他少儿时期在故乡接受初等教育，已切身经历山区农家的困境，逐步认识到了清廷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的入侵，是造成中国人民深重灾难的根源。在广州期间，他通过与革命的青年学生接触，阅读一些进步报刊，逐渐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认识到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只有推翻清廷，才能赶走帝国主义。

他看到大街上学生在给行人剪辫子，便第一个跑去报名，说，这样好，辫子剪了凉快。

四、就读陆小，秘密入党



1912年3月的一天，檐上春燕啄新泥。本家叔叔把张发奎叫到府上，开门见山地说：“向华，现在辛亥革命胜利了，家乡的恶霸不会找你的麻烦了。常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你也快16岁了，有什么打算?”

张发奎仰着脸说：“阿叔，当学徒并非我所愿，大丈夫当立大志，干大事。我想跟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活动中，为振兴我中华而努力。”

本家叔叔早已是同盟会成员，赞许地点点头：“说得好！现在有一个机会，中山先生的追随者胡汉民在广东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他们正开始整顿民军，我想把你安排到民军模范团，担任部队长的勤务兵，将来再寻求发展的机会，你看怎样?”

“好极了。”张发奎一听，喜笑颜开，“谢谢阿叔。”

张发奎自从加入民军后，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成天上传下达，跑出跑进，也不觉得累。部队长对这个机灵聪颖的小鬼，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知道这是一块好材料，值得培养。

仲春的一天，窗外的紫荆开得正艳，部队长拦住了跑得一身汗的张发奎："华仔，来一下，有事跟你说。"张发奎抹了抹脸上的汗："长官，有事请吩咐。"部队长敲了敲他壮实的胸脯："不错，在民军干，长高长结实了。你想不想到新军里去当兵？"张发奎两嘴一咧，露出一口好看的白牙："不瞒长官，做梦都想，我还想当将军呢。""好，有志气。"部队长说，"不过你年纪还小，得到军校里锻炼锻炼，现在正是春季招生，我想介绍你去考黄埔陆军小学堂，你看好吗？"张发奎胸脯一挺："谢谢长官栽培，我会好好学习的。"

回到家，张发奎把部队长介绍他考黄埔陆小的事跟本家叔叔说了，本家叔叔也为之高兴。

张发奎问："叔，这黄埔陆军小学堂到底是一所怎么样的学校？"

"说来话长。这本是清政府实行'新政'的产物。清政府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庚子国变等一系列打击之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从 1901 年起，开始推行'新政'措施。在军事方面，仿效西方军事模式，编练新军和警察，代替原来的八旗和绿营，并在各省兴办武备学堂、陆军小学，有的省还办了陆军中学，为新军培养中下级军官。"本家叔叔呷了口香茶，"1903 年，两广总督岑春植奉命在广东训练新军，在广州筹办黄埔陆军中学、黄埔武备学堂，翌年又筹办将弁学堂。到了 1905 年，黄埔陆军中学与黄埔武备学堂合并，改办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并另筹办黄埔陆军小学堂。黄埔陆小从 1907 年春招生，至今已有 5 年。"

本家叔叔继续说："中国同盟会香港分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等人主理广东新军及巡防营的工作，并派一批积极参加新军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到军校当教官。据我了解，黄埔陆军小学堂有姚雨平、邓铿、胡毅生、赵声等同盟会员在校内任职，辛亥革命成功后，军校被革命党人接管，成为培养新式军官的地方。这对于有志于从军救国的青少年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何况陆小是官费，入校学习不用交学费，你更要好好珍惜。"

在部队长等的介绍下，张发奎顺利考上了黄埔陆小，从此结束了打工生涯。

黄埔陆小设在广州市郊美丽的长洲岛上。教官大部分是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穿着非常整洁光鲜、绣有金色花纹的军呢制服，足上是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把明亮的指挥刀，他们走起路来，雄壮有力，刀声靴声，铿锵悦耳，虎虎生威。学生穿着也不差，全套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剪去了辫子，身挎长枪，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

陆小的学习和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模仿日本和德国式的，紧张而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数理化、外语。陆小既是军事学校，过的是准军营式生活，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严格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就要接受警告或立正、禁闭和不许外出等处罚。张发奎个子不高，身体却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成绩突出。他在3000名同学中以《吴起将兵与士卒同甘共苦论》一文名列前茅，深受教官的青睐。其中，最赏识张发奎的，是学堂堂长邓铿。

邓铿，字仲元，1886年1月31日生于广东梅县丙村，广东将弁学堂第四期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协助黄花岗起义。广东光复后，他协助陈炯明整编广东部队，并任都督府陆军司长、参谋长。邓铿是粤军的名将，一直负责广东的军事。在学校，他发现张发奎不仅军事成绩优秀，还聪颖勤奋，为师友所推崇，决定吸收他为国民党党员。



1912年至1914年间就读于黄埔陆军小学的张发奎（前排右一）与部分同学合影

1914年3月，一个春雨绵绵的晚上，邓铿把张发奎等几个他赏识的学生秘密召到他在校外的一间寓室。

他严肃地扫视了大家一眼，压低声说："去年3月20日，袁世凯在上海刺杀了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的宋教仁先生。中山先生号召进行'二次革命'，各省纷纷宣布独立，通电讨袁。你们几位同学立志献身革命事业，打倒袁世凯，精神可嘉。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山先生等都到了日本东京，广东省也被袁世凯所收买的地方军阀龙济光攻占，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仍知难而进，不畏艰险，坚信国民革命一定成功。现经组织批准，你们正式加入国民党。我荣幸地成为你们入党介绍人。"

从这一天开始，张发奎觉得自己开始成熟了，再不是那个爱捣蛋的华仔。当时，国民党要求党员工作勤劳，生活自重，行为勇敢，待人热情，尽多争取志同道合的朋友，反对骄奢淫逸，言行卑鄙，张发奎均堪称楷模。党员们经常传阅秘密书刊，一起或谈论国家大事，或慷慨悲歌。张发奎后来在其《抗日战争回忆录》中自述：

> 我自民国三年，加入国民党，后来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我都一直参加，从未间断。在这时期中之民国六年，因党部经费困难，曾特别规定在每党员之月薪中，加征百分之四十来维持，其时所有革命党员，莫不乐从，毫无怨言，而且益加奋发，斗志高昂，皆国父之人格与革命精神所感召也。

五、考入武昌，反对袁贼

在邓铿的指点下，1914年秋，张发奎陆小毕业后，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是一所中等军事学校，其前身是湖北陆军中学。这所学校的课程包括两方面，一是普通中学的文化课程，有国文、外文、数、理、化等；二是军事科目，有射击、刺杀、初级战术、筑城学等。学校的治学方针是：学科和术科兼顾并重，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

1915年5月，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了彻底卖国的《二十一条》，以换取日本对他恢复帝制的支持。同年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为帝。袁世凯的卖国求荣、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与反抗。12

月 25 日，蔡锷等在云南发动讨袁的护国战争，贵州、广西、广东等省先后响应。

张发奎奋不顾身地投入这一爱国运动。他与同学们一起，成群结队走向街头，发表演讲和宣言，揭露袁世凯丧权辱国、开历史倒车的滔天罪行，号召群众起来参加反袁斗争。他还串联了一批同学，跑到驻扎在学校附近的湖北督军炮兵团营地，向士兵们宣传演讲，鼓动他们起来反袁。在举国上下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下，袁世凯于次年 6 月忧郁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成立了以段祺瑞为总理的北洋政府。

1916 年秋，张发奎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本可升入保定陆军学校，因革命需要，回广东参加反袁之役，曾一度为孙中山随身侍卫，第二年随胡汉民的弟弟胡毅生在广东士敏土厂任职。

有关他未能继续深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张发奎体弱多病的母亲自儿子出走后，担惊受怕，日日以泪洗面，不到半年就抑郁而死。母亲去世后，父亲一人无力抚养几个年幼的儿女，只好辞去公职，举家迁回矮岭村去居住，并自己在家辅导儿女的学业。由于生活困难，3 个妹妹很小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这是张发奎一生中最大的憾事。由于家庭生活困难，张发奎得承担起帮助家庭、支付弟妹教育经费的重担，不得不靠到工厂工作赚钱养家。

但在张发奎心中有一个坚定信念，就是跟随中山先生，继续进行国民革命，他时刻在等候这个机会的到来。

第二章 参加粤军，护卫孙中山

一、漳州从军，首立战功

张发奎军校毕业后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工作的几年间，正是孙中山着手组建自己的军队、倡导护法与北伐的重要时刻。转眼已是1919年的夏天，南国的阳光特别地凶，早上7点多，人走在大街上，身上就有些灼热之感。

"向华，向华——"正准备走进厂大门的张发奎听见有人在叫他，循声回头细看，一个瘦黑个子的人笑吟吟望着他。"伯陵，是你，你小子这几年跑哪里去了？"张发奎认出是薛岳，跑过来一把将他抱入怀中。

薛岳，字伯陵，韶关市乐昌九峰人，与张发奎同龄，跟张既是韶关老乡，又是武昌陆军第二期预备学校同学，两人关系甚好。1916年，两人同在武昌军校毕业后，张发奎出来工作，薛岳则在翌年春升入著名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深造，彼此联系渐稀。

"向华，我已在保定军校毕业。我和邓演达、叶挺、黄琪翔、李汉魂、李扬敬和罗梓材等广东老乡都不愿意留在北洋军中当见习军官，想回来投奔孙中山先生。"薛岳松开张发奎的怀抱，打量着说，"几年不见，你长结实了。我打听到你还在厂里干，只是不清楚你的具体住处，便在厂门口前堵你，拉你一块去投军。"

"伯陵，我虽在士敏土厂干，却一直关注着粤军的动向。袁世凯死后，北方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甚至出现了'辫子'军张勋复辟的闹剧。现在，段祺瑞控制了北洋政府。为此，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非常大元帅，积极推动北伐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遗憾的是，中山先生得不到桂系、滇系军阀的支持，手里又没有自己的军队，根本

无法进行北伐。恰在这时，准备辞职的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决定将所辖警卫军 20 个营改编为省长亲军，任命陈炯明为司令，交给大元帅府管辖。这样，中山先生开始有了自己的军队。”张发奎笑着说。

“向华，我听说中山先生于去年 1 月 12 日组建了援闽粤军，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尤其高兴的是，我们的老教官邓铿出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协助陈炯明指挥军队。”薛岳兴奋地说。

“是的。去年 5 月 17 日，被迫辞去非常大总统职务的中山先生，命令援闽粤军分三路向闽南进攻。数月之间，援闽粤军连克闽西 20 余县，攻占了闽南重镇漳州。9 月，徐世昌就任北洋政府总统后，向中山先生提出南北和议，南北军队以闽西的三元和闽南的江东桥为界，互不侵犯。至此，援闽粤军占据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 26 县，建立了‘闽南扩法区’。”张发奎说，“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军校毕业生，只有投身到军队中才有出息，方显军人本色。当时，我便想去投奔粤军，只是苦于无伴而未成行。”





“援闽粤军现扩编为 2 个军，正在招兵买马、急需人才，现在投军，正是好时机。”

“伯陵，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去找厂长辞职，咱们今天就走。”张发奎说罢，快步走进大门，直奔厂长室。

薛岳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不觉好笑，3 年不见，向华还是改不了他猴急的脾气。

半个月后，张发奎与薛岳、叶挺等结伴而行，经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福建漳州。他们一到漳州，即被这里的新气象所吸引。原来，陈炯明率粤军挺进到漳州后，因缺乏渡海工具不能继续挺兵，便屯兵漳州。他常用“卧薪尝胆沼吴”以自勉，不仅在漳州积极训练军队和修筑公路，还致力于社会文化事业，宣传民主与自由。此时粤军军威甚壮，漳州面貌崭新，朝气蓬勃，一时俨然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甚为中外人士所注目。连德国报纸也赞誉漳州是东方一颗明星正在发出光芒，苏联还派出第一个代表到这里秘密会见陈炯明，准备支持中国的国民革命。

在粤军司令部，张发奎三人见到了最为崇敬的教官邓铿。邓铿见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到来也非常高兴：“你们来得正好。目前，北方的直系为了打击皖系势力，勾结占据广州的军阀岑春煊和桂系陆荣廷，企图围攻援闽粤军。中山先生想要粤军打回广东，赶走桂系军阀。我正在为部队回粤做准备，我看你们先在我身边做副官或见习参谋，锻炼锻炼，有机会再让你们下连队带

兵，怎么样？"

"一切听邓参谋长吩咐。"张发奎三人"唰"地敬礼。

1920年春，孙中山见时机成熟，正式电令粤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8月，粤军分三路出击，其中，总参谋长邓铿统率第一军洪兆麟、熊略、梁鸿楷等部为左翼，从云霄、诏安以攻澄海、汕头；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则率该军全部为右翼，从上杭、永定以攻蕉岭、大埔、梅县、兴宁、龙川，沿东江以窥河源。参谋处长叶举率第一军李炳荣、邓本殷部任中路，从平和进攻饶平、潮安，并突破丰顺、紫金，策应左右翼。

烟尘滚滚，号角四起。张发奎随邓铿的左翼军作战。部队一路攻城掠地，但打到惠州城时，遇到顽强抵抗。

惠州乃兵家必争之地，东临大江，西为西湖，环抱全城，仅有几米平坦小路可通城，自古皆称之为不陷之城池。有民谣唱道："铁链锁孤舟，浮鹅水面游。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正因为地势险要，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在这布置了沈鸿英、马济及林虎等的精锐部队，凭借高大城墙，设防固守，使粤军屡攻不克。

望着在攻城中不断倒下的战友，打红了眼的张发奎主动向亲临前线指挥的邓铿请战："邓参谋长，让我带敢死队上！"

邓铿知张发奎是一员虎将，命令道："好，张向华，我现在任命你为敢死队督战长，你负责从军中挑选精壮80余人组成敢死队，在黄昏之前给我把惠州城拿下！"

"是。"张发奎随即下到连队挑选敢死队。

残阳如血，硝烟弥漫。

"契弟，跟我上！"张发奎身先士卒，带着敢死队员几番英勇冲杀，突破敌阵，爬上城墙，闯入敌群，夺获新式步枪两支，首立军功。

10月22日，粤军终于攻下惠州。

援闽粤军在左右两翼取得决定胜利以后，分路扫荡淡水、博罗、石龙、增城残敌，直取广州。此时，桂军已在潮梅迅速溃败，紧接着李福林、魏邦平又在广州河南区宣告独立，遂使莫荣新的桂军腹背受敌，被迫放弃广州，急撤到梧州一带扼守。由此岑春煊把持下之军政府，土崩瓦解。

10月28日，粤军进驻广州。

这是张发奎第一次随军作战，显现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给邓铿等粤军将领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发奎也在实战中领略了邓铿高超的指挥才能。

二、军中精锐，护卫中山

深秋的广州渐渐有了凉意，金黄的梧桐叶片片飞落。孙中山与邓铿边走边谈。

“仲元，这次粤军顺利回师广州，你们官兵都辛苦了。”孙中山缓声说。

“跟随中山先生革命，我们官兵义不容辞。”邓铿肃然道。邓铿知道，这次中山先生偕唐绍仪、伍廷芳等来到广州，重组军政府，重任大元帅，随即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司令，先生在这百忙中召见自己，一定有要事相商。

果真，孙中山很快进入正题：“援闽粤军回粤后进行了改编，全军整编为 3 个师，16 个独立旅，人数扩充至八九万人，已有一定规模。但是，由于粤军各部多由敌军残部收编而来，原有基本队伍品类复杂，兼之援闽、回粤两次胜利后，渐呈骄悍，并趋于腐化堕落。以致风纪日弛。我为此忧心忡忡啊。我们的队伍一定要与军阀的部队不同。仲元，你懂军事，对革命又忠心，我找你来，想跟你商量，希望你在各部基础上择其素质较优者，编为第一师，由你兼任师长，以加强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使之成为全军模范师。不知意下如何？”

“先生所言极是，学生照办。”邓铿爽快答应。

邓铿得令后，决心将第一师大加整顿，他想起了这次作战中涌现出的像张发奎这样年轻勇敢、富有理想的军官，便亲自点将，多方罗致一批有朝气的军官和陆军学校出来的年轻军官到第一师任职，组建新的粤军第一师。第一师辖 4 个团，张发奎初被任命为师部上尉副官，旋升少校，后又调任李安邦部警卫游击第二十七营营长；薛岳被任命组建机枪营，任营长；李章达和叶挺被任命组建工兵营，分别被委以正、副营长；邓演达等人则被任命为参谋。

当时第一师有如下几个新特点不同于其他部队：一是重视对各级干部的培养，有目的地举办军官教育营、军士教导营等对中下层军官进行轮流培训；二是在军事学术上，实用重于形式教练；三是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四是重视社会常识教育；五是试行生产教育。

经过多方面的整编教育，粤军第一师获得很大的进步，那些旧官兵消除了颓废放荡的习惯，积极学习，加强锻炼，严守纪律，精诚团结。在整个队

伍来说，战斗动作与制式教练，都相当娴熟，并养成了旺盛斗志的战术思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确实起了模范作用，得到各方面的称赞。粤军第一师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将才，李济深、邓演达、陈可钰、薛岳、黄镇球、张发奎、黄琪翔、余汉谋、李汉魂、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李章达、叶挺、梁鸿楷、陈济棠、邓世增、邓龙光、缪培南、李扬敬、徐景唐、香翰屏、朱晖日、钱大钧、陈诚和罗卓英等，都先后在第一师中任过职（除李济深、戴戟、钱大钧、陈诚外，其余均为粤籍），后来都成为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有不少日后成为现代中国叱咤风云、如雷贯耳的人物。

粤军第一师的治军方法与思想，对张发奎影响相当大，这为他成为一代名将奠定了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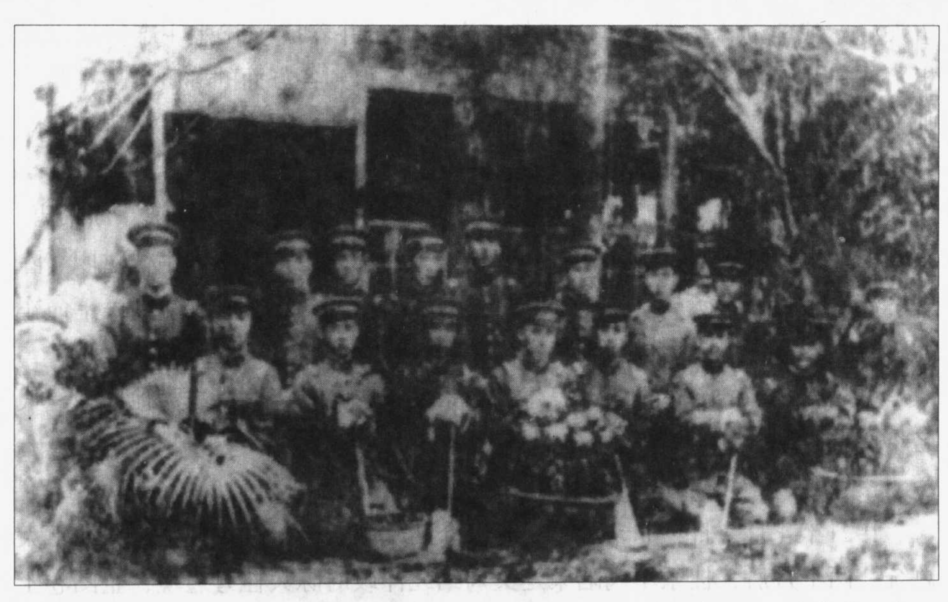
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参众两院联合会，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两个月后，桂系军阀陆荣廷又勾结北洋政府陈兵桂粤边境，企图卷土重来，进犯广州。6月，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军，共同讨伐桂军。陈炯明率粤军入桂作战，邓铿受命留守广州，并代行总司令和广东省长职。

粤军入桂，所向披靡，先后占领南宁、柳州和桂林。桂军残部逃往桂西南龙州，不久也被消灭。此时，恰值北方的直系与奉系准备大战，孙中山建议趁热打铁，立即北伐。国会非常会议于10月8日通过了北伐提案。10月18日，孙中山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

同一天，孙中山在许崇智公馆召开北伐会议，参加人员有胡汉民、汪精卫、许崇智、廖仲恺、古应芬和邓铿等。中山先生说明开会理由后，接着谈到军队问题，他说："我已命令李福林师随我赴桂林，组建北伐大本营，准备从湖南北伐。"顿了一下，他回头对邓铿说，"仲元，你要从第一师拨一团给我做卫队。因为登河（李福林的别字）的部队是不会打仗的。不过，他的部队如果跟我一年，你们就不够我打了。"

会后，邓铿深感护卫孙中山的重要性，考虑再三，决定挑选自己最信任的几名有勇有谋的虎将负责卫队工作。于是，他从第一师抽出3个营成立大本营警卫团，任命该师参谋长陈可钰为警卫团团长，李章达、华振中为中校团附；将第一师的机关枪营改编为警卫团第一营，薛岳任营长；将工兵营改编为第二营，叶挺任营长；将游击营改编为第三营，张发奎仍任营长。警卫团编成后，分两批出发，直赴桂林，负责警卫北伐大本营和孙中山的任务。

张发奎闻知负责警卫中山先生的任务后，兴奋得有些手舞足蹈，连喝几



1921年大本营驻梧州时警卫团军官合影。前排左三为张发奎、左四为薛岳、左五为陈可钰、左六为叶挺、左七为蒋光鼐、后排右三为缪培南

大口白兰地。他酒量好，能喝一两斤，但他知道，以后在中山先生身边，一切都得谨慎。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抽调部队，准备明年春取道湖南，大举北伐。当时参加北伐军队，除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和李福林部外，还有朱培德的滇军、彭万的赣军和谷正伦的黔军，共有13旅之众。而陈炯明的粤军第一军除邓铿组建的大本营的警卫团外，一兵一卒也不参加北伐。粤军就此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拥护孙中山的北伐军，以许崇智的第二军为主；另一部分是拥护陈炯明的“陈家军”。

张发奎带着全营官兵随孙中山来到桂林，这是他第一次到桂林，一下被这迷人的山水所陶醉。从此，他与广西结下了不解之缘。

北伐大本营设在桂王宫里。桂王宫在前清为贡院，民国后，改作谘议局，在城内独秀峰下，左邻师范学院，规模非常宏伟。警卫团团部设在前楼，中座有一大楼，中山先生的办公室、寝室等皆在楼上；后座为一大礼堂，用于召开会议。中山先生一有空闲，就喜欢跟卫士们聊天，给他们讲革命的道理，使张发奎他们受益匪浅。

桂林山水甲天下，先生休闲时，喜欢坐藤兜，四处走走。张发奎亲带警卫紧随前后，并布置便衣，散在四周保护。这时，苏联特使马林来到桂林，

与孙中山会晤。马林走后，孙中山即召集在桂各军将帅训话，决定中国革命须以俄为师，如不学习苏联，断无成就。张发奎对此印象深刻。

正当北伐军准备开往湖南北伐时，陈炯明却在后面捣蛋。作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自恃3年来援闽、回粤、援桂等战功，益觉踌躇满志，顾盼自雄，开始萌生背叛孙中山、称霸一方的心思。一直对陈炯明深信不疑的孙中山，还在桂林积极做着由湘北伐的准备，他致电各省各军首长亲自或派代表来桂林参加军事会议。可是陈炯明接电后，态度一点也不积极。而此时湖南总督赵恒惕节外生枝，借故建议取道江西北伐，使孙中山不得不改弦易辙，取消原来取道湖南北伐的计划。

陈炯明与孙中山先生意见相左，远在两广组织军政府以前。邓铿曾对人说："中山先生遇事过于勇锐，或要求过高，而兢存（陈炯明的字）则过于持重，每不肯降心相从。"据此可知邓铿多年来周旋于孙、陈之间，处境之艰，用心之苦。忠心耿耿的邓铿想不到的是，他与陈炯明共事多年，粤军的军务一直由他帮陈炯明打理，陈炯明竟然会对他下毒手。

1922年3月21日，邓铿亲赴香港去迎接一贵宾，回至大沙头广九车站，天色已晚。正当他走出车站时，两颗手枪子弹突然向他袭来，击中他的腹部。23日4时，他在韬美医院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临终，他太息一声，谓"好人难做"！溘然闭目，享年36岁。

噩耗传至桂林，北伐大本营一片悲恸声，张发奎突闻自己最尊重的教官和领路人邓铿遇难，犹如晴天霹雳，哭成了泪人。

邓铿遇难后，传说纷纷，都说与陈炯明及其部下一帮歹徒有关，但苦于无证据，久未破案。直至1928年冬，始将主谋行刺邓铿的罪犯陈炯明亲信族弟陈觉民抓获正法。其余凶手黄福芝、陈少鹏也受到惩治。张发奎这才出了一口恶气。

由于邓铿被杀，不仅使北伐痛失一名大将，而且还影响北伐的供给。北伐军大营内形成两派意见，一方以蒋介石为代表，力主回师讨陈，为邓铿报仇；一方以李烈钧为代表，劝说以北伐大局为重，不要造成内部分裂，主张改道韶关，从江西北伐。孙中山权衡再三，最后采纳了后者意见，决定将大本营移设韶关，但为平众怒，在回师途中免除了陈炯明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和内政部长职。然而，陈炯明仍军权在握，不思悔改，暗中令其亲信部将叶举等部回师广州，图谋兵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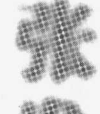
一时间，风急云卷，变幻莫测。

三、移师韶关，陈贼叛乱

南下的火车渐渐远去，天空中还飘着少许的煤烟，张发奎站在站台上，出神地望着，心里隐隐地感到不安。

他是5月初随北伐大军从广西经三水、清远回到韶关、踏上家乡土地的。12年前，他孤身一人坐木排南下广州，韶关只是在一瞥间匆匆而过。如今回来，他已是一名久经战场的革命军军官，担负着保卫北伐大本营保卫孙大总统的神圣职责，肩上的担子平添几分沉重。

韶关是粤北重镇，是中原进出广东的咽喉，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韶州市区负山（帽子峰）带河，东临浈江，西临武江，南为浈武二水合流处，汇为北江，形势险要。远的不说，咸丰四年清军守韶州，洪秀全的太平军攻了年余未能下；与此同时江西的赣州，太平军攻了数月亦未能下，故民间有“铜韶铁赣”之称。






5月6日，孙中山乘火车从广州亲赴韶关，夫人宋庆龄偕红十字人员随行。9日，孙中山在韶州大本营发布北伐总攻击令，誓师北伐。总司令李烈钧、总指挥许崇智率部兵分三路经始兴、仁化、南雄向北挺进江西。当时参与的北伐队伍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第一师梁鸿楷部和李福林部，滇军朱培德部，湘军谭延闿部，豫军樊钟秀部，赣军李烈钧部和黔军等，共约7万人。各省部队云集山城，整个韶州成了个大兵营，马嘶人欢，热闹非凡。

孙中山移师韶关后，他的3个警卫营各负其责，薛岳的第一营作为机动部队随孙中山活动，叶挺的第二营留守广州总统府，张发奎的第三营主要负责韶关大本营本部的保卫。

督师北伐大本营设在原南韶连边防督办署，又称韶州镇台署衙门。这是一座四合院式的两层砖木结构瓦面楼房，坐北朝南，楼的南北中央皆设有楼梯，底层8个柱子，中间建成对称的7个拱门。楼上下四周均由走廊相连接。中间有300多平方米的正方形天井。楼的结构属西式，显得宽敞、明亮。大本营设有参军、文官、幕僚党务等处，以及负责后勤的金库、庶务、供给等单位。南楼地下的会议厅，可供中山先生召开各种会议及接见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之用。

张发奎对这个地方较满意，它位于市中心，交通便利，往东200米，是城的东门，过浮桥即可到火车站。一位老先生告诉张发奎，大本营所在的这

条街原叫弓箭街，由来是此街有许多专门制造、销售弓箭的作坊以及商号而得名。街东口的城门叫“闻韶门”，市民叫它为“老东门”，临河的古码头上架着的浮桥最早建于元朝，河对面即是东河坝。现在弓箭街基本不再生产和销售弓箭了。民国建立时，就把它改名叫“建国路”。张发奎听后略有所思。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他到韶关任四战区司令长官，为激发民众的抗日热情，一度把此路改叫“抗日东路”。抗战胜利后，又恢复为“建国路”，沿袭至今。

为了确保大本营的安全，张发奎不敢懈怠，他把全营分成几组，除保留机动部队外，分3班24小时值勤。

大本营院内，有6棵树龄达几十年的大榕树，中山先生在日理万机之余，喜欢与夫人宋庆龄在这枝繁叶茂的榕树下散步。多少个夜晚，中山先生办公室的油灯彻夜亮着，起来查哨的张发奎常驻足观望，真想进去劝先生好好休息，注意保重身体。但他知道，这是北伐最重要的关头，有多少军机大事等候着先生去处理。

此时，孙中山忧虑的并不是节节胜利的北伐军，而是在后院捣蛋的陈炯明。为了争取陈炯明支持北伐，孙中山任命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并要求陈炯明积极在后方支持北伐。陈炯明表面上表示服从孙中山的处置，暗中却在积极准备武装叛变。5月18日，叶举率部突然回到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的职务，免除廖仲恺的职务。廖仲恺感到局势危急，电请孙中山速回广州。

在江西前线，北伐军进展顺利，于6月13日攻下了江西赣州，并进至吉安，前锋直指江西省会南昌。孙中山原先打算，南昌攻克后，再到九江，他要亲率北伐大军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谁料在这紧要关头，忽然接到了廖仲恺的电报，他经一番痛苦思考以后，决定再作一次让步，同意让陈炯明署理两广军务，并电令叶举率领所部兵力奔赴驻防处。为了解决后顾之忧，他将韶州大本营交给文官长胡汉民暂为代理，自己返回广州，督促陈炯明的行动。

大家都劝中山先生不可过分相信陈炯明，如果一定要回去，也要带足卫队，可是孙中山考虑到北伐前线兵力紧张，只答应带50名卫士返回广州。警卫团长陈可钰急了，坚持让薛岳的一营作为护卫队伍，随中山先生行动，张发奎的第三营留在大本营里继续担任警戒任务。而最终的结果，薛岳只带走了第一营的一连、二连和三连，余下的四连，与张发奎的第三营，由中校

团附华振中指挥，负责大本营的守卫，陈可钰随孙中山行动。

刚才在站台送别，张发奎再三叮嘱薛岳，此行凶多吉少，一定要保护好中山先生的安全。薛岳拍了拍腰间的枪说："放心吧，向华兄，有我们在，谁也不敢动中山先生的一根毫毛。"

话虽这么说，张发奎仍放心不下，因为自从邓铿被刺以后，他就逐渐看清了陈炯明的真面目。果然不出所料，中山先生前脚刚走，北伐军在赣州就发现了陈炯明与吴佩孚的来往信件，信中商量的事情是如何南北夹击北伐军，如何在消灭孙中山以后让陈炯明占两广为王。

张发奎得到这一情报后，心急如焚，赶紧与胡汉民商量，派专人到广州，报告中山先生，请求他密切注意陈炯明的动向，不要为乱臣贼子所乘。可是这时候，无论孙中山采取什么行动也都来不及了。

6月16日黄昏，西天火云一片。大本营文官长胡汉民急匆匆来找张发奎，通报说："向华，大事不好，刚刚得到消息，今日凌晨，陈炯明叛变了。他的队伍炮轰总统府，要活捉中山先生。"





张发奎"蹬"地跳起来："这王八蛋真的敢向中山先生下毒手！先生现在怎么样?"

"我没有与中山先生联系上，只是刚才听一个南边来的生意人说的。前两天，在陈炯明幕后指挥下，叶举和熊略等人准备武装叛乱，活捉中山先生。"胡汉民喝了一口水，继续道，"今天凌晨3时，他们果然行动，总统府门外，炮声隆隆，中山先生在卫士的护卫下已安全离开总统府，平安来到珠江上海军司令部的楚豫舰。"

听到中山先生脱离险境，张发奎松了一口气。

两人正议论着，团附华振中推门进来，报告说："胡先生，中山先生有急电，命令北伐军停止进军，回师平叛陈炯明。"

胡汉民看完电报，叹了口气："陈炯明叛乱，打乱了我们的北伐部署，真是千古罪人啊!"

华振中继续说："我刚得到叛军方面的消息。陈炯明早料到北伐军会南回，已命令其得力干将翁式亮、杨坤如的部队迅速北上，企图先北伐军一步，占领韶关，阻挡南下北伐军的先头部队回广州。"

张发奎摊开作战地图，标明叛军的位置，分析道："叛军3天内就可到达韶关，我们这里只有少量守卫部队，必须迅速派人与赣州的北伐军取得联系。"

胡汉民来回踱了几步，停了下来，决断说：“大敌当前，事不宜迟。我决定先让大本营的文职人员撤离到始兴，我自己立即到赣州，与李烈钧、许崇智取得联系，大本营就交由你们两人负责。你们要注意安全。”

“胡先生，您也要一路保重，我派人护送您。”张发奎关切地说。

四、拒绝诱降，甘做“大王”

送走胡汉民等人后，张发奎迅速布兵遣将，准备应战。谁料到在这紧急关头，团附华振中动摇了。

华振中对张发奎劝道：“向华兄，我接到翁式亮校长的一封信，劝我们去投奔他。翁先生曾是我们黄埔陆军小学的校长，是我们的恩师。他现是陈炯明的亲信，我们不如带着队伍投靠他，将来定有出息。”华振中是始兴县隘子井下围墩里人，跟张发奎是老乡，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1 年冬，他从北京回到广东，在粤军第一师任上尉参谋，后升为中校团附。

张发奎一直对华振中很尊重，没想到在此生死时刻放出如此鸟话来，他脸上勃然作色，怒斥华振中政治上如此幼稚糊涂，做出这不忠不义之事。但华振中当时鬼迷心窍，不听劝阻，执意鼓动警卫部队的部分官兵投靠陈炯明。大敌当前，人各有志，而且华振中又是团附，张发奎只好带着他的第三营撤离韶州。

后来，华振中对叛变之事极为后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良心虽出自爱国家，爱部属，而事实是做了反革命！这是我良心上最大的憾事。”1926 年，他看到陈炯明倒行逆施，毅然挂印逃官而去。

6 月 20 日，陈军翁式亮、张化如两团先北伐军一步占领韶州，在市区大肆抢掠，连德国教堂也不放过，照样抢劫一空。韶关市民遭此兵劫，拖儿带女，纷纷逃难，哀声一片。为了抗击北伐军，翁式亮迅速在黄冈山、芙蓉山和帽子峰等战略要地构筑工事，严阵以待。

7 月 2 日，许崇智接到孙中山电令后，率第二军与李福林、朱培德部进入粤境，由南雄、始兴直取韶州。北伐军以朱培德部任左路，攻占黄冈山后迂回芙蓉山。许崇智部任中路，抢攻帽子峰。李福林部和许崇智一部斜攻火山，迂回马坝，以切断陈军退路和省韶退路。

北伐军锐不可当，许崇智部一举即攻占帽子峰，另路攻占火山后直迫马坝。同时，黄大伟部也由始兴进抵翁源同陈军洪兆麟师接触。

帽子峰俯瞰韶关，关系至大，双方反复争夺，北伐军由于弹药缺乏，三得三失，惟有从火山进迫马坝一部，仍然严重威胁着陈军的安全。陈军一部被迫退守马坝。在这关键时刻，陈炯明动用“秘密武器”，给担任北伐任务的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发去一份绝密的电报，要他从北伐前线秘密回师，从背后袭击北伐军。

梁鸿楷接到命令后，左右为难，他既不想从背后去打北伐军，又不好违抗陈炯明的命令，踌躇再三，决定将自己所属部队分兵三路。连夜向广东方向后撤，到了和平、连平一带后观望，脱离北伐军。而粤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陈修爵是陈炯明的亲信，见梁师长作“骑墙”之举，甚为不悦，率领本团，倒戈相向，加入叛军，连夜兼程开赴曲江县马坝，支援翁式亮的部队。叶举知道后大喜，调来自己所属的汽车，将陈修爵的部队运往马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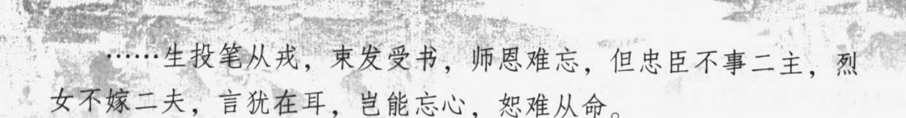

北伐军乘胜追击，正好遇到陈修爵的三团。这是一支生力军，他们装备精良，遏止了北伐军的进攻势头。南下讨贼的北伐军已经连续作战 28 天，全凭一股勇气在作战，一旦被阻止住，便很难再前进，恰巧听说阻止自己前进的又是自己人，北伐军内部出现了倒戈现象，军心大动。

7 月 30 日，在韶关方面的北伐军各部退至始兴江口，在翁源方面的黄大伟部也频频告急。胡汉民、许崇智、李福林等 3 位北伐军负责人撤到南雄后，与总司令李烈钧复议，决定暂时收缩一下军事讨伐的规模，改变作战方式，许崇智部退入福建省境内，李烈钧、李明扬、朱培德部退入湘境，赖世璜部退回江西省赣州境内。

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较量，北伐军南下讨贼的计划没能取得预期战果，平叛行动受阻。

再说张发奎撤离韶关后，率部加入北伐军黄大伟部，与叛军激战于翁源。他们最后因腹背受敌与主力失去联络，孤军作战。

这天，哨兵报告，门口有个叫丘兆琛的求见。张发奎想起这丘兆琛是自己昔日黄埔陆军小学的同学，便请他进来。老同学相互寒暄一阵后，丘兆琛说明来意：“向华，恩师翁式亮校长，一直对你很器重，特意让我带一封信给你，请你过目。你们的团附华振中过去后已受到校长的重用。”张发奎仔细看信，信中称：“师生之情，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迅速来归，免贻后悔。”看完信，张发奎不动声色，拿起桌上的笔墨，当即回复一函，信中写道：



……生投笔从戎，束发受书，师恩难忘，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言犹在耳，岂能忘心，恕难从命。

送走丘兆琛，张发奎知道翁式亮不会善罢甘休，迅速率全营从翁源撤退到家乡始兴仙人洞，继续与叛军对抗。仙人洞，山高林密，易守难攻，不少绿林好汉聚啸其间。部下笑称张发奎占山为王，是个“山大王”，张发奎哈哈大笑曰，在此做个山大王也不错吧。

因为这段经历，张发奎便有“大王”的绰号。另一种说法，张发奎批阅公文签名时，常草签一“奎”字并把字体拉长，看上去酷似“大王”二字。后来，张发奎官至上将司令，他的部下也亲切称他为“大王”，他慨然相应，可见其平和、随意的一面。

张发奎率领全营，在仙人洞餐风宿露，静待时机之变。3个月后，他等来了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劝他归队的信。

前面说过，粤军第一师是邓铿亲手创建的模范师，张发奎是其中一员猛将。邓铿被刺身亡后，梁鸿楷升任为师长，军纪开始松懈。孙中山改道韶关北伐时，粤军第一师奉命加入北伐军序列，并在攻打赣州中取得辉煌战果。但第一师与陈炯明关系甚密，情况颇为复杂，其中第一团团长谢毅、第三团团长陈修爵，本属陈炯明死党，事前已有密码互通消息，在前线公开站在叛军一边反对孙中山；第二团团长徐汉臣居心叵测，态度模棱；第四团团长陈铭枢则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只有工兵营长邓演达等才是真正拥护孙中山的军官。当各团长接受陈炯明送来的贿赂，公开亮牌归附陈炯明时，其下属几个营长则在坐等时机，密谋反陈。是年9月，粤军第一师被调往西江，驻防肇庆。师长梁鸿楷听说张发奎还在始兴仙人洞，便修书一封，请他率部一起到西江。

眼看天气转凉，队伍仍是单衣，张发奎觉得长久与外界失去联络，占山为王终不是办法，权衡再三，答应下山，希望能与邓演达等粤军中亲孙的将领建立关系，再图伟业。

张发奎下山后，其部先在广州整顿，被编为粤军第一师辎重营，调驻番禺，11月调驻肇庆，改隶第一师第二团，编为第三营，他仍任营长。

这段时期，是张发奎最苦闷的时期，沾上了当时旧军阀的种种毛病，意志颇为消沉。这里有一个民间传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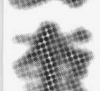
当时，张发奎的属下有一个连长叫许志锐，是曲江县白土镇下乡村人，与张发奎可谓是韶关同乡。同时，他也是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堂毕业，先后到武昌陆军中学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他派往山西阎锡山部任见习排长。见习期满，正值袁世凯妄图称帝复辟，胸怀大志的许志锐，迅速南下回粤，在张发奎部下任职，与张发奎交情不错。

许志锐比张发奎年长两岁，敬佩张发奎之才华胆略，如今见张发奎意志消沉，苦劝不改，便想了一个主意。一次，军官们聚会喝花酒，张发奎也准备带一个他最喜爱的女子去赴宴。许志锐先他一步，与一个年轻的参谋商量，叫他假意去勾引那个女子，并许以重金。这女人是风尘女子，见钱眼开，哪有什么真感情，便欣然跟那参谋赴宴。



张发奎本与那女人约好在酒店门口相见的。谁知，晚宴开始前，那娇艳女人竟然与一个帅气的参谋手挽手亲热地走在一起，当张发奎不存在似的。张发奎气得两眼冒火，上前理论，那参谋年轻气盛，决不相让。于是，两人没说几句，便老拳相向。







“哎，给我住手！”许志锐过来把他俩拉开，调解说：“都不要争了。我看这样吧，这女人愿意跟谁由她自己决定，你们看怎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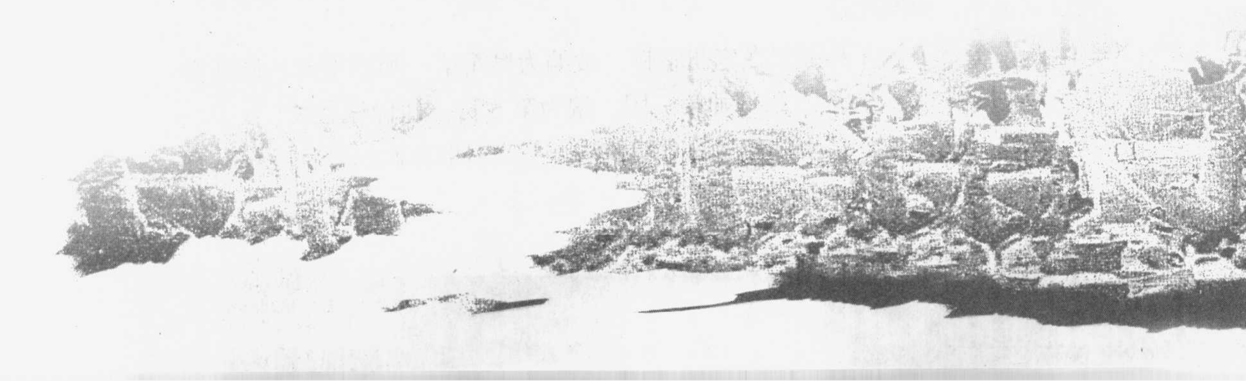
张发奎自恃与女子有一段感情，便答应了。谁知，那风尘女子白了张发奎一眼，嫌他没钱长得又土，像个乡巴佬，便娇滴滴地依在年轻参谋的怀中。张发奎气得嗷嗷大叫。

许志锐趁机把张发奎拉到一边，劝他说：“大丈夫驰骋沙场，建功立业，方显英雄本色。何必沉迷于女色？”



张发奎听此良言，翻然醒悟，自此后远离女色，终身只娶一妻，并没像其他军官那样妻妾成群。同时，张发奎也不赞成他的子弟和部下纳妾，沉迷女色。一次，他回到家乡，听说他的堂弟娶了两房媳妇，气得要把堂弟抓来打几军棍。他堂弟吓得不敢来见他。

后来，许志锐告之真相，张发奎明白好友的一片苦心，非常感激他，视之为良师益友。



第三章　西江起义，倒戈反陈贼

一、秘密策反，率先起义

肇庆是个美丽的城市，青螺般耸立于一湖碧水间的七星岩，犹如仙境圣地。张发奎兵驻西江，却无心赏景，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暗中打听孙中山先生的踪迹。

这天，一个从香港回来的进步学生带来了几张报纸，上面有孙中山自陈炯明叛变后来到上海的消息。原来，孙中山从一个老华侨那里获悉北伐南下讨陈受挫后，不得不离开广东，取道香港来到上海，坚持进行革命活动。他在上海寓所不断接见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人，部署继续讨伐陈炯明的战斗计划。1922 年 9 月 18 日，他发表了《就陈炯明叛变事件致海外同志书》，对这次因陈炯明的叛变而导致革命的失败深表痛心，再次揭露陈炯明叛乱经过。

在油灯下，张发奎细读着这篇文章：

> 此次陈炯明叛变，非惟文与诸同志所不及料，亦天下人所不及料。盖以陈炯明之性质而论，其坚忍耐劳，富有过人之处；然对于国事常存私心，且城府深严，不以诚待人……而两粤同志军队替志杀贼、待时而动者，为数尤多。陈炯明叛党祸国，纵兵殃民，罪恶贯盈，难稽显戮。凡我同志，但当蹲厉奋发，努力不懈，粤难平定为期必不远也。

张发奎读到这里，拍案叫绝，这篇文章不仅让他彻底地认识了陈炯明的

为人，而且也更坚定了他反陈的信心。他拿着这张报纸，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师长梁鸿楷的住处。

张发奎进得门来，只见一师参谋长李济深、工兵营长邓演达等坐在那里，彼此会意地一笑。他们几个早对陈炯明暗杀邓铿，尤其是背叛孙中山后把广东弄得乌烟瘴气深怀不满，正在密谋反陈。

梁师长明知故问："张营长深夜来访，有何要事？"

张发奎二话不说，从怀里掏出那张报纸给大家看。

看完报纸，梁师长眉头大舒："当务之急，得派人与中山先生取得联系，获得他的支持。"

邓演达接过话头："这样吧，我去上海找中山先生，向他汇报我们粤军第一师的情况。你们在家里准备策应，如何？"

"好。"众人一致表示赞同。

邓演达果然不负众望，于 11 月初秘密来到上海，与孙中山取得联络，并带回了中山先生的指示。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孙中山讨伐陈炯明的东路军已经开始行动了。"邓演达风尘仆仆归来，迅速把消息带给众军官，"奉中山先生之命，驻扎在江西的许崇智率领的北伐军，改为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并于 10 月 12 日，攻占了福州。接着，他们一路势如破竹，直逼广州。"

"那么，中山先生有什么指示？"张发奎迫不及待地问。

"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利用西南军阀的矛盾，首先发动正在广西徘徊观望的滇军张开儒部和桂军刘震寰部、沈鸿英部，联合粤军可靠部分，组成讨伐陈炯明的联军，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希望第一师的同仁能够接受这个新任务，继承邓仲元的遗志，并将之发扬光大。"邓演达不急不缓地说。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梁鸿楷、李济深、张发奎等粤军第一师将领听了，心里有了底，纷纷表示赞同。

梁鸿楷做事一向老道，提醒说："这事急不得，陈炯明在粤军的势力相当大，我们只能在军营里进行全师的秘密策反工作，随时准备举旗起义，千万不能莽撞。"

1923 年元旦来得很快，一场冬雨后，西江上的风显得又冷又硬。

这天晚上，邓演达来到张发奎的营部，说："向华，形势变化很快。去年 12 月 26 日，孙中山委任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第一路总司令沈鸿

英、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和拥护孙中山的粤军，各派代表到大湟江的白马庙共商反陈炯明大计，一致决定向梧州进军，策应东路军。此次重要会盟被称为‘白马会盟’。会后，反陈炯明的军事行动迅速展开。”

张发奎给邓演达倒了一杯水：“师长他们有什么安排？官兵们都等不及了。”

邓演达呷了一口茶，摆摆手说：“不要急，你看，我们粤军第一师的实力，除了我的工兵营和你的营外，都掌握在陈炯明的死党谢毅、陈修爵两个旅长手中，很难作整个师的发难。在此情况下，我们对陈军只能采取拖后腿的办法，陈炯明让我们去阻止讨贼军，我们就让部队稍与之接近，即向后撤，使之溃败瓦解，然后再乘机起义讨陈。”

“有道理。”张发奎点点头。

“今天上午，陈炯明为抗御滇桂军，任命叶举为总司令，到梧州指挥。叶举见粤军第一师布防在肇庆一带，有点心慌，约我们将领饮鸡血酒、发誓，表明同心打滇桂军。席间，我二话不说，举起鸡血酒一饮而尽，让他放心。”邓演达把一杯茶一口喝干，“我已经决定，等叶举一走，就准备全营起义。”

“邓营长，你放心，我已在全营有计划地进行秘密宣传工作，我所在营的官兵原都是中山先生的警卫，十分效忠中山先生，他们表态说：‘张营长，你说打哪，我们就打哪。’你们工兵营起义后，我们迅速策应。”张发奎表态说。

“兄弟，咱们在战场上见。”邓演达紧紧握住张发奎的双手。

1月3日，邓演达在封川豆腐坑向全营官兵宣布：“奉孙大元帅之命，协同讨贼各军东下，讨伐国民党叛徒、祸国殃民的陈炯明，建设新广东。”于是，工兵营在“打倒陈炯明，建设新广东”的欢呼声中宣布起义。

张发奎闻悉邓演达营起义后，与第二团团长卓仁机、营长郭学云等在幡龙水阵地举起义旗，迅速与邓演达营在德庆联合。紧接着，张发奎率义军在马口附近歼灭陈军罗绍雄部，缴获步枪700多支，子弹10万多发，旗开得胜。

讨贼军沿西江右岸一路东下，直指肇庆。陈军总指挥叶举因西江各地尽失，鼠窜广州；陈炯明部署的右翼指挥官林虎所部，也被李易标部、莫雄部和粤军第一师的起义部队联合击溃，败逃三水。至此，陈炯明的西江防务全线崩溃，再也无力组织反击。

在西江前线一片凯歌中，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的通电，要求各军“格从命令”，努力完成“为国家除叛逆，为广东去凶残”的倒陈任务。

在西路讨贼军和从福建而来的许崇智东路讨贼军、经粤北南下的朱培德赣军、南路讨贼军黄明堂部的围击下，陈炯明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他见大势已去，被迫放弃广州，退往惠州，并于1月15日宣布下野。

1月16日，张发奎率部随讨贼联军顺利占领广州。

孙中山在上海得知讨贼军取得全局性胜利之后，发布了一项命令，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2月21日，他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第三次组织革命政府。也是最后一次。

张发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中山先生。

二、升任团长，肇庆大捷

广州重光，四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然而，斗争远未结束。

当时广州城里各路大军云集，各省许多军人政客纷纷在此建立司令部，计有川、陕、粤、湘、黔、滇、桂、鄂、豫、鲁、晋等大小司令部13个，情形十分热闹。尤其是以杨希闵、刘震寰、沈鸿英为首的滇桂联军进驻广州后，旧病不改，争权夺势和专横跋扈的军阀作风恶性膨胀，他们凭借军权在握，胡作非为，大开赌档，卖鸦片烟，弄得乌烟瘴气。

孙中山气得七窍生烟，召集各军旅长以上将领到河南士敏土厂的大元帅府训话，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哪知训骂一顿后，滇桂联军情形如故，继续与许崇智大闹矛盾，甚至公开拘捕孙中山任命的广东省长胡汉民、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使广州政局重现险情。而处于弱势的粤军第一师随时有被人吞并的可能。

粤军第一师本来每月200元军饷，平均每人一毫钱的伙食。魏邦平被捕后，军饷无处领，变成无政府状态，不免照当时坏习例，开赌筹饷。张发奎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恨恨地说：“这回对不起广东，我们竟引狼入室了。”但粤军第一师的力量只有邓演达、陈济棠2个旅，和张发奎100多人，总共加起来不够2000人。他们担心野蛮的滇桂军，随时会缴部队的枪，参谋长李济深决定率第一师偷渡黄埔到江门去，逃离滇桂军的势力范围。

粤军第一师成功离开广州后，在江门大约住了半年。在孙中山的关怀下，经过整顿，改编为粤军第四军，由梁鸿楷任军长，将第一、第二团改编

为独立旅，第三团早已投归陈炯明，剩下的第四团及工兵营5个营，则编为第一师第二旅，以陈济棠为旅长，邓演达为第三团团长，戴戟为第四团团长，并将张发奎部及新入各部编为第一师第一旅，以卓仁机为旅长。张发奎升任该师独立团团长。

张发奎在独立团成立大会上，开宗明义，宣布了建团的宗旨："革命军队的要素，是奉行三民主义，执行本党的命令，用人公开，财政公开，这四者革命军队起码的条件，非如此不得稳军心，得民心，我们必须共同认识，坚决贯彻。"

张发奎一如既往，在台上站得笔直，头高昂着，说话声音不高，一字一句却非常有力：

"我们要继续贯彻邓仲元先生的遗志，在教育方面，军事与政治并重，特别要注意实践教育，在用人方面，要以品德、能力、资历、战功为标准。彻底廓清以同姓、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为权衡的封建意识；在财政方面，必须涓滴归公，不得营私舞弊。各部队如有缺员截旷，要一律上缴为公积金，用于充实人马、器械、被服和改善官兵生活……"

全团官兵，都屏息静气，仔细听取了他的训示。后来，这些制度，特别是公积金制度，便成为张发奎治军实行的制度。至此，张发奎才觉得，粤军第一师已彻底清除了陈炯明的势力，开始恢复邓铿先生时代的精神。

这是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孙中山苦苦支撑着南方的局面。

同年4月，反复无常的桂军沈鸿英部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以韶关为基地，在西江和北江发动叛乱。孙中山镇定自若，下达了讨伐沈鸿英的命令，命令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滇军杨希闵部、西路讨贼军刘震寰部和驻江门的粤军第一师立即出师，围歼沈鸿英叛军。李济深带领陈铭枢、张发奎、邓演达和陈济棠部奔赴清远参战。

一场恶战，终以沈军被打垮告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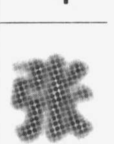
5月6日，粤军第四军奉命进攻在肇庆的另一部沈军黄振邦等部。他们在军长梁鸿楷指挥下，很快将肇庆城团团围了起来。由于城高墙坚，久攻不克，伤亡十分严重。新任大本营参谋长蒋介石奉命前来通知："吴佩孚之方本仁部已进至南雄附近，如肇庆再不能攻下，则大局危矣。"旋即调整部署，三团长邓演达被任命为攻城指挥官，指挥第一、第三师分别从东、西两门攻城。

张发奎率领全团承担起攻坚任务。革命军以步兵为掩护，组织地雷队埋雷炸城。黎明时分，一声巨响，惊天动地，将东城墙炸开缺口10余处，敢死队攻入城内，全歼顽敌，俘获叛敌黄振邦旅长等，这就是肇庆大捷。

紧接着，李济深又率领第一师开往西江上游。进驻广西梧州，帮助新起的力量还不大但又富有朝气的广西军事首脑李宗仁、黄绍竑肃清沈鸿英残部，接管梧州。

在梧州城，张发奎第一次见到了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等广西将领，在以后的岁月中，张发奎与这些新桂系的代表人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三、千里驰援，解围博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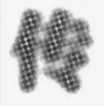
“张团长，卓旅长叫你马上到旅部开会。”通讯员上前报告。

“知道了。”正在观看士兵操练的张发奎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粤军一旅旅部。



旅长卓仁机正等着他：“张团长，刚接到中山先生的紧急命令，命令我旅立即开赴粤东前线，解救被围困在博罗县城的许崇智部。”

“什么事这么急?”张发奎问。



“沈鸿英残部被肃清后，中山先生为早日消灭陈炯明残部、攻下惠州城，于8月亲赴前线督战。他派粤军第二师第一团、滇军杨延培一旅至博罗，会合已在博罗整训的许崇智部，沿东江河进占泰尾墟，切断东江上游敌人的供应线。叛军觉察出他们的意图，即派出陈修爵、李易标等部约5000人，先行袭击博罗。”卓仁机指着墙上的挂图介绍说，“叛军先是占领了博罗城北面之高地，向城之东西两面包围，博罗三面受敌。许崇智率部坚守10来天，粮弹将绝。中山先生非常焦急，电令我们粤军一旅星夜兼程前往解围。”



“好，我们出发。”张发奎回答得很干脆。

当天晚上，全旅集中台山县城台城，乘火车开抵江门。第二天改乘船驶赴孙中山行营所在地石龙。9月4日早晨一到石龙，卓仁机即由随大元帅东征的古应芬陪同，前往行营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一旅来得及时，非常高兴，命令他们原船开赴苏村，归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指挥。

一旅赶到苏村后，在“珠江一叶”的电船上，卓仁机与张发奎等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握住他们的手，恳切地说：“你们来得正好，敌人已包围博罗10来天了，城里情况很危急。请火速率队前往，限于当天解围。”

军令如此之急，一旅没有再停留，向博罗前线进发。9月10日下午3时，他们进入博罗西边的笔架山，占领了阵地。另一支援军杨希闵率领的滇军也于此时赶至。

陈军发现对方大部队援军到来，害怕受到内外夹击，马上收缩队伍，退回城北高地。

邓演达乘敌退走之际，马上冲出西门，到阵地来会卓仁机、张发奎，他紧紧拥抱两位战友："你们再不来，我们连饭都吃不上了。"

接着，邓演达带着他们进城谒见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许崇智说，敌人已经撤退，令你们一旅配合大部队迅速追击敌人。

张发奎回到团部后，连夜率部追击，顺利进入河源城。

四、阵前巧遇，石龙兵败

进入河源城后，张发奎大病一场，被送往省城广州医治。

他没想到的是，讨贼军在兵力优胜于敌人，又是得胜之师，照理应该一鼓作气追歼逃敌，但讨贼军到此却停止了进攻。总司令许崇智随队进入河源不几天，便把指挥事务交给参谋长张国桢，自己溜回广州。一部分高中级军官在他走后不久，也效法返回省城"快活"去了。参谋长张国桢为人气量狭窄，与下属关系很不融洽。部队纪律松散，士气低落，聚赌之风盛行。一个多月后，陈炯明叛军大举反攻河源，讨贼军便力不支而溃退了。

正在广州治病的张发奎得知敌人反攻河源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坐卧不安。他连忙要求出院，请战回前线。于是，在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的率领下，张发奎与其他在广州休假的军官匆匆赶回前线。

泰尾墟北临东江，不利于作战。李济深决定把战线设在泰尾东边10公里之柏塘和杨树一带山地。当张发奎团开到柏塘时，敌军林虎部的先头部队也到了柏塘附近。李师长和滇军将领商定了如下作战计划：粤军第一师在柏塘右翼，滇军在左翼，向敌人展开攻击。第一师以陈济棠第二旅为主攻部队，一旅张发奎团为第一线的预备队。以张驰团为全线的总预备队。

这天拂晓，东方才露出鱼肚白，讨贼军向敌人搜索前进。这一带山峦起伏，树林密布，很难观察到敌人主力动静，张发奎站在高地上，用望远镜观察，发现了对面小高地上有敌旗和零星的士兵。

这时，枪声大作，担任主攻部队的第二旅第四团开始向敌展开猛攻，战

斗中，一支敌军突然从侧面出击，主攻部队很快稳住阵脚，将敌击退。流弹四飞，负责主攻的营长香翰屏腿部受重伤，被抬离阵地。士兵们见营长伤重离阵，慌了阵脚，跟着溃退下来。

张发奎一看，大势不好，发动预备队想稳住战线，从右侧面加入战斗。叛军也出动预备队压了过来，把张发奎整个团围在中间，情势十分危急。

这时，战场上出现了戏剧场面。一位敌军官隔着烟火大声问："喂，你们是哪个部队?"张发奎属下的一个参谋有些奇怪，仍然答道："粤军第一师卓仁机旅。"敌军官竟连忙喊道："自己人，别打了，别打了!"

原来这林虎部队中有许多是李烈钧的旧部下，和卓仁机很要好。林虎本人还是卓仁机的拜把兄弟。因此，他们把卓仁机部队当作"自己人"看待。张发奎马上带领部队冲出敌围，躲过一劫。



不久，敌人继续发动进攻，攻势猛烈。讨贼联军因进攻失利，士气低落，经敌人几次冲锋，阵地便被突破，全线大溃退。

讨贼联军从柏塘直退博罗，略作抵抗后，又向石龙方向退走。数万人拥过石龙的石滩桥，秩序甚为混乱，人仰马翻，自相践踏，损失惨重。负责后卫的张发奎见状，冷静处置，带队伍绕道而行，这才避免了损失。

讨贼军撤过石滩桥后，直退广州。陈炯明叛军洪兆麟部沿樟木头、石滩尾追至广州市郊石牌，广州已受莫大威胁。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奉孙中山命令从北江增援广州的豫军樊钟秀部、湘军谭延闿部于 11 月 19 日及时赶到。这支力量一加入战斗，战局骤然改变。陈军受挫后撤，讨贼军乘胜反击，把敌人赶到增城。

战乱平息后，粤军第一师回到肇庆整补。



第四章　统一广东，东征风云急

一、出兵东征，夜袭河田

转眼到了1924年。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历练，张发奎日益成熟，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这年，有两件大事受到张发奎的关注，一是孙中山于1月20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中国革命开始进入新时期；二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

当时，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改编为第十二旅，任命陈铭枢为旅长，张发奎独立团改称第一团，他仍任团长。张发奎出身于农民家庭，对“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衷心拥护，对共产党人也有好感；而对于创办军校，他本人是军校出身，坚信军校对培养革命军人的作用，希望黄埔军校能建成一个异于旧军校、不受军阀左右的全新军校。

9月，就在孙中山在韶关组织第二次北伐时，北方发生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结果直系战败，总统曹锟被囚，吴佩孚逃往湖北。冯玉祥控制北京后，将所部改编为国民军，与奉系张作霖讲和，共同在北京成立临时执政政府，任命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总理。接着，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共同电邀孙中山北上北京，共商国是。11月4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并于12月31日到达北京，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

正当全国人民盼着孙中山先生能在此次北上达成和平大计时，粤东战火又起。

1925年元旦刚过，陈炯明勾结江西的方本仁，分三路进攻广州。广州

大元帅府决定东征陈炯明，任命建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兼任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任前敌总指挥。东征部队于2月1日分三路东进：左翼滇军杨希闵部攻河源，中路桂军刘震寰部攻惠州，右翼由蒋介石指挥，攻淡水、潮汕。右翼军由建国粤军和黄埔学生军组成，共有3000多人。

开始时，东征部队势如破竹。右翼部队在短短一个月间，先后占领淡水、海丰、潮安、汕头等地。陈炯明的部队节节败退。不料，由于东征军左翼和中路停滞不前，据守河源、兴梅一带的陈炯明主力部队林虎部2万多人，南下集结于河婆（今揭西）、鲤湖、棉湖一带，分数路如暴风急雨般袭来，企图切断右翼东征军的补给和后路。蒋介石见形势危急，电令在普宁休整的2个黄埔学生团前往迎敌；命令建国粤军陈铭枢第一旅、欧阳驹警卫旅，火速支援。

作为后续部队，张发奎所属的建国粤军第一旅和欧阳驹警卫旅，是在淡水之战后投入战斗的。当时，粤军第一旅旅长陈铭枢辖2个团共约3000多人，其中，第一团团长张发奎，中校团附许志锐，所属3个营；第二团团长蒋光鼐，中校团附方纬，所属2个营。

部队于2月下旬由肇庆经广州、平湖、淡水、平山、三多祝、公平向粤东挺进。3月11日，当队伍前进至紫金上栅时，旅长陈铭枢接到前方侦察员探报，河田附近发现敌军林虎部黄兴中旅,便果断下令，部队于次晨3时分左右两路前进，限拂晓前向敌军进攻，占领河田。

接到命令，张发奎第一团连夜急行军，率先从右翼进攻。

夜雨绵绵，伸手不见五指。部队沿着崎岖的山道摸黑前进。粤东一带都是低矮的丘陵山地，山林密布，陡峭难行。“快，跟上！”张发奎抖了抖身上的雨水，挥手让队伍迅速跟上。他见一个小战士不小心摔断了腿，忙示意警卫员把他扶上自己的坐骑。一个闪电，照出张发奎瘦黑而坚毅的脸，小战士见是自己的团长，不敢上马。张发奎低声呵斥：“少啰唆，赶路要紧！”

翻过几架山梁，穿过一片黝黑的松树林，视野豁然开阔。山下是平整的水稻田，稻田外堆着高低不一的房屋。透过稀疏微弱的灯光，大致勾勒出一个小镇的轮廓。

“团长，前面就是河田镇。”团附许志锐指着灯光处对张发奎说。

张发奎站在高地上俯视河田的地形。雨已停，河田正沉睡在梦中，几座比普通平房高出半截的碉堡显得狰狞可恶。小镇里隐约传出“嘭嘭嘭”的梆子声。他抬腕看表，已近凌晨3时，低声命令：“按原计划行动，拿下河

田。”

负责主攻的一、二营官兵在三营掩护下，迅速开始行动。大约一袋烟的工夫，作战参谋跑步前来报告：“报告团长，我军已闪电般占领河田，毫无防备的敌军没有抵抗，全部瓦解，敌团长被生擒，缴获枪械 300 多支，敌残部向梅林方向逃窜。”

“打得漂亮，赶紧打扫战场。”张发奎脱掉已被雨水打湿的军帽，露出难得的笑脸，他又叮嘱了一句，“叫炊事班烧点生姜汤，让战士们多喝点，小心感冒。”

二、千里追击，攻打兴宁

12 日下午 6 时，部队正准备开饭，旅长陈铭枢急招来张发奎、蒋光鼐两团长：“刚才接前敌总指挥蒋介石急电说，右翼军在棉湖正与敌剧战，情况十分危急，要我旅急速开到河婆，限 3 月 13 日到达，截击敌人。”

张发奎看了眼墙上的挂图，说：“由河田到河婆约 80 公里，我们再来个夜行军，天亮时可赶到河婆。”

于是，部队匆忙吃完晚饭后，连夜出发，天露出鱼肚白时，赶到河婆。张发奎见跟随第一旅前进的欧阳驹警卫旅也同时到达，非常高兴，命令队伍稍作休整后，准备渡河，截击敌军。

河对岸，敌军见东征军援兵到来，沿大山向罗甘坝撤走，不敢恋战。张发奎大手一挥，对三营长黄琪翔下令道：“命令你营为追击队，别让敌人跑了。”黄琪翔是张发奎最为欣赏的营长，他率三营一个百里急行军追到罗甘坝，但敌人跑得比兔子还快，丢掉包括旅长乘的大轿等一批笨重物资，其惊惶之状可知。

当晚，粤军第一旅和欧阳驹旅在河婆宿营。已被解围的蒋介石率教导二团和黄埔学校学生军，也由棉湖到达河婆，与他们汇合。

蒋介石设便宴招待陈铭枢、欧阳驹两个旅的主要军官，感谢他们增援及时，帮右翼军解了围。他介绍说，右翼部队在棉湖一带遭到敌人的围攻，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很大。所幸你们两个旅来得及时，不仅解了我们的围，而且取得棉湖大捷。此役林虎主力遭重大损失，我军也伤亡千人之上。

刚才两军会合时，张发奎见何应钦团损失很大，营以下主官大部分伤亡，可以料见棉湖一役的惨烈，不禁佩服这群黄埔“学生兵”首次出征就能

打得如此顽强。

紧接着，东征军由河婆向粤东前进，一路披星戴月，于 18 日下午到达兴宁城郊。蒋介石下令攻打兴宁县城，其部署如下：钱大钧教导一团位置于西南门，蒋光鼐团位置于济桥竹子赉山，张发奎团位置于神光山。

神光山是兴宁城外的一座小山，居高临下，为兵家所争之地。负责守城的敌军将领林虎原是老桂系军中的名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东征军绕道直取兴宁的计划如此神速。不禁大惊失色，一边命令关闭城门，准备应战，一边急令外围部队从水口赶来支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神光山。

19 日天刚亮，敌军开始向神光山猛烈进攻。张发奎在阵地上集中火力，向敌还击。战斗不到半个小时，进攻的敌军就被击败，仓皇向梅县方向逃跑。张发奎令队伍追击，缴获敌步枪 600 多支，俘虏敌兵 500 多名，大胜而归。





战斗结束后，张发奎令黄琪翔率其第三营开到竹子赉山，支援第二团阵地，并叫人通知陈诚的炮队开炮，掩护队伍横渡南济河。时任炮兵队长的陈诚，拥有两门苏式山炮，位置在第二团阵地内竹子赉山。可是陈诚接到通知后，却拒绝说："没有蒋团长命令，不能开炮。"张发奎一听，气得大骂"丢那妈"。

此时，蒋介石下令全线进攻，第二团和第一团三营全部冲锋过河，冲破敌阵地，敌军大败而逃。至此，兴宁外围之敌已被肃清。

蒋介石随同加伦将军到第二团竹子赉山阵地视察。加伦将军对第一、第二团官兵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赞许说："按照计划，我们本来准备下午 1 时开始攻击敌人的，谁想到上午 11 时外围之敌就被你们肃清，你们今天的战斗同苏联十月革命战争时红军一次漂亮的攻击一样英勇。"

蒋介石把张发奎叫到跟前，低声问："张团长，我昨晚有一封命令叫你团第三营的连长送去的，要调你团第三营接防西门防地，有没有收到？你查一查。"张发奎摇了摇头："没有接到这封命令，刚才第三营牺牲了一个连长，不知是不是这个连长接收的，待查。"

张发奎还向蒋介石告了一状："炮兵队长陈诚，我们冲锋时，叫他开炮掩护，他不开炮，坐失时机，不如将炮交给黄营长使用。黄琪翔是炮兵人才。"

蒋介石没有表态，默然离开。陈诚是他亲信，山炮是他的宝贝，他怎么能舍得？

林虎见神光山没有拿下，已无力应战，便指挥部队突围。下午1时，钱大钧教导一团，开始由西门用竹梯登城，很快攻入城内，林虎则向北门逃走。是役，东征军总共伤亡数十人，而缴获枪械服装甚多，林虎心爱的7条宠物猫狗因来不及带走，一并被“俘”。

攻下兴宁后，张发奎来到黄琪翔营部，黄营长拿出一支德国七九步枪给他看：“团长，我们团都是杂枪，这种德国造的枪很好，我们要从敌人手里缴这样的枪来补充。”张发奎点点头，转而问黄营长蒋介石那封命令的下落。黄营长诡秘地笑了笑：“命令是接到了，我认为调我营接防西门没道理，便将全营开到神光山脚大榕树下休息，准备明早迎击水口回来之敌，当我团正与敌剧战时，我营由敌后冲击，敌人就慌乱逃走了。”

张发奎拍拍他的肩膀，哑然而笑。

当时，人们都笑林虎残部是沿途拉烂屎逃跑的。因为农民拿桐油煮粥给他们吃。此外，农民还到处袭击林部残军，弄得官兵惊惶失措。对照东征军所到之处，群众送茶送水，供给情报，打锣敲鼓欢迎，与敌军受到的冷遇，形成强烈对比。因此，张发奎深切地感受到，这次东征军能迅速击败在人数上超过一倍以上的敌人，是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以后治军，张发奎都非常重视部队的纪律与思想工作，重视军民的关系。

正当东征军攻克潮汕、进兵兴梅时，传来孙中山先生因操劳过度，肝病复发，不幸于3月12日在北京逝世的噩耗，但为不影响士气，蒋介石一直秘而不发。直到攻克兴宁、梅县后，3月30日，东征军才在兴宁北门外习屋坝召开追悼大元帅及阵亡将士大会。各军将士官佐以及县属政、学、农、工各团体约5000人参加了会议。

张发奎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他在全团公祭仪式上含泪对官兵们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逝世，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损失。但是，中山先生的精神不死，他激励着中国革命者前仆后继，沿着他开创的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道路阔步前进。

三、统一建军，弟弟牺牲

风云突变，第一次东征刚结束，广州后院又起火。

原来，右翼军在乘胜追击陈炯明残部时，左翼滇军杨希闵部和中路桂军刘震寰部不但不前进平叛，反而暗中勾结陈炯明，乘孙中山逝世之机谋反，

企图夺取广东革命政权。正在前线指挥的蒋介石获悉杨、刘叛乱，怒发冲冠，急率东征军主力星夜兼程，回师讨伐。6月12日，东征军攻占广州，平定杨、刘叛乱。至此，广东革命政府清除了心腹之患。这次平叛，张发奎再一次深刻认识到，靠充满私欲的军阀是无法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

同年7月1日，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8月26日，在苏联顾问帮助下，国民政府将所部粤、湘、滇军，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共有6个军，并参照苏联红军模式，设有党代表：第一军军长蒋介石，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组成；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由原湘军改编；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由滇军改编；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由粤军第一师扩编而成；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由粤军改编；第六军军长程潜，党代表林伯渠。张发奎因功升任第四军第一独立旅旅长，











正当张发奎沉浸于建军、升官的喜悦时，粤东却传来噩耗，他心爱的弟弟张发萱（字贵斌）在战场上牺牲了。

贵斌出生于1900年，在家排行第三，是张发奎的大弟，性情聪慧，体魄壮实。作为长兄的张发奎离家出走后，懂事的贵斌承担起帮助父亲、照顾弟妹的重担长达10年，这使张发奎内心十分感激。1924年，贵斌听说哥哥当了团长，特地从家乡千里迢迢前来投奔，要求从军报国，张发奎便安排贵斌当了一个不戴军衔的军需官。

谁想到东征军主力撤离汕头后，在英国人和北洋军阀的支持下，陈炯明率领残部第二次东山再起，打败了留守汕头的何应钦的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一团，逐步重新占领了韩江和东江流域。这年7月，在河源石公神，张发奎因病离队，暂时把队伍交给黄琪翔带领。部队遭遇叛军李易标部，一场恶战由此而开，由于敌强我弱，部队被困，贵斌愤然夺过一支驳壳枪，振臂高呼，掩护部队杀出重围，自己却因弹尽而牺牲，年仅25岁，死后连尸骨也未能找到。

张发奎闻此消息，欲哭无泪。贵斌是在他的帮助下参加革命军的，像他一样，作战非常勇敢，进步很快。张发奎无法相信这朵年轻的生命之花就如此夭折，一连三天三夜，他都陷于深深的痛苦中，寝食不宁。

1939年8月8日，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时，特地回家，在父母墓地不远处，为贵斌修了一个衣冠冢，并在旁边建了一个“贵斌亭”，亭里竖着《二弟贵斌衣冠冢志》石刻，读来十分感人。在碑文的最后一段，这样

写道：

> 十余年来，吾以戎马倥偬，未为贵斌谋纪念，隐痛良深。七七国难后，更以转战大江南北，无暇及此。本春奉命回粤，忝长两广战区。每怀浴血抗战诸将士之与贵斌同此忠勇无前者，不可胜计，安得一一为之纪念哉！大敌未除，国仇未报，抚生恤死之责未尽，吾心伤痛，较悼贵斌尤甚。今为贵斌设衣冠于故乡，与其谓为勒石以纪吾弟者，毋宁谓为勒石以记吾过也。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贵斌何有于衣冠冢乎！

张发奎还把在矮岭村建的一幢私邸取名“贵庐”，以表达对弟弟贵斌的深切思念。据说，贵斌的死对张发奎影响很大，后来，他招兵时，一般都不在自己家乡招，因为打仗是要死人的，他不忍心看着家乡子弟战死沙场，自己回来愧对父老乡亲。

四、二次东征，双头设伏

这是一个乱世出英雄的时代，国家的不幸给无数热血青年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他们在群雄争霸中各逞其能，在充满挑战与诱惑里脱颖而出。张发奎注意到，在第一次东征陈炯明和平定杨、刘叛乱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蒋介石，势力越来越大，成了当时一颗曜曜升起的“政治明星”。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先生被刺，震惊中外。蒋介石成功地利用了负责调查“廖案”的机会，采取步步为营战术，先是拘捕了主使犯胡毅生（胡汉民的弟弟）和第四军副军长梁鸿楷，接着，又驱逐党内元老胡汉民出洋，随后以许崇智企图与逃到香港的陈炯明联系为由，逼迫许崇智交出军权、离开广州去香港。由此，蒋介石升任为军事部长，取得了国民政府的军事指挥权。张发奎对蒋介石打击粤军、夺取军权这一套特别反感，此后，他与蒋介石一直格格不入，蒋介石对他也未予以充分信任。

9月下旬，菊黄蟹肥，秋风渐起。国民政府决定再次东征陈炯明。

东征军分为3个纵队，蒋介石亲任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以何应钦为第一纵队长，直攻惠州；以李济深为第二纵队长，辖第十一师、张发奎独立第一旅、第十二师之三十四团，及潮梅留守部队，沿东江左岸向淡水、马鞍前

进；以程潜为第三纵队长，随同第一纵队前进。这次东征是在统一组建国民革命军后的首次出征，与第一次东征相比，决心更大，力量更强，队伍更团结。他们打的第一个硬仗，就是惠州。

惠州是叛军的重要据点，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又有杨坤军共计 5000 多人防守。东征军这一仗打得特别惨烈，共激战 20 多天，付出巨大的牺牲，才于 10 月 14 日，打死敌军长杨坤，攻克惠州城。

东征军攻占惠州后，蒋介石一面电令陈铭枢力拒南路之敌，一面下令兵分三路，第一纵队为右路，经梅林出海丰；第二纵队为中路，经平山出三多祝；第三纵队为左路军，经石公神出河源。22 日晨 3 时，第一纵队主力第一师向梅龙西羊蹄岭之敌进攻，下午 5 时，占领海丰城。



在第一纵队奋战之际，第二纵队的张发奎率部一路前行，进至汤坑。突然，前方炒豆般枪声大作。侦察参谋骑马前来报告说，我军与陈炯明部黎生股人马遭遇，敌方约有 6000 余人，正在阻击我们。张发奎跳下马，命令，占领制高点，消灭这群“拦路狗”！







部队迅速展开，尖刀营向敌阵地展开强攻，遭到敌猛烈炮火的打压，伤亡很大。张发奎又令，注意减少伤亡，组织更强的进攻。

又是几轮冲锋，双方苦战数小时，敌不退。

残阳如血，张发奎急令第三十四团增援，但一直打到天黑，敌仍不退。

张发奎喝了口警卫员递上来的水，说：“这回我们碰上硬骨头了，看来今晚不要睡觉了，通知预备队迅速吃晚饭，换下前方部队。”



午夜时分，张发奎利用队伍善打夜仗的优势，组织新一轮进攻，战至拂晓，方把敌击退。

战斗结束后，张发奎察看了汤坑、双头地势，认为这一带是叛军必经之地，正好在这里布下埋伏，与第一、第三纵队的友军配合，给敌人来个“关门打狗”。

果真 4 天后，他们在双头制高点修复好阵地，张发奎就得到战报：叛军在第一、第三纵队的双重打击下，创伤惨重，节节败退，余部正向双头溃奔。

“敌人来得正好！”张发奎命令全旅迅速准备战斗，迎击敌人。

叛军两日来未曾休息，虽已有些筋疲力尽，但其兵力是张发奎的几倍，他们如狗急跳墙般，向张发奎的部队发起孤注一掷式的冲锋。

这是一场恶战，双方交接后顿时打得天昏地暗。

张发奎在前沿阵地大声动员："弟兄们，敌人给我们包围了，此战关系到东征的成败，我们就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能让敌人跑了！"

双头一带多是山地，张发奎一边沉着地指挥官兵利用有利地形抗敌，打退敌人几十次进攻，一面派人与友军联系，请求增援。下午3时，军号声起，独立团跑步前来增援，顿时士气大振。

张发奎从身边战士手里夺过一支轻机枪，高喊："契弟，跟我冲啊！"率先冲了上去。一时间，"契弟，冲啊"声四起，官兵们犹如猛虎下山，向叛军组织了大反攻。在张发奎旅的强大气势冲击下，叛军不支，纷纷举起白旗而降……

接着，东征军长驱直入，连克潮汕，陈炯明叛军土崩瓦解。11月6日，蒋介石发表了收复东江通电。

五、率部南征，横渡琼岛

"旅长，李军长急电，命我旅火速参加南征行列。"作战参谋送来一份加急电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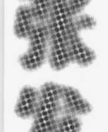
张发奎看着电报，不禁眉头紧锁。

原来，盘踞在广东南路八属的效忠于陈炯明的邓本殷部乘国民革命军东征之机，出兵进犯恩平、开平、台山、新会等县，国民政府速命李济深为南征军总指挥，讨伐邓本殷部。南征军分兵三路，由李宗仁派遣广西精锐向高州、廉州进迫；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梁鸿林部向四邑三埠前进。谁知，十二师师长梁鸿林听说第四军副军长梁鸿楷被蒋介石扣留后愤而叛变，枪口反倒对准自己的"兄弟"第十师。在单水口一带，南征军正与叛军激战。

张发奎抬头对作战参谋说，命令部队轻装前进，迅速参加南征作战。

3天后，张发奎率部及时赶到阳江，刚好遇上已与南征军激战三昼夜正在溃逃的叛军。来得好不如来得巧。张发奎这支生力军一阵猛打猛攻，邓军残部哪有还手之力，只好夺路而逃，纷纷向海南岛逃窜。

军长李济深前来探望全体官兵，夸奖张旅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并道："向华，军部决定，鉴于原第十二师师长梁鸿林叛变，你们独立旅扩编为第十二师，准备让你升任第十二师师长，想听听你的意见。"张发奎一听独立旅荣升第十二师非常高兴，但对自己任师长却一再谦辞："军长，本人尚年






轻，资历尚浅，第十二师是著名之师，需要一个有威望的人来担任。”李济深思虑再三，说：“向华，凭你的军功和经验，你完全胜任师长一职。这样吧，我尊重你的意见，由副军长陈可钰兼师长，在广州遥领，你以副师长负实际领导责任。你师管辖3个团，第三十四团团长为叶挺，第三十五团团长为缪培南，第三十六团团长为黄琪翔。除了叶挺团驻肇庆外，你们新组建的第十二师要做好渡海准备。投入消灭南路邓本殷残部的战斗。”“是。”张发奎给军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西风初起，霜染层林。台山一间小学校，第十二师司令部。这里作战图高挂，电话铃嘀嗒，人进人出，一片繁忙。

“报告，张师长，新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率10余名政工干部前来报到。”参谋在门口通报。

张发奎放下手中的文件，出来迎接。他高兴地握着廖乾五的手说：“廖主任，欢迎，欢迎你们呵。你们一路辛苦。”

廖乾五是中共党员，是受中共的指派到第十二师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当时在第十二师至少有百分之二十的中共党员，他们的勇敢与敬业给张发奎留下很深的印象。

廖乾五有力回握着张发奎的手：“久仰张师长英名，此次得以到贵师合作，甚感荣幸。”

“哪里，哪里。”张发奎回头对参谋说，“马上叫司令部的主要人员与廖主任见见面。大家认识认识。”

一会儿，张发奎见参谋长李汉魂等师部主要人员到齐后，逐一向廖乾五作了介绍。

双方落座后，张发奎见廖乾五言谈诚恳风趣，衣着朴素，完全像一位普通军官，便关心地问：“廖主任你是北方人，来广东能习惯吗?”

廖乾五回答说：“可以，请师长以后多指点。”

张发奎又问。“你不懂广东话怎么办?”

廖乾五指着身边的一个年轻人介绍说：“他叫魏鉴贤，是你们广东老乡，我就靠这位小同志当翻译。”

张发奎站起来，走近魏鉴贤的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细佬，你几岁啦?”

魏鉴贤立正回答：“报告师长，我今年18岁。”

张发奎笑着说：“好，你和我从军的时候差不多年纪呵!”

魏鉴贤端详着这位个子不高，身体结实，面孔红润光亮，性格开朗，说话热情诚挚的副师长，原来紧张的心情这才松弛下来。

当天晚上，张发奎设便宴欢迎廖乾五。廖乾五要魏鉴贤同去。魏鉴贤说："主任，我只是个上尉科员，你们都是官长，我就不去了。"廖乾五说："副师长、参谋长等都是广东人，我听不懂广东话，你去当个翻译，以便我和张师长他们彼此之间接触了解。"魏鉴贤只好应允。吃饭时，魏鉴贤显得非常拘束，张发奎见了，和蔼地对他说："细佬，不要客气，都是自己人。"

有一天吃饭时，张发奎和廖乾五谈论出兵南路，如何要求官兵遵守纪律的问题。廖乾五说："师长，现在广东人民最怕最恨的是军队拉夫、筹饷、扰民。我建议，第十二师这次南征，不要拉夫，不要筹饷，不要打扰老百姓。"张发奎听后马上说："廖主任这个建议非常好，我完全赞同。东征时部队就是这样做的，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执行？"接着，他征求席间的官佐们意见，大家对此表示赞成。张发奎随即说："明天部队出发时，要把这三条纪律向全体官兵传达，个个必须严格执行，违者严处。"

部队离开台山，浩浩荡荡向雷州进发。12月初，第十二师抵达雷州。

这天晚上，张发奎突然来到政治部住处，看到魏鉴贤和他人共铺盖，有些奇怪："细佬，你的行李呢？"魏鉴贤报告说："报告师长，我们在行军中，政治部由于宣传品及人员行李较多，负责运输的人力有限，廖主任指示我们，宁可把不必要的行李丢掉，也要坚决执行不拉夫的规定。我就和另一位科员把被子等行李留在阳江一个区公所了。"

张发奎高兴地点头夸道："细佬，不错。由于你们政治部带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对部队影响很大，第十二师各团营连至今没有出现违反三大纪律的事。"

1926年1月15日，琼州海峡，北风呼啸，海浪滔天。借着夜色，张发奎率第十二师分乘100多艘大眼鸡木船（帆船）在罗港渡海，向海南岛铺前港登陆进攻。

张发奎与廖乾五、黄琪翔等乘坐的指挥船是一艘拖驳火轮船。张发奎站在船头，全神贯注，观察海面情况。经过一夜的航行，士兵们身体虽有些疲倦，但个个精神抖擞，在拂晓时成功登陆，并发起总攻，很快攻占了铺前港及沿海阵地。

第十二师在琼岛所向无敌，如摧枯拉朽般，在数天内即将邓本殷部完全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终告统一。

在广州，陈可钰闻知张发奎率领第十二师又立新功，十分高兴，他向李济深坚辞所兼第十二师师长一职，并推荐说："张向华乃血性汉子，有雄才大略，责任感强，而且颇有前瞻的目光与魄力，这次南征指挥第十二师屡战屡胜，功绩显著，理应由他任师长。"军长李济深以为有理，答应了他的请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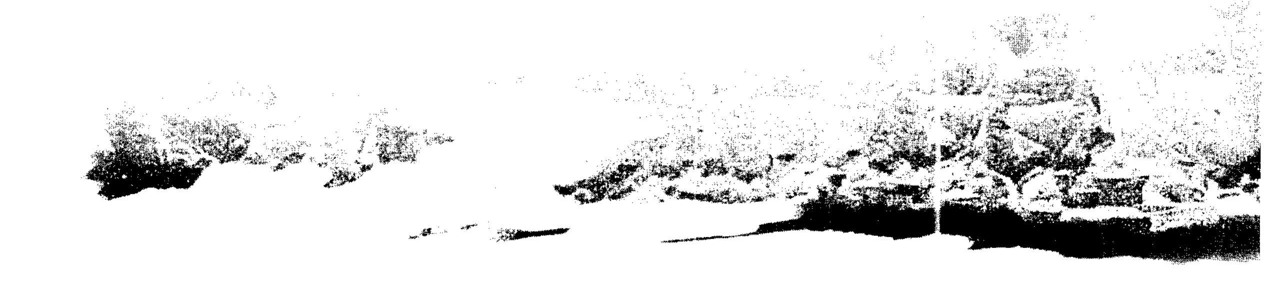
不久，军部下来委任状，张发奎任第十二师师长，朱晖日任副师长。这一年，张发奎刚好 30 岁。

第十二师进入海南后，驻守在府城及海口一带进行休整，师司令部设在府城一间庙里。张发奎任师长后，对自己和部队要求更加严格，一天吃午饭时，他对身边的军官说："按照规定，师长随身武装卫士四人，团长带两人，营长带一人，当然无可非议，但我觉得现在军官官架子太大，廖主任能以身作则，出门从不带卫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向他学习？"说着，他问黄琪翔："黄团长，出门不带卫士可不可以？"黄团长当即答复："可以，请师长下命令我们马上执行。"廖乾五主任赞许说："我赞成这样做，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这样便于接近人民大众，要给老百姓留下好的印象，就必需摆脱官架子。""好，就这样办。"张发奎放下饭碗，拍板道。

以后，张发奎和第十二师的将领上街，都不再带随身卫士。







第五章　攻城掠地，北伐打先锋

一、离开海南，率部北上

进入5月中旬，天蓝海蓝，椰林如帜，海南岛一片盛夏景象。每天黄昏，夕阳还悬在半空，师部一群人便跑到沙滩上，劈里叭啦脱光衣服，下海游泳，好在部队很少女兵，大家也就无所顾忌，嘻嘻哈哈在水里玩着，官兵不分。张发奎也常加入其中，并时常回忆起童年在墨江游泳的情景。

"师长，我回来了，军部有急令。"副参谋长许志锐匆匆赶到沙滩，大声招呼着。

张发奎一口气从深海里游到岸边，站起来，顺手把一条大毛巾系在腰间："嘿，志锐，你回来了，军部有什么要事？"

"李军长命令我师迅速回师广州，参加北伐。"许志锐咧嘴笑道。

张发奎喜出望外："我们就等这一天了。志锐，你刚从广州回来，给说说这北伐究竟是怎么促成的。"

在海边游泳的众军官听说要北伐，纷纷爬上岸，围了过来。

许志锐喝了口警卫员递过来的椰汁，道："我这次到广州出差，从军部了解到，上个月10号，桂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来到广州。他此行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成国民政府北伐。但因刚发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与汪精卫为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斗争已至白热化，加上国共矛盾日益恶化，他的北伐大计并没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蒋介石虽然同意李宗仁的见解，但一再强调，现在广州困难重重，如何能谈到北伐？"

"坐下来慢慢讲。"张发奎用大毛巾抹干头上的水珠，"后来怎么样？"

"说来简单，李宗仁与李济深军长都是广西人，两人过从甚密，这次到

广州，李宗仁就被专门安排到我们军部休息，李军长对李宗仁的北伐之论相当赞同，鼓励他应再接再厉，不可功亏一篑。”许志锐坐在一张藤椅子上，绘声绘色地说，“我听军部我的一个老同学介绍说，一天晚上，在军长的书房里，两人促膝长谈。李宗仁忽然灵机一动，对军长道：‘任公，你第四军可否自告奋勇，抽调两个师先行北上，待稳定湘南、湘东防线之后，我们再促中央北伐?’稍停他又道：‘任公之第四军乃粤军主力，主人翁自告奋勇效命疆场，势必影响其他客军。我们七、四两军，皆能征惯战之部队，一定可以把敌人打败。甚至可收复长沙，造成有利形势。’军长听罢，毅然而答：‘德邻，此意我完全赞同。’李宗仁道：‘这样吧，明天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我将列席参加。届时，我当再次提出出兵北伐的要求。我发言后，你即请缨，请政治会议决议，准许第四军北上入湘参战。’军长点首赞同。”







“军长支持北伐是英明之策。”张发奎问，“中央同意了吗?”

“第二天，李宗仁在会上，力陈北伐的重要性，请中央务明天时，速定北伐大计。他的话音刚落。李济深军长即起身道：‘德邻同志所言各点，十分中肯。形势已很明了，今日北伐，正是千载难逢之机，何况唐孟潇已声明附义，第七军正在前方苦战，并节节推进，北伐已势成骑虎，中央断不可坐视。’他摸了摸长须，提高嗓音道：‘为免七军与孟潇无援，第四军愿派两师前往，叶挺独立团即可出发。吾望各军袍泽，共襄盛举，中央更应速定北伐大计，早日问鼎中原，以慰先总理在天之灵，以慰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殷切之望。’”许志锐把这一段说得活灵活现，如临其境般，“李军长的慷慨陈词，使众人都为之感动。会场上一时无声，没有反对之语。结果，原则上同意李宗仁北伐的主张，决定组织北伐军司令部，推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

许志锐顿了一下，侧身道：“为促成北伐。李军长已派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入湘援唐，并令我们第十二师与第十师迅速回师广州。”

张发奎听罢，大声叫好：“有叶挺独立团打先锋，我们完全放心，希夷这个人我最了解。”

叶挺，字希夷，号西平，与张发奎是陆小同学，又一起任孙中山的警卫团营长，两人交情深厚。1924年，叶挺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赴苏俄学习，次年回国后，适值第四军扩充部队，张发奎力邀叶挺到第四军中当团

长。

叶挺说："这没问题。但要我当团长，就要当独立团团长。"张发奎爽快地说："行，我去跟李军长说说，把我所属的第三十四团调给你，成立个独立团。"李济深答应了叶挺的要求，当即委任他为独立团团长，并指定其部队驻在广东西江肇庆地区。

张发奎对叶挺说："请希夷见谅，因经费奇缺，第三十四团武器较差，对组建独立团不利，我也帮不上大忙。"叶挺知道，张发奎所说的第三十四团，其前身是铁甲车队，这是中共最早的一支军队，归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曾参加过两次东征，后来在第四军中取得第三十四团番号，官兵由共产党方面自己解决。

他便顺水推舟地答："向华兄能把第三十四团交给小弟，小弟已感激不尽。一支队伍，武器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问题是干部，有了好的干部就会训练出好的部队。我已向李军长提出，独立团的干部由我挑选。"

果真，叶挺亲自挑选独立团的所有干部，其中半数以上军官皆为中共党员，且皆为黄埔军校一、二、三期生，如陈赓、曹渊、卢德铭、许继慎等人，都为独立团的营、连、排长，同时招募了广西、湖南的一些贫苦农民和进步青年，官兵总共 2100 人。独立团组建后，训练比其他部队要求严格，官兵情绪高昂，纪律特别好。

张发奎关切地问许志锐："叶团情况怎么样？"

"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团已轻师出征。叶团入湘后，即迅速抢越郴州，急赴永兴，插进安仁，把由攸县南下的吴佩孚部队驱返攸县，叶之举使唐生智第八军无背腹暴露之虞，湘南一带亦肃清了敌踪。战场形势的发展使人振奋。"许志锐答道。

"好，叶团首战告捷，揭开了这次北伐战争的序幕。我们要迅速做好开拔准备，加入援湘作战。"张发奎深思一会儿，道，"我们第十二师下辖 3 个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和三十六团。现在三十四团主力改为独立团后，我想，志锐，由你重新组建三十四团，并任琼崖警备司令，我们走后，你负责海南岛的治安，在这里留守一段时间，暂时不参加北伐。"

许志锐听说不让他参加北伐，心一热，有些急，但他深明师长的用意，只好服从。

5 月 19 日一早，旭日东升，张发奎率全师将士渡船离开海南岛，昼夜

兼程；但见云卷旌旗，汗湿征衣，宿露餐风，枕戈披甲，沿途上，众百姓箪食壶浆，夹道相迎，情景感人。

二、周密部署，攻下醴陵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6月15日，第四军陈铭枢的第十师、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在广州举行北伐动员大会后，高唱着这首《国民革命》歌，乘坐火车至韶关。离开广州前夕，何香凝、邓颖超和孔若伟等作为广东妇女界代表到车站送行，赠送他们一面绣有“铲除军阀”四字的锦旗，以示鼓励。

当时，广州至韶关的铁路，非常糟糕，枕木有的地方已腐烂得很厉害，一碰便像豆腐渣一样碎掉，火车行驶得很慢，特别是上坡的时候，跟走路速度差不多。铁路长达250公里，它建筑在水流湍急的北江右岸，四周景色迷人，河水是蔚蓝色的，长满了灌木和竹子的高山从东至西将河谷团团围住。在每一个大站，都有由当地守备部队组成的仪仗队列队欢迎。他们高呼口号，燃放鞭炮，预祝北伐成功。这使张发奎备受鼓舞。

火车到了韶州，就是终点站。部队改为行军，沿着武江而上，翻过高高的九峰山，进入湖南郴县、安仁，沿途未遇强敌抵抗。

这次北伐，主要的敌人是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军队。吴佩孚控制着湖南、湖北和河南一部分，辖有7个步兵团、3个独立旅，共约10万人，加上湖南督军掌握有4个师和3个旅，近3万人。孙传芳集团控制着苏、浙、赣、闽、皖5个省，有近15个师、24个独立旅，总人数为22万5千人，但孙传芳的嫡系部队不过3万人。尽管如此，敌兵力优于北伐军，一场恶战势必难免。

6月30日，张发奎部抵达安仁，第二天，他便接到唐生智从衡阳发来的命令。

原来，在衡阳坚守的第八军唐生智部，由于得到北伐军第四军、第七军的支援，开始反守为攻。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唐生智

统一指挥入湘各军作战，部署进攻长沙计划。他决定以第八军、第七军担任湘江西岸作战，主攻长沙；第四军担任湘江东岸作战，攻占醴陵和株洲，同时警戒江西孙传芳部的窥伺，保证北伐部队右翼的安全。

张发奎见作战计划甚是周详，感叹唐生智不愧是将才，立即率部于 7 月 4 日到达攸县集中，当天，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也率部由衡阳赶到攸县。

在两师团以上军官联席会议上，张发奎首先发言："我先说一事，这次北伐由我们第四军陈可钰副军长担任副总指挥。由于陈军长有事没有赶到，为了统一指挥第十、十二师两师的作战，我推举陈铭枢师长为第四军临时指挥，代理军长，请大家举手通过。"

众人举手赞成。

陈铭枢本想推辞，但见张发奎一番诚意，只好接受了。他即以代理军长的名义发出进攻醴陵作战部署。

陈师长部署后，张发奎强调道，这一仗，打泗汾最为重要，泗汾解决后，其残余可能败退醴陵城，也可能溃窜江西的萍乡，醴陵也许就可以不战而胜了。因此，必须控制或切断萍株铁路线，才能肃清萍株线以南的敌人，巩固湘南广大地区的胜利成果。

7 月 6 日，张发奎带炮兵营、第三十五团和他的直属部队到新市。这时，叶挺由皇图岭打来电话："张师长，醴陵民众得悉北伐军将至，暗中组织了平民救国团前来协助。他们还将醴陵一带地形制成图表，送给我军。从他们送来的地图上，我发现在皇图岭以东约 10 余里的高枧有一条路可经清水湾直通沈潭。""希夷，你赶紧把地图送来。"张发奎率师入湘后，叶挺独立团归张发奎统一指挥。"我已经派快骑送来，很快就到。"叶挺答道。

地图收到后，张发奎仔细研看，发现自夏家桥西沿沈潭至泗汾、豆田一线，有河流横亘，不能徒涉，敌人配置重兵于此，倚为天然防线；由皇图岭北进泗汾，为通醴陵大路；而皇图岭之东 10 余里的高枧，果真有两条小路，一条北至清水港，可达沈潭；一条向东北可达美田桥。两条路相距不远，且清水港与美田桥之间均有高地遮蔽，容易联络。

张发奎马上用电话与陈铭枢取得联系，两人讨论后决定由高枧、皇图岭分两路前进。

一路由张发奎率第三十五团及第十师之第二十九团为右翼，以主力越过长家桥，向沈潭之敌攻击前进；一路由叶挺率独立团为左翼，从皇图岭出发，向泗汾之敌佯攻，以牵制敌之主力；陈铭枢率第三十团为预备队，由皇

图岭相机推进，策应各方；第二十八团和第三十六团则担任东线警戒。

7月8日，右翼军集结高枧，陈铭枢下达进攻醴陵的命令。

张发奎平时说话较随意，但下达作战命令则常用娴熟的军事术语："令第二十九团团长范汉杰率队由美田桥攻击前进，破敌后追至株萍铁路之楚东桥，即行停止，转对萍乡方面警戒，第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率部由清水港攻击前进，破敌后向醴陵追击，占领醴陵城。各部于9日准备完毕，10日拂晓实行攻击。"

部署完毕，张发奎自率直属各营队，随第三十五团前进。

7月10日早上6时，天已大亮，第十二师开始向沈潭夏家桥进攻。张发奎爬上将军岭一座高山上视察，透过淡淡的云雾，只听见前方枪声由疏而至密。他听了一阵，回头问："三十五团有消息吗?""刚接到缪团长的报告，三十五团第一营今早5时半由将军岭向沈潭出发，6时左右，部队即与敌军接触，发现敌军已占据了沈潭河边的防御线，他们一时难以前进。"作战参谋说。张发奎沉思片刻："敌人的意图很明显，想在沿沈潭河作战。依照原定计划，我们主力用部队从右翼进攻。马上下令给缪团长，叫他令第二营在沈潭向夏家桥方向猛冲；并令炮兵向敌方攻击；下令黄团长率队进攻瓦子街，包抄敌军后路。"

说完，张发奎即率第三营及直属部队向总预备队在将军岭前线右方的高地靠拢。

接到张发奎的命令后，缪培南令第二营迅速行动，加快第一营的右翼进攻。不久，第二营强渡沈潭河，与邻军第二十九团第三营相互配合，一阵猛攻，把右翼的敌军击退。

张发奎命令炮兵向敌阵地轰击，10分钟左右，敌军开始向三星里方向退却。

早上7时，第一营占据沈潭城。"打得好。"正在指挥的张发奎听到沈潭攻下后，非常高兴。这时，缪团长从电话中报告："我正率领预备队和第二营向敌军追击，第一营则暂时驻在沈潭进行休息和整顿，并警戒敌方左翼。"

张发奎亲率炮兵营及其直辖部队向三星里跟进，并令缪团长向神福追击。突然，泗汾方面传来密集的枪声，他心里一颤，从枪声判断，叶挺独立团在左翼还没有得手，而总预备队第二十九团又不知在何处，必须立即派出增援队伍，帮助独立团夺取泗汾，然后再向醴陵追击。

他抿了抿有些干燥的嘴唇，向作战参谋下达命令："令三十五团第一营从夏家坊包抄敌侧，支援独立团。"

一小时后，缪团长派人飞马来报，敌军有两部分退却，一向渌口，一向醴陵，现黄团长正率第一、第二两营及其直辖部队向渌口追击，而他则率第二、第一两个营向醴陵方面追击，第二十九团第三营留在神福山附近休息听候命令。

张发奎赶到神福山，与第三营会合。

上午10时30分，从夏家坊方面传来密集枪声，参谋报告说第三十五团第一营正向敌人进攻。张发奎三步并作两步，爬上一个高地，只见敌方所用的三角旗也是黄红色，从远处看与北伐军的旗帜没有多大分别，误以为北伐军是自己人，正在向他这个方向打招呼呢。而敌队中有颜色的坐椅，显然是敌指挥官。张发奎果断判断说："泗汾的敌军正准备向山下的大路上退却，命令工程队和驻在神福的第三营追击，同时令炮兵营迅速组织火力向敌方轰击。"

一时间，炮弹呼啸着向敌群落去，敌兵被炸得四处溃逃。工程队和第二十九团第三营犹如下山之虎向敌人追击，把敌人冲得七零八散。

太阳开始偏西，张发奎进驻柳树坳，正遇上叶挺。叶挺报告说，泗汾敌军已退，独立团正尾追逃敌，一直追至醴陵。张发奎说，看来醴陵已无敌军，我军应迅速占领醴陵。

下午5时30分，张发奎与陈铭枢各骑高马，率部昂首进入醴陵城。城内群众载歌载舞，高放鞭炮，夹道欢迎革命军。

应该说，醴陵一战，作为前敌指挥，张发奎的判断是正确的，战前他就断定，泗汾之敌大败后，其残余可能败退至醴陵城，也可能溃窜江西萍乡，因而必须切断萍乡铁路。战局的发展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泗汾攻克之后，残敌弃城北去，大部分东窜萍乡。

不久，陈铭枢指挥人马，一举攻克株洲。

时任第三十六团参谋长的李汉魂认为："攸县的胜利，是叶团独奏肤功，而醴陵、株洲的胜利，是第十师和第十二师共同创立的辉煌战绩，也真正是旗开得胜！较大规模的部队配合运动，提供了我军以后攻平江、围武汉等几个大战役的实战经验。"

三、军纪严明，百姓拥护

株醴两线敌焰涤荡之后，浏阳已陷无险可守的局面，长沙尽失屏障。李宗仁指挥的第七军、唐生智指挥的第八军于7月12日顺利攻克长沙。张发奎师随即进占浏阳。此时，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张发奎，对陈张率人马攻克醴陵，致以慰劳，并令他们分别在醴陵、浏阳一带休整待命。

张发奎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深知此次北伐意义非同寻常，特地在全师连以上军官会议上作动员："我们这支部队是在东征、南征中锻炼成长的，民众对我们的期望很高，因此，我们对自己要求要更加严格。在这里，我要重申军纪，除不拉夫、不筹饷、不扰民规定继续执行外，第十二师各团、营、连每到一地，要主动和群众联系，帮助群众挑水，准备柴火，打扫卫生；借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损坏，挖好茅坑。部队撤离后，要归还门板，捆好铺草，损坏东西要赔偿。同时，还要为群众担足用水，把房子打扫干净，所住过的地方不能留有部队居住过的痕迹。对于这些规定，一定要严格执行。"

军官们知道师长执法时说一不二，迅速把这些规定记在笔记本上，好回去执行。

张发奎伸出大手，屈指数说道："我还要在队伍中严格执行四大禁令：即不嫖娼、不赌博、不吹烟（鸦片）、不开小差；同时，还要执行'三大公开'，即各级军官都要财政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凡违反者，决不轻饶！"

军官们一听，更为肃然，这回师长来真的了。

张发奎平时与官兵相处很随和，但执行起军纪来从不含糊。在北伐途中，他常亲带一批政工人员下到部队的驻地检查连队执行规定的情况，有违令者，轻者关禁闭，重者枪毙，决不姑息。从此，"四大禁令"、"三大公开"成为张发奎治军的原则。

张发奎深悉宣传的重要性，要求政工人员每到一地，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四处张贴"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等标语口号，教唱军歌，让北伐战争深入人心。

第十二师驻守浏阳约20天，由于天气炎烈，时疫蔓延，不但部队伤员



增多，而且民间的疾病也很猖獗。虽然部队卫生设施和药品有限，但张发奎一方面要求卫生人员加紧治疗伤兵员，一方面也为群众施医施药。民间一大困难就是食盐紧缺。由于敌军在岳阳截留大批淮盐，强行奉公，这等于封锁了食盐南下的供应，以致盐商裹足，人民面临生活缺盐的威胁。张发奎知道此情后，要求后勤军需部门从广州源源解运食盐，酌量划拨供应市场。

这一着不下于千百门大炮机枪的威力，人民望风相拜，剖胆相从。有自动来密报军情的，有要求参军入伍的，有远道从平江而来苦诉民困的，还有许多由民众组织的民团局来人来函表示，只要部队需要，他们随时随地提供民夫和向导，他们会不辞劳苦甚至豁出生命来效力。这使张发奎深受感动。

当时，《广州民国日报》随军记者这样报道四军的出色表现：

> 该军官兵除政治工作之日与民众接洽外，其余各级官兵，莫不本‘民众化’之旨，到处以人民团体或个人，以极诚恳和蔼之态度，与之联络，及访问各地人民之生活状况与痛苦，并助人民组织团体。军、师、团各主要将领对民众大会，无不躬自参加，极力向民众解释各种革命理论。且一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尤其张师长一路来通，士兵露营之禾稿，亦皆自出金相酬。

四、临阵布局，直取平江

8月浏阳，赤阳似火。练兵场上，喊杀声一片。

8月16日，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在长沙接受任务后，赶到浏阳驻地社港市的前沿阵地，召开第四军作战会议，

陈可钰首先通报说，7月9日，北伐大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后，陆续开拔。蒋介石总司令让李济深军长留守广州，自己带着北伐总司令部于8月12日凌晨到达长沙，受到5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晚，蒋总司令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北伐第二期作战战略计划。会议决定，对赣取守势，加强警戒，对鄂取攻势，乘胜追击；把第八、第七、第四军合编为中路军，以唐生智为总指挥，进攻汨罗江、平江一线，直指武汉；以第六、第一军为总预备队，随主力跟进；以第二、第三军为右翼军，负责对江西方面警戒；另以附义的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担任左翼，从湘西以出荆、沙。另外，中路军再分为左、右两纵队：第八军和鄂军为左纵队，由唐生智兼任纵队指

挥，目的是攻取岳阳；以第四、第七军为右纵队，李宗仁为纵队指挥，任务是攻击平江。各军自 8 月 19 日起发起总攻击。

陈可钰从桌子旁站起来，下令道："此次会战，我军作为主攻部队，由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统一指挥第三十六团黄琪翔部和独立团叶挺部从中路进攻平江，第三十五团缪培南部从左翼佯攻平江西南高地，牵制敌人正面主力。"

"是。"张发奎起立接令。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指挥所属 3 个团，越过平江东南，渡汨罗江，插入平江城北面，配合中路作战。"

"是。"陈铭枢起立接令。

张发奎接受任务回到师部，马上派出多路侦察员探听敌情，察得平江守敌为吴佩孚之第二十五师第五十混成旅陆沄部，桂军第一路司令韩彩凤部和湘军杂牌军周凤歧部，共计 4 个师 5 万人马；守城人马由陆沄以蒲平镇守使兼平通警备司令身份统御。





平江城四周，多山地峡峪，易守难攻。陆沄乃北军中能征惯战之将。他早就料到北伐军会来进攻平江，便在平江城周围，甚至环平江城至汨罗江北岸的山岭、塘坳、大小道路、险要地段，均构筑了坚固工事，并在北伐军可进攻的路段上，加布地雷、蒺藜等物，并砍倒大树，推下巨石，作为路障。除此以外，还在平江城东南的鲁肃山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山炮、迫击炮和机关枪。陆沄经此布防，自以为平江固若金汤。

张发奎不敢轻敌。他考虑到，正前方天狗山及鲁肃山的敌人在河前面筑有坚固的战垒，硬攻难以取胜，不如另择进攻路线。这时，侦察员回来报告，除了正面路线，侧面还有两条：一条在白玉湖下面三里，另一条在止马铺附近。张发奎闻之，心生一计，决定采取包抄战术，派一部从正前方佯攻敌军前线，而把主力军从左侧包围敌人的两旁及后方。



每次战斗，张发奎都喜欢率他的师司令部随主力部队前进，以便随时靠前指挥，这次也不例外，第三十六团与独立团都是主攻部队，他便率直属队与两团保持最近距离。

8 月 19 日拂晓，第四军开始向平江攻击。早上 6 时许，作战参谋向张发奎报告说，右翼第十师在淡江方面已与敌激战，取得优势；左翼第三十五团也向平江西南鲁肃山发动声势浩大的佯攻。第三十六团及独立团也按原定计划前进。

在波碧滩附近，叶挺打来电话："本团到达狮子岩，特别大队已在星宿岭及童子岭与敌军接触，敌人死守苦战，打得很激烈。据当地百姓说，我第三十六团已打败敌人韩彩风部，逼他退到平江北门附近的高山。我亲率第一、第二营向平湾前进。"

听完叶挺的报告，张发奎一边把上述情形报告给军部，一边令叶挺率部向平江前进，与第三十六团联合作战，消灭在平江城的敌军；又令第三十五团猛攻，以便达到从两旁攻打的目的。下令后，张发奎统率直属队伍向平江挺进。

不久，第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飞骑来报："上午10时40分，我团从北门攻进平江城内，我正指挥余部从北门攻进平江城，直捣敌军司令部。"张发奎闻之大喜，立刻把战况向军部报告，并令黄团长与叶团长联合清除城内敌人，注意鲁肃山的动向。

"跟我上。"张发奎戴上头盔，肩挂冲锋枪，亲自指挥直属部队进攻童子岭，掩护独立团的预备队向第三十六团靠拢。直属部队的官兵早已手痒，见师长带头披挂上阵，二话不说，迅速出击，三下五除二便将这股敌人打败。

战斗结束后，张发奎看着堆成小山的战利品和成群的俘虏，连叫过瘾。

副军长陈可钰来到前线，见张发奎老毛病又"犯"了，责怪他："张向华，你现在是师长了，有你这样当指挥官的吗？出现万一怎么交代？"张发奎调皮地敬个礼："报告军长，下次一定注意。""你呀，30岁的人了，还像个孩子。"陈可钰无奈地摇摇头。

前方捷报频传。

第三十六团参谋长李汉魂率三十六团第一营从正面进攻击溃敌人后，抢占平江城西北一块高地，把军旗插到城头，随即开展巷战，团长黄琪翔也率部分人马杀入城中。敌我双方正激战中，叶挺独立团及时赶到，加入巷战，至12时许，已将城内之敌完全解决。敌守将陆沄见大势已去，呼号无援，举枪自毙，躺倒在指挥部。

平江之战，共计10小时，吴佩孚倚为"良将劲弩，信臣精卒"的精锐部队，顿时烟消云散，湘东北门户终为北伐军打开。嗣后，第四军把平江战场善后交给后续部队，继续向溃败之敌追击，几乎兵不血刃占领通城。

张发奎不禁哈哈大笑说，湖北督军陈嘉谟可是吴大帅之爱将，怎么也闻风而逃，丢下大批军用品，看他回去如何向大帅交差？

此时，第七军、第八军也已先后克复岳州、羊楼司、蒲圻等处，残敌纷

纷向咸宁撤退，据守汀泗桥一带待援，北伐战史上著名的汀泗桥战役，随即在这里揭幕。

五、星夜强渡，铁桥鏖战

几乎每次重大战役前，张发奎都要对当地地形地势、历史现状和风土人情等作番考察，为决策作准备。在攻打汀泗桥前，张发奎打听到附近有一前清举人，便特地登门拜访。

老人原当过北洋水师的军官，见来者仪表堂堂，虎虎生威，今不耻下问，定是有来历之人，也不细问其身份，便侃侃而谈：

"汀泗桥乃为粤汉铁路线上一座铁桥，也是一个小镇，它是武汉南面的门户，镇背枕着咸宁、嘉鱼两县间的黄塘湖，北、西、南三面环水，铁路斜穿西南至东北，东面是崇山峻岭，地形险要。除张兴国、赤岗亭一段为大路外，余皆蛮荒丛林，飞越维艰。民国六年马济北伐及民国十年湘鄂战争赵恒惕部也仅攻抵桥前，即被胶着不能再向前进军，且受重创。而吴佩孚之所以能威震全鄂，亦在于倚持此雄关天堑也。"

张发奎点头称是，又问："北军的情况如何?"

"据我了解，吴佩孚带了爱将刘玉春，已从北京南下，向武汉挺进。现在，守卫汀泗桥的北军将领宋大霈、叶开倬、陈嘉谟等，都是吴大帅的爱将，以宋大霈为守军总指挥，集精兵2万余，云集于汀泗桥瓶颈地带.欲与你们北伐军决一死战。陈嘉谟亲率所部精兵第二十五师万余人，也星夜兼程前来增援。"

张发奎谢别老人后，把这一情况向副军长陈可钰报告。陈可钰听罢，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我们不能让宋、叶、陈之麇集人马有从容布阵的时间，使其有喘息的余暇。现在是下午1时半，我决定，不待友军第七、第八军会合，即下令四军人马向汀泗桥前进，以达到夺取铁路的目的。你以为如何?"

"我完全赞成，机不可失，我们得争取主动权。"张发奎表态说。

"你们准备打硬仗吧。"陈可钰是个儒将，身子骨较弱，却能谋善断。

张发奎请战："军长请放心，我十二师善打硬仗、恶仗，最艰苦的任务交给我师吧。"

得到张发奎等将领的支持，陈可钰于8月25日在石坑渡颁发了攻击命

令。

张发奎得令后，于26日一大早从一个小车站启程，以第三十五团为先锋、独立团为中队，迅速前进。上午10时左右，第三十五团二营五连与敌两个连在汀泗桥南端的高猪山遭遇，一战而克之。前锋部队追击至铁路桥南端，突然敌炮火铺天盖地袭来，桥头一片火海。

张发奎不顾危险来到前沿指挥阵地，见敌炮火封锁了桥头，拦住部队去路，回头对炮兵营下令："给我狠狠地打，以最猛烈的炮火摧毁敌炮阵地。"

炮兵营得令，瞄准好目标，几个连发，便打哑了敌炮群。

在隆隆炮声中，张发奎把第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叫到一旁，说："缪团长，你派遣侦探队向左侧搜索前进，以防敌军水路侵袭；令第六连占领高猪山前沿湖一带高地，与敌隔湖对峙；第七连在彭家湾施行警戒，你团其余部队，悉在高猪山及虾模山附近村落待命。"

缪团长答了句"遵命"，便前去布置。

接着，张发奎又令叶挺派一连兵力，埋伏在铁道左侧村落警戒，另派炮兵连控制高猪山右侧高地，向铁桥北端敌军之机枪阵地轰击，以机关枪炽盛火力，掩护步兵冲过铁桥。

部署既定，他下令各部向铁桥猛烈冲击。

桥北端，敌将宋大霈见北伐军来势凶猛，亲自上阵督战，扼桥顽抗，以炽烈火力交叉封住桥头去路。在枪林弹雨里，北伐军官兵虽一排排倒下，仍前仆后继，终于抢占桥头堡。

敌将陈嘉谟下了死命令，北军在大刀队督战的逼迫和现大洋的引诱下，猛烈反击，又夺回桥头堡。双方在桥上展开了肉搏。陈嘉谟凶残至极，竟然下令向双方肉搏的士兵开枪、开炮，桥上作战的双方人员无一生还，顿时泗水河河水全被血水染红，河面上漂着无数军帽，远处漂着数不清的尸体，敌我难分。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副军长陈可钰、师长陈铭枢与总司令部的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第四军顾问戈列夫、第十师顾问帕路、第十二师顾问铁罗尼等来到前线，与张发奎一起指挥战斗。加伦还直接指挥炮兵作战。

张发奎见前锋主攻部队数次冲锋，均未奏效，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他大声下令，各部停止前进。

天黑下来后，双方持胶着状态。

当晚8时，马灯高照，师部召开军事会议，商量进攻敌人的部署。他们

得到情报，吴佩孚亲率增援部队已越过武昌南下，将抵贺胜桥。江西的孙传芳也派兵袭击北伐军后方之势，局势相当严重。

会上，叶挺快言快语，主张速战速决，以快打慢，当晚一定要拿下汀泗桥。黄琪翔沉稳老练，也同意叶挺的意见，并具体说明道："根据目前实际，我军士气旺盛而装备不良，勇于进攻而不长于防御，敌军情形则完全相反。今夜如不能彻底解决战局，明天吴佩孚援军到达后，必将大举反攻，使我军陷于被动。我建议不惜任何牺牲，今晚实行全线夜袭，突破当前高山阵地，以挽救危局。我的具体意见是，第三十六团为前锋，采取迂回战术，乘夜开赴离汀泗桥三四十华里的上游，强渡北岸，直冲汀泗桥北岸之敌，估计一夜之间可达桥北。同时，我军从桥南正面猛烈炮火掩护下，可望一举突破敌阵。"

张发奎听罢，高叫："妙计，我赞同黄团长这个建议。"

会后，张发奎把方案向邓演达、陈可钰和苏联顾问汇报，得到批准。于是，他命令黄琪翔率第三十六团出发，以急速行军到达上游偷渡地点，强行涉水渡过汀泗桥北岸。

当晚 10 时，天上没有月亮，只听到江水拍岸声。黄琪翔请一个当地农民做向导，由分水咀附近成功强渡汨罗江。出敌不意，夺取了 4 个山头。

敌军做梦也没想到北伐军会从急促的河水中强渡而包抄其后路，守在最高峰的阵地的敌人发现北伐军偷营后，惊惶失措，组织密集的火力向北伐军扫射。

"冲啊！"三十六团战士们奋勇冲杀，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梯次跟上。在敌机枪扫射下，数十名官兵倒下了，血染整个大桥。三十六团第一营因最先突入敌阵，伤亡甚众，但最终仍占领了桥北岸最高阵地，控制了汀泗桥通道。

拂晓，第四军全军发起了全面攻击。张发奎在桥南岸亲自指挥独立团和第三十五团同时向敌人发起正面进攻，队伍从桥南右翼猛扑桥头死守之敌，以一当百，勇不可摧，迅即攻上桥头，残敌仍负隅顽抗。

张发奎高声命令传令兵："发信号弹！"

3 颗红色信号弹空中升起，画出漂亮的弧线。

各团官兵见到信号知铁桥得手，立时风卷残云般向桥头冲去。一时间，守敌大乱，纷纷弃甲溃逃，但归路已断，在四军各路人马夹击之下，残敌全部俯首缴械。当日中午，北伐军占领汀泗桥，武汉的险要关口落入他们的手中。

战斗结束后，张发奎登上山头，发现无数死伤在战壕里的双方官兵，大

部负有白刃战的刺刀伤，足见战斗激烈程度。他要求官兵要善待战俘，不能仇视，一律优待，概予不究，要回家的，发给路费，送他们回家。

一个叫李文藻的被俘军官，是北军军官队班长，与李汉魂同是保定军校的校友，他要求加入北伐军。张发奎同意了李文藻的请求，着其为招兵委员，就地挑选精壮 60 人为部队补充兵员。李文藻目睹北伐军严明纪律和高尚风格，极为感动，叹曰："仁者无敌矣。"

8 月 28 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电嘉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文曰：

> 汀泗桥、咸宁一带。探送第四军陈副军长、陈师长、张师长，并转各团长钧鉴：汀泗桥夙称天险，乃我军一鼓而坠之，负隅逆军，歼灭殆尽，非兄弟等筹策攸宜，将士忠勇效命，畴克臻此，嘉慰逾恒。戴团长陷阵负伤，殊深系念。除派员驰赴汀泗桥慰问外，所有在事出力人员，着先传令嘉奖，并希将此役伤亡官兵详查汇报，以凭赏恤。蒋中正。俭。

汀泗桥一战，敌我双方拼死苦战，争夺激烈，弹雨弥天，各死伤 2000 余人。在四军中，仅第十二师就毙敌 1000 余人，俘敌官兵 2000 多名，缴获枪炮、马匹等一大批，己方也死伤官兵上百人。

望着烟雨茫茫的江水，张发奎不禁吟起一句古诗：劝君莫话封侯日，一将功成万骨枯。数十年后，李汉魂回首此壮烈情景时仍慨然谓："北伐军血染黄沙，沉着果毅之大无畏精神，万古彪炳，丰草长林，将永为国殇哀悼！"

然而，更残酷的血战还在后头。

六、狭路相逢，贺胜喋血

贺胜桥是继汀泗桥后的又一座铁路桥梁，桥两侧，左为梁子湖、右为背塘湖，均为天险。这里是进入武昌的必经之道。

8 月 28 日下午 5 时，张发奎来到咸宁，接到各方的报告：吴佩孚亲自赶到贺胜桥，指挥 3 万人马，准备与北伐军决一死战。当天晚上，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陈可钰、陈铭枢、夏威和胡宗铎等北伐军前方高级指挥官齐集咸宁，商讨攻打贺胜桥的计划。

因虑湖水之盛，正面之隘，兵力难展，会议决定向贺胜桥发起全面进

攻，并由李宗仁直接指挥各军进攻贺胜桥，直捣武汉。李宗仁当即下令第四、第七两军同时出击。

张发奎知道，贺胜桥之战，守者为中国最负盛名的直系精华，督战者又系直系主帅、能攻善守且自诩为戚继光的吴佩孚；攻者为北伐军的中坚四军与七军。此役的胜负决定着各自命运。因此，双方都在孤注一掷。未等开战，他就闻到了死亡的血腥味。

8月29日接到军部命令，张发奎迅速作出如下部署：

> 三十日晨，第十二师进攻杨林当的敌军，应当夺取从左侧的吴家湾到右边的北路学校的战线，而于晚上采取攻势。第十师是我军的后备队。执行上述命令的布置如下：第三十五团应于今晚夺取吴家湾、黄五桥、大路寥到铁道左边的战线。独立团同时应夺取从铁道右边到北路学校的战线。师司令部以及直辖的军队驻在横沟桥前面的第三十五团的后面。第三十六团作为后备队，驻在横沟桥附近。炮兵营驻在横沟桥的后面，官埠桥的前面,师炮兵营由邓演存参谋长指挥。





盛夏，天黑得晚，19时10分，夜幕还没完全遮没大地，战斗就打响了。

第三十五团和独立团从正面冲锋，两团人马集中精锐力量，企图突破敌正面阵地，其枪炮声之密、火力之猛，为北伐军自北伐以来所没有，但见空中弹雨乱飞，地上白刃交锋，在山野炮和重机枪的轮番扫射下，战场上血肉横飞，一片火海。

前沿指挥所，缪培南团长在电话中扯着嗓子报告："师长，敌军以攻对攻，向我们猛攻，战斗已近白炽化。"张发奎查看了一眼作战图，答："贺胜桥两边地势复杂，敌军火力凶猛，我已命令第三十六团迅速派一营增援左路，直接接受你的支配。你们一定要控制好局势，掌握好主动权。"

30日凌晨4时，张发奎统率后备队急行军，赶到大路寥前沿阵地。他叮嘱警卫员把他的德式轻机枪擦拭好，子弹上膛，随时准备战斗。

天晓时，叶挺掏出手枪，迎着晨风高喊："独立团跟我上！"说罢，率部从右侧攻，猛如过江龙。

左侧，缪培南把军帽一摘，大喊："独立团上去了，我们三十五团也不

是没卵子的！”说着，也亲率全团主力向敌狠攻，怒如下山虎。

张发奎早也坐不住，挽起袖子：“给我拿机枪来！”他跳上阵地，带着副师长、参谋长等师部一批高级指挥官与士兵一道，浴身于火海中，任流弹横飞，炮弹四炸，无畏无惧。

北伐军的舍生忘死精神，使吴佩孚的官兵惊呆了，他们有生以来没有见过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子弹一批批扫过，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踏着战友的身体冲了上来。“这些人简直疯了！”坐镇在装甲车上亲自督阵的吴佩孚也有些不相信眼前的一切，他吹着胡子大声对执法总司令赵荣华下令：“赶快组织8个大刀队在后面督战，官兵如有后退，不分军阶，一律处以极刑！砍他的脑壳！”

贺胜桥头喊杀声震天，桥下积尸累累，河水都似乎要为尸体堵塞。尽管北军在大刀下督战，并砍下几颗旅团营军官血淋淋的脑袋，砍死士兵不计其数，但北伐军愈奋神威，敌为之气沮、动摇。战斗不到半个小时，敌方出现惊惶，开始有计划地退却。张发奎命令部队乘胜向敌人追击。

30日上午9时，敌军从杨林当完全退却，第一防线全溃。吴佩孚见状，下令不惜代价，死守第二道防线，拼力保住贺胜桥。

张发奎一整夜没休息，眼睛熬得通红，他草草地吃了两个馒头聊作早餐，便开始部署下一步行动。他扫视了众军官一眼，说：“各位兄弟，辛苦了！根据军部的命令，独立团、二十八团负责正面进攻，三十五团、三十六团由两侧迂回进攻。炮兵要不惜炮弹摧毁敌人的火力。决战就在今日，希望各团加把劲，不惜代价，也要拿下贺胜桥。”

枪炮声、厮杀声又起，直冲云霄。张发奎从望远镜中看见，独立团和第二十八团官兵拼着命冲杀上去又被敌反扑过来，而后再杀，再反扑，双方于桥头展开了喋血拉锯战。只见桥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在敌方，吴佩孚的高参张方严也手持望远镜在观察，他是一个久经沙场之将，但从未碰到过如此恶战，当看到身着灰色制服的北伐军踏着同伴尸体前仆后继地冲锋时，两条腿不由得打起了哆嗦，他长叹一声，北军必败也。

贺胜桥一带地势特别，起伏不大，均为波状地和可以徒涉的小湖沼，遍地是茅草丛树，障碍视线。因此，指挥员不易指挥自己的人马进行战斗，几乎是各营各连甚至各排，各自为战。好在平时张发奎治军有方，重视部队主动性培养，官兵们虽处乱阵，仍临危不惧。

第四军与北军双方激战一日，付出重大伤亡，仍不能攻下桥头。这时，

第七军先头部队俞作豫团赶到，增援第四军右翼。继而又有第八旅尹承纲之第十五团、周祖晃之第十六团赶到，在贺胜桥东王本立一带与北军展开战斗。

张发奎仍然置身前线，沉着地指挥直属部队和炮兵队累次把反复包围过来的北军人马击败，炮火频频击中敌兵麇聚点及粮弹辎重。

吴佩孚见北伐军冲杀极猛，复排机关枪、大刀队于桥上，凡畏缩退却者，立被射杀。吴佩孚还将手刃退却之旅团长的头悬在电线杆上，以示有进无退。然而，北伐军士气极旺，哪里枪声最密集就向哪里冲锋，敌军见势无不大惧，争先恐后地后退，桥窄人众，路不通行，士兵们左突右冲，数千人掉入急流中。



吴佩孚的大刀督战队堵在桥头，散兵见无路可退，竟向大刀督战队反冲锋，督战队被冲垮，数万人一哄而过，夺路逃生，吴佩孚的副官也被打死。敌大将陈嘉谟见大势已去，又不愿退却，滚在地上大哭，谓其受恩深重，今日兵败如此之惨，实无面目见吴帅。他的手下一旁急劝："追兵已至，你再不走，就要被俘了!"如此，陈嘉谟才在卫兵相架下，仓皇而逃。



敌另一大将刘玉春丢盔卸甲地跑到吴佩孚的装甲指挥车上，直挺挺地跪在吴佩孚的面前，声泪俱下地道："大帅，我的人马快打完了，3个团长伤了两个，39个连长只剩了5个，别的部队都未听我命令，就请大帅拿我正法来振作一下士气吧。"



吴佩孚倒也冷静，流着长泪，双手扶起刘玉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话音未落，"乒乒乓乓"，其指挥车连中数弹，帅旗被炸折。吴佩孚见大势已去，急乘火车夺路而逃。

数千士兵因来不及逃开，被火车压死，头裂脚断，肚肠泄露，惨不忍睹。贺胜桥两边，不少为断头、缺足的尸体或饮刀未死辗转惨啼呼号者，在电线杆上、树上挂人头多个，均为吴佩孚之大刀督战队所杀，其惨其悲，难以笔书。

黄昏时分，贺胜桥一战胜利结束，张发奎显得异常兴奋，战意更浓，他高兴地用白话对指战员们说："得了（胜利了的意思），赶快打到武昌去!"

贺胜桥一战，从8月29日上午起至8月30日上午基本结束，时间刚好一天。敌军在战斗中阵亡约四五百人，水淹死者比战死者尤众。俘虏敌军官169人，士兵2386人，缴获军火一大批。四军伤亡497人，数字远高于汀泗桥一战。

第六章 攻克武昌，驰援战江西

一、三打武昌，曹渊牺牲

烈日当空，云淡风轻。

武汉位于汉水、长江交汇处，汉阳在汉水两岸，汉口在长江北岸，武昌则在江南，形成了三镇鼎足、隔江相望的天然形势。武昌历来为湖北省省会和府城。其城墙高耸，雉堞巍峨，蛇山贯于中，与汉阳龟山对峙，坚固雄伟，易守难攻。

9月1日，北伐军第四、第七两军主力并肩作战，攻至武昌城下。李宗仁与各队长官在殷家湾召开会议，决计趁敌立足未稳之机，下令攻城。

战斗打响后，官兵们抬着木梯，高举军旗，呐喊着冲向城墙。谁知武昌城垣甚高，坚实无比，墙外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颈，官兵们冒死攻到城下架云梯时，由于梯子太短，距城墙上端还有2米多，无法登城，攻城部队停在城池边上，不得要领。城墙上，敌人滚木礌石一滚而下，机枪、手榴弹一齐扫射，北伐军攻城部队伤亡极大，死伤达百余人。

李宗仁见强攻不下，只得下令停止。第一次攻城归于失败。

9月4日一早，秋风渐起，新月如霜。李宗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向第四、第七两军高级将领通报最新敌情：

“据可靠情报，吴佩孚率残部由贺胜桥败至汉口查家墩总司令部后，一面下令其人马严密守城，一面一日数电四处求援。目前，吴佩孚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他把守武昌城的重任交给他最信得过的将领刘玉春，并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筹备总司令。刘玉春接到重任后，下令紧闭9座城门，加强防御工事，居高临下，配置各种火力，防止我们攻城。吴佩孚则坐镇汉口，调度由

北南下的援军。”

李宗仁介绍完敌情后，继续道：“蒋总司令已到江西指挥北伐孙传芳的队伍，这里仍由我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为副司令，以第四军全军及第七军胡宗铎部、第一军二师刘峙部并配大炮 9 门合编为攻城军。二师暂归第四军指挥。另外，各师选 400 人，干部 15 人，编成奋勇队，也即是敢死队，皆以营长为队长，为攻城之先锋。”

张发奎回到师部，笑逐颜开地对部属道：“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师由总后备队改为第一阵线，负责进攻由通湘门到宾阳门之处。现在，要迅速选出 300 名敢死队员，组成奋勇队，准备攻城。”

团长、营长们一听要成立奋勇队，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态说：“师长，我们每一个革命军人都是奋勇队员，我们是为了主义而战的，用不着挑选，以免伤害我们兵士的勇敢精神。”







张发奎听了很感动：“好，就由你们自己指定第三十六团、独立团的一部分作为奋勇队。”

当晚 8 时，天完全黑了下来后，张发奎亲率师部直属部队来到邓家湾，这里距武昌城墙只有 1000 米，非常危险，但这里也接近前线，便于指挥，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次日凌晨 3 时，月黑风高，攻城开始。一时间，炮火连天。

“跟我上！”欧震首先率奋勇队员在猛烈炮火掩护下，杠着长梯，迅速涉过壕沟，来到墙根，安置好云梯，准备爬墙。

“北伐军上来了！”敌人早有准备，集中火力向城墙下猛扫，并向奋勇队员扔掷炸弹、火把，刚爬了一半梯子的队员们纷纷中弹倒下。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奋勇队员们不断高喊着“革命军胜利万岁！”一个跟一个冒死往上爬，从未停却，景象非常惨烈。由于云梯太短不能到墙头，奋勇队员们强攻了一个小时，死伤过半，却没有结果。

高大的城墙如黑铁般铸立。

张发奎在指挥部密切关注着攻城的情况，攻城部队付出如此大牺牲却未有进展，使他心急如焚。这时，电话铃骤响。夹着嘈杂的枪炮声，话筒那端传来叶挺凄苦之音：“师长，曹渊牺牲了！”

张发奎心中一颤。

曹渊是独立团第一营营长，中共党员，英勇善战，为独立团之中坚。这次攻打武昌命令下达后，一营全体官兵摩拳擦掌，表示愿以死相拼，纷纷留

下绝命书，此举成为北伐军美谈，谓“古有贻榇决死战，今有留书攻城壮举”。叶挺见一营请战坚决，便把一营作为独立团的奋勇队，由曹渊任队长。

凌晨3时总攻开始前，曹渊带着奋勇队员偷偷越过壕沟，来到城墙根下，准备打敌人个措手不及。突然墙头灯火通明，枪声大作，守城的敌人发现北伐军想偷袭，马上集中炮火向他们反击，火力相当猛烈，压倒了北伐军之炮火，爬在长梯上的奋勇队员全部壮烈牺牲。

天大亮后，攻城部队完全暴露在敌人视线下，既上不去，又不能向后退，只得躺在墙根壕沟里躲避炮火。负责指挥的曹渊见攻城无望，半蹲在地上，给叶挺草成一书谓：“团长，天已拂晓，登城无望，职营伤亡将尽，现存10人，但革命军人有进无退，如何处理，请指示。曹渊。”他刚写完“渊”字，突然一颗流弹飞来，正中他的头部，鲜血四溅，当场殒命。其渊字最后一笔拖了三四寸长。这报告竟成曹渊的绝笔。

张发奎听完叶挺的报告，含泪道：“叶团长，代我向一营问好，告诉他们，你们的曹营长精神不死，我们北伐军是支铁军，是打不烂打不垮的！”

攻城指挥李宗仁见攻城部队伤亡惨重，继续攻打徒招无谓牺牲，下令停止进攻。

就在这时，蒋介石偕白崇禧、顾问加仑、唐生智一行抵武昌城南之徐家海。他对部队围而不攻有些不快，立即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

“武昌城内敌已惶惶，我当趁敌立足未稳，攻克武昌，限48小时内攻下。”蒋介石说话态度非常严厉，丝毫没有商讨的余地。

蒋介石讲罢，张发奎等在场的高级将领皆面面相觑，没有发言者，谁都知道，攻城非同儿戏，众人皆把目光转向李宗仁。

李宗仁见蒋介石态度十分坚决，也未作陈述不宜硬攻之理由。

“既然没人有意见，散会。”蒋介石首先站起来，走出了会场。

胡宗铎随李宗仁出了会场，小声问：“德公，武昌城如此坚固，限期之内何能攻下？”

李宗仁道：“蒋总司令自信心很强。他说能攻下，攻不下也要攻。”

胡宗铎道：“德公何不作解释呢？”

李宗仁道：“总司令往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析无益。我们也只有尽力罢了。”

一旁的张发奎听了，久久无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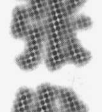
9月6日晨3时，北伐军第三次攻打武昌城。

这一次战斗比前两次更为激烈，由于北军已有了准备并增加了援军，当北伐军奋勇队抵城下时，城上火药包、手榴弹、爆炸罐、滚木礌石等一并扔下。独立团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然敌枪弹如雨下，登梯官兵皆被击毙，时各处皆牺牲惨烈。

在官兵们激烈攻城之际，蒋介石偕李宗仁到前线视察，他见官兵伤亡枕藉，知攻城无望，只好下令各部队停止攻击。3次攻城皆以失败告终，这是北伐以来牺牲最惨重的战斗。

二、“双十”大吉，攻克武昌








突闻汀、贺两桥失陷，孙传芳大惊，急忙出兵江西，增援吴佩孚，企图拦腰截击北伐军。蒋介石速调李宗仁的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入赣作战，阻击孙传芳军，对于武昌残敌，为避免更大伤亡，采取封锁围城策略。武昌围城任务由第四军独力担任。张发奎所率的第十二师，作为攻城军的总后备军，驻在南湖附近。

这天一早，浓雾弥漫，作战参谋报告说：“今天凌晨1时，有100多名敌人从文昌门出来，沿着城根到保安门，我们的哨兵发现后，向敌人开火，他们也还击，双方打得很激烈，天亮之前，敌人给我们打了回去。”

张发奎用冷水擦了一把脸，说：“好，就这样打，统统给我打回去。”

下午1时，传来好消息，第八军唐生智部得原吴佩孚的第二师师长刘佐龙反正响应，迅速攻下汉阳、汉口，其后以一部北取武胜关，截断了武昌守军的退路。张发奎拍着桌子道：“武昌现已成为一座孤城，攻下武昌只是时间问题了。”

9月15日，张发奎正式收到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封城令。封城令下达后，北伐军把武昌城围得水泄不通，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转眼到了9月30日，守城敌军粮食渐渐吃完，兵士每日仅食两餐，连战马也已杀尽做粮食。张发奎提醒官兵们，种种迹象表明，敌人正计划突围，要防止敌人狗急跳墙。

果然不出所料，10月1日凌晨，敌人1000多人由通湘门、中和门和保安门开始突围，叶挺一边命令部队还击，一边向师长张发奎报告，请求支援。

张发奎当即令第三十五团团长缪培南派一个营加强独立团的防御力量，

又令第三十六团派一个营到山口寺附近抵抗敌军。经过激战，第十二师的官兵夺回了通湘门高地，打死打伤数百敌人，把敌人赶了回去。但独立团也死伤300多名官兵，几乎打完了所有弹药。由此可见这一仗的残酷与激烈。

10月6日，攻城司令部下达了夺取武昌的命令。10月10日拂晓，敌师长吴俊卿率所部起义，打开保安门、中和门，迎北伐军进城。北伐军迅速推进至城下，第十师、第十二师分别从保安门、通湘门入城，沿途发动进攻，刘玉春、陈嘉谟部略有抵抗，旋即被完全缴械。城里市民见北伐军进城，纷纷涌上街头，夹道欢呼。

正在进城的张发奎接到捷报，独立团于早上7点半从通湘门入城，占领蛇山；第三十五团随第十师进城后，抓获躲藏在鲍姆大学的敌长官刘玉春，另一敌将陈嘉谟也已落入我军手中。

张发奎感慨地对身边的参谋长吴奇伟说："这武昌城整整包围了40天，今日终被我革命北伐军攻破。你看历史竟然这么巧合，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之日为10月10日，推翻了大清帝国。这次我们攻克武昌也为10月10日，正好是15周年。看来10月10日为吉利之日，我们北伐军定能得天下。"吴奇伟说："师长，晚上我们不如把几个团长请来，大家好好喝一杯，我还准备了一箱你爱喝的法国白兰地呢。"张发奎大笑道："好主意，咱们不醉不休!"

武昌既克，举国震动，海内外各方贺电雪片般飞来。武昌黄鹤楼、汉口大钟楼、汉阳晴阳阁上都飘扬着革命政府之华旗。城里城外到处是一片革命的欢庆景象。

10月18日，正是总理纪念周，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武昌莲花湖边的大操场上，检阅队伍排列整肃，全副武装，官兵精神肃穆，雄壮威武。

这天，接受张发奎检阅的部队，主要是第十二师扩充后的师部直属各部队，有炮兵团、特务连、工兵队、监视队、通讯队、迫击炮连、和卫生队等，共计官兵2000余人。

10时正，阅兵开始。张发奎同副师长、参谋长及各随员，依次检阅。

一时间，军乐齐奏，官拔刀，兵举枪，刀光耀目，乐音悠扬，情形极其庄严。

检阅毕，随行总理纪念周礼仪。随后，张发奎站在高台上，叉着腰，向众官兵训话：

今天在这武昌城，一面纪念总理，一面检阅我们向前革命的武力。本师直属各部队，官兵精神之肃穆，各队武器之完备，本师长固极满意，但回想着我们一路打到此地，和围困武昌城内的时候，我们牺牲了许多同志，即我们本师，也一共已牺牲了九百余人，这是我们时刻不能忘记，而是要时刻准备会为我们已牺牲的同志复仇的……至于我们这次打下武汉，只不过是革命的开始，前边茫茫的一个革命成功的目的地，尚正需我们同志努力。同志们，我们是不能时或稍懈呵！今天的检阅，各部队的精神是好，但我们革命军，不只是在检阅时要有这种精神，即到打仗时也是一个样子，并且还要格外的有奋斗牺牲的精神，然后我们的目的始能达到。总理说："革命军不但是要以一人去打十个敌人，且还要以一人打一百个敌人。"这话是要我们同志时刻牢记着在脑子里，并且要以这句话确确实实的去做到，才配称做革命军人，才是总理的真信徒，亦才可以救中国人的痛苦。各位同志宜各向前去勉之……

张发奎一口气说了一个多小时，训毕，已是中午12时。

官兵们纹丝不动，肃静地听着，倍感兴奋与鼓舞。

三、统率四军，围打德安

一股寒流从西伯利亚自北向南袭来，初锋一到武昌，顿时有了很重的寒意。

长长的船队一字排开，"突突突"地离开武昌码头，向下游江西方向直进，船上载满全副武装的第四军将士。张发奎站在船头，表情凝重，任夹杂着微细雨粒的江风扑打在脸上。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后，吴佩孚精锐已失，北伐总司令部即将军事重心放在消灭盘踞浙赣方面的孙传芳主力。孙传芳虽也是从奉系分出，但已虎踞长江下游有年，饷裕甚丰，兵强马壮，其实力较之吴佩孚有过之而无不及。

初时，孙传芳并没有把蒋介石亲自带领的北伐军放在眼里。没想到北伐军从9月6日出兵江西后，直指孙传芳五省联军，并于9月19日一举攻克江西省城南昌。孙传芳立刻组织强大兵力反扑，打败孤军挺进、攻入南昌的程潜第六军，重新收复南昌，并调集卢香亭、郑俊彦、陈调元和周凤歧等

部，在南昌与九江之间沿南浔路排成长蛇阵，准备与北伐军决战。

蒋介石闻第六军惨败，大怒，急令李宗仁的第七军从武汉向江西进击。第七军进兵江西后，初时取得箬溪大捷，但由于孤军深入，遭到敌军的围攻，在德安一役中损失惨重。而此时，蒋介石亲率队伍，第二次攻打南昌，连攻3日，牺牲重大，均未果，不得不撤出战斗。

武昌攻克后，蒋介石决定对孙传芳再次用兵。他与李宗仁、程潜、白崇禧等一起重新制定了《肃清江西计划》的军事计划，并令在北伐中屡立战功的第四军入赣参战。其时，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因病住院治疗，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担任了武汉卫戍司令，于是由张发奎率领第四军精锐出发援赣。

张发奎受命于危难中，即于10月20日率所部由武昌乘轮船东下，至石灰窑登陆，于28日开抵白水街集中待命。蒋介石见四军如此神速，大喜，特地于10月27日从高安发来“嘉勉张发奎千里驰援电”：

> 武宁李军长转张师长向华兄勋鉴：此次兄千里增援，不辞艰劳，殊胜爱慕，有将如兄，革命无虞不成矣！途中有否遇敌？病兵多否？士兵冬衣发否？伙食有否带足？共有战斗兵若干？盼详复。中正，感。

11月1日，蒋介石指挥三路人马，杀向孙传芳的联军，北伐军肃清江西计划开始实施。在江西省武宁县箬溪镇，李宗仁即令第七军向德安攻击，张发奎师和贺耀祖师向回马岭进击。

江西多山，山峦重重，山路崎岖，前锋部队遇到没路的情况，常常得飞舞大砍刀，在前面披荆斩棘，开路修桥。许多在平原里长大的士兵叫苦不迭。张发奎也和士兵一样走山路，头戴草帽，脚踏草鞋，穿着与普通士兵无异。他自小在山里长大，这点山路并不算什么，有时还顺便帮小战士扛长步枪。

一个友军的联络员对张发奎说：“看你的士兵都像是小孩子，打起仗来，有点危险。”

张发奎笑着说：“广东人架儿小，并非年轻，打起仗来，劲儿大，你瞧吧。”

张发奎率部进抵烂泥坡、夏家铺一带，便得到德安方面的报告，知悉德安敌军甚少，敌之陈光祖支队，马登瀛、颜景琮、上官云相各旅，均集中德







安以北之孤山、万家垄和马回岭之线，利用铁路，相互策应。

张发奎蹲在地上，展开军事地图分析敌我情势："德安敌军力量我第七军已足以当之，所以为拊德安之背，我们四军的主力应重点进攻万家垄、骆驼山及孤山。"他站起来果断下令，"命令第三十六团长黄琪翔为指挥官，率第三十五团、第三十六团之一部，于2日晨向万家垄攻击前进。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在2日午前到蔡家大屋候命。"

待作战参谋记录完命令，张发奎又嘱咐，击破万家垄之敌后，如敌向马回岭退却，则会同独立第二师夹击之，如敌向德安退却，则会同第七军从两旁夹击他们。

11月2日晨7时，张发奎率师总后备队，取道陈家湾往贾家大路，随第三十五团前进。

总后备队驻扎在封神城附近后，张发奎三步并作两步，爬上一个山头，瞰览敌情。谁知士兵们好奇，蜂拥到山上观战。由于目标显著，敌炮集中射击，一颗炮弹爆炸在离张发奎所坐处只有50米的地方，把前来受令的蒋光鼐震得后退几步。张发奎急呼士兵下去，自己仍神情自若，沉着地指挥作战，任枪弹如雨点般在周围飞过。

这时，黄琪翔团长派人来报，第三十六团在意塘棚一带准备迂回包围敌人，进攻孤山中部。不久，万家垄方面枪声大作。11时，张发奎接到第三十五团缪培南团长报告，该团第一营已将敌打败，正沿着铁道乘胜追击逃敌，有一部分残敌仍在孤山抵抗。

张发奎即派第三营与第三十六团联合进攻孤山敌人。黄琪翔团长得令后，统率各营向孤山进攻，并命令炮队连续向孤山、骆驼山开炮，掩护步兵进攻。血战整整持续了一小时。正午12时，孤山、骆驼山完全克复。此时，李宗仁率第七军已抵德安城南高岭一带，张发奎便与第七军联合作战，于16时打下了德安城。

四、孤军作战，化险为夷

攻下德安后，张发奎来到一处高地视察敌情，忽然发现在3里外的万家垄北角有七八个敌探出现，并向德安方向一路搜索过来；山下，喷着白烟的火车徐徐南下，这表明敌人援军已到。张发奎迅速作出对策，命令后备队与直属部队要保持密切联络，防止敌主力的到来。

前方传来急促的枪声，半小时后，缪培南团长送来报告，他的第一营已把敌人的援兵赶到马回岭南部高山，敌人仍在马回岭死守阵地。张发奎浓眉一扬，分析道："据守马回岭的为敌3个混成旅，其中颜景琮部实力较强。敌军据守险要，持久则工事不断加强，于进攻不利；我军刚获孤山、骆驼山胜利，士气方锐。为迅速扑灭马回岭之敌，我打算以第三十五团为主力径向马回岭攻坚，以第二十九团协同前进，控制铁路，再命炮兵营以炮火掩护步兵，尽力消灭在马回岭的敌人。"

幕僚们表示赞同。

11月2日下午4时，第三十五团、第二十九团各一部在横山一举将敌击溃，追敌至马回岭南端，敌人据险而守，北伐军择险而攻，战况惨烈。

黄昏时分，天竟下起雨来，豆大的雨粒扑打在地上升起一层白烟。敌人利用这一气候，向第三十五团阵地连续发动两次反攻，皆因该团各部戒备严密，未能得逞。

午夜时分，伸手不见五指。敌人得到援兵，开始反攻，他们挥着刺刀与北伐军第三十五团第二营白刃决斗数次，最终被北伐军打败。然而，孙传芳并不示弱，他利用控制的铁路线，源源不断地运来援军，把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团团包围，企图一口吃掉。

情势万分危急。

张发奎亲到阵地前沿观察，见敌人敢于出击，判断敌军必有援兵驰至，他一边令各部加强注意，不许疏懈，并部署在明天拂晓施行总攻击，一边派人与驻在离马回岭不远的第一军贺耀祖独立二师联系，请求支援。

谁知派人通告了5次，自命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贺耀祖对四军素有偏见，竟然一兵未发。参谋长吴奇伟亲自前往，哭诉第十二师孤军血战的危险，仍未能打动贺耀祖派部队增援，张发奎气得大骂。

在这危急关头，张发奎得知追敌至德安的三十六团完成任务后已奉令返至五谷庙，当即下令该团迅速加入战斗，插入三十五团与二十九团之间的空当阵地，全力支援三十五团，争取一举奏功；又令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率二十八团向敌右翼抄出敌后，以呼应三十五团、二十九团正面攻击。

3日拂晓，三十五团正面之敌颜景琮部发动攻击，双方激战，乃至于刺刀相搏，战事极为惨烈。所幸三十六团及时赶到，以一部向敌正面突击，一部由右翼猛进，将敌包围。血战历一小时，敌势终呈不支，纷纷退却。

第十二师硬是靠自己的英勇奋战，不仅避免了全军覆灭，而且动摇了整

个敌军战线。

在左翼与北伐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对抗的敌军，见颜景琮部动摇，也相继退去。第十二师乘胜进占马回岭，残敌纷纷向沙河方向逃窜。

攻占马回岭后，张发奎得到李宗仁的急令，敌军卢香亭部由涂家埠沿铁路反攻德安，正与第七军激战于九仙岭，请求增援。蒋介石也从竹节塘发来急电，要张发奎赶快率部前往涂家埠。军情十万火急。刚刚脱离危险的张发奎没有像贺耀祖那样见死不救，而是即派第十师副师长蒋光鼐先率三十六团、二十八团及三十团一部向德安前进，归李宗仁指挥。他自率余部向九仙岭挺进。

4日上午10时半，敌军向北伐军猛攻，枪炮齐发，遮天盖日，十分凶猛。第三十六团黄琪翔团长命令部队夺取铁路右边的高地。在机枪掩护之下，第三营从左翼进攻，于11时50分将敌人击败。此时，蒋光鼐统率第二十八团向左翼推进，并派一营助战。第七军见友军赶到，乘势从右侧进攻，取得胜利，敌人全线退却。

德安、马回岭之役遂告结束。随后，北伐军迅速攻克九江、南昌。



五、亲拟报告，痛斥二师

马回岭一战，四军伤亡700多人，要不是张发奎指挥得当，四军勇敢，差点全军覆灭。这一战也反映出北伐军内部开始产生分歧与矛盾，为后来的分裂留下了伏笔。

11月8日晚，张发奎悲愤有加，熬了个通宵，先是给北伐军总司令部拟发了一份电报：



> 一、职师冬晨攻击万家垄之敌，业接触。右翼七军未能协同，左翼贺师长前进迟缓，于是敌得协以谋我……二、职部此次独立作战，伤亡甚多，已知者阵亡营长一，重伤二，其余伤亡官长约二十余，士兵约五百余。贺师长始终未能与我协同动作。

紧接着，他又给副长官陈可钰写了一封报告，真实地记述了当时的激战情景，痛斥贺耀祖独二师见死不救，以及部队进南昌的所见所闻。由于是内部报告，写得极为真实和直截了当。该报告后来被随军的苏联顾问带回莫斯

科，得以保存，弥足珍贵。

报告首先陈述了四军在马回岭孤军作战，贺师见死不救之情景：

> 此次本军入赣，受七军李军长指挥。冬江两日在德安及马回岭之役，几陷本军于绝地，照预定计划，左翼于冬日拂晓总攻击，由七军击右侧即德安城及九仙岭一带之敌，独立第二师击左侧即马回岭一带之敌，本军任务则攻击德安城东北及万家垄之敌。乃冬日上午八时，本军三十六团已向骆驼山及孤山之敌攻击，三十五团已向万家垄之敌攻击，敌均顽强抵抗，经我官兵奋勇血战至四五小时，卒将敌击破，将所有敌人之高山阵地概行占领。敌虽败退仍节节抗拒，且增援之敌由火车大批运到，本军陷在核心，左支右吾，昼夜转战，虽德安城于冬日下三时即行克复，而马回岭方面危险万分。当时独立二师贺师长驻在孙村与马回岭相距不远，在一昼一夜间经本军张师长五次通告，催促其出击，并派军部吴参谋往效秦庭之哭，终不见出一卒一兵，幸本军官兵奋勇牺牲至七百人之多，始于江日上午将马回岭之敌完全肃清。使非本军者，未有不完全覆没者也……

其次，用典型的事例，陈述了四军军纪严明，深受人民欢迎，反观独二师军纪涣散，百姓深受其害，两军出现鲜明对比：

> 本军此次入赣，深得人民同情，战争之际随军队行者恒数百人，以是风声所播，各处民众无不渴望四军之至。当独立二师之入九江也，军民本纪比较逊于本军，人民大失所望。而二师至九江团宣传人员缺乏，一切宣传品又无，而贺师长第一次之布告又为向地方筹饷者，并责商会即借筹两万元，虽曰不久即还，而民众以前受惯军阀欺骗，因之怀疑我革命军。及本军一到，人员各（如）得甘雨，即时全市开市欢迎鼓舞称道备至。全市之中鲜见本军官兵，其得见者，仅职部之宣传队及四军之士兵之宣传队耳。因是人民脑中无不有一第四军，在街谈巷议均作锦上添花之语，其影响所及，独立第二师少数之不肖士兵亦从而学好。当虞日下午一时开军民联欢会时，市民到者四万余，职部人员及士兵之做宣传工作者全体动

> 员，一时革命空气非常紧张，此为九江市民第一次所受之训练，亦由此而认识革命军之真面目。独立第二师官兵借搜索枪只为名，到处抢劫，尤以北方人受害最巨，其所得赃物，如女衣女舄亦当街拍卖，其情形与入武昌城相似。经本军官兵之劝告干涉乃稍敛，事为贺师长所闻，乃为惩一儆百计，于齐日正午将其手枪队队附文少吾执行枪决，其枪决地点乃选送至本军十二师司令部以前正对面之空阵地，盖欲使本军官兵知其有此举也，而一般看热闹之民众人山人海，佥云此乃被四军不答应之结果，职当对民众讲演声明国民革命各军之纪律均是一样……

实际上，这种投机取巧行为在北伐开始不久即已时有发生，作为旁观者的苏联顾问也完全洞悉这类把戏，他们认为："国民革命军各部队对战胜敌人的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也远不相同。加伦认为，广东的一些主力军肩负了最后一些战斗的全部负担。第七军和贺耀祖师在战斗中随机应变，只在追击被打败的敌人时非常积极，大部分战利品都落到了他们手中。"







随军苏联顾问越飞有一份详细的分析报告，说明北军如何凶残而不得民心，北伐军又为什么能取胜的原因，并指出：由于贺师不救，四军遭受包围，作战艰苦：

> 江西战事，最重的负担，始终是二、三、六各军，损失亦以这几军为最大；一军之二师，虽亦参战，亦蒙大损失，但非独当一面之军（初时第一师归六军，第二师归二军，最后次作战，第二师为总预备队，后即加入追击部队），四军这次参加作战，其作用很大，惟马回岭、德安一带作战，因贺耀祖不照原定计划，不照顾他（四军）左翼，而只拼命地往九江去，所以四军曾受敌之包围，经过很大的危险。显然作战之艰苦，是上述这几军，但战利品却是七军及贺师得的最多！其余各军，多少亦得一些而已（因敌人缴械者实在太多）……

这表明，在这次北伐中，张发奎所率的第四军贡献大，牺牲也很大，缴获却不多，其无私无畏的品格令人敬佩。同时，也看出，北伐军内部像贺耀祖部这些大煞风景的现象，与党见、政见的分歧一样，同样急剧涣散和瓦解

着这场主观上极不成熟的“大革命”，使这场本已大打折扣的革命蒙上了一层新的阴影。

六、接受铁盾，名扬天下

江西平定后，第四军奉命班师回鄂，驻防武昌。当一身戎装的张发奎率领援赣的部队乘轮船出现在长江码头边时，前来迎接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和数万名群众，顿时欢迎声一片，鞭炮声、鼓乐声，杂然并作，声闻数里。在进城的十数里路途边，彩旗飞扬，万头攒动。

张发奎不禁以手加额，向群众答礼。

由于张发奎在江西的出色表现，爱才心切的北伐军总参谋长李济深想一步到位，破格提升张发奎任第四军军长一职，并电请总司令蒋介石。蒋介石却以为不妥，于11月12日在九江复电给李济深表示自己的意见：

广州李总参谋长勋鉴：电悉，张向华战功固大，但年龄资望尚浅，吾辈爱人以德，应养成其大者，不必急于破格升迁，中意先升其为第四军副军长，而以陈景瑗为副党代表，如何？请再裁核。中正，文。

11月26日，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第四军副军长兼第十二师师长，任命陈铭枢升任第十一军军长。然而随着第四军的扩编，急需用人。翌年1月，张发奎很快升任第四军军长，副军长由黄琪翔升任，所部辖第十二、第二十五师，师长分由黄琪翔（兼）、朱晖日担任。而在广州的李济深，为避免番号重复，将原来的第四军改称第八路军。由此，第四军一分为三，即为陈铭枢的第十一军，张发奎的第四军和李济深的第八路军。

1月25日，在武汉粤侨联欢社的倡议下，武汉社会各界为第四军从江西凯旋召开庆功会。由于第四军出师北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创吴佩孚于鄂南，败孙传芳于赣北，加以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深得人民群众拥护。武汉人民为表彰第四军的功绩，特铸一铁盾，正面镌有红色“铁军”二字，铁盾背面题词云：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震迩遐。能守纪律，能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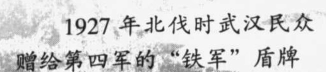
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

作为大会主持人，北伐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大声宣布：“此铁盾赠给英勇无敌的第四军，这是人民对我北伐军的嘉勉。请四军代表上台领奖。”

伴随着台上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刚升任军长的张发奎一身戎装，健步走上台，代表第四军将士从邓演达手中接受这一荣耀，心里感到无比激动与自豪，频频向台下群众敬礼。

应该指出的是，“铁军”这一荣誉称号，是人民赐给参加北伐的第四军将士的。张发奎代表第四军接受这一荣誉，当然有其客观原因：因为该军在攻克武汉后，率师北伐的副军长陈可钰因病住院而去职，嗣后第四军扩编，张发奎升任副军长、军长，因此由张发奎代表第四军接受人民赐予的这一荣宠。但从张发奎在北伐战争中的表现来看，他作为“铁军”的代表，并被武汉人民誉为“铁军英雄”，是当之无愧的！那面盾牌后来一直为张发奎保存，并视之为传家之宝。




1927 年北伐时武汉民众
赠给第四军的“铁军”盾牌

第七章　宁汉对立，中原战奉兵

一、迁都武汉，再度北伐

武昌、南昌攻克后，北伐军完全占据主动地位，吴佩孚已无反攻之能力，孙传芳在江西新败，对江浙也仅图自保。而北伐军自身，由于连续作战近半年，各部伤亡极大，亟待整补。但是，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政治上的暗流也随之滋长。

1926年冬，广州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总部决定迁都北上，以便于北伐的继续实施。国府要人均认为迁都武汉是最佳选择，没想到蒋介石却反对在武汉建都，坚持要建都于南昌，其理由谓此举不使军事与政治紧密结合，实际上其内心是担虑武汉乃唐生智的势力范围，他无法指挥一切，由此国民党内部产生了汉赣隐然对立。尽管蒋介石再三反对迁都武汉，但在众人的坚持下，最后还是于1927年3月6日决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全部迁到武汉。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改选了党、政、军委员，张发奎成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3月20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

二届三中全会大大推举了汪精卫，限制了蒋介石的权力，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当时，武汉方面军人反蒋日渐明朗，唐生智、张发奎均公开反蒋，惟陈铭枢袒蒋，由此注定了第四军的分裂。当年的战友，后来因政见不同，竟然兵刃相见，令人扼腕。

在汉、赣对立愈来愈明朗的情势下，国民党军开始实施了东下沪、杭的军事计划。北伐部队分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中路军又分为江右军和江左军。唐生智为西路军总指挥，张发奎的第四军归唐统辖。

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北伐东路军、中路军攻克南京、上海。谁知一到上海，蒋介石迅速变脸，制造了震惊中外的“4·12”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南京等地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广东的李济深，也制造了“4·15”惨案，大杀共产党人。从而，掀起了一股反共黑潮。

蒋介石不仅在上海公然屠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又于南京建都，一系列的举动，激怒了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至此，宁汉正式分裂，处于对峙状态。在这一斗争中，张发奎始终站在武汉政府一边。此时，亲蒋的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去职，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张发奎兼任第十一军军长。

4 月 18 日一早，下着微微春雨，张发奎赶到唐生智的总司令部。身穿一袭唐装的唐生智把他迎进客厅。

双方寒暄几句后，唐生智即切入正题：“向华，现在北方形势紧张。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看到吴佩孚、孙传芳迭遭失败，兔死狐悲，大感不安。新败的孙传芳主动上天津，向张作霖求援，结成北方 15 省联盟，组成所谓的‘安国军’，由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决意南下，欲乘北伐军久战之余，一举而收渔人之利。他已令张宗昌之鲁军应接孙传芳，又令其子张学良率奉军沿京汉路进攻河南。目前，张学良部已进占了郑州。”

“这可是北伐的好时机。”张发奎正为蒋介石闹分裂而影响北伐伤透脑筋，他真不愿意看到北伐尚未成功，自己内部又相煎起来。

“是的，武汉政府决定继续北伐，任命我为北伐军第四集团军总指挥，统率第四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独立第十五师和第八军之一部进军河南，讨伐张作霖；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其军事计划为两期，第一期占领河南，与冯玉祥部在郑州、开封会师；第二期与阎锡山在北京会师。”

张发奎略有所思地点点头。

唐生智拿出一叠文件，继续道：“今天请你来，就想研究一下具体作战部署，我考虑这么安排，向华，你任第一纵队司令官，率第四军、第十一军、独立第十五师为右翼；任刘兴为第二纵队司令官，率第三十五军、第三十六军为中路；另以原在河南境内的魏益三、伍应岐、梁寿恺、庞炳勋等部组成第三纵队，居中响应。部队将沿平汉路北上，约定冯玉祥部出潼关，沿陇东路东进，夹击河南之奉军，会师中原。”

张发奎仔细看了作战计划，表示赞同：“一切听从总司令的安排。”

4月19日，第二次北伐誓师典礼在武汉南湖举行，张发奎和武汉国民政府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唐生智、谭延闿、徐谦、恽代英、廖乾五、郭沫若和彭泽民等都参加。誓师大会后，张发奎便亲率第四军、第十一军从武汉出发，于5月1日前全部开抵河南省驻马店，集结待命，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随军指挥作战。

在开往驻马店的列车上，张发奎有些心事重重。

此次北伐，是在宁汉分裂的状况下进行的，已没有第一次北伐那样齐心合力。特别是宁汉两派军队正对峙于安庆、九江之间，奉张人马在开封战役打败豫军后，占领了河南大部，据了解，推进至上蔡、西平一线的奉军，为其三、四方面军团，兵力约5万人，总指挥分别为张学良和韩麟春，这些都是奉军的精锐，拥有飞机、坦克和十几个重兵团，霸气十足，看来一场恶战不可避免。

张发奎再三叮嘱属下各指挥官，敌人无论数量和装备都比我们好，千万不能轻敌，一定要小心从事。

5月13日，唐生智颁发了第一道总攻击令，命令将张发奎的第一纵队分成左右两翼，左翼经黄埠、青龙潭、南席镇，右翼经东洪桥、扶沟县、通许县，以兴隆集至韩庄之线为攻击目标，占领开封。张发奎接到总攻击令后，令第二十五师向上蔡、第十二师向黄埠、第十师向蔡屯警戒前进。

此时，参谋长送来作战报告，第一纵队的当面之敌为奉军第十一军赵思臻部，赵部盘踞上蔡一带，控制着洪河上的东洪桥和西洪桥，并有向我攻击之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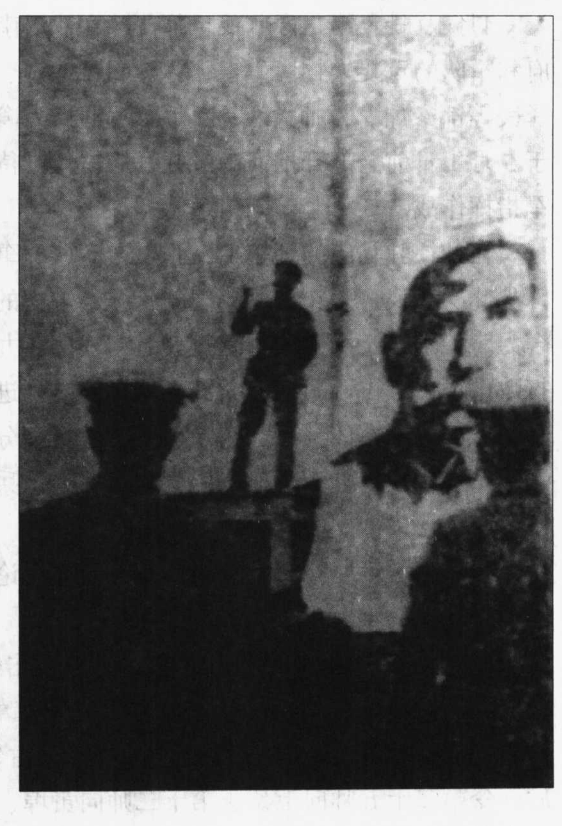
张发奎当即下令："为制敌先机，我骑兵第一团和第二十五师之七十四团立即向敌发起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次日上午，第四军沿公路向上蔡方向出发。走在全军队伍前头的是第二十五师和负责侦察的由100名骑手组成的骑兵团。张发奎的指挥部紧跟在第十二师后面。

下午3时，骑兵团首先与奉军第十二旅富双英部遭遇，并迅速将敌击退，敌军退守上蔡城西一带，凭借坚固工事及城内炮火掩护，顽强抵抗。

黄昏，张发奎骑马赶到前线，下达了15日拂晓攻击、包围上蔡的命令，决定以第二十五师攻击上蔡西城，第十师攻击上蔡南门，第十二师经十里铺向唐按前进，断敌归路。

然而，战斗比预想中的艰难，这是"铁军"对"铁军"之战（北伐军第



1927年4月19日，第一纵队在武昌南湖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图为纵队司令张发奎在大会上讲话







四军和奉军的第十一军当时都称为“铁军”），双方都把预备队投入了战斗。

这天拂晓，东方刚露出鱼肚白，北伐军第二十五师首先开始攻击，上蔡西城之敌以3个团的兵力，在12门迫击炮掩护下，向二十五师反攻，激战中，北伐军七十四团团长张弛受伤，第三营营长许淑民阵亡，官兵伤亡甚重，高达500人，先锋团损失了大部分指挥人员，所幸第三十五团适时赶到，始将敌击退。

北伐军十二师也在拂晓开始北进，午后在十里铺与敌发生激战。双方的行动都很积极，都想从侧翼绕到敌后。经过近一小时的战斗，奉军被击败，十二师占领了西洪桥附近的沙河渡口，但也损失了近两个团的兵力。

上蔡城迟迟难以攻下，张发奎带着直属部队迅速向东西洪桥推进，并命令第二十五师师长朱晖日率所部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三十五团和第十师之三十团各一部继续包围上蔡。

到达前线后，张发奎和第四军副军长黄琪翔亲率作战参谋，前赴东西洪桥附近作实地侦察。望着硝烟弥漫中的上蔡城，张发奎调整了作战部署，发

出新的攻击命令：以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指挥七十团进攻西洪桥，三十六团攻击水寨，三十四团攻击东洪桥；以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所部为预备队；另以三十五团、七十四团在上蔡城东北监视城内之敌。

命令下达后，第七十团于16日下午向西洪桥之敌发动攻击。敌方为第六旅，据险抵抗，战斗甚烈，激战至次日上午，北伐军攻下西洪桥，残敌向陈蔡铺方向逃窜。

东洪桥方面，三十四团也同时发动攻击，敌方为第十六旅，据桥头土城顽抗，北伐军屡攻不克。至17日拂晓，一夜未眠的张发奎急调二十八团加入作战，才攻下土城，占领东洪桥，敌向商水一带溃退。

东、西洪桥被攻下之后，据守上蔡城的敌军第十二旅旅长富双英见后路已断，派人向北伐军接洽投诚，上蔡城不战而下。

上蔡、东西洪桥之役，北伐军与敌苦战三昼夜，激战六七次，终将奉军中号称“铁军”的第十一军全军击溃。但张发奎部也付出极大代价，总计伤亡官兵达2600余名。

后来，随军的苏联顾问勃拉戈达托夫这样分析道，尽管奉军在人数上、武器上和军事技术上都占了优势，奉军有11个团，有大量飞机和枪炮，第四军只有9个团，但四军取胜的原因是在对部队统一指挥、官兵的战斗经验和士气上占优势。四军遭受巨大损失的原因是奉军在物质技术方面占优和南方人不习惯在平原地区作战造成的。

二、贺龙轻骑，出奇制胜

逍遥镇地处周口、西华、临颖和漯河的中央，距漯河、临颖都是30公里左右，地位重要。这里大部分为平地，土质粘而又黄，人口稠密，大部分村庄都有七八米高的土墙，墙上有垛口，四周有装满水的壕沟。逍遥镇河流纵横，主要有沙河和汝河，沙河从西经镇南侧流向周口，河宽三五十米，两岸长满芦苇丛，河水湍急，不能蹚水涉越。除了一座铁路桥外，河上几乎没有桥，而河两岸高达5~8米的堤坝，倒是一个很好的阵地。奉军依河把守，布置了大约5个团的兵力，其中包括炮兵和骑兵，共5000余人。

迎着清凉的河风，张发奎与黄琪翔来到沙河南岸前沿观察地形。他用马鞭指着对岸说：“欲驱逐正面之敌，必须自北岸击敌之背，因逍遥镇为敌之左翼屏蔽，河流向西南突出如弧形，攻逍遥镇则敌侧背受制。如果能尽量利

用地形上的特点，正面佯攻，背面迂回，则逍遥镇可下，而临颍东面屏障也打开了。”

黄琪翔点头称是：“从侦察的情况来看，奉军只是沿着沙河向南设防，缺乏纵深配备，把兵力摆在一字形的单纯防御我方正面攻击的态势。在逍遥镇东南，只有奉军一个骑兵营，自恃有沙河为天险，极为大意。”

“敌人的大意就是我方的机会。”张发奎敞开衣领道，“我决定以独立第十五师贺龙部自邓城渡河，先打奉军的弱点，击破骑兵营，再从侧面进攻逍遥镇；第十二师则自老吴寨渡河，直攻逍遥镇。”

贺龙是在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的，张发奎对他十分器重。

5月24日拂晓，贺龙率独立第十五师在邓城偷渡沙河成功，全歼敌骑兵营，并沿沙河左岸飞师向逍遥镇攻击前进。奉军的侧翼和后方遭到突然袭击，惊惶失措，一触即溃，纷纷向逍遥镇逃窜。敌人原想背镇一战，无奈贺龙的军队奋勇冲击，打开了缺口，势不可挡地占领了逍遥镇。





这一仗，贺龙以独立第十五师4个团的兵力，攻击有重炮配备的5个团，全歼3000余敌，缴获4个团的装备，包括24门野炮，拦腰斩断了奉军的防线，而己方伤亡不到百人，取得大捷。张发奎听说贺龙一举占领逍遥镇后，笑着对黄琪翔夸道：“这贺胡子打仗真的不错，好一个‘奇兵制胜’。黄军长，你代表我去慰问他们，赏他两箱白兰地。”

三、临颍决战，伤亡惨烈



张发奎率部于上蔡、西平大胜之后，又迅速令部队绕出周家口，迂回漯河奉军后方。

漯河奉军面临包围之中。

张学良见势不妙，急令开封的王树棠第十军乘夜行列车前往增援，迎击张发奎部以掩护全军撤退。王树棠得到少帅的命令哪敢怠慢，立即以何柱国旅为先头部队，前来增援。

后半夜，外面下着小雨，张发奎刚刚睡下，就被警卫员叫醒，唐总指挥有电话找你。

张发奎披上大衣，起床接电话。

电话那端传来唐生智很重的湖南话：“向华兄，打扰了，有情况要向你通报。”

“总指挥，请吩咐。”张发奎打起精神道。

“据最新消息，南下奉军连日遭北伐军打击，逍遥镇以东一带敌军虽被迫退向西华、扶沟，惟中路铁路沿线正面，奉军不但未放弃郾城，且以临颍为中心，集合力量，其后方部队，仍节节增援，源源南下，另有野炮兵第四团、山炮兵第四团，并有飞机、坦克助战，声势浩大，总计兵力在10万以上。”唐生智一开口，就报出这一长串敌情，“临颍乃许昌的屏障，奉军各路人马从东、西、南三方摆开阵势，3万人集中于临颍城东，在北起辛庄、南至聂庄一带深挖了绵延20余里呈弓形的攻击防御型战壕。临颍正面，即南面的京汉路和西部地区，除荣臻第七军外，还配有第十六军等部，依托王庄、十里铺、熊庄、安庄一线防御阵地，在小商桥以北的南河两岸据险而守。”

“看来，张少帅是想找我们在临颍决战啊。”张发奎插了一句。

“是啊，为击败寻求决战的敌军，总司令部决定集中力量攻击临颍，我想让你们第一纵队改变战略，放弃向北攻击计划，转向西攻击临颍之敌，以期将正面敌之主力部队一举消灭。”唐生智的口吻像是商量，其实是命令。

其实，唐生智下达这个命令是颇有“居心”的，因为奉军虽连遭败仗，损失不少，但在临颍一线的总兵力仍然超过了武汉政府派来的北伐军总兵力的一倍，所以，张学良才敢与北伐军在临颍决战。而首先受到威胁的是北伐军第二纵队第三十六军，这可是唐生智的嫡系部队，面对强大的敌人，他惟恐自己的嫡系遭受严重损失，不顾夜深仍然打来电话，突然改变作战计划，让张发奎的部队转向临颍迎敌。

这个命令，对于张发奎来说是一个考验。当时第一纵队三面受敌，稍有不慎，就会受到敌人的夹击包围，甚至有被消灭的危险，但他并没有计较这一切，而是坚定地回答：“我们一纵队坚决执行司令部的命令，请总指挥放心！”

张发奎对上级的命令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他对部下也是这样要求，“铁军”之“铁”，首先体现在铁的纪律上。时任第三十六团参谋长的李汉魂后来回忆说：“在前进的行列中他很少把自己的位置放在火力网的后面，命令就是命令，硬得像铁！连他自己接受指挥者的命令时也是一样。”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张发奎连夜调整了部署。5月27日拂晓，他下达了第一纵队作战任务，以第四军副军长黄琪翔指挥第二十六师、第十二师，攻击临颍城东北两端地区之敌，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向小商桥攻击临颍南

端地区之敌，第十师从羊石向西南推进，对鄢陵方面警戒。他自率第二十六师为总预备队，随正面跟进。

张发奎指着地图上的“小商桥”说：“此桥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南宋时期，名将岳飞提兵北伐，曾与金兀术大战于此，抗金时杨再兴也在此壮烈牺牲。”

黄琪翔接过话头：“如今，北伐军将与奉军在此相遇，有意味的是彼此的指挥主官都姓张，一个是铁军将领张发奎，一个是奉军少帅张学良，两张相遇，两军对垒，究竟鹿死谁手，还得有一番考量。”

张发奎笑曰：“告诉三军，我们也学岳飞，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

正当张发奎在紧张地布阵时，在郑州，奉军少帅张学良也一夜未眠。他亲自接见了旅长何柱国，并面授何柱国以良策。何柱国率部在临颍下车后，即与张发奎部相遇。



5月，正是麦苗抽穗的季节，一望无垠的大平原，麦田青青。



何柱国乃奉军少壮派，对北伐军战术有研究。临战前，他亲到前沿观察地形，见一个小村孤立于大片麦田之间，大笑曰，张发奎善于山地战，素用“迅速接敌，勇猛突破”的战术，作战时北伐军必利用此小村为掩护。北伐军火力远不如我们奉军，我给他来个将计就计，把全旅轻重火力全部集中朝向小村，北伐军近村时，打它个人仰马翻。



果然不出何柱国的所料，北伐军利用麦苗作隐蔽，匍匐前进。主力集中在小村方向，如此则完全暴露于奉军火力之下。何柱国狞笑一声，打出第一枪，霎时间，奉军轻重火器一齐发射，北伐军官兵猝不及防，死伤惨重。

北伐军官兵毫不退缩，一排排向敌阵地冲击，士气甚旺，前仆后继、冲锋不止，竟将青天白日旗插到奉军散兵壕内达11次之多。但在敌人炮火中，冲到壕前人已极少。

何柱国看到奉军阵地前北伐军的官兵尸横遍野，干笑着道，嘿嘿，老子子弹比你人多，坦克和预备队还尚未用呢。

张发奎见状，忙令部队暂停攻击。

在其他战场，战况也同样激烈，但见烟尘蔽日，杀声震天，炮声轰鸣，血肉横飞。

贺龙指挥独立十五师经黄连城西，向小商桥发动攻击时，敌我双方伤亡严重，其第十五团伤亡达1400余人，第四军军旗也都丢失，后被贺龙部夺回。在贺龙部的顽强进攻下，残敌抵挡不住，向临颍撤退。贺龙部占领了小

商桥，解除了对第三十六军右翼的威胁。

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是在城东，第十二师尤为惨重。27日下午，第十二师进抵苇塾附近，得悉敌军大部据守七里头一带，布防甚严。该师即令三十四团于傍晚向敌发动攻击。

三十四团以第三营用疏散队形，攻七里头正面之敌，第二营沿右翼抄七里头北端，第一营为预备队跟进。黄昏时分，占领十里头之敌经第三营猛攻，退守七里头一带，恃坚固工事，顽强抵抗，第十二师屡攻不能克。

午夜时分，张发奎仍坐镇指挥部，一天的战况如此惨烈，有些出乎其意料，看来奉军的精锐果真名不虚传，必须重新调整部署，加强力量，于是，他连夜急调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赶到辛庄，抄袭敌之左翼，以第十二师之三十四、三十六团任正面，三十五团任左翼，乘28日拂晓之际，实行全线进击。

28日的战斗更为剧烈。前方的消息，让张发奎心里一次次发紧。

虽然北伐军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然而，敌方兵力数倍于北伐军进攻部队，且有良好工事，优越兵器，北伐军自晨至午，苦战半日，正面前线官兵伤亡甚众，三十四团团长吴奇伟负伤；左翼三十五团也伤亡颇重；更为壮烈的是，右翼之第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伤亡了五分之四，团长蒋先云率部勇敢冲锋，不幸壮烈牺牲。

蒋先云，中共党员，毕业于黄埔军校，原为武汉工人纠查队总队长。这次北伐，他主动要求参加。张发奎非常器重他的才干，委以他担任新组建的第七十七团团长。战前，蒋先云向全团演说："我团是新建立的，打仗有没有把握？"他自问自答地肯定回答，"我觉得是有把握的。因为我有一条命去拼，有一腔血去流。"蒋光云在战斗中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身先士卒，直到阵亡。

惊闻蒋先云阵亡的噩耗，张发奎面对苍天白云，久久不语，清泪潸然而下，黄琪翔等闻之，也不禁同为泣下。

"黄军长，我们上前线去。"张发奎提起冲锋枪，冲出指挥部。黄琪翔率领直属部队，紧随其后。

张、黄出现，士气复振。

张发奎一面令第十二师坚守阵地，不许退却，一面以七十六团沈久成部及七十一团欧震部向右翼之七十七团阵地增援。同时急调鄢陵之第十师赶来增援。

下午2时，第十师冒着烈日赶至，进攻部队闻讯，反守为攻，大喊着："冲啊！"向敌阵地冲击。

在北伐军奋勇猛进，连番攻击下，敌军不支，弃坚固阵地逃遁。北伐军乘胜追击，直薄临颍城下，奉军军心大乱，不敢恋战，弃城向北退走。

28日下午，北伐军攻克临颍城。

硝云散尽，战场上哀声一片。张发奎亲到战地医院看望伤病员。医院院长向他报告说，临颍一役，北伐军伤亡惨重，由于运输困难，许多伤病员来不及送往后方救治，加以野战医院设备和医疗条件差，不少重伤号不治身亡。

张发奎霍然而起，要找唐生智理论，并嘱咐说，各师军医处立即调出军医若干人，限令铁路行车单位要每列特挂3个车厢，限于两日内将临颍以南各站所有伤病员一齐运至武汉后方医院。违者枪决！

北伐军临颍决战，双方均伤亡惨重，共歼灭奉军万余人，第四军伤亡也达万人。当部队集合列队，迎接战地检阅时，张发奎噙着眼泪，哽咽地说："弟兄们，挺起胸来，我们伤亡了许多弟兄，鲜血染红了临颍，但打垮了几万奉军，夺取了决战胜利，我们永远是打不垮的铁军。"说到这里，他凝眸遥望北方，久久不语。

时任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向武汉政府报告云。

> 奉逆自失去漯河天险后，即大批增援，集中临颍，反攻正面……欲与我军争此生死一着。我三十六军、四军、十一军、贺师，奋勇争先，前仆后继，以血肉之躯，与如雨水之弹火相搏，英勇牺牲，率将大憝击溃，败不成军。不仅夺得极多之战利品，并将张逆学良之卫队俘获数名，此役实为从来没有之恶战，前方武装同志之劳苦，可惠可告，而我们死伤亦极其重大……

若干年后，90岁的张学良在其口述史访谈中，深情地忆起老友张发奎：

> 我跟你说个小故事，张发奎你晓得？我跟他在河南打得非常惨烈，他号称"铁军"，双方死了好多人，到后来在英国，大使郭泰祺说要给我做介绍，我说我们早认识啦，不打不相识呢。后来我们很熟，还在红宝石酒楼一起吃饭。

克复临颍后，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由陇海路东进，先后于洛阳、巩县间击破奉军右翼，奉军担心后路被切断，纷纷向黄河以北退却。冯玉祥部与中路军于6月1日会师郑州。

张发奎率部向开封进发，与第二集团军会师开封。至此，黄河以南已无敌踪，北伐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在郑州与冯玉祥合商，决定河南军政交由冯玉祥负责，唐生智、张发奎部退回武汉。次日，张发奎率部离开开封，班师回武汉。

第八章　分共反蒋，南昌赤旗炽

一、迫于形势，矛盾“分共”

7月的武汉热得像只大火炉，烤得人不动也在不断冒汗。市民们晚上都不呆在房里，男女老少一人一张凉床，全都跑到露天里睡觉。达官贵人可不用受这罪。他们乘轮船，下九江，跑到庐山上面去避暑。庐山的仙景让他们觉得自己像活神仙。

汪精卫带着一批武汉国民政府的要人们也上了庐山，他不单单是为了避暑，而且还要考虑对付与之分庭抗礼的蒋介石。此时，他下的最大决心，就是“分共”，与中共分道扬镳。他特别提醒唐生智、张发奎等将领要注意军队中的共产党人的动向。

张发奎自然知道汪精卫的烦恼，但说到“分共”，其内心仍是矛盾的，毕竟在北伐中，他与中共的合作关系不错，四军能取得如此的辉煌，也与四军中的中共党员英勇作战密不可分的。北伐战争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国民革命军中有许多共产党人在工作，如著名的共产党人周恩来、林伯渠、肖劲光、李富春等，都曾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军、师级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张发奎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

张发奎对共产党人进入他的部队似乎并不介意，随着他所指挥的部队的增多，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中也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一个独立团的范围。如先后担任过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罗汉、张善铭、廖乾五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秘书长高语罕等；他手下的几员征战沙场的骁将，如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和许继慎等，都是共产党员。到北伐后期，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据不很确切的材料统计，在他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其

中，叶挺第二十四师、贺龙第二十军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共产党人在张发奎的部队里起着极大的作用，他们遵守纪律、刻苦耐劳、英勇善战、勇于牺牲，这点张发奎深有感受。

虽然部队里有这么多共产党人，张发奎对掌握军队还是蛮有自信心的。因为，四军军长黄琪翔、十一军军长朱日晖都是他信任的人，二十军军长贺龙不是共产党员，而叶挺又是他的好友。正因为如此，汪精卫发动“7·15”分共以后，张发奎对部队里的共产党人，仍然采取容忍态度，不少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高语罕、于树德等仍留在他的部队里，他甚至想把这些人留下来为己所用。直至在30多年后，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者问他“共产党人是否给了你很多帮助”时，张发奎的回答仍然是：“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他们在宣传里只说我的部队好。”

可以这么说，在大革命时期，除了贺龙等后来与国民党决裂、成为参加革命起义的将领之外，在北伐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张发奎是与中共关系最友好、客观上对中共帮助最大者。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不同，他的左倾、他的联共，还是有一定诚意的。

其实，不单单是张发奎，四军里许多将领，如张发奎最信任的黄琪翔也不大愿意“分共”，并说：“离开共产党的帮助，以后打仗就难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内战》中这样评价道：

> 很多人物的举动也和《三国演义》所叙接近，即是在地缘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关系为依归。张发奎称“铁军”，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战无不胜，也并不是战术高妙，乃是数人意识形态接近，在统御经理上互相信任，结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地分工合作。后来环境变迁，各人也不能再创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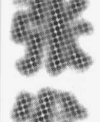
这个观点值得回味，国共分裂后，张发奎的“铁军”果真没像北伐时那样战无不胜了。

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15日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分家。在中国历史上，以7月15日这一天作为分水岭，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

对于张发奎迟迟不清共，汪精卫等十分不满意，一再敦促他要在部队中坚决清共。

一直紧跟汪精卫的张发奎，感到国共合作已不再可能，他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礼送”的政策。但即使同意分共后，他仍大批接纳共产党人。时任北江农军负责人的龚楚后来回忆说:“张发奎将军由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同志。……我想起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也正因为这一点，中共对张发奎一直存有幻想。

然而，张发奎虽然“容共”，却从未想过参加到共产党这一边来，这是其历史局限。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的时候，知道孙先生对汪精卫是有所寄托的。从表面上讲，现在先生已逝，汪精卫即使是扶不起的“阿斗”，他这个“赵子龙”也要责无旁贷，尽力扶持。30多年后，张发奎对他当时作出的选择有这样一个说明:






> 我认为，革命完成以前，革命力量不应分裂。但是，如果汪精卫要分共，我支持他，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比我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以前已经说过，军人被告之，服从是他的天职。这可能很危险。年轻的军人易于被引入歧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认真地考虑，哪种政策是正确的。因为汪精卫认为这是正确的，我也就这样想。我对于军事的兴趣远高于政治。

二、东征反蒋，三心二意

汪精卫在武汉进行“分共”的同时，还策划着“东征反蒋”。

此时发生的“东征讨蒋”，与“4·12”以后的宁汉对立已经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纯粹变成国民党内部的争斗。“7·15”事变，即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正式“分共”后，国民党仍处在一种人们谈起即为之齿冷的可悲状态中——“一个党、两个政府、三个党部、四分五裂”。所谓“一个党”，即都称国民党的党名。所谓“两个政府”，即南京、武汉有两个国民政府，分别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都自称是惟一的合法中央政权。所谓“三个党部”，

即南京、武汉各有一个中央党部，以张继、林森、谢持等人为首的上海西山会议派虽然没有地盘，却也有一个中央党部，三家都自称是国民党的正统。

国民党的“两府三中央”在反共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可是在党权、政权上的争夺却依然如故。当时武汉政府的主席及武汉国民党中央的主席都是汪精卫，他一心要让南京方面承认自己是正宗，并表示臣服。南京政府的主席胡汉民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不买账，非要瓦解和吞并武汉政权。武汉政权南面的李济深、西南的四川军阀、北面的冯玉祥都倒向南京政权，汪派国民政府的财政状态接近崩溃，可谓是四面楚歌，内外交困。因此，汪精卫、唐生智认为惟一的出路是“东征讨蒋”，以主力沿长江顺流而下打垮南京政权，夺取江浙富庶地区，这不但就此能解决财政问题，还可以使其他各派国民党势力臣服于自己。这样，7 月 15 日宣布与共产党分家后，武汉政府马上又喊出了“东征”的口号。

对于“东征讨蒋”，张发奎是支持的，二次北伐回到武汉后,他就表示：“蒋逆为吾人目前之敌人，非出师讨伐不可。”而且，他也很自信，他和唐生智的队伍能直取南京，赶走蒋介石。因为，唐生智的手下除自己带出来的湘军，还管辖着收编的高桂滋、刘佐龙等部，总兵力达十几万人。张发奎所部有 3 个军共 4 万余人，其中，第四、第十一军是广东军队，第二十军是刚刚扩编的湘西贺龙的军队。而他们所要对付的只是蒋介石的第一军，李宗仁的第七军还处于摇摆中。然而，唐、张二人真正实施东征后，又各自打起了算盘，并不想与蒋介石的军队真正打硬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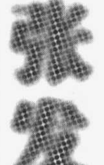
张发奎把指挥部设在九江，计划派四军第二十一师富双英部沿长江南岸东进，其主力分两路东进，一路经上饶、江州、杭州进攻上海，一路经皖南攻取南京。

张发奎的部下大多数反对东征。他们说起“二次北伐”河南时，冯玉祥待武汉方面取胜才从侧后攻奉军，唐生智则是先让张发奎的部队打胜后才就势追击。有人说：“河南一战，张发奎损兵八千，唐生智损兵八百，冯玉祥损兵八十。”这次东征，唐生智又想拿我们做“傻仔”，真是想得美！我们坚决打回广东去。于是，他们对张发奎说，即使东征取胜，如同北伐时一样，是“铁军”打硬仗唐生智得便宜，长江下游也不会有容身之处；如果东征失败，部队也回不了两湖，那时就会进退不得。还不如趁离开武汉之机，带着这四万多人马到广东老家去另开辟一个局面。这一番话渐渐打动了张发奎的心。为此，他在与汪精卫商量后，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就东进讨蒋与回师广

东问题征求意见。

7月的武汉大雨连绵，新的洪峰在长江上游酝酿。中共临时中央这时通过内线关系，摸透了张发奎的内心打算。

中共中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于7月上旬进行改组的，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履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停职。其时，李立三首先提议应利用这一形势，把现在还能掌握的武装力量都调到九江、南昌一带，在那里暴动。周恩来、张国焘、李维汉、张太雷等也都认为武汉当局的“东征讨蒋”，不过是汪精卫、唐生智集团与蒋介石集团争夺地盘的新军阀混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不能再参加。如果张发奎同意合作，就与他一同拉走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南下广东。如果张发奎不同意合作，就在南昌暴动，自己单独南下广东开辟一个局面。争取张发奎参加即将举行的暴动，是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的左派梦寐以求的，从当时的一份文件来看：







> 中共中央确定组织民众武装起义的新政策，着手制定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计划。同时决定以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实行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二次北伐。

因而，中共中央始终未放弃过联合张发奎这方面的努力，曾派张国焘等人去游说张发奎。张发奎均托故不见。

国民党左派代表邓演达在出走莫斯科之前，特地与在四军的苏联顾问铁罗尼一起来找张发奎。邓演达与张发奎关系密切，张发奎自然不好不见。邓演达开门见山地说：“向华，汪精卫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您不应该听他的，唐生智政治上也死了。您应该带第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回到后方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一切从头做起。”

张发奎知道邓演达不是共产党员，邓只是想让自己与共产党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关系，共同组成一支反蒋反汪力量，便反驳说：“汪先生的政治生命还没有终结，他只是有点病，我们就要请医生救他。”

铁罗尼说：“既然这样，我们仍然可以找汪精卫谈谈。”

张发奎说："你们找他谈什么呢？我的观点就是必须支持汪先生。"

三人不欢而散。

后来，谭平山、何香凝、徐谦等都与张发奎谈过类似的话题，同样没有任何结果。

三、叶贺抗令，起义推迟

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张发奎的政治态度，改变依张政策，决定"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同时，决定制定湘鄂赣粤4省秋收暴动计划，并委派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九江地区策动张发奎之第二方面军武装起义。

正在中共紧锣密鼓准备起义时，汪精卫在庐山召集唐生智、张发奎和东征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省长朱培德等军事将领召开反共会议。

汪精卫首先发言，矛头指向张发奎："张总指挥，从武汉决定制裁共产党后，武汉的共产党徒都跑到你的四军、十一军、二十军工作，你以为他们是帮助国民党，所以优容他们，小心养虎为患啊。"

朱培德接过话头说："现在，贺龙之二十军、叶挺二十四师、蔡廷锴十师等人马均驻防九江至德安一线。九江最大的力量乃贺龙之第二十军，叶、贺部队共产党人多、太红了，我们必须先下手为强，防患于未然啊。张总指挥，这些是你的军队，你要痛下决心才是。"

唐生智皱着眉说："现在形势危急，据可靠消息，中共一批要员云集九江，有进行暴动的倾向，叶、贺不稳，我看这样吧，就以张总指挥的名义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届时将此二人软禁，同时令叶、贺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然后以3个军的兵力包围叶、贺部队，解决他们！"

张发奎对"分共"并无异议，关键是在什么时候。原先他准备到广东后再说。在这种压力下，他点头答应，对朱培德说："此计可行，就请朱老兄代为通知叶、贺吧。"

朱培德道："好吧，我定把口信带到，届时将他们一网打尽。"

当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张发奎在准备着次日如何软禁叶、贺两人时，他万万没想到，身边的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会将这秘密透露给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而叶剑英竟然是中共秘密党员。

黄琪翔 (1898–1970)，字御行，梅县水车镇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历

任粤军第一师后方办事处少校参谋、东征军十四师团长、北伐军第四军军长。7 月 19 日，黄琪翔参加了汪精卫等主持的庐山“分共”会议，察觉到反动派即将逮捕和杀害著名共产党人时，他连夜派人下山，秘密通知了叶剑英等人。

第四军部设在九江市总商会院内。离总商会不足百米之处，有一个美丽的甘棠湖。湖中有个小亭叫烟水亭。叶剑英得知张发奎等要解决叶、贺部队的绝密消息后，便秘密约贺龙、叶挺、廖乾五和高语罕在九江甘棠湖上见面，商量对策。

五人在湖上划舟泛游，叶剑英低声透露了汪精卫他们的密谋，并说：“老张靠不住了，他亲口对我说：‘真是逼得没法，我只好投降右派。’我看，张发奎是没希望的了。”

贺龙、叶挺听完，不禁大吃一惊。

时不宜迟，经过短时间的商量，贺龙、叶挺决定不接受张发奎的命令，连夜将参加暴动之人马开到南昌。

7 月 26 日，贺龙、叶挺人马抵达南昌后，中共要员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周恩来、彭湃、刘伯承和朱德都相继抵达南昌。周恩来到南昌后，成立了由他任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暴动工作，并任命贺龙为暴动总指挥。

获悉中共各方面要人均纷纷抵南昌，汪精卫、张发奎、孙科、朱培德、唐生智等深感大事不妙，张发奎心有不甘，数次电催叶、贺到庐山开会。

7月 27 日，汪精卫见叶、贺不从，急了，再次召集张发奎、孙科等在庐山密议，商讨对付共产党发动武装暴动的办法。会议作出了三条决定：(一) 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党”，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人。

南昌暴动势在必行。

或许，身在庐山的张发奎有两个没想到，一个是没想到，叶、贺会抗他的命参加暴动，第二个没想到的是，中共内部因是否争取他起义，竟然争吵一番，甚至推迟了起义时间。

原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于 7 月 28 日晚举行暴动，就在这关键时刻，张国焘于 7 月 27 日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九江，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待他到南昌后再定。7 月

30日，张国焘抵南昌，说共产国际有电，云起义“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

张国焘说这话确实是共产国际的意思。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布廖赫尔等认为，希望起义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东。刚与张发奎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廖赫尔预言，如果张发奎参加起义，将有3万多士兵，这足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产党党员能够把张发奎排挤掉；但如果共产党人在南昌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至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提出警告，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含糊其辞的指示通知起义领导人。

周恩来闻听此言大怒，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反对说：“这个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想法不吻合，暴动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受汪精卫影响很深，根本不会同意我党的暴动计划。我们党应该站在领导地位，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决不能依靠张发奎了。”

冷静了一会儿，周恩来解释说：“我们与贺龙已订了暴动密约，贺龙已征得其属下各师长的同意，不能改变。贺龙还表示，若暴动联合张发奎，他不参加。”

谭平山也主张不管什么人的指示，事到如今一定要暴动，于是便和张国焘在会上大吵起来，并指着张国焘的鼻子大骂他一顿。

前委经过激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8月1日晨举行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一声枪响惊破夜空，南昌起义正式开始，经过一夜激战，起义部队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

当日一早的南昌《民国日报》，刊登了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15名共产党员和7名国民党左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的《中央委员宣言》。上午9时，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选举产生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何香凝、贺龙、叶挺、朱德、恽代英、林伯渠、李立三等25人为委员，又在这25人中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为主席团成员。当时，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张发奎、郭沫若均没到场，谭平山作为革命委员会

的代主席，主持工作。

8月2日下午1时，在南昌贡院召开5万多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并举行革命委员会宣誓就职典礼。参加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代理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下辖3个军，第二十军由贺龙兼军长，党代表廖乾五；第十一军军长由叶挺兼任，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军长由朱德担任，党代表是朱克靖。3个军达2万余人。

由于南昌暴动的大部分部队都是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下辖的部队，所以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方面对张发奎还是重视的，尤其是共产国际一直认为要由张发奎参加并领导才成，因而在8月1日会议上，张发奎仍被选为委员，并保留了他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务。

叶、贺分别打电报给张发奎，欢迎他来南昌一块干革命，群众团体也发通电以及贴出“拥护张总指挥”的标语。贺龙只是就任第二方面军“兼代”总指挥，意即仍随时欢迎张发奎前来。可见当时相当部分人对他仍抱有幻想。

四、叶参“献计”，放弃追击

南昌乃四战之地，易攻难守，暴动队伍不得久留，何去何从，摆在了中共领袖们面前。当时两湖的工农群众运动已蓬勃发展，数十万人马可一呼而起。但年轻的中共领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南下潮汕，其意是想得到一个海口，取得苏联军火接济。8月3日开始，暴动队伍先后撤离南昌。时值酷暑，沿途群众不知底细，纷纷逃离，暴动人马得不到补充和支持，沿途生病掉队者不计其数。

关键时刻，出现动摇分子。有些被动参加起义的如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蔡廷锴率师南下中，于8月4日在进贤县一带忽然提出“礼送”共产党员离队。然后，像早有预谋似的，他把部队带到福建，找他的老长官陈枢铭去了。

再说，8月1日，张发奎接到贺龙、叶挺给他的电报，说南昌业已举事，劝他一起加入革命堡垒。此时，他虽然没有得到战斗详报，也猜测出他们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暴动了。张发奎开始还抱有阻止他们的幻想，认为自己在第二方面军威信最高，部下还是会听令的。只要他亲自出马招呼一

下，叶、贺也拉不走多少队伍。他下庐山后，感到眼下当务之急是稳住南昌城外围的部队，尤其是驻黄龙门、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因为这个师是他部下最有战斗力的一个师。于是他亲点自己的特务营，乘坐小火车，直奔黄龙门车站的第二十五师师部。

张发奎身边的特务营，都是从各军中百里挑一的年轻小伙子，绝大部分是广东籍子弟，约有四五百人，每人手中都有一挺手提机关枪，也称“花机关枪”，按现代兵器的划分应算是冲锋枪。那时得到一支连发武器实属不易，张发奎时刻不忘把这支卫队带在身边以防不测。

天近晌午，烈日当头，张发奎满脸是汗地赶到黄龙门车站，朱晖日与李汉魂前来迎接。

李汉魂沮丧地报告：“张总司令，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把他的一个团拉走了，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带走了2个连，第七十五团的3个营也不知去向。”

张发奎挥了挥手：“周士第是我把他放在团长这个位置的，他会听我的。赶快上车，和我去马回岭，我要亲自截住他们。”

于是，朱晖日、李汉魂跳上小火车。火车上，除了张发奎和他的特务营外，竟然还有3名苏联顾问。

黄昏，西天一片火烧云。聂荣臻、周士第带着担任后卫警戒的起义军第七十三团第一营守在一座铁桥边。他们听说张发奎亲自带着队伍坐火车追来了，隔河还清楚看见张发奎在那边喊话，便命令机关枪向空中开枪，吓一吓他们。

张发奎听到枪声，以为火车司机已被共党控制，赶紧与李汉魂等人跳下火车，沿着路基向北狼狈而返。

载满特务营的火车却未停下，一直开到德安车站。火车一停，他们即被起义军包围，周士第命令他们放下武器，保证官兵的安全。他们只好服从。

聂荣臻等人进入车厢，发现张发奎的望远镜和随身的一些物品丢在桌上，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并缀有黄穗子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旗。有意思的是，这面军旗被作为起义部队的军旗，一直扛到潮汕失败为止。

一小时后，一个参谋带来张发奎的一封信，问是否可以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这可是他的心爱之物。显然，他不指望追回他的部队了。

聂荣臻痛快地说：“可以，就连他的卫队都一同放回去。”

刚刚被俘获的张发奎的特务营又整了队，乘火车向北开去。

由此可见，共产党方面还没有对张发奎彻底撕破脸皮。

8月 4 日下午，气温高达 38℃，人坐在房间里不动也直冒汗。张发奎心里却有些发冷。他在九江紧急召开第二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会议。

张发奎见自己手下 3 万人马差不多被叶挺、贺龙拉走了三分之二，真如同挖走了自己的心头肉。一开会，他就大骂：“叶挺、贺龙公然叛变，于公谊私情均不可谅！一定要讨伐！”

朱晖日是反共坚决的人，挂着第十一军军长的头衔，叶挺率军起义使他只剩下一个不完整的师，差不多成了空头军长，自然是恼怒万分。听到张发奎的叫嚷，他第一个起来响应：“奶奶的，共党如此嚣张，应立即派兵追击。”





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也跟着提出要攻打叶挺、贺龙，追回部队。

其时，黄琪翔内心十分痛苦。他既不愿追随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反共反人民，又没有勇气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因此郁郁于怀，无所适从。他曾私下说：“北伐至此，最觉痛心，拟将第四军所有枪炮抛沉大江中，军中所存款项，平分全军作路费还家，做个真的解甲归田。”因而黄琪翔虽然也骂叶挺不够朋友，不过他的反共态度还不太坚决，没有那么激烈地主张追击和讨伐。



坐在席间的叶剑英听着十分焦急。目前，张发奎手下的第二方面军虽然只剩下 1 万多人，可是要是去追击南昌起义部队，江西朱培德的部队必然会配合。起义军南下前有李济深、钱大钧的粤军部队拦阻，后面又有尾追，定会陷入前后受夹击的不利境地。如果张发奎放弃追击，朱培德为保存实力也不会去追赶，南昌起义军南下就没有后顾之忧。



叶剑英从容地点上一支烟，内心却激烈地想着对策。

等到张发奎及其身边的将领发泄完，叶剑英把烟按在烟缸里，开始用他的梅县客家话发言。他明白张发奎在气头上虽然嚷着要追赶叶、贺部队，内心中还是想保存和壮大实力，不会舍得拿仅存的那点本钱去打硬仗。他决定利用张发奎一直想重回广州立足的意图，劝诱他放弃追击起义军的打算，以便保存起义军的实力。

叶剑英从容不迫，先分析了一番整个形势，说明现在国民党内实际上分成宁、汉、粤三派，都变成了新军阀，只有我们是真正继承孙总理遗训坚持

革命的。在这三大派中，南京的蒋介石是我们第四军的宿敌，掌握武汉政府军权的唐生智的湘系军队也不能容纳我们，只有回广东去找老上司李济深，在那里开辟一块地盘。等到有了自己的基地，再北伐统一天下。而要实现这一点，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有实力。没有实力，一切成了空话。

这句话说到张发奎心口上了，他不禁轻轻点头表示赞许。

叶剑英扫了眼众将领都聚精会神的表情，继续侃侃而谈："叶、贺已经撤离南昌，势必南下广东。广东的李济深必不相容，肯定要派兵迎击，广州城随之空虚，这正是我们南下广东的大好时机。如果我军打起'援师讨逆'的旗号，直趋广州，比跟着叶贺屁股打、两败俱伤好多了。"他转身对张发奎说，"张总指挥，我们原来商量好的，到广东重新做起，如果尾追叶贺，徒耗兵力，我军仍无立足之地，又怎样实现总理遗训，重新北伐呢？"

张发奎沉思了一下，有些为之动容。他其实最了解南昌起义部队的底子，特别是叶挺部队的战斗力。再想到起义军虽然拉走部队，对他还没有完全翻脸，在文告中仍把他列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七委员之一，起义中缴获的他的望远镜等私人物件也都派人送还。此时与叶贺约定互不相扰，让他们南下去吸引李济深、黄绍竑的粤桂军队主力，打个两败俱伤，自己正好可以像叶剑英所说的那样，乘虚而入广州，下一步也可取李济深而代之，待坐稳了广东再图其谋。正是考虑到这些，张发奎的脸色缓和了许多。

黄琪翔接腔道："叶参谋长分析得有理，我建议暂时与叶贺示以和缓，派人去约定分路南下，互不相扰。"

张发奎点点头，表示同意叶剑英、黄琪翔的意见，放弃了尾追贺叶部队的想法。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为避'通共'之嫌，我们还是派出一部分兵力去追赶叶贺的部队。叶参谋长，你电告武汉政府，就说'职部积极进剿，本日先头部队已抵涂家埠，速向南昌追剿'。"

张发奎开完会后，郭沫若正在指挥部等他。

张发奎关心地问："中共已在南昌暴动了，我解散了政治部，先生有何打算？"

郭沫若干脆地回答："我打算到南昌去。"

张发奎没有再阻拦郭沫若，反而出人意料地说："先生你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动身吧。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明天就不能保险了。"他沉吟了一下，说："请郭先生代我向贺叶等转告以下四点：（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二）我听

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张发奎的名义，傀儡我做不来；（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害了我的人。”

郭沫若笑着说：“既然如此，张总指挥不妨以书面形式把这些内容写给我，我也好准确无误地传达啊。”

“好吧。”张发奎让秘书拿来纸笔，挥笔而就。

当晚，郭沫若等20余人乘火车南下南昌，张发奎目送他们远去，感触甚多。

8月9日，张发奎连发两电给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和孙科等人，痛陈：“此次贺叶叛变中央，精神受刺激过甚，实已心灰。……务令共党歼尽，稍赎罪过。”

然而，张发奎打完电报，却低声对黄琪翔道：“我们另择路南下吧，记住，不要跟得贺叶部队太紧。”

对于第四军南下这一段史实，国民党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中有如下记载：

> 叶贺等遂东去抚州，张发奎率师追之。嗣忽分途，叶贺等由闽粤边境趋潮汕，张发奎部则改由南雄入粤。

这“嗣忽分途”，不知情者看起来有些莫名其妙，这里应记叶剑英一功。30多年后，张发奎是这样回忆南昌起义的：

> ……八月七日，我各师到达南昌，叶、贺已闻风向进贤、抚州方面逃遁，我除了招抚安辑外，当即指挥各师紧向叶、贺两部叛军追击，等我追到抚州的时候，叶、贺又窜向宜黄，而有由宜黄南下窥粤之势……后来，叶、贺叛军果然窜广东直趋潮梅，政府为挽救革命策源地之广东起见，乃令我追剿，当时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琛亦派前第四军党代表陈可钰来赣，洽商清剿计划，因此，我就决定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南雄、始兴、韶关，径趋广州，以增强广州防务，必要时，再移广州之师东向潮梅，予以截击。

30多年后，张发奎在口述回忆中曾对他的一些做法和立场解释：

(我知道) 叶挺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们彼此间极好。我想，我可以将他争取过来。最坏，我想他可以离开我的军队。

但是，我对贺龙没有把握，因为他有自己的部队。不过，我对他很好，他也知道这一点。我为什么对他不错，因为我是真诚而直率的。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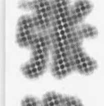
共产党人集中到九江时，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起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他们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发放路费。分共不意味暴力，它意味共产党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我坦率地要求他们当我准备攻击南昌时站在旁边。唐生智胡乱地屠杀共产党人，我不能。我没有逮捕共产党人。为什么？因为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负责。此外，我永远不相信屠杀能奏效。

许多政工人员离开了……我给每人发了路费。

我多次说过，我不会杀害共产党员。在任何情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第九章　张黄事变，广州大暴动













一、进驻广州，逼李让权

南方的8月时雨时晴，酷暑难耐，部队中的病员日趋增多。

张发奎、黄琪翔率第二方面军，与南昌暴动的贺龙、叶挺部队平行而进，互不侵犯，当获悉叶、贺的部队抵达赣南抚州，有进入粤东之势时，他便命部停止追击，取道新淦、吉安、泰和、赣州、南安，于9月20日来到南雄。

在南雄，张发奎对黄琪翔说："9月13日，广州的李济深为支持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发表了长篇宣言，希望下野的蒋、汪能重新执政。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已经合并，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我打算暂时离开部队，取道到香港，与李长官好好沟通，就军队回粤问题取得他的谅解。由你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率部继续南下吧。"

在广州，正忙于镇压南昌起义军的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虽知张发奎拥汪反蒋，与自己的政见不同，但见叶、贺南下，潮、梅吃紧，此时不宜得罪张发奎、黄琪翔，且念过去都是自己老部下的情面，同意张、黄回粤，甚至派闲居广州的原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代表他到半途迎接，希望黄琪翔带部队到东江尾追叶、贺部队，与两广部队夹攻"叛军"。黄琪翔根据张发奎的安排，坚不从命，李济深不得已，急调驻广西的第十军兼程赶往粤东，与陈济棠等的部队会剿"叛军"。

正值李济深、黄绍竑会剿南昌起义部队时，9月21日，广州市内出现一番特殊景象，黄琪翔以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部队举行了"凯旋"入城式，并散发火药味很浓的回粤宣言，公开攻击南京国民政府，并称

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李济深无奈，赶紧派员到香港，迎接张发奎回广州主持军政。

9月27日，李济深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张发奎表示拥护李济深执掌广东权柄，并送2万支枪给李济深作见面礼。

再说在武汉的汪精卫听说张发奎部顺利开进广州后，十分高兴，他又看到了制衡南京的希望，他给张发奎发来电报说，他准备在两个星期内从汉口到广州。张发奎没有与李济深商量，即复电催促汪精卫早日来穗，“以期在南方建立一个新局面”。

9月30日，广州政治分会决定，不遵守中央特别委员会限10月1日撤销之命令，并派张发奎为改组省党部委员，李济深为两广经济委员会委员。

10月1日，李济深之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在广州正式成立，国民革命军后方总司令部同时结束，原后方总司令部所属的军队及张发奎所部，统归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辖。李济深在士敏土厂设宴招待张发奎。张发奎表明了他的政治主张，既反对国民党西山派分子，也反对唐生智篡夺国民党中央权力，并声明他及其下属将领均支持李济深作为南方军事首领。于是，张发奎在广州南堤的旧盐务大厅设立指挥部，主力部队集中在韶关，另一部派往东江的石龙。

在南京的广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见状，反对张发奎控制广州，派出部队经上海乘军舰赴汕头。与此针锋相对，广州召开盛大的民众欢迎会，欢迎张发奎及第四军返粤。张发奎在会上声称回粤有三个使命：一是肃清共产党，铲除叶、贺起义军；二是改善广东政治；三是扶植工农。张发奎还发表通电，谴责南京特别委员会，要求李宗仁、白崇禧安排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解决局势问题。

10月7日，李济深、张发奎致电汪精卫，请汪回粤主持“党国大计”。同日，汪派陈公博由汉口抵达广州。

张发奎虽然心里对李济深十分尊重，但他知道李济深是拥蒋的，与自己的主张并不相同，为了支持汪先生，也只能对李长官多多“得罪”了。为了取得广州的控制权，张发奎、陈公博等乘广州防务空虚之机，向李济深步步施压，迫使他同意改组广东省政府，甚至改变部队番号，称李济深的留守第四军为新编第四军，而张发奎的前方第四军则保留第四军的番号，成为第四军的正统。

李济深步步忍让，被迫改组了省政府，以陈公博为省民政厅长，邹敏初

为财政厅长，黄琪翔为军事厅长；又让出了农工厅长职，由张发奎的政治部主任谢婴白担任；广州市公安局长则由张发奎的军长朱晖日担任。最后，广州市市长也由汪精卫的亲信甘乃光担任。

李济深虽然对汪、张表现出了一副友善仁厚之态，但内心有些不安，问黄绍竑如何应对张发奎等的要求。黄绍竑见张发奎的矛头是针对自己的，有些无能为力，把自己的部队调往广西，东江防务交往张发奎部接替。他苦笑着劝李济深说："他们要求什么，就给他们什么好了！横直广东人的事由广东人自己去搞，你是他们的老长官，虽然你是广西人，但你不是桂系，他们不会对你有什么歹意吧。"

10月18日，广州国民党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李济深任主席，陈可钰任总参谋长，张发奎、黄绍竑任副总参谋长，陈公博任政治部主任。该会为两广军事统一机构，取消李济深之第八路军总指挥、张发奎之第二方面军名义，通电声明主张恢复中央党部。





10月24日，由张发奎派李汉魂之二十五师，赴东江解除李济深之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胡谦所部武装，将胡谦扣留。李济深电令将胡解省，张发奎却以"贪污"罪将胡谦就地处决。同时，张发奎又暗中争取了薛岳等粤军将领的支持，鼓励他们脱离李济深。





李济深看到张发奎越来越不把他这个老长官放在眼里，军事、财政、人事上的冲突不断发生。他惟恐鹊巢鸠占，失去了广东地盘，乃以老上司的身份主动提出，愿给张发奎港币5万元，要张出洋远游，并制造礼送汪派出粤的舆论。同时，他又将反对汪派最烈、与张发奎又有所不合的陈铭枢由日本邀请回国，到福州再统军队，还特地电陈，邀其"回粤休养"。这一来，张发奎与李济深的关系陡然紧张。

二、设下圈套，骗李擒黄

碧云黄叶，秋色连天。

10月29日，汪精卫自上海抵达广州，召集何香凝、陈公博等人开会，谋在广州设立中央执监委员会，继续与南京政府对抗。

11月10日，汪精卫邀请张发奎到位于葵园的私宅晤谈。张发奎到时，汪夫人陈璧君出门相迎。汪精卫将张发奎让进密室。

两人坐定，汪精卫道："向华，今我等已入粤，不知兄下步将有何打

算?”

张发奎道：“若取两广，必须将李济深、黄绍竑两人赶开，二人离去，凭汪先生之身份，一纸号令，两广便能统一。”

汪精卫点头道：“英雄所见略同。向华兄，只是……”说到此，他犹豫了一下，又道，“李济深在党内资历很高，他在广东的势力很大，弄不好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张发奎略思片刻道：“是啊，当寻一万全之策。李济深是我四军多年的老上司，众将领都不愿意与他兵戎相见。我看只能用计使其离开广州，再把黄绍竑从广西骗到广州。将其逮捕，则两广不费吹灰之力，为我所得。”

张发奎话到此处时，汪精卫像想起什么似的，以掌拍额道：“对了，现在有天赐机缘。”

张发奎道：“莫不是借蒋、桂之力，骗走李济深?”

汪精卫道：“正是此计。”言罢，摇晃脑袋道，“昨天，宋子文到宅中晤我，言蒋中正意欲拉我反桂，今早上蒋又发来电报，邀我北上会商党事。”

张发奎问道：“蒋中正何时回的国?”

汪精卫道：“刚刚回来。昨日南京方面也来电，言要在沪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商讨四中全会事。我看可以趁此机将李任潮骗走。”

张发奎补充道：“在李任潮和你将走时，再发电叫黄绍竑来穗，我在香港幕后指挥，密令黄琪翔将黄绍竑除掉，如此两广则唾手而得。”

汪精卫点首道：“此乃天助我成功。”

当下，两人又做了番详细计议。

第二天，汪精卫面晤李济深。汪说他要去沪开会，还把蒋和宁方电报给李济深看。李济深虽然时时在提防汪、张，可也没想那么多。当下，汪精卫便以个人的名义，给南宁的黄绍竑发了电报，要他到广州来。黄绍竑见是汪精卫的电报，不敢怠慢，急急地起身，于11月16日从南宁赶到广州，下午4点便往葵园谒汪。

张发奎和陈公博、黄琪翔等一班人正在汪府，彼此相见有点尴尬。

黄绍竑问汪精卫：“李任潮主席呢?”

汪精卫满脸是笑，答道：“任潮先生因有要事马上就动身去上海，不在这里。季宽先生，你初到，路上辛苦了。请你休息一下，我们改天再谈吧。”他没有提要和李济深一同去上海。

张发奎等正准备欢送李、汪登船去上海，都不说话。

黄绍竑看神情不对，就辞了出去，心里不免起了疑心。

张发奎在送走李济深、汪精卫后，为了“避嫌”，也连夜离开广州，赶到香港，广州的事由黄琪翔处理，他遥控指挥。

当晚，黄琪翔召集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与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的代表开会，决定马上采取军事行动驱逐桂系，并派人到黄绍竑住宅捕杀黄绍竑。

单说黄绍竑，送走了汪精卫和李济深，便回到吉祥路自己的私宅，由于连日行车疲劳，他便早早睡下了。

刚刚朦胧入睡，有卫兵进来报告，广州财政厅长冯祝万紧急求见。冯祝万乃黄绍竑的老友。黄绍竑闻之，急忙披衣而起：“快快请进。”

冯祝万匆匆而进，见左右无人，压低声音道：“季宽兄，你还在此高枕？张向华已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半夜时分就要向你动手了，赶快逃吧。”

黄绍竑听了，惊得面如土色：“我与向华无怨，向华何以对我下此毒手？”

冯祝万道：“季宽，你太忠厚了。须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时间迫在眉睫，赶快逃命吧。我也要离开广州。”

黄绍竑见状，不敢怠慢，急忙化装成一商人模样，悄悄地离开了公馆。还没容他逃出广州，城内便枪声大作，大街小巷都是兵了，高喊着：“活捉黄绍竑！”黄绍竑无处躲藏，急忙跳进一条臭水沟里，隐住了身子，待士兵过后，才摸出了城，搭上一条外国船，逃难到香港。

第二天一早，广州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标语，上写着：“打倒黄绍竑！”“欢送李济深！”“实现汪主席的救党主张！”“反对南京特委会！”李济深的公馆也同时被士兵抄查。

黄绍竑后来回忆道：

> 抗战时期，我与李济深、张发奎、吴奇伟等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那时我与张发奎等已经合作了好多年，混得很熟，彼此无话不谈了。大家在火车上谈起一九二七年广州的事情。我问张发奎：“向华（张发奎号），那时候你们为什么要把李任公赶走呢？”张发奎说：“我对任公劝了不少次，流了不少眼泪，任公都没有答应。”他不说明劝李任公的是什么内容。李济深笑着说：“我当时不知道你们做什么，叫我怎么答应呢！”当然李济深不会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的，而是不同意罢了。我又问吴奇伟：“梧生

(吴奇伟号)，假如那天晚上（十一月十六日）你把我拿着了，你怎样处置呢?”他说：“唔唔，恐怕对不住了。”唉！这几个军阀的大笑里面包含着多少人的性命和多少人的哭声啊！

三、夺权成功，四面楚歌

11月17日上午，广州政治分会匆匆任命张发奎为广州军委会主席，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代理广东省主席。同时，他们还宣称黄绍竑背叛党国，迫走汪精卫、李济深应予以铲除。至此，汪派掌握了广东的一切大权，并宣言反对南京特委会。

18日，张发奎这才没事似的回到广州，主持军政，并以广州政治分会的名义通缉黄绍竑。黄琪翔攻占虎门要塞和石井兵工厂，并包围黄埔军校，将黄埔军校解散。

20日，张发奎在穗召开重要会议，决定成立“主席团”，以处理目前军事事务。主席团由张发奎、李福林和陈公博组成。22日，张发奎在广州总商会大会上发表讲话，表示：“铁军”不是赤色军队，是支持国民党的；对李济深强迫商界筹款表示同情，决心裁减军费开支；反对唐生智，亦不服从非法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他要求商界支持他所领导的政府。

张发奎、黄琪翔发动的这次以“护党运动”为名的政变，史称“张黄事变”。“张黄事变”虽然在一夜之间就获胜，却捅了一个大马蜂窝，在南京，汪精卫成为国民党内攻击的中心。

最为恼怒的是李济深，他下轮船后接到黄绍竑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得知广州兵变，方知上当受骗，大骂汪精卫和张发奎是伪君子，呈请中央剿办张发奎和黄琪翔，并马上电令他的部下陈济棠率兵从东江反攻广州，并联络已经从香港逃回广西的黄绍竑，让他率领由第七军留守部队编成的第十五军从西江和北江进军广州，对张发奎形成东西夹击之势。白崇禧赴汉口，与李宗仁商讨对付广东军事政变。海军“飞鹰”号军舰反对“张黄事变”，从黄埔起航，抵达汕头，与李济深部队联合。

张发奎紧急应对，一面把自己手下最精锐的第四军黄琪翔部调到梧州，以防备黄绍竑的桂系军队从广西反攻广州，一面把第二十五师调到广州以东的惠州、石龙一带，以阻止忠于李济深的陈济棠师从东江一带反攻广州。同时，黄琪翔还兼任广州卫戍司令，以加强对广州的控制。

11月 28 日，张发奎发表致李济深的公开信，对李济深对南京特别委员会的态度表示不满，并且声明，“铁军”最近的军事政变，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以反对黄绍竑企图解决第四军的诡计，同时也为了支持国民党。针对李济深诬称这次政变是“共产党之阴谋”，张发奎、黄琪翔还通电否认有容共及联络陈炯明之事，自称其行动为“护党”，表明他们是服从国民党中央的。他还电请汪精卫回广州主持大局。在上海，汪精卫派也为张、黄辩护，称其只是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与共产党无关。

11 月 29 日，广州政治分会通过决议，发表一份谴责“桂系新军阀”的声明，指出桂系军阀阴谋伙同各种反对系，在广东乱政和危害国民党，并表示要解除李济深的一切军事职务，要“推翻和惩办”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次日，广东省军事会议，还把张发奎的第四军及其领导下的其他粤军，命名为“护党军”。



12 月 1 日，广州召开“护党”大会，通过六项决议：（一）要求在广州举行国民党四中会议；（二）废除非常的南京特别委员会；（三）巩固广东国民基础；（四）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等同其他反动分子企图危害本省，要给予清除；（五）要求政治分会惩办李济深；（六）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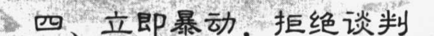
以上种种措施和言论，都说明张发奎在为自己的军事政变进行辩护，企图洗脱罪名，同时他心里还是没有底，再次和黄琪翔致函汪精卫和其他中央委员返回广州，以便管辖南方的党政事务。

尽管做出各种努力，12 月 2 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发奎、黄琪翔。次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全会预备会在上海召开，汪精卫和其他 5 名中委仍竭力为张、黄辩护，提出考虑到张、黄二人都曾经宣布过服从党的命令，因此，广东问题的解决应当通过即将召开的会议，而不应通过战争。

然而，战争已在弦上，不得不发。

张发奎与桂系军队在东、西、南三路相对峙。陈铭枢的第十一军由福建分水陆两路回粤东，参加讨伐张发奎战争。李济深委陈铭枢为东路总指挥，节制钱大钧、陈济棠两部，会同西路黄绍竑、南路徐景唐合击广州。

正在双方剑拔弩张时，由中共领导的广州起义暴发了，这一下打乱了张发奎的阵脚。



四、立即暴动，拒绝谈判

其实早在“张黄事变”前，中共方面已在策划广州暴动，他们对张发奎、黄琪翔并不存在什么幻想。早在南昌起义军准备在潮汕与李济深、钱大钧部队决战时，张太雷于9月29日报告中央说：

> 我军直取梅县、兴宁，如胜，可击破李、钱两部的主力。张发奎、黄琪翔与我们吊膀子，互相派代表。但我们绝没有幻想，并且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的真正敌人。在张军内部，我们现已稍有工作，广州暴动的准备积极进行。

这里所讲的“在张军内部”的“稍有工作”，正是指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这支力量。当时广东省委还不知道该部已在韶关被解除了武装。一个星期后，噩耗传来，南昌起义在潮汕已经失败，靠外来的力量占领广东，完全没有希望。

叶剑英接到中共准备在广州举行暴动的计划后，心生一计，他摸准了张发奎、黄琪翔的心理，提出是否可将教导团调进来打李济深。张发奎开始犹豫地说：“教导团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丢出去可以炸别人，可是搞不好又会在手里炸了自己。”叶剑英则说：“如果要打李济深，你部下的多数军官和部队都是李的老部属，恐怕靠不住。恰恰教导团同李济深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可以用来打先锋。”

经过一番劝说，张发奎总算同意把教导团调到广州。为避嫌起见，叶剑英主动提出想辞去教导团长之职，专任第四军参谋长。张发奎问起谁可继任时，叶剑英推荐了杨满松，这是个平时不大爱管政治事务的中性人物，也是张发奎很信任的人，于是当即得到同意。

张黄事变后，中共广东省委军委负责人再次找到叶剑英，要他想尽一切办法扩充第四军警卫团，并把党的力量加进去，为日后的起义增加力量。得到组织的指示后，叶剑英马上去找张发奎，提出扩编警卫团：“我想再组建一个营，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团。这样才能保证警卫广州之需。总指挥您看如何？”

叶剑英所称的警卫团，是“张黄政变”后临时以两个营凑起来的部队。

一个营是原来的第四军军部特务营，另一个营是刚刚在政变中收编的李济深的第八路军军部特务营。对李济深这个营，张发奎认为靠不住，想在这个团增加新的力量。他听到叶剑英的建议，马上欣然同意："好，你去办吧。"

正在中共广东省委积极准备广州起义时，苏联顾问纽曼却提出反对起义的意见，他要求中共广东省委与张发奎谈判，争取张发奎。

张发奎自南昌起义后对共产党就深怀恨意，不过此时他的主要敌人是李济深，自己发动政变后在广东还没有坐稳，害怕共产党在他的脚下闹"地震"，所以在表面上愿意与共产党继续联络，想利用广州的中共和工人组织，跟他一起去反对桂系，并主动要求约见中共在广东的最高负责人。



到底最高负责人去不去见张发奎、黄琪翔，中共广东省委一时犹豫不决。张黄二人以武力控制广州，手下还有5个师的兵力，共产党组织还属于在地下活动并被搜捕的对象，仔细讲来，对黄琪翔大家多少还放心一点，因为他过去还表现比较进步，现在在内部还赞同有限的"容共"，对张发奎可就拿不准。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和纽曼等人一起研究了张发奎的要求，并拟好了与张发奎谈判的六项条件：







一、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

二、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

三、立即武装广州工人；

四、交还"四·一五"以后被改组委员会占据的工会各会所；

五、保护省港罢工工人原来的一切权利；

六、处罚用恐怖手段对付工人的分子。

然而，他们从最近张发奎镇压工人的行为和反共言论看，认为张发奎绝不会答应上述条件，最后终于决定不再和张发奎联系，关上了与张发奎、黄琪翔谈判的大门。

在最新解秘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历史资料中，存有谢苗诺夫"关于广州暴动的报告"（1928年2月15日于莫斯科秘密）。谢苗诺夫在报告中说，广州起义时，"说服张发奎、特别是说服黄琪翔投诚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做。"又说，"我们没有利用这个时机。黄琪翔对这一点（指国共合作——作者注）很感兴趣，他是张发奎的助手，是个杰出的年

轻将领，对苏联和共产党有一定的好感，他在自己军队里容留共产党员比谁都久。共产党员在他的军队里担任许多负责的职位。我一直坚持必须同他进行谈判。共产国际代表团却对谈判下了‘禁令’。只有个别一些军事人员主张谈判。”

其实，对于如何对待张发奎，当时的中共中央早就有指示。在他们看来，张发奎已难以成为合作的对象，并将之视为与蒋介石、汪精卫毫无二致的军阀，执行了坚决破裂的政策。这反映在1927年9月9日《中央致广东省委信》中：

> 此间多传张发奎仍欲与我们妥协，据江西报告，黄琪翔的军队在赣南公开地呼出“打倒叛党叛国的唐生智”、“打倒分赃式的汉宁合作”等口号，亦可以证明此倾向。中央八月三十一日致你们的信中，即已指明张发奎到我们军队中来的危险性以及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坚决地与他绝缘，张发奎已经是南昌事变的反叛者，已经是我们公开的敌人，我们与他已毫无妥协之可能。

中央的态度既已如此明确，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又曾因为试图与张联络而受到严厉批评，广东地方党组织自然不能再对张发奎留下任何余地。既然双方水火难容，中共广东省委确定了“立即暴动”的最后决心。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秘密向下属组织发出了号召暴动宣言，宣布：“工人同志们！我们知道张发奎黄琪翔等绝对不会接受我们这些条件，因为他们是军阀。我们应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广州，反对李济深同时也反对张发奎。”宣言在表示与张发奎最后破裂后，随即向工人、农民和士兵这三方面发出了起义的响亮战斗口号。

张发奎也预见到无法再与共产党合作，举行了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如何对付广州的共产党人。广州市公安局长朱晖日报告，抓到了教导团的一个军官，审问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已有确凿证据说明教导团要参加暴动。

得知这个消息，叶剑英感到情况严重，马上对张发奎解释说：“总指挥，根据我的侦察，所谓共产党暴动的情况并不可靠。”接着，他分析道，“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业已失败，贺龙、叶挺败走汕头，绝对没有力量在广州暴动，不可轻信谣言。我是教导团的老团长，更了解教导团的所作所为，担保共产党暴动不成。即使暴动了，光凭警卫团也对付得了。”

听了这番话，张发奎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在12月9日至10日两天内，汪精卫连续给陈公博（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李福林（第五军军长）等拍来四封密电，急切要求他们“坚决反共”。汪精卫还感到放心不下，派出其妻陈璧君专程去广州，和张发奎面商防范措施，提防共党暴动，并提出解散教导团的主张。幸好，在叶剑英的周旋下，才使这一计划落空。

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张发奎也作了一些部署，派“雷震”、“雷兑”等鱼雷艇，另派浅水巡舰，担任省河警戒，并梭巡由白鹅潭至三山一带；长洲则由长洲要塞司令部恢复警戒状况，河面泊有军舰两艘，日夜升火巡弋；其虎门、鱼珠、车歪各炮台，均一律宣布戒严，检查船只。陆上方面，河北由薛岳之一部及公安局保安队担任警戒，河南由李福林部维持，并在花地、芳村、石围塘、河南尾各地，增派队伍。

张发奎仍嫌市区兵力薄弱，又抽调教导团入市协防，并亲到该团演讲，谓不使广东为灰色，打倒腐化投机分子，不恶化，不右倾，奋斗到底。他原来担心的只是工人、农民组织的队伍搞些小暴乱，没想到这次暴动的主力竟然就是教导团。

五、调兵遣将，镇压义军

12月11日晚上，广州起义正式开始。起义爆发的枪声响起时，将住在东山和葵园的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从睡梦中惊醒。

当夜，张发奎和黄琪翔正睡在东山的一座公馆内，这里外傍珠江，内环东山湖，景色秀丽，环境幽静，因而在近代是广东达官贵人和一些外国人设立公馆之地。起初，还是远远传来零星的枪声，作为久经阵战的职业军人，张发奎马上听出这声音来自距东山不远的广九车站，北面的新编第一师师部方向也有枪声。

这时，电话铃声骤响，他接过来一听，是农工厅长谢婴白的声音——“广九车站一带发现枪声，可能是共产党暴动了！”

报告尚未说完，电话就断了。黄琪翔急忙跑上楼来，连连喊：“快找叶参谋长！让他查查是怎么回事！”此刻，他还把叶剑英当成最可靠的人，后来粤系军阀中许多人盛传此事，并当成印证黄琪翔糊涂的笑料。

张发奎焦急地拨着电话，可是哪里也打不通，气得他大骂：“看来，电

话局一定被共产党占领了，黄军长，共产党很快会派人来捉拿我们，我们身边只有几个卫士，快走吧。”

张、黄二人带着贴身卫士，慌慌张张地跑出了这座小楼。这时，起义军如果派出一个班的队伍，就有能力将这两个广州国民党军队的首领抓获。可惜的是，广州起义负责人疏忽了，忘记了“擒贼先擒王”之理，让张、黄逃过一劫。

张发奎出了院子，只听得市内的枪声更密，而且以西面长堤的第四军军部方向最为炽烈，只是珠江南面还平静。于是，他决定先渡江到河南避一避，便和黄琪翔匆匆地跑到附近二沙头的颐养院，找到了广州商会会长邹殿邦。邹殿邦的庭院靠着珠江，不仅养着保镖，还有自己的电动汽艇。张发奎向他匆匆地说明了共产党在暴动，自己要到河南调兵镇压后，邹殿邦立即满口答应。

折腾了大半夜，天已蒙蒙亮，江面升起一层薄雾。电动汽艇“突突突”地把张发奎、黄琪翔和邹殿邦从二沙头送到珠江南岸的海幢寺。

上岸后，张发奎一行直奔第五军部，找到军长李福林。张发奎先是自责了一番先前对共产党防范不力，把自己骂了一通之后，请求李福林快发兵渡江“平乱”。李福林见张发奎一行狼狈进来，心中好笑，过去，这些正牌军人和政客都把我李福林和第五军视为土匪，正眼都不瞧一下，此刻倒也有求我的时候。看到张发奎刚才那番表演，李福林不好说什么，只指着黄琪翔的鼻子大声说：“今日的祸，都是他容共引起的！要我出兵帮助，要先除了他！”

黄琪翔一声不吭，张发奎忙为自己的这个老部下辩解。接着他对李福林分析说，现在城内“兵变”的不过只有一个教导团，而且还忙于攻打各机关，兵力肯定分散，假如有两营人过河，先攻占广九车站，分路向城内进攻，只消半天就可扫平“叛乱”。

“我属下潘枝那团兵不是被你调到北江去了么？目下河南有什么兵可派？”想起张发奎前一段拉他打李济深，将他的主力两个团调到广州以北参战，李福林心里便来气，他手下的兵要用来保老巢，当然不肯拿出来给张发奎指挥。

事已至此，张发奎无可奈何，只好借用第五军的办公笺起草了两封电报，急调他在外地的军队回广州。土得掉渣的第五军司令部根本没有电台，河南地区连电报局也没有，市内的电报局和第四军军部情况又不明，他想来

想去只好借用外国人的无线电台。在情急之中，电报已经无法译成密码，张发奎请来经常与广州沙面外国租界打交道的买办商人谭礼庭，要他去找洋人帮忙拍电报调兵。

果然，沙面租界里的英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一听说是要调兵打共产党，马上爽快答应。

张发奎亲拟电报，下达如下命令：

一、十一日共逆乘省城空虚，纠集工人暴动，纵火焚劫，我陆海空军现扼守河南南石头一带。

二、我军为迅速肃清广州共逆，决将东江交陈军长铭枢接防，西江固守肇庆，南部固守江门、单水口之线。

三、我军各部队之移动任务如下：

1. 东江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即率部回广州，扑灭共逆。

2. 西江十二师全师，第二十六师除派出第七十八团回广州讨共外，余仍留驻肇庆，统归许师长志锐指挥，扼守肇庆附近，对广西方面警戒。

3. 南路教导第一师之第一、第二两团，着邓副师长龙光率领回南石头附近，与讨共各军协同作战，归黄军长琪翔指挥（黄军长现在河南指挥讨共各军）。

4. 南路教导师之第三团，及第五军之第四十五团，第四军独立团，统归南路胡参谋长铭藻调遣，扼守单水口、江门及铁道沿线。







这个命令的全文，除了对共产党的诬蔑之词外，也有许多自欺欺人的粉饰之言。例如所谓要将东江交陈铭枢军长“接防”，其实，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奉李济深的命令正在率兵讨伐张发奎，这只不过是将当地让给对手的掩饰之词罢了。再如说黄琪翔正在河南“指挥讨共各军”，更属胡编。黄和张此时都是光杆司令，而且李福林还不肯在河南容纳黄琪翔，岂能让在他在此“指挥”？不过从这个电报的内容仍可看出，张发奎决心抽空防御陈铭枢的东线，在西线还保持一部分兵力抵御桂系黄绍竑部，将其5个师兵力中的2个整师调回广州。

除了准备调来的兵力外，薛岳属下的一个新兵团及莫雄为团长的新编第

二师第三团正在广州郊区，已经在与起义部队接火。李福林的第五军实力只相当于一个师，发现形势对其有利也会参战。海军还有兵舰支援张发奎的部队，珠江内的英、美、日军舰和沙面租界内的外围地面部队也会掩护国民党军。

相比之下，广州起义的部队中正规部队只有教导团一个团和警卫团的一个营，还有几千名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工人赤卫队、几百名刚入城的农民武装。虽然起义者的士气和斗志高，可是力量对比却相差过于悬殊了！

张发奎发出电报后，已近中午，他草草扒了几口饭后，便和黄琪翔、陈公博等一同到珠江南岸边，察看江北的战况。看到长堤一带硝烟弥漫，第四军军部和中央银行周围还燃着烈火，他们判定那里还未被攻下。此时，“宝璧”、“江大”两艘炮舰开到，张发奎感到终于有武力在手，恢复了镇静，登上了“宝璧”舰，并宣称这是他的“旗舰”。黄琪翔则登上了“江大”舰，尾随其后。

张发奎认为教导团只有步机枪和迫击炮，奈何不了有铁甲的兵舰，于是要军舰向江北岸边驶去。不久，军舰驶近了长堤。张发奎下令舰上的机枪和排炮向第四军军部周围射击，并喊道：“看见扎红领带的就可以打！”随着枪炮齐发声响起，他又起劲地在舰上大叫，要水兵们卖力作战，许诺事后有奖赏。

正在得意时，突然“轰”的一声，一发大口径炮弹从江北飞来，在“宝璧”舰周围激起了冲天的浪柱。张发奎想不到起义军还有大炮，顿时吓得马上钻入底舱内，并令两艘军舰赶紧向南岸驶去，以避开起义军的炮火。事后知道，这是叶剑英见敌舰猖狂，调来刚刚缴获的炮兵团的大口径炮向江中射击。

张发奎再次逃到南岸，一时惊魂未定，听说援兵的事还无消息，刚刚抖起的一点威风又丢到爪哇国去了。陈公博过来建议说：“张总指挥，我看，单单发了个电报，下面的部队不知具体情况，也不一定派兵迅速前来，还是您亲自到西江去催一下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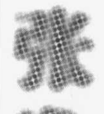
张发奎认为有理，向李福林借了一只小火轮，准备去江门、肇庆两地找自己的下属部队。由于害怕江北起义军的炮火，等到天黑之后，火轮才起航，借着夜幕掩护向西驶去。

经过一夜航行，火轮先到了江门，在天亮前到了肇庆。

张发奎到达后一问，驻两地的3个师都接到了沙面租界打来的电报，只

是因电文用的是明码，不是军队通用的密码电报，都感到有些奇怪。加上电报中对广州的情况只称是“共逆暴动”，具体的暴动形势如何没有讲明。这时外界对广州城内的种种不确实的谣传也满天飞，有人说市内仅有不大的骚乱，只是小事一桩；有人则称共产党已经席卷了广州，势力不小。对于这些都爱惜自己的实力而不愿轻易牺牲的部队长官来说，自然不敢冒冒失失地行事。他们都虽然根据命令集中了应调的部队，却大都在待命。只有江门的一个团乘船出发，得到的命令也是到广州附近先看明情况再相机行事。

看到这些按惯例行事的部下，张发奎虽然气恼，不过也认为事在情理之中，只好催他们赶快动身前往广州，并说明了市区的大致情况。有自己的最高长官赶来督促，再加上听说暴动的不过只有一个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第四军的这些高级军官们心中有了底，都拍胸脯保证马上可以赶去，而且很快就能制服“叛乱”。






这样，自 12 月 12 日天亮以后，江门、肇庆码头上拥挤着的灰色人潮开始蠕动了，在口令声中一队队士兵上了驳船。随着汽笛的嘶叫，一艘艘火轮拖着满载着灰色人群的木船，沿江向广州驶去。看到众多的军队出发，据陈公博后来回忆，他们的心才“安静”下来。这时，他和张发奎讨论的主要问题，已是如何善后，同时担心的是：“我们不怕兵力不够，只怕共产党不待兵来先向东北两江逃。”

再说在 11 日深夜，广州起义军总指挥部召开军事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军事总指挥叶挺提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宜坚守广州，应主动转移到海陆丰去开展长期革命斗争。这一正确意见未被采纳，反被共产国际代表纽曼指责为“动摇”、“主张去当土匪”。起义军内部产生分歧。



12 日拂晓，李福林、薛岳部队猖狂反扑，形势急转直下。中午，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张太雷在驱车返回指挥部途中，在黄泥巷口遭敌机器工会体育队袭击，中弹殉难。

12 月 13 日，张发奎所部薛岳会同李福林部，从河南分三路向市区进攻，一路从黄沙铁路车站，一路从珠江前沿，并在海军舰只的配合下，攻入市区。

广州起义失败。广州城再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张发奎对广州起义恨得咬牙切齿，他觉得共产党在他后门点火，坏了他的全盘计划。“平叛”部队进入广州后，实施疯狂报复，真是逢人便杀，见

人就砍，把苏俄驻广州的外事机关也同时捣毁，并杀害了包括苏联顾问在内的领事馆10多名工作人员和100多名朝鲜革命者。

一时间，广州城中血流成河，尸堆如山，所杀被俘者和无辜市民有5000之众，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城市屠杀中残暴的一页纪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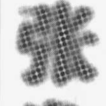
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这样评价广州起义：

> ……张发奎的军队正好开去挡黄绍竑去了，如再等一个短时期，他们就会调一师兵力回广州解散工会和教导团。我们乘这空子把部队拖出来，并且根据情况估计，要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

当时作为共青团中央巡视员到粤的陆定一，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记述道：“敌人进入市区后，对毫无防备的工农兵士，实施大屠杀了！到处是枪声，到处是死尸，几乎是见红即杀！广州市登时血流成河！除了千余工农兵士向北退走后，同志牺牲有200余人，赤卫队及兵士牺牲者2000余，民众更不知死了多少！”

起义失败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曾登载一篇题为《悼念死难的五千七百工农兵士》的文章，里面写道：“这些军阀，李福林、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在12月14日至19日五六天之中，杀死了5700多人。”这一数字，据说是根据广州起义失败后市区掩埋尸体数统计出来的，虽说不一定很准确，却也大致差不多。

当时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肃反委员的杨殷同志，在1928年第3期《红旗》周刊上撰文道，“13日敌人向广州包围时，在海上用兵舰的大炮向市内射击，着地开花，以至房屋焚烧极多，进城时著名土匪李福林的军队及薛岳新编的土匪，趁机放火、抢劫，被难者何止千家。更呈其凶残，逢人便杀，因勒索不遂而被诬为共产党者为数甚众。”“更将工友包围屠杀至3000余人，尤其是红花岗、东较场、观音山3处，每处五六百人，用机关枪扫






射。”

叶剑英也回忆道：“国民党军队进入广州后，进行血腥大屠杀，尸骸遍地，血流成渠，是役殉难的军民 5700 多人。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哈西斯等 5 人也遭杀害。”

中外的一些通讯社，也报道了国民党镇压时的残暴。东方通讯社香港分社 12 月 15 日电讯称：“李福林夺回广州后，大捕共产党，捕获后，立即捆缚枪决，现被杀者达千人，街市尸骸累累，惨相不忍入目。”

由于血腥镇压起义，张发奎部队的名声一落千丈。

当然，张发奎也有自己的态度。早在南昌起义时，他已十分恼怒，说“我对得起共产党，共产党对不起我”。广州起义之后，他更是暴跳如雷，一逃出包围，就积极调兵遣将，残酷地镇压了起义。也许张发奎认为，自己是重交情、讲义气之人，他对共产党人仁至义尽，而叶挺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起兵“背叛”，在南昌起事，还可谅解；当他与黄琪翔好不容易从李济深、黄绍竑手中夺回广州后，中共又在广州发动起义，这使他觉得，太不够义气，不讲朋友交情，认为他调兵反扑是理直气壮的。而在叶挺等人看来，为党、为主义奋斗，利用党掌握的武装起兵反国民党，是完全正义的，不存在放弃朋友义气的问题。但双方的立场不同，看法自然迥异，以张发奎当时的觉悟，绝对理解不了叶挺、叶剑英等人的行动。对于广州起义，张发奎在上世纪 50 年代还写有《广州暴动之回忆》一文，极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六、内外交困，帐离四军

再说共产党人在广州这么一暴动，逼得张发奎从广西撤了兵，也使汪精卫吃不住劲了。国民党内反对他的人都说他通共产党，纷纷指责他，直把个汪精卫急得像个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了。反汪派揪住汪精卫不放，说广州事变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员，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许多所谓张、黄“附逆”的罪证。汪精卫到了这个时候人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不得不由上海乘轮船出国。

而刚被四中预备会议第四次会议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电令广东各路军队合力“平共”。12 月 14 日，国民党当局发布命令：“临时军委会主席团张发奎、陈公博，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公安局长朱晖日，着免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张发奎虽然把中共的广州起义镇压下去了，但没想到自己倒落了个“通共”罪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广西黄绍竑率领的桂军乘虚而入，内外交困，使他一时不知所措，在政治上完全处于孤立的地位，不得不和陈公博、黄琪翔和朱晖日等引咎辞职。李福林被推暂管广州，缪培南任第四军军长，薛岳任副军长。

12月18日，张发奎电蒋介石表示服从，谓已被广州政治分会免去分兼各职，愿以国民党员资格补过将来。不久，他又和陈公博、李福林发表联名电报，表示衷心赞成蒋汪合作，尽力支持蒋介石复任总司令。

临离广州前，张发奎召开了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商讨如何对付大兵压境的桂军，以及陈铭枢、陈济棠的部队。

缪培南新官上任，倒显得有几分信心。他指着作战图介绍说：

“敌我双方的军队实力是这样的：敌军方面，西江有桂军的黄绍竑第十五军三个师，两个独立团，徐景唐的一个师；东江，有陈济棠的一个师和舒宗鎏的飞鹰军舰。此外，还有陈铭枢第十一军的两个师。我军方面，有第四军的三个师，薛岳一个师、黄镇球一个师。此外则是李福林的第五军两个师，但后者战斗力不强。海军方面，除了中山舰可以出海之外，只有二三十只内河兵舰。因此，在数量上看，我方占着优势，可与之一战。”他看了眼张发奎，又说，“实际上由于张长官、黄军长这次被迫离开部队，对于我们的士气影响很大，毕竟张长官是我们的‘军胆’啊。”

张发奎有些怅然，摆摆手说：“告诉将士们，我和黄军长虽然离开了，但铁军的军威还在，铁军的军旗不能倒。现在，我们处在敌军重重包围中，必须拿出北伐精神来，打敌人个落花流水。”

黄琪翔插道：“张长官说的有理。缪军长，讲讲你的作战方案。”

缪培南继续说：“本来在中共广州暴动前，我们定有3个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以全力先打西江，把黄绍竑部队击败，占领梧州后，再回师去打东江的陈铭枢、陈济棠的部队。这个作战方案比较危险，我们决定不采用这个方案。第二个作战方案是放弃广州，以全力出击东江，把陈铭枢、陈济棠打败，然后回师广州，乘黄绍竑兵力分散的时候把桂军歼灭。这个计划就我看是比较好的，即或不能取胜，也可以把部队撤往江西。第三个方案是退出广州，据守韶关、南雄，看以后形势的变化或是作战，或者向赣南安全撤退。照我看来，这个方案最稳，但比较消极，有损我们第四军北伐时‘铁军’的威名。我个人的意见是，采纳第二套方案，把敌人各个击破，然后再

迎请汪主席、张长官、黄军长等回广州开府，重振粤军军威。”

张发奎听了，不禁点点头：“我同意第二套方案。我觉得我们四军暂时退出广州，避敌锋芒，还是有利的。我和黄军长今晚就离开广州，先去香港，然后再到日本考察，部队就交给缪军长指挥了，也拜托各位师长了。青山绿水，后会有期。”

为了不影响军心，张发奎、黄琪翔坚决不让众军官相送，带着家眷偷偷离开广州。

到香港后，张发奎一直关注着广州的战事。谁知不到两个月，就传来第四军战败、许志锐师长不幸阵亡的噩耗。



原来，缪培南送走张、黄两位长官后，采取第二套方案，放弃广州，全力出击东江陈铭枢、陈济棠的部队。



12月20日，李济深系统的粤军在汕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集合潮、汕、闽的粤桂军队进攻第四军。次日，南京特委授李济深以全权，返粤整顿局势。随后，李济深回到广州，亲率部队讨伐四军。黄绍竑则带着桂军的部队沿西江合攻广州，毫无阻碍地就占领了肇庆、三水、河口。



正在这关键时刻，作为“骑墙派”的李福林临阵叛变，派代表在河口欢迎桂军，泄露了缪培南第四军的作战方案。黄绍竑得到李福林代表报告，大吃一惊，觉得时间非常紧迫，如果稍有迟滞，就会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立刻改变桂军的计划和行动。他电令已到达清远县的黄旭初、吕焕炎两师不要再向广州南进，而径由清远经花县、增城向河源急进；伍廷飏师也不在广州停留，由水路乘船到石龙登陆，与黄、吕两师会合向河源前进；徐景唐师由江门方面乘船到惠阳登陆，沿东江东岸向紫金前进。

1928年1月14日，四军决定与粤桂联军在粤东五华县潭下决一雌雄。

当时，第四军各师在青溪市一带击破陈铭枢、钱大钧等部属之后，相继攻克兰关要塞及潭下墟，但敌军增援部队已抵达大田、锡坪一线，绕第四军侧背，情势危急。缪培南下令第四军各师悉向潭下前进，迎击敌人。许志锐师赶到潭下时，李汉魂师及邓龙光的教导第一师也陆续到达。

这时，敌方已据潭下南方10里的高地作对抗的模样。许志锐亲赴前线观察地形。风门场右侧一带的马鞍山高约500米，地势险峻，现已被敌占领，成为敌主力集结点。他认为必须攻占此高地，才能制敌取胜。第四军部同意他的观点，决定以教导一师担任中路，第二十五师担任右翼，第二十六

师担任左翼，教二师为总预备队，于14日拂晓，实行总攻击。

许志锐奉命担任左翼作战后，决定以马鞍山为攻击目标，派副师长兼七十六团团长陈芝馨向左面攻击，第七十八团团长林祥率部向右面攻击，第七十七团团长黄新培率部暨独立团之两营为预备队，相机策应。

早晨6点半，天大亮，陈芝馨率所部由左翼仰攻马鞍山。该处地势岗峦起伏，敌凭险顽抗，陈芝馨所率七十六团勇夺数处阵地，已把马鞍山左侧一带山岭攻占，经数次冲锋，距山顶只有几步之遥，但敌居高临下，炮火猛烈向下扫射，始终未能把山顶攻占。

此时，缪培南的第四军和薛岳、黄镇球等师已到五华县以西、龙川县以东地区的歧岭墟，与西进的陈铭枢、陈济棠部队发生遭遇战，并大败两陈部队，敌军伤亡奇重。

第四军素以"铁军"自命，战无不胜，士兵们在阵地前大声地说："前方李宗仁带的第七军还可以同我们踢两下，后方第七军就是烂泥一堆。"桂军官兵一听，火冒三丈："你们是铁军，我们就是钢军，钢军一定要把铁军打碎。"

许志锐认识到胜负决定此战，乃以全部兵力争夺马鞍山，并加强正面进攻的力量。无奈由下向上仰攻，深感困难，始终未能接近高峰阵地。

不久，敌又以猛烈炮火反攻。

许志锐目睹情形，赫然震怒，亲率特务连一排，大声高呼着冲锋前进，将抵山顶时，右臂中弹受伤，他视死如归，仍督战如常，随后腹部又中一弹，伤及要害。师部秘书见许志锐身负重伤，急派几名士兵把他送返后方，经军医整夜施救，无奈伤势太重，许志锐于15日清晨去世，年仅34岁。

许志锐牺牲后，军部令副师长陈芝馨代理，当夜，又组织全面进攻，双方死伤颇重，第四军只好固守阵地，停止进击。缪培南不得不指挥部队向老龙墟和平县方向退却，退入赣南，此时已损失近一半的兵力。

在南京，蒋介石听说第四军新败，觉得正是收买四军的好机会，于是，他让缪培南率部进入赣东北，归顺于他。张发奎苦心经营的第四军，就这样纳入了蒋介石的阵营。

再说在香港，张发奎惊闻爱将许志锐战死沙场后，一连几夜不眠。

许志锐，原名叔龙，志锐是他的别字，他1894年9月7日生于韶关曲江县白土乡下乡村，是陆军小学第六期毕业生，后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后一直在张发奎的部队任职，与张发奎私交颇深。1927年4月下

旬，张发奎奉命率部入豫，扫荡奉军，留守琼崖的许志锐奉命北上参加第二次北伐，担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副师长。深为张发奎所赏识，不久升任为第十一军二十六师师长。此次张发奎辞去本兼各职，出国考察，没想到与许志锐竟成永别。张发奎极重袍泽情谊，在战后特派人前往五华县，将许志锐的灵柩运回广州，改用上好棺椁将其英骸运回故里，择地安葬。

第一次新粤桂战争，就这样疾风骤雨般结束了。李济深统治广东的局面重新恢复，黄绍竑到广州后，仍用代理分会主席及代理第八路军总指挥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陈公博和张发奎等，与武汉的李宗仁等互相呼应。

这时，正是桂系踌躇满志的黄金时代，而蒋介石正在处心积虑地进行第二次倒桂计划，他手中的四军无疑是一支反桂的有生力量。





第十章　联桂反蒋，攻粤败北流

一、兵不血刃，招降桂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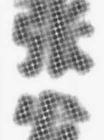
张发奎站在鄂西长江岸边。

四野沉静，霜枫如旗。对岸的高山，反射着深秋的阳光，延绵数里。滩头上，一群光着膀子拉纤的汉子，脚步凝重，号子浑厚，溯水而上的大木船昭示着征途的艰难。此刻，他的心情也像那些纤夫，一步一个沉重。

自从离开四军后，张发奎在日本周游了一圈，便在香港、上海等地闲居了一年多，这是他从军以来第一次离开部队，心里总有些失重之感。也就在这时候，他的老搭档黄琪翔离开了四军，和邓演达一起参与组建第三党的活动，两人从此分道扬镳。1928 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打败奉系张作霖部后，基本统一了全国。紧接着，蒋介石为了控制全国，通过两次裁军，企图压缩地方派系，极大地扩充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遭到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进而发展成为反蒋战争。张发奎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

本来，在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之初，张发奎是站在蒋介石这一边的，对于蒋提出的裁军意见，第四军率先通电表示支持。在缪培南和薛岳的鼓动下，第四军上校以上的军官联名上书，要求裁撤自己所在的第四军。这种举动，在各军事首领都紧紧捂住自己实力不松动的状况下，是很抢眼的。张发奎苦于军阀连年混战，百姓遭殃，表示支持。裁兵之法果然在第四军身上实行了，同年 9 月中旬，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5 个师被缩编成 3 个旅），缪培南任师长，朱晖日任副师长，薛岳没被重用，只好怅然离去，闲居香港九龙。

1929年春，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势力在北伐中迅速膨胀，并得到广州李济深的支持，他们并不买蒋的账，公开反对裁军。这无疑对蒋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蒋介石因而把桂系选定为进攻的头一个目标。湖南是桂系联接广西的通道，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却完全听命于蒋介石，与桂系貌合神离。于是，桂系决定先发制人，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撤免鲁涤平的省政府主席职务，由何键继任，并密派两师入湘解除鲁涤平等的军队。此举给蒋介石留下了借口，他立即组织起一支讨逆军，于3月26日下令讨伐桂系。讨逆军以朱培德为第一路总指挥，由江西进攻武（汉）、长（沙）路，阻止桂军南逃；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由皖鄂边境沿长江西攻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河南沿平汉路南下夹击武汉。



张发奎在上海，预料蒋桂难免一战，早放出要报复桂系的空气，故意使蒋介石闻知，并自负地说："讨伐桂系的第一号任命状一定是我张向华。"果真，4月7日，正在用人之际的蒋介石重新启用张发奎，任命他为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并拨其嫡系部队朱绍良、陈继承两师归张发奎指挥。



蒋介石命令张发奎调动各师集结于江西修水、铜鼓间，准备进攻武汉桂系主力，但为确保控制张发奎，又命令心腹特务关巩任第四师政治部主任进行严密监视，并密令朱绍良、陈继承在一定时机内消灭张发奎和第四师。对于蒋介石的阴谋，张发奎早已料到，并加以防范。他将计就计，直至第四师集结铜鼓，他才正式到职担任指挥。沿途都是第四师打先锋，朱、陈部队随后跟进。



桂系主力第七军等因内部腐化，分赃不匀，矛盾重重，以致毫无战斗力。驻防武汉的李朝芬部听到张发奎部西进的消息后，即逃窜至鄂西、荆州、沙市附近。张发奎率领第四师不经战斗便入武汉，又在荆州一带，一枪不发，收缴了桂军的一部分武器。

这兵不血刃的投降与受降，为张发奎以后与桂系合作反蒋做了准备。

二、宜昌首义，通电反蒋

如此轻松解决鄂西的桂军，使张发奎始料不及，他更没想到的是曾在北伐威震一时、有"钢军"之誉的桂军也如此不堪一击，仅仅坚持了几个月便被蒋介石打得晕头转向。6月27日，李宗仁、白崇禧等相偕逃往香港，蒋

桂战争便以桂系的失败而告终。紧接着，蒋介石又打败了与桂系联合反蒋的冯玉祥。

这一切好像只是一场梦。

7月初，张发奎在解决桂军后，指定各部在荆州附近集结休整待命，并兼任鄂西绥靖主任。他在荆州积极整军集训，渐渐恢复"铁军"的军威，在南京的蒋介石有些惴惴不安。他深知已牢牢掌握军权的张发奎雄心勃勃，敢作敢为，又剽悍善战，特别是他是忠于汪精卫的，不得不防。于是，他给朱绍良、陈继承下了一道密令，伺机解决张发奎的第四师。

朱绍良、陈继承得令后，打算以庆祝张发奎部胜利之名，摆一个鸿门宴，在沙市宴请第四师少校以上官长，准备待他们离开酒席之前，一举解除武装。殊不知张发奎已有戒备，在赴宴前命令部队不参加会餐的官兵，随时准备紧急集合以防意外，同时，在会场附近增加警卫巡查。朱、陈二人得知张发奎有戒备后不敢贸然动手，乃将张发奎和平解决桂军、补充实力的情况详报蒋介石，以待命行动。

张发奎已感到来自四方的威胁。东面的武汉，有刘峙重兵坐镇；西面的三峡，有刘湘凭天险扼守；南有长江之阻，李韫衔部驻防于常德，陈渠珍部驻防于沅陵；北面的襄樊，也布有重兵。张发奎心里有数，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他决定离朱、陈部队远些，便以整训为由，让各师按地区进行训练，朱、陈两师驻荆州、沙市地区，第四师则移驻宜昌、当阳地区训练。

张发奎部移师后，第四师第十一旅（旅长黄镇球）、十二旅（旅长吴奇伟）及教导旅（旅长陈芝馨）驻宜昌，第十旅（旅长邓龙光）驻白洋、当阳，重新归军的李汉魂任副师长，韩汉英任师参谋长。此时，全师有2万余人，超过甲种师的编制定额，实力相当雄厚。张发奎感到由衷的高兴。

谁知部队到达宜昌一个月后，师政治部主任关巩不辞而别，张发奎认为关巩是蒋介石派到四师的"钉子"，他必是回南京向蒋介石密告去了，四师凶多吉少，一定要另找出路。正在这时，他收到了汪精卫的密信。汪精卫在信中说，他在欧洲看到国内局势动荡，已于9月初回到香港，并在跑马地建立"国民党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树起"护党救国"的旗号，策动一切不满于蒋介石个人独裁统治的地方实力派起来反蒋。鉴于在北伐时建立的关系，他首先联系张发奎，希望张发奎能带头反蒋。

其实，"护党救国"的旗号最早就是由张发奎在"广州事变"中提出的。阅毕汪信，张发奎甚表赞同，暗中与身边的幕僚合计着如何响应汪精卫

的号召，再一次东征反蒋。

在南京，蒋介石得到关巩等人的报告后，一边命令在曹万顺的暂编第一师迅速乘船溯江而上，进驻枝江县布防，以阻止张部渡江南下，一边命令张发奎率部离开宜昌，乘轮船东下浦口，再坐火车到苏北海州地区接受整训，而宜昌交由曹万顺部接防。

张发奎知道，蒋介石对自己一直不信任，本来对其收缴桂系残部的武器就有点不乐意，现在汪先生又在香港建立“地下中央”，他一定怀疑自己与汪精卫之间有联系，现在果然压力就随之而至了。怎么办？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张发奎决心发难反蒋，领军南下。于是，他召集少将以上的将领会议征求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反蒋。

张发奎当机立断地说：“我们现在是孤军作战，制定的作战方案一定要慎而又慎。我看，应包括三点：（一）过湖南用迴环战术，稳妥前进，极力避战，以保存实力。（二）到广西后，如桂军能相容，即与合作；如桂军拒守，应全力先将桂军消灭。（三）最终作战目的是攻取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联合各方面拥汪反蒋。现在当务之急，要秘密准备小轮船载运部队渡江，并让眷属乘外国轮船离开宜昌，以解后顾之忧。”





第四师官兵绝大部分是两广人，听说要渡江回乡都很高兴，只 3 天时间就全部渡过长江。

与此同时，张发奎还派出三路代表分头活动，第一路是派人赴重庆见刘湘，请他不要派兵追击。刘湘正为四川的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没有余力干涉川外事，因此做了顺水人情，答应了。第二路是派人赴长沙见何键，请他在第四师路过湘西时不要截击，何键不仅不同意，差点把来使杀了。第三路派人赴香港，敦促汪精卫迅速回国，做好桂系的工作，不计前嫌，重新合作。这说明，张发奎并非莽张飞，其反蒋是做了各方面准备的。

9 月 17 日，张发奎“先下手为强”，在枝江境内长江弯曲处伏兵以待。曹万顺师约两个团乘两艘轮船到达白洋附近时，即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张发奎亲自命令炮兵连开三炮，两船被击中要害，两团人马全被解除武装。取胜后，他下令把所俘士兵中的强壮者补充部队，把所俘旅长带到石门后放走。

蒋介石得知张发奎部已渡过长江并缴了曹师的械后，异常恼怒，命令李韫珩约 3 个团追击张部。张发奎见李部尾追在后，甩也甩不掉，实是讨厌，过慈利时，命令担任后卫的吴奇伟旅教训他一下。吴奇伟便在一个狭长的山谷巧布埋伏，将进入山谷的李部 1000 余人全部击毙。李韫珩经此大创后，



再也不敢跟踪尾追。

在湘西，何键得到蒋介石全力歼灭张发奎部的命令后，即派李抱冰旅在石门口袭击张部。李部为保存实力，与第四师第十九团三营接触，打了半天就撤回。何键又派刘建绪军在武冈县之瓦屋塘设下埋伏，张发奎亲自带着特务营及十一旅迎战，激战一昼夜，双方官兵死亡都不小，但刘建绪军毕竟不是张发奎的对手，最后被迫退守武冈城。张发奎率部顺利渡过沅江。

蒋介石知道，张发奎部一旦回到两广，无疑是放虎归山。于是，他再次电令何键不惜代价堵击张部，一面通令全国讨伐张发奎。张发奎当然不肯让步，由其领衔，副旅长以上的将领副署，通电反蒋，并提出撤销违法乱纪的三全大会；根本铲除腐败恶化势力和敦请革命元勋（汪精卫）返国主持大计这三项护党主张。据说，这电稿还是副师长李汉魂的手笔，骈四俪六，写得亦庄亦谐，不愧是篇妙文。同时，张发奎将“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的番号改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

后来，有人问张发奎：“你以一个师的兵力，处在四面包围中，敢与蒋介石为敌，孤军奋战，究竟有什么把握呢?”张发奎豪气地说：“三户可以亡秦，一旅足以兴夏，何况我有二万之众，我们一帮将领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硬汉，一帮士兵和军官都是身经百战的勇敢健儿，蒋介石实力虽强，但众叛亲离，不得人心，我一经发难，必有人四起响应，我就可以纵横西南，给蒋介石以无情的打击。只要我张发奎尚有一师之众，蒋介石就不能高枕无忧。”

从历史角度来看，张发奎在宜昌发难反蒋，他虽然只有一个师的兵力，影响却相当大，成为蒋桂大战、中原大战的导火线，最后迫使蒋介石第二次下台。此是后话。

三、冰释前嫌，张桂合作

汪精卫在香港得知张发奎反蒋，大喜过望，即派薛岳从香港赶到南宁，向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游说，希望俞作柏能与张发奎合作，在两广创造新局面。

俞作柏本与汪精卫、张发奎有过历史关系。1927 年 11 月 17 日，张发奎在广州采取非常行动，曾任命寓居在香港的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要他回桂，反黄绍竑。后因张黄失败，俞作柏这才作罢。但此时，俞作柏在

广西主政不满3个月，基础尚未巩固，蒋介石一方要他入京，另一方汪精卫又叫他反蒋。在急不暇择的情况下，他发表通电，同意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欢迎张发奎返桂。

谁想到，俞作柏这一转变，事先没有做好准备工作，不但原来的李宗仁的旧部吕焕炎等心怀不服，就是李明瑞的心腹大将黄权也不了解，随即为粤军陈济棠所收买。蒋介石很快下令免掉俞作柏、李明瑞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为陈济棠），任杨腾辉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又委黄权为独立第五师师长。黄权的叛变，使俞作柏、李明瑞感到大势已去，决心出走。

而在广州，陈济棠听说张发奎要回来，知道其来者不善，一面把他的总指挥部移设梧州，一面将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急调入桂，防堵张发奎。

再说桂军叛将杨腾辉、黄权得到陈济棠的支持后，有恃无恐，一面派出队伍进驻桂平，向南宁进逼；一面强迫俞作柏、李明瑞。俞作柏只得离开广西，前往香港，而李明瑞则倒向了中共一方。这给在桂军中秘密工作的中共组织抓住了机会。12月8日，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色起义，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俞作柏之弟）任红八军军长，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从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邓斌（邓小平）出任红七军、红八军政委。可以说，张发奎在宜昌的反蒋起义，无意中给百色起义创造了条件。

回顾历史，真有意思，中共领导的几次起义，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现又是百色起义，都与张发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值得史学家去关注。

形势急变，汪精卫为使张发奎部入桂不致同广西部队相左，便通过唐生智穿针引线，主动与桂系领导人黄绍竑晤谈，希望流亡在外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速回广西，领导桂军同张发奎合作，参加反蒋行动。

政治是讲现实的，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正在行进途中的张发奎，很快接到黄绍竑的密信，说他已回到广西，并在宾阳做通了吕焕炎、杨腾辉、梁朝玑桂军将领的工作，决定不计前嫌，愿意与张发奎通力合作，同下广东。同时，他已令各部秘密向平乐、梧州集结，以期早日与张发奎军会师。

看完密信，张发奎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11月13日，张发奎接到黄绍竑电：“接第二届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命






令，组织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部。李宗仁任总司令兼中央命令执行所所长，黄绍竑当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相与一起讨蒋靖粤。”张发奎为之大快，在同安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一职，并任命薛岳为副总司令。

11月 24 日，张发奎与黄绍竑会晤于梧州北面的石桥，商量张桂联军联合作战事宜。两年前，在“广州事变”中，两人是生死冤家，如今又站在共同反蒋的阵线上，彼此相见，顾不得尴尬，很快切入正题。

黄绍竑开门见山地说：“向华，我已同李、白商量，桂局新定，诸事待理，而贵军长途跋涉，也要稍事休息，在下主张桂军准备一两月后，再会师东下。”

张发奎一听，摇头反对：“季宽兄，作战就应乘敌不备，攻其不意，若待对方准备完成，则难于取胜。”顿了一下，他态度坚决地说：“如广西方面没有做好准备，我四军哪怕孤军深入，也要一鼓作气，直取广州。”

黄绍竑见张发奎坚持己见，终于表示让步：“既然两军合作，就应同舟共济，桂军岂有退缩之理？向华，我们就一同东下吧，现在来谈谈具体合作事宜。”说着，他拿出一张作战方案说，“为了统一指挥两军作战，李宗仁先生将以中央传达所长名义，担任总指挥。”

张发奎点头表示赞成，并说：“我们两家可以兵分两路，我指挥第三路军经怀集、广宁到清远，定 12 月 6 日在清远与你们广西的第八路会师，如何？”

黄绍竑回答得很干脆：“行。我们广西方面，将由白崇禧指挥第八路军六师六旅，除吕焕炎率杨义师驻守广西外，其余均东下作战。现在广东方面早有防备，除陈济棠的讨逆军第八路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蔡廷锴、蒋光鼐各师及直属部队外，蒋介石还派朱绍良带了 3 个师赶来支援，并任命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指挥作战。”

张发奎铁着脸说：“这是一场恶战，应充分做好各种准备。我们已提出‘不打到广东会饿死，打到广东有饷关’的口号，鼓励将士勇往直前。”

黄绍竑把掌往桌上一拍：“上一次粤桂战争，我们桂军吃了败仗，这一次，定要把陈济棠的粤军打个落花流水。教训陈济棠，也就是狠抽蒋介石的大嘴巴。”

四、合击广州，功亏一篑

12月6日，南粤仍是晚秋的景象。张发奎的第三路军与广西八路军如期会师，李宗仁在广东清远下达了总攻击令。7日晚，两路人马分别由横石、清远渡过北江，攻击前进。

此时，广州粤军方面已在花县一带驻有花县防务工程，向左延伸至芦仓西江边沿，据说这是由陈铭枢亲自视察布置的。粤军方面的兵力对张发奎军约为5比1，而且他们是以逸待劳。

12月8日，张发奎率第三路军到达花县，即以吴奇伟、陈芝馨两旅为右翼，攻花县、两龙墟；以邓龙光、黄镇球两旅为左翼，攻新田、石角。






战斗开始时，左翼进展很顺利。敌3个师大部分被击溃，撤回广州近郊收容整理。黄镇球旅官惠民团已攻入距离广州10多里的和平墟。广州市区已能闻到隆隆的枪炮声，一片混乱。在此坐镇指挥的何应钦、陈铭枢心里十分慌乱，做好了随时登舰逃跑的准备。

张发奎认为只要一鼓作气，很快就可攻下广州。他摸着两腮浓密的胡子在阵前鼓励官兵们："弟兄们，给我冲，我要攻下广州才刮胡子。"

就在这关键时刻，邓龙光送来一封刚刚截获的敌军紧急命令。谁知就是对这封命令的处理，一下改变了战局。

原来，粤军只有张瑞贵一师还算完整，调至仙阁村固守。何应钦从指挥部派传令兵送一封紧急命令给张瑞贵，传令兵却"乌龙"地把命令误送到左翼进攻的邓龙光阵地。邓龙光拆开一看，原来是何应钦要张瑞贵将师部转移，死守待援，便立即把该命令送至张发奎指挥部，请示对策。

看完敌军的命令，副师长李汉魂主张把进至和平墟黄镇球旅和作预备队的陈芝馨旅撤至仙阁，增援右翼，集中力量将张瑞贵师歼灭后再进入广州。张发奎考虑到右翼战事紧张，便听从李汉魂之计，把黄、陈两旅调到仙阁，集中在仙阁决战。但战场上瞬息万变，因时间已拖延半日以上，敌方觉察到对方的意图，加强了防范。张发奎的部队也因连战多日，已感疲困，加上黄镇球旅突然回撤，士气受到影响。

在两龙墟一带，双方展开激战。守军凭坚固工事防守，抵抗异常激烈。打到11日，黄镇球旅长受伤，邓龙光旅增援上来，仍无进展，未能解决张瑞贵的部队。

粤军比张发奎部队的装备好得多，特别是他们拥有当时还少见的空军，占有空中优势。12日，粤军在空军协助下组织猛烈反攻，十几架飞机在低空盘旋轰炸，炸得没任何防空能力的张部人仰马翻，血肉横飞，团长李汉炯、欧震相继受伤。坚持了一天一夜，张发奎看到部队伤亡过大，没有制空权，只好下令撤退，集中至溍江口一带，并通知桂军撤退。

花县战役攻击期间，桂军负责花县北线协攻，牵制了三分之一的敌军，但他们协同攻击的任务并没有很好发挥。原因是，因经4月和10月两次变故，桂军官兵思想混乱，士气低落，白崇禧对部队掌握指挥不够落实，致使部队久攻军田不下。另外，他们也有坐观成败，使张发奎实力削弱，以便进入广州后操纵张军的企图和行动，所以打起来就不那么卖力。现在看到张发奎部退却，左侧背受威胁，白崇禧也赶快下令撤退。

然而，张发奎把部队撤到北江东岸在北端的溍江口准备渡江时，忽然发现在南端担任掩护的桂军预备队蒙志部，竟然先于自己的队伍撤过北江西岸而且也不打声招呼，致使部队在渡江时失去掩护，危机四伏。

此时，广州方面的朱绍良部的几支小部队乘火车直追而来，由于前端掩护的桂军撤得无影无踪，火车竟得以一直开至溍江口，突袭张发奎的部队，打乱了他们的阵脚。

本来部队撤至溍江口时，张发奎就让工兵营在溍江口和溍江上游各搭了一座浮桥，规定教导旅在横石渡江，其余各部在溍江口渡江，渡毕再分别由后卫部队将浮桥拆去。

张发奎的部队是在拂晓到达的，本可以马上渡江，但他想等一下桂军的消息，便决定下午渡江。谁想到，师部行李陈列街上，其中有几十担现洋。常言道露财招灾，溍江口的人素性强悍，见有这么多钱摆在街上，一些人便起歹心，相约来抢。

这时，坐火车来的敌军在镇外打枪袭击，歹徒们便也从街上打起枪来。张军以为敌人里应外合，惊慌失措，自乱阵脚，纷纷奔向江边浮桥涌去……

张发奎在几名强壮卫士的保护下，抢先过桥。他过江后，回头张望，只见直属部队的人马竞相争渡，秩序大乱，浮桥被挤断，不少人马落入水中，惨相万千……

花县一战，张发奎损失实力二分之一强，官兵的伤亡很大。高级将领中，旅长黄镇球、副旅长欧震都受伤。旅长吴奇伟、团长孟敏、黄士途均掉

队。

关于此次攻粤失败的原因，张发奎在《四军纪实》一书中评论说："此次之败，在于轻敌。左翼追到人和平墟后，不直下广州，处置失当。两军联络不确实。友军不十分拼命攻击前进。且敌有空军参加作战，以致功败垂成。"黄绍竑在他的《五十回忆》中谈到此次失利的原因时也说："首为步调不一致，次为广西部队频经变动，战斗力已减。对方有空军参加作战，予我军有极大的威胁。"

五、抗击粤军，北流大败

在平乐、荔浦一带，张发奎好不容易才把失散的队伍集中起来，一点数，总共只有8000余人。他打起精神，采北伐时期的三三制，将这些官兵重新整编，编成6个团、1个特务营、1个工兵营，恢复第四军番号，分为第四、第十二两师，自任军长兼十二师师长，李汉魂为第四师师长。






正是隆冬季节，风雨交加，寒冷透骨。部队由于给养困难，士兵多衣不蔽体，情绪低落。张发奎看着这一切，心里像打翻了酱瓶，不是滋味。

12月28日，张、桂两军将领在平乐召开联席会。

李宗仁首先发言："……总结各路护党救国军近两个月的战况，形势极为不妙，西北军、石友三部和我们张桂联军先后失败。我看以后不再用'护党救国军'第三路、第八路的名称了，应该恢复北伐初期的队号，以振士气。"

说到北伐，张发奎有挥不去的情结，马上举手赞成："北伐时，我军是'铁军'，贵军是'钢军'，钢铁相加，天下无敌。我军已改称第四军，你们桂军有两个军，不妨也改称第七军和第十五军，拿出北伐时咱们两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锐气来。"

"好。"众将领鼓掌赞成。

李宗仁继续道："现在形势危急。在桂北，朱绍良率领的中央军从资县进犯八步；粤军由西江进犯梧州；湘军由黄沙河进犯全县；原来防守邕、贵、浔、郁的吕焕炎又叛变投敌；而左右江则为百色起义后的共党红七军、红八军所占领。蒋介石以陈济棠、朱绍良、何键三路大军侵桂，如同泰山压顶，势不可挡。我决定，以白崇禧率第七军及教导师在桂北对付朱绍良的入侵；由黄绍竑率第四军第十五军前往讨伐吕焕炎。我驻宾阳居中策应。"

众将领依令而行。

转眼已是1930年，新年伊始，人们都希望有个好的开头。眼看离农历春节还有十几天，张发奎向李宗仁建议，乘广东南路空虚，由他率部由贺县出发，向花县、茂名、广州湾出发，袭取广州湾，打通一条临时海道，解决目前经济困难。李宗仁同意了。

张发奎攻下广州湾后，蒋光鼐曾派人与他秘密联络，要张联合桂系和他一起消灭陈济棠的实力，创造一个两广合作的新局面。张发奎当然同意这一计划，便派代表去与蒋光鼐秘谈。不料此时，粤军又大举进攻广西，李宗仁电催他立即回师，支援黄绍竑。该计划被迫取消。

原来初时，黄绍竑率部队迎战粤军，打得异常顺利，贵县和南宁均已克复，形势大为好转。胜利来得太快了，黄绍竑便头脑发热，他竟分兵使用，给对方留下空子。粤军发现黄绍竑手中的兵力不多，有机可乘，急令蒋光鼐师占领藤县，并以蔡廷锴、余汉谋、香翰屏三师沿容苍公路前进，企图解玉林之围，收内外夹击之效。

黄绍竑迫于形势，令第四军由高州进入容县杨梅，意欲阻止粤军前进，但四军未到，敌军已过容县。不得已，张发奎命令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经由陆川，奔赴北流。

这时，粤军已占领离北流仅15公里的三和墟。3月13日，连夜赶到的第四军，不顾兵力疲惫，马上出击。一场恶战就这样在三和墟附近展开了。

三和墟地势呈盘地状，周围是农田，北面有高山，已被粤军占领，黄绍竑部踞守在南部的丘陵地陵。张发奎了解形势后，令第十二师为主攻击队，第四师为预备队，战线长达10余华里。借着夜色，第十二师向高地上的粤军发动猛攻，一时枪声大作。粤军居高临下，占领有利地形，易守难攻。张发奎指挥部队前仆后继，不惜牺牲，激战彻夜不息。

第二天一早，太阳出山，敌出动数架飞机前来轰炸，向张发奎军队的阵地猛烈扫射，粤军乘势发动进攻。张发奎冒着炮火，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

部队血战三昼夜后，由于损伤过重，无法再支撑下去，张发奎只好于3月16日凌晨下令向西撤退。

第四军在北流会战中损失奇重，一个军的兵力只剩下一个师，张发奎有苦难言，把部队拉到南宁附近进行整理，将两个师的残部缩编成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等三个团，以吴奇伟、薛岳、韩汉英分任团长，邓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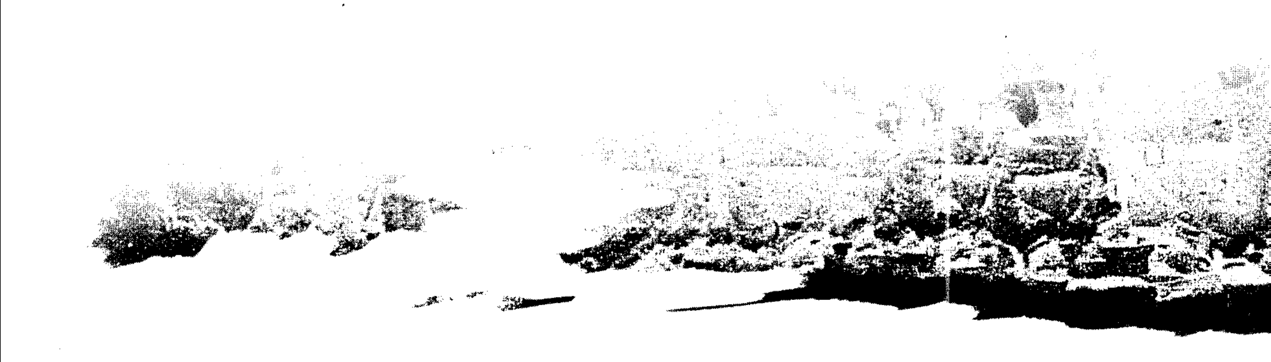
为参谋长；取消第四师番号，只留第十二师番号，张发奎自任军长兼师长。

这一天，阴霾四布，寒风袭人，张发奎的心更是一片冰凉。在战斗总结会上，他和白崇禧一起，猛烈批评黄绍竑指挥失当，没有集中兵力使用，给敌人钻了空子，造成部队惨败。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作自我检讨时说："北流的战败，关系于我军的气势太大了！事后自然有好些人埋怨我指挥失当。"

其实，北流之败，是因广东部队在战术上有所改进，蒋光鼐等吸收花县作战的经验教训，在这次战斗中，每一个阵地都筑了纵深的壕堑，布置了各种障碍物，据险扼守，又有飞机整天在盘旋投弹。张桂联军不但没有飞机，而且没有攻坚的大炮，连迫击炮也不多，因此冲来冲去都冲不动粤军，以致后来粤军一反攻他们就失败了。好在白崇禧在另一路指挥有方，将深入平乐的粤军逐出桂境，民心才稍定。于是形成粤桂两军隔江对峙之局。







第十一章　中原大战，衡阳遭挫折

一、结成联盟，共同反蒋

1930年的冬天是在一片贫寒中度过的。北流战役的惨败，使张、桂联军暂时无力与粤军作战。张发奎一面令队伍抓紧休整，恢复元气，一面等待着时机。

没想到，时机很快到来。这一天，参谋长邓龙光急急推门进来，报告说："张军长，阎锡山打算反蒋了。李总指挥让你马上去他那里开会。"

张发奎骑马赶到指挥部，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早等在那里。

李宗仁笑着把华北联合反蒋的形势简单作了介绍：

原来就在年初，华北局面酝酿着深切的变化，一个波澜壮阔的反蒋联合阵线正在逐渐形成。2月28日，阎锡山把冯玉祥接到太原，与各方代表广泛磋商、决定组成联合反蒋的政治军事联盟，并派人去香港，请汪精卫北上共商大计。3月18日，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出潼关，占领洛阳，中原大战自此启幕。

黄绍竑手持一张电文，说："向华兄，中原打起来了，我们也要积极响应。刚才，我与德公等草拟了一份电文，准备推崇阎、冯领导反蒋，你看一下，没意见就签个名。"

张发奎高兴地说："好，这回有盼头了。"说着，他接过电文细读：

党国破碎、民苦流离，推原祸始，告介公一念之私，有以致之。故介石一日不去，则整个的党，统一的国，一已不成……百川先生，公忠谋国，普海风从，定战止争，匪伊人任，宗仁等再思筹

思，惟有请百公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总揽军权。焕章、汉卿两先生，党国干城，勋劳夙著，敬推为副总司令，夹辅百公，藉以促成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早日实现。

“写得好，就要让蒋光头下台。”他掏出钢笔，“刷刷刷”地在李、白、黄名字后面，签上了一个大大的“奎”字。

经过各方代表会商，反蒋联盟很快形成。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的将领 57 人，由鹿钟麟领衔发表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 月 1 日，阎锡山在太原就职，冯玉祥在津关就职，李宗仁在桂平就职，惟张学良没有表示。于是，阎锡山任命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由广西出兵攻湘鄂；冯玉祥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由潼关向河南进攻；阎锡山自兼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指挥河北军事；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由河南攻山东。





根据这个形势，李宗仁将在广西的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自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总参谋长，第一路指挥官为张发奎，白崇禧兼第二路指挥官，黄绍竑兼第三路指挥官。

蒋介石紧急应对，于 4 月 5 日下达讨伐令，中原大战正式开始。

这一次中原大战，双方动员之众，范围之广，影响之大，以及人力物力所受的损失，远远超过北伐战争。

二、挥师北上，首尾难顾



4 月之春，云淡风轻，杨柳拂面。李宗仁、白崇禧与张发奎等将领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作战方略。

李宗仁说：“……广西现有兵力不多，为了要与冯、阎会师中原，只好放弃广西，全军北上，进攻湖南，直取武汉。后方一些战略据点，由地方团队负责维持。”

张发奎表示赞同：“我们就沿当年桂军北伐之路，在武汉与冯玉祥的部队会师。”

李宗仁点点头：“为了集中兵力，我军将放弃桂平、资县，主力由柳桂方向秘密北上，分两批进入湖南。现在，黄绍竑尚在左右江指挥剿匪未回，

我决定，由我统率第四军、第七军、第十五军先行出动。兵分为两路：向华兄率第四军及第十五军梁朝玑师由桂林出全县，健生兄率第七军及第十五军许宗武师由平乐出龙虎关。两路军到达零陵后，一同向衡阳推进。湘军唐生明率部要求参加第一方面军，我把它编为第八军，一同作战。”

接着，他补充道：“此次出师，志在必胜，我已由香港印制‘国民银行’钞票几十大箱随军运进，预定一到武汉，即公开发行。此事已得到了冯玉祥、阎锡山两总司令的同意。”

为了迷惑敌人，在出发前，李宗仁略施小计，故意以小部兵力进扰平南，粤军果然中计，以为将袭北江，把在桂兵力全部调回广东，陈济棠亲在广州坐守。

5月22日，张桂联军挥师入湘，如入无人之境。蒋介石急令江西鲁涤平部入湘支援何键，鲁部才到赣湘边境，第一方面军已兵不血刃而得重镇衡阳。

旗开得胜。按照原来北伐的打法，白崇禧令张发奎率第四军抄袭醴陵，第十五军向渌口、株洲，第七军向衡山、湘潭前进。

醴陵之战是一场重要的战役。张发奎迅速作出部署，让韩汉英团、吴奇伟团，配备两门大炮，担任正面进攻，薛岳团为预备队。

战斗首先在泗汾地区展开，激战一整天，正面攻击部队遭到何键部的顽强抵抗，没有取得成效。到了深夜，张发奎忽生一计，命令薛岳部由右面高地迂回前行，包围何键的湘军。薛岳依计而行，占领了渌水桥，用火力控制了桥的南面，断了敌军的退路。

拂晓，张发奎见包围圈已形成，便发动全线总攻击。

3个团如猛虎下山，向敌人进攻，何键部队多面受攻，难以抵挡，全线动摇，终于大败而溃逃。第四军大获全胜，缴获甚多，长驱直入，进至平江，一路都没有遭遇抵抗。

与此同时，友军也频频告捷，第十五军在占领湘潭后，一鼓而击溃渌口与株洲之敌，于6月5日进入长沙，朱绍良、夏斗寅、钱大钧各部皆北逃，何键率部逃往湘西。6月8日，白崇禧率第七军占领岳阳，前锋进入湖北，克复武汉已在指顾间。

第一方面军以不可阻挡之势攻入湖北，冯玉祥的第二方面军也由许昌追击而来，南北反蒋军队夹击武汉的形势已经形成，眼看胜利在望。然而此时，冯玉祥将西北军主力过早东移，停止了平汉线的攻势，因而贻误了战

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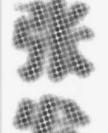
蒋介石在张桂联军进占长沙之后，急电广东的陈济棠、陈铭枢派兵北上，合击张桂联军。陈济棠弄清张桂联军北上意图后，迅速派蒋光鼐、蔡廷锴部从韶关沿粤汉铁路北上，趁黄绍竑率领的桂军后队尚未依照原定计划跟进衡阳的空隙，于6月10日乘虚抢占衡阳，把桂军前锋和后队切为两段，两湖战场的形势顿时为之完全改观。

后来有战略家作出评论说：假使南战场白崇禧占领岳州直指武汉时，北战场冯玉祥的西北军能互相呼应，密切配合，则中央军首尾难顾，胜负之数，确实未可知也。

那么，黄绍竑为什么姗姗来迟，贻误戎机呢？一句话：自私观念在作祟。



黄绍竑没有参加4月的南宁会议，对放弃广西、全部入湘北上的做法不理解，他还幻想长期保持他的广西省政府主席的地位，他曾对亲信说："你们李、白不要广西，留给我好了。"这就是说，他没有全局观点。从而造成其属下两个师行动迟缓，坐失时机，被粤军抢先一步，占领衡阳，把张桂联军拦腰分为两截。






黄绍竑以仅有两师人马，兵力单薄，独力不能把衡阳夺回为由，急电李宗仁：请回师击破粤军，再行北进。李宗仁、白崇禧正在考虑北进武汉还是回师救黄的时候，恰巧接到汪精卫从香港来电："据戈定远面告，冯玉祥要进军武汉，请桂、张两军仍回两广。"

白崇禧把电报交给张发奎，说："现在听老兄一言决定。"

张发奎心里总有一个将广东作为起家守业的根据地的梦想，见机会来了，便说："现在前有重兵阻击，后有追兵截尾，我们被分成两截，供给不上，有被分头吃掉的危险。如果回师击败蒋、蔡两师，就可以直取广州，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

于是决定回师。后来证明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三、兵败衡阳，秘密结党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前方部队南回，粤军迅速退守衡阳，

在耒阳，李宗仁召开军事会议，黄绍竑从南宁赶来参加。

李宗仁分析道："……守衡阳的是粤军蒋光鼐、蔡廷锴部，他们凭坚固

工事扼守，不易攻夺；现在正逢湘南因大旱而饥荒，我们的军粮成为问题，我看是不是全军渡过湘江北岸，据守祁阳、宝庆一线休整，俟度过荒年，再图进展。”

张发奎想了想，说：“这样也好。”

白崇禧却不赞同：“根据情报，衡阳守军蔡廷锴部忽然离城向熊飞岭挺进，动机不明。如果粤军守在衡阳，确实不易攻坚；但现在其倾巢而出，正是打击他们的有利时机。我们有 18 个团的兵力，敌方只有 17 个团，我们不妨与之决战，打赢了，直捣广州；打不赢，回师广州固守。”

于是，李宗仁改变战略，决定乘势反攻，消灭粤军，夺取衡阳。

他们完全忽略了桂张联军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前进则气盛，攻无不克；而退却则气馁，战意消沉。而且，时当盛夏，长途行军，士气疲惫。如此一支军队，是很难与拥有空军的“老对手”粤军的生力军对碰的。

7 月 1 日，李宗仁下令总攻，白崇禧指挥第四、第七两军和第十五军为左翼，黄绍竑指挥两个教导师为右翼，在洪桥北面的五塘，双方遭遇，展开大战。

战斗开始后，张桂联军攻势凶猛，但经过两夜三天的苦战，仍拿不下衡阳，部队损失十分大。

第四天，粤军大举反攻，情形急变：打前锋的许宗武师先退了下来，白崇禧严令第四、第七两军稳住阵脚。几经冲锋，伤亡惨重。第四军副师长李汉炯、第七军第八师师长梁重熙相继阵亡。尽管击毙了对方猛将张世德，但张桂联军全线败退，伤亡惨重。尤其在撤退途中，又遭到粤军飞机的扫射，整个部队顿时一片混乱，溃不成军，狼狈不堪。

在衡阳附近，得胜的一方——蒋系军事力量很快集结，对张桂联军形成三路包围之势。为了摆脱全军覆灭之危，白崇禧一边派联络员通知右翼的黄绍竑退却，一边则与李宗仁、张发奎等不顾一切冲出包围圈，经东安仓皇退回广西的全县。

这是张发奎从军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在撤退中，由于军心动摇，部队亡的亡，逃的逃，张发奎想到第四军南下广东以来，经花县、北流、衡阳 3 次重大惨败，元气大损，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萌生散伙的念头，吩咐各团对溃散的官兵不必收容。

脾气暴躁的薛岳更是忍不住对部下大发牢骚：“我和张军长都不想再干下去了，诸位请自便，或投靠他方，或把枪械卖了回家，或上山落草都可

以，大家各奔前程吧。”

军官们都没有答应，苦留张、薛二位指挥官，他们才安全撤到了广西。

7月5日，黄绍竑率领差点被敌军吃掉的部队狼狈不堪地也撤到全县，与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相见。大家在湘山寺晤叙一堂，恍如隔世，对此次第一方面军未能与冯、阎会师中原，深表遗憾，不禁感慨万千。

当晚，三军将领会餐。张发奎、薛岳想起这次溃败，看到黄绍竑就来气，碍于面子又不好当面指责，打算借酒发难，指控黄绍竑未能依照计划率后卫部队如期占领衡阳，给粤军钻了一个空子，是此次失败的主因，应对湖南战败负责。黄绍竑入席时，发现座中各人表情有异，于是一开始就拿着酒瓶猛饮狂喝，边喝边闹，根本不让张发奎、薛岳有说话的机会。未到中席，他就喝得酩酊大醉，吵得天翻地覆。李宗仁心中有数，急令身边侍从副官把他扶出，一场危机，终于避免了。





酒席散后，张发奎对李宗仁说：“德公，我们四军现在仅有两个营的兵力，真的是溃不成军了，不如请求您把四军的番号撤掉散了。”

李宗仁劝道：“我们桂军也损失十之七八，但散伙之事还是免谈吧。”

“这是真的。我已与薛岳、李汉魂、邓龙光、欧震、吴奇伟等众将领商量了，把历年存积的几十万元公积金拿出来分给跟来的官兵，以后各走各的路。”

李宗仁见第四军以1万余人的雄劲之师，削减为千余人的残部，也深表同情。他慰勉张发奎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必如此消极。”接着，他以利害关系来打动张发奎：“向华！你丢了部队出去，难道就终老香港，对政治和军事不再过问了吗？有点本钱，终比一点本钱没有的好！你不要一时消极，不顾及长远的厉害。”

白崇禧更进一步地劝道：“向华，下野的滋味你尝过，我们也尝过。丢了棒棒被狗欺，你前次下野后不是有旧第四军做本钱，1929年春蒋介石还能起用你吗？此刻你到香港去，汪先生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肯投到陈济棠方面去当部下吗？蒋介石还能放心再给你兵带吗？我劝你打消走的计划，再和我们一道干。没有兵，我们给你补充；没有钱，我们给你筹措。我们有祸同当，有福同享，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请你三思。”

张发奎长叹一口气说：“我现在毫无凭借，难以重整旗鼓啊。”

李宗仁想了下：“这样吧，我将本军许崇武、梁重熙两师番号撤销，将这两个师的装备，和少校级以下约6000人，全部划给你们四军，以恢复你

们的战斗力。”

张发奎经过李宗仁、白崇禧这么一劝解，果然打消了散伙的初意，决心继续干下去。

李宗仁、白崇禧随即拨给张发奎几千官兵，分驻柳州、柳城两处。但张发奎只接受了士兵和枪械，将各级官佐一一送回给李宗仁。一来，虽然四军散了，但连、排长这些士官还在，二来他想保持自己四军的纯粹性，军官仍用自己四军的人。

张发奎配合原有老兵，重新编组，编成6个团，分为第十、第十二2个师，以薛岳、吴奇伟分任师长。训练了2个多月，又恢复了战斗力。这样，第四军才继续坚持了下来。

黄绍竑自北流之败，已受谴责。此次衡阳受挫，第四军几乎散伙，只剩了十分之三。他自知不被见谅于张发奎，顿萌退志。后来，他脱离了桂系，投向蒋介石。

同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在柳州整军，保持着4个军的番号，每军2师，每师2团。正在这困难时期，张定措转来汪精卫的寄语，以李、黄、白等在广西崛起，不过是一种感情的结合，无政治信念存乎其间，等到感情和个人利害冲突时，这种团结就不存在了。黄绍竑此次贻误戎机就证明了这一点。为今之计，要求李宗仁、白崇禧与张发奎合力组成一个政团，作为团结战斗的领导核心。

这一寄语使他们茅塞顿开。张发奎与李宗仁、白崇禧接纳了此说，于是一个定名为“护党救国青年军团”的秘密组织，就于1930年9月1日在柳州广西银行里秘密诞生。该组织最高领导机关为中央干事会，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中央常务干事，这个组织的成员，完全排除忠心于黄绍竑的骨干分子。同时，白崇禧任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完全取代了黄绍竑的地位。从此李、白互相扶持，甘苦与共，久而弥笃。一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之际，两人才分道扬镳。

但张发奎担心第四军干部被桂系同化、收买，便先在第四军内部秘密组织了“国民党护党同志会”，规定凡先参加“护党救国青年军团”的人必先参加这一组织。

四、飞兵巧渡，夹击滇军

1930年9月25日，李宗仁召开革命同志会常务干事会议，检讨了整个局势：

“各位同志，鉴于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率军入关，直指北平，以致冯、阎不战而败。北方既无战事，蒋介石将全力来对付广西，广西必须击退敌军，而后才有回旋余地。现在我们前面有两大任务：一是打粤军，一是打滇军。今天开会，就是请各位来献计献策。”

白崇禧报告了前线的情况：“……滇军3个师已把南宁围困了近5个月，南宁守军的粮食，仅能维持到10月10日左右。粤军余汉谋部也从贵县进占宾阳，切断了柳州到南宁的公路交通。”

“应先打滇军，以解南宁之围。”张发奎表态说，“第四军进入广西以来，同粤军三战三败。我们将士经过这些挫折，再不能在战场上听到‘丢那妈，契弟！’的喊杀声了，如打滇军，四军仍愿当先锋队，重振军威。”

“好，有向华这句话，这仗就好打了。”李宗仁最喜欢张发奎这种甘当先锋的作风。

会议最后决定，由白崇禧率张发奎、杨腾辉、李品仙3个纵队，前往解南宁之围。

9月28日，白崇禧从柳州出发，亲率主力部队，依靠当地向导的指引，从昆仑关和高峰隘这两个天险的悬崖峭壁中，找到了三条连马匹也通不过的单人小径。他令张发奎、杨腾辉两纵队把炮兵、电台、马匹等笨重东西都留下，全军轻装偷渡关山，一冲就冲到昆宾公路的四塘附近。届时，滇军还以为是土匪，完全料想不到守城部队的援军竟飞渡到来，惊诧之余，措手不及。

张桂联军和滇军在南宁城下鏖战了三日。滇军作战力相当强，整连整连地冲锋，使张桂联军难以招架。打到第三天最为激烈时，白崇禧和张发奎同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突然有一个连的滇军，沿山边隐蔽地区迂回而来，向山下吴奇伟的师部指挥所袭来，情势十分危急。

吴奇伟身边只有一个卫士排，几个参谋要师长赶快撤退。吴奇伟一点不急，他正左手提着酒壶，右手拿着一只鸡腿在啃着。见敌人来势凶猛，他毫无怯意，舞着鸡腿指着卫士排大喝一声：“散开射击！”官兵们奋力抵抗，

遏制了滇军的攻势。

十几分钟后，桂军一个团赶来增援，终于把冲上来的那一连滇军击退。

当时如果吴奇伟不冷静沉着，稍一后退，定会牵动这一线的守军而波及白、张的指挥所。后来白崇禧对吴奇伟开玩笑说：“滇军用的指挥刀是鸦片烟枪，你用的指挥刀是鸡腿，将来在战史上应当大书特书。”吴奇伟听了，哈哈大笑。

这一战滇军的兵力并未损失，但卢汉眼见余汉谋向西夹击的部队不至，怀疑余汉谋和张桂联军之间已有谅解，便于第三日夜间向西撤退，南宁之围遂解。

南宁解围后，守军将领黄旭初对白崇禧、张发奎两人说：“10月10日，城内的米已吃光了，只剩下一些黑豆。情况十分紧张，恰巧这个时候，健公给我的电报到了，说：‘援军走十二日由葛墟进出邕宾路四塘。’大家高兴之余，于是用黑豆饭来度双十节。”

后来广西一度以双十节为“黑豆节”。

南宁和平马之战，是张桂联军的最后一战。滇军退走后，湖南部队从全州撤回湖南，广东部队从宾阳、迁江、贵县、桂平一带撤回广东，只留一部分扼守梧州。至此，广西全省，除梧州外都已由张桂联军完整地收复。李宗仁即将总司令部从柳州移到南宁，南宁又恢复了原来广西省会的地位。

击溃滇军之后，张发奎再次进行整编，将薛岳的第十师并入吴奇伟的第十二师，全师编为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团，以沈久成、欧震、阐维雍分任团长，唐宁纵为参谋长。张发奎调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职，薛岳调任柳州军校校长，韩汉英为副校长，继续与桂军共度极其艰苦的岁月。

第十二章　汪蒋合作，欧美三年行

一、汪蒋合作，四军离桂

1930年冬，中原大战以张学良附蒋引军入关，导致冯玉祥、阎锡山失败而告终。此时环顾海内，国民党阵营里的反蒋武装力量，只有局处邕柳一隅的张桂联军了。

面对蒋介石的重重压力，张桂联军已无法再组织武力反蒋，只能对内则编练民团，以解决广西兵力不足的问题，对外则联系一切反蒋力量，尤其注意团结好广东的陈济棠，希望能重新建立两广合作的局面，打破蒋的封锁。

政治也如孩儿的脸，说变就变。

蒋介石为了想当总统，竟然于 1931 年 2 月 28 日软禁了反对他的胡汉民，顷刻间，宁粤间掀起了一场政治大风暴，激起了又一次反蒋联盟的形成。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反蒋联盟的盟主。他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释嫌修好，联合反蒋之意。为了表示联合广西反蒋的诚意，他将驻在贵县、桂平、梧州一带的粤军撤回广东。

处在上顾无望、艰难竭蹶中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得此佳音，直觉峰回路转，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间，粤、桂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转而合作。

5 月 11 日，李宗仁在广西率诸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内中除历数蒋之罪状外，还有对以往反蒋失败的痛省，以及此后与反蒋各派“精诚合作”的决心。同时，决定派白崇禧、张发奎作为特使赴粤，向陈济棠提出应该把汪精卫请出来。

5 月 21 日，白崇禧和张发奎来到香港，请汪精卫赴广州参加组府反蒋。







回顾1929年冬护党救国军的组成，完全得自汪精卫的倡导，有了这一段历史渊源，所以旧调重弹毫不费力。汪精卫对他俩说："你们来得正好，孙科派梁寒操来晤，说他不日可到，我们等他来一同发动。"5月24日，孙科偕陈友仁、许崇智自上海抵港，拜访汪精卫。刚好，白崇禧、张发奎在汪宅，他们便相与会商在广州组府的程序问题，由于思想早有准备，一谈就拢。

5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在广州召集，决定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立，名目上是粤系，实际是联合国民党的所谓"左"、右派和桂系一起组成的。桂系在广西蛰伏一段时间之后，乘此机会又伸出头来，走上了政治舞台。

广州政府成立后，陈济棠与李宗仁相商，将两广军政人事重新作了调整。军事上，两广军队一律取消原来称号，改编为第一、第四两个集团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部下辖3个军，分别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为军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则以白崇禧为副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政府方面，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济棠兼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由黄旭初担任。由是，两广合作反蒋局面正式形成。

赴粤任务完成，张发奎心情宽松了许多，他并不急着与白崇禧回广西，而是留在广州寻找机会，他不能让四军一辈子呆在广西啊。

正在宁粤对立时刻，日寇公然在沈阳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沦陷。此事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宁粤矛盾得以缓和。为了争夺国民党的党权，围绕召开国民党的四大，展开激烈的斗争，结果，形成以蒋介石为首的宁派和以原广州国民政府人员为首的粤派。由于两派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各自分别召开第四次党代会，按分配的名额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再在南京一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宁粤双方经谈判，决定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粤方代表团一行从香港乘"晨臣总统"轮赴沪。汪精卫特邀张发奎、唐生智两大将同行，想把这两个军人当作与蒋介石谈判合作的一张王牌。张发奎欣然而往，并在国民党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辞职下野。次年1月29日，中央政治会议又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是，蒋、汪对立的局面遂告结束。

谁料到，李宗仁对汪精卫邀张发奎到上海出席和议起了疑心，认为汪精

卫此举不寻常，或为第四军另谋出路。白崇禧便采取措施，调吴奇伟第十二师驻守百色。张发奎闻讯后，甚感惊讶，从上海电请李宗仁收回成命。如不奉准，即乞将四军全体遣散。李宗仁不想把事情闹大，允其请，事乃终止。

张发奎是听从汪精卫的号召反蒋的，回忆起1929年，他首义反蒋，率部来到广西之后，攻粤入湘，先后受挫，三次缩编，实力大减，不禁百感交集。此次桂系起疑心，他油然想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之语，现在汪蒋已实现合作，该是考虑如何离开广西另望发展了，但好聚好散，分手也要有理由。目前日本人正入侵我东三省，不如把队伍拉到前线打鬼子去。

于是，上海和议结束后，张发奎于1931年11月17日在上海分电广州四全大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请准他率第四军北上援助黑龙江马占山将军抗日；18日，他又电李、白，重申前请；22日，他再电其部下陈劲节面谒李、白，提出上述要求。

一连三电至情至理。







李宗仁、白崇禧明知张发奎是打着抗日的旗号离开广西，但又不便加以阻止。因此只好空口表扬一番，并提不出什么具体办法。

12月10日，张发奎从上海回到广州，分晤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会商四军北上事，一样没有什么结果。万般无奈中，时为桂军驻香港办事处处长的陈劲节，主动为老长官张发奎分忧，突然留函李、白，即去香港。他在信中说，如果李、白不准四军北上抗日，则他手中所掌握的用来买军火的外汇，即不准备交还。

情势发展到此地步。李宗仁明知张军援黑绝不会成为事实，也不好力阻其行，于是派人从广州去香港同张发奎谈判，提出了下面这两项解决办法：准吴奇伟率第十二师援黑；陈劲节必须回广西办清交代。

12月中旬，李宗仁赴南京出席四届一中全会，过沪时又约张发奎面谈、解决一些有关四军北上的具体问题，但他心中对张发奎用陈劲节这一招始终郁郁不快。

12月28日，第四军发出通电、向广西全省党政军民告别。次年1月1日，第四军在南宁体育场举行北上援黑誓师大会。由吴奇伟师长主持。李、白都不在南宁，特由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叶琪监督。

1月3日起，第四军第十二师分批由南宁出发，取道邕柳公路北上，2月1日全部集中全县。到了这时，张发奎才感到问题来了：第一：作为南京的最高军事机构军事委员会尚未正式成立，汪精卫虽身为行政院长，也无法

解决四军北上的军费问题；第二：何键怀疑四军与唐生智有勾结，正在衡阳集结大军准备抗拒，非有南京命令，不准通过。

正在为难时，张发奎接到了蒋介石在和汪精卫于徐州举行会议后给他的电报："'1·28'沪战后，日舰在长江阻止我军行动，四军不如遵陆接沪，较为适宜。"

李宗仁也从广州电云；"吴师集中全县，当地民众对四军抗日义愤，报表钦崇，热烈迎送，素所未有。此时沪战正急，热河危殆，若四军停兵不前，殊难自解。若无论北上或东进，弟当力为赞助成行。如何早作决定。"

张发奎无奈，只好令四军暂时不要北上。

3月6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军委会的名义下令，指定四军经衡阳、醴陵，到江西"剿共"，军饷由财政部拨付。

3月10日，第四军离全县进入湘南，结束了它两年多以来与桂军并肩战斗的历史。

二、识汪面目，关系破裂

张发奎是当年军中拥护汪精卫最忠实、最坚决、最积极的一人，对汪真正做到了"言无不听，计无不从"。1927年，他为支持汪精卫，与中共分裂，致使中共在南昌起义，削弱了他三分之二的军力；同年11月，汪精卫又要张发奎在广州驱逐李济深，制造"张黄事变"，结果和桂军黄绍竑以及李济深的部队大战于粤东，也因失败而退出广东。这次又因为拥汪而在宜昌发难反蒋，经过大小10余次战，拼完了实力，仅仅剩下几千疲残之师，撤出广西后，由吴奇伟带到江西樟树镇进行整训。总之，张发奎对汪精卫始终追随，毫无怨尤，特别是张发奎对汪蒋这次重新合作起了关键性作用。

按说汪精卫对张发奎虽不能特别提携，也当推心置腹，多方抚慰。殊不知汪精卫毫无信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人只知利用，根本不懂得珍惜。他看到张发奎现在手中没有多少兵力，再也无力量帮助自己，弄不好反而影响他与蒋介石的关系，因此，便把张发奎当成了障碍人物，并尽量避免与他见面。

1932年春的一天上午，张发奎特地到汪精卫的铁道部一号官舍去见汪精卫。谁想到，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出来挡驾说，汪先生病了，病得很重，

不能出来会客。张发奎信以为真，请陈璧君代问好，便起身告辞。两天后，有人告诉张发奎，说汪根本没病，而是到杭州会蒋介石去了。张发奎不信，来人递上一张当天的晚报，报上头条新闻赫然刊登着蒋汪杭州会晤的消息，张发奎一看，气得跳了起来。

过了几天，张发奎又去汪宅拜访，门房见是常客，进去通报。张发奎自以为和汪关系密切，不待通报，也跟着走了进去。其时，汪精卫正和秘书曾钟鸣坐在客厅里谈话。门房报告说张将军求见，汪精卫一听，皱眉道："又来了，讨厌，讨厌！"汪精卫的一席话，刚好被站在客厅门口的张发奎听得一清二楚。

张发奎愤愤地离开汪宅，回到自己位于上海爱虞限路一座小洋房的寓所，又气又恨，想起自己如此用尽力气拥汪，到头来却落得如此下场，于是恨恨地说："汪精卫的虚伪面目，今天已被我戳穿了。"






他的一个幕僚见他如此生气，不揣冒昧地说："向公，汪精卫无信无义之外，还很无耻。他这样无情地对待你，还跟着他跑干什么？"

张发奎长叹一声："我一次又一次地反蒋，那年在广州还反过李济深，不了解我的人，都骂我反复无常，其实我是上了汪精卫的当。我现在再来反对汪精卫，那不更说我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吗？这好比旧时的女人嫁错了丈夫，要离婚，怕人讪笑，不离婚，又深感痛苦，真是难啊！""你已经上了汪精卫的当，人们都说你是他的死党，今后还要跟着他走，说不定还要上他更大的当。"张发奎苦涩地笑了笑："那倒不会了，以后我对汪会敬而远之，我已经没有兵权了，汪已和蒋合作，他还利用我干什么呢？"

这时，孙科辞去行政院长职，由汪精卫继任，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他们大肆安插汪精卫改组派人员。那时，第四军中上级军官未能安置，流落在上海、南京一带，张发奎多次请汪精卫安置他们，汪精卫一味敷衍。

情急之下，张发奎十分强硬地对汪精卫说："汪先生！第四军的全体官兵，为了拥护先生的革命主张，这几年来一再苦战，舍生命，流热血，万死不辞，而今所剩不多了。总队已小，一部分人员安置不了，现在流落在南京、上海的有好几十人，而先生不加抚恤安置。他们生活都很困难，几次要来向先生请愿，还要向报纸发表一些东西。他们说：'我们给汪先生出的力，难道还不如那些只会吹牛的改组派？'他们这些想法，都经我劝解和阻止了。现在如果先生再不理，就让他们来找先生，我也管不了许多了。"

汪精卫自知理亏，听后皱起眉头，又是搓手掌，又是搔头发，许久不作答复。倒是陈璧君在旁边十分着急，连忙替汪出主意说："你就和顾部长商量一下吧，在铁道部内设法安置他们吧。"

汪精卫这才装成恍然大悟的样子，答复张发奎说："好，我和孟余商量。"

几天后，在行政院会议上，铁道部提出了一个"设立路警管理局"的提案，会议通过后，随即任命前第四师副师长朱晖日为局长，前教导旅长、柳州军官学校校长陈芝馨为副局长，下设4处，编制将近200人，除了安置第四军几十个闲散人员外，还安插了一部分改组派和反对过陈济棠的军官。

即使如此，张发奎与汪精卫的关系还是开始出现裂痕。

三、欧美考察，捐资建校

张发奎原本想带第四军到抗日前线打日本鬼子的，没想到蒋介石把第四军调到江西剿共去了，而他自己在"1·28"抗战爆发后，被派往上海协助军事，由于手中没有军队，只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官，让他空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蒋介石看到张发奎在眼前晃来晃去也感到有些碍眼，生怕他又生些什么事出来，便让财政部长宋子文给了他10万大洋，让他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名义，赴欧美各地考察军事，作为建军之参考。从这点看，蒋介石比汪精卫更会笼络人。

张发奎正想出外散散心，打算有系统地学习与了解国外先进军事技术和经验，为抗战做准备，便答应了。他临行前，却没有动用给他留洋的10万大洋专款，而是另有打算，准备把这笔钱捐献给家乡，建一所小学，这可是他童年的夙愿。当他把这意见与夫人刘景容商量时，张夫人欣然赞同。

张发奎是1924年回老家结婚的，他曾发誓说不当上团长不结婚的，这一年他已任粤军第一师独立团团长。新娘叫刘景容，是始兴清化月武镇人，比张发奎小12岁，当地一家望族的千金小姐，知书达理。张发奎还记得在县城举办婚礼后，他特地带新娘子回老家。这是他成名后第一次衣锦还乡。那天，按家乡的风俗举行婚礼，他在老家摆了12围桌，把全村张姓的人家都请了来，他每一桌都去敬酒，用大碗喝酒，一人敬一碗，那天他喝了几十碗，竟然没醉，乡亲们啧啧称奇，夸他海量。

张发奎觉得建学校是件大事，马虎不得，得托一个稳重之人，他想起了他的小老乡张光弟，便叫卫兵把张光弟找来。

这张光弟是个革命进步青年，1927 年曾在始兴搞农民运动，遭到当地反动政府的通缉，呆不下去了，便投到张发奎麾下。张发奎很器重他的才干和胆识，让他在身边当了个少校侍从秘书，后来又把他调到新闻检查处当处长。一天，某报刊登了一条薛岳与女护士的绯闻，薛岳看报后怒发冲冠，跑到张公馆大吵大闹。张发奎为了息事宁人，无奈劝张光弟辞职，这才好不容易打发走薛岳。这回建学校，张光弟正好派上用场。

张光弟进来后，敬礼问候，说："张长官，有什么吩咐?"

张发奎招手让他坐下，切入正题："老蒋派我到欧美考察，这里不是你久留之地，你倒不如回我老家，替我办间学校培养人才，让山里的孩子有书读，顺便替我把祖屋修一修，说不定我以后解甲归田有个落脚的地方，你看怎么样?"

"一切听您的命令！"张光弟点头答应。

"学校要办得有名有声有实力，要请有本事的老师来授课，让方圆百里各县都送子弟到这个学校来读书，困难而成绩好的孩子，可考虑减免学费。我给你 10 万大洋，你全拿去做经费吧。"张发奎呷了一口茶，说，"你放心回去吧，我会叫参谋处打电话回始兴县府，安排你当个县参议员，有职有权，办事方便些，他们也不敢难为你。"

接着，张发奎又对学校的选址、校舍设计等作了交代，吩咐张光弟到广州请个好的建筑设计师来设计，回乡建校一定要取得当地父老乡亲的支持，把事办实、办好。

张光弟点头答应。

刚送走张光弟，侍卫来报，门外叶教授夫妇求见。张发奎高声说："快请。"

门口一亮，进来一对新人，男的高大英俊，身穿一套白色西装，配绛红色领带，更显挺拔出众，文质彬彬，女的苗条修长，鹅蛋形的脸上戴一副金丝眼镜，身穿红色碎花旗袍，挂一串钻石项链，一头黑发高高束起又随意飘下，既有大家闺秀的矜持，又不失知识女性的儒雅。

张发奎高兴地走上前，轻轻拥抱了一下男士，然后托起女士的手笑吟吟地带到刘景容前，说："夫人，我来给你介绍，这就是我跟你提起过的全赓靖女士，北平市国立艺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她是满族人，父亲全绍清，曾

任北平教育部部长，后任北平红十字会会长。全女士从小聪颖勤学，成绩优异，画得一手好油画，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北平有名的才女。”

张夫人端详着全赓靖，道：“果真是才貌双全。”

“张夫人过奖了。”全赓靖脸上红晕顿生，不禁低下头。

张发奎又把男士拉上前，介绍说：“这是叶绍振教授，上海中国公学博士，老家是梅县的。他俩能走到一起。还是我保的大媒。”

张夫人一听乐了：“想不到你张大王打仗之余，还有闲情逸致当月老。”

全堂顿时笑起来，气氛也轻松许多。

叶绍振轻握了一下张夫人的手：“夫人，您好。您来上海这么久了，我因忙于婚事，一直没过来看您，实在对不起，我与张长官是忘年交，请夫人原谅。”

张夫人摆摆手：“没事没事，你俩真是郎才女貌。”

全赓靖从小坤包里拿出一张大红请柬，递给张夫人：“我和先生准备在后天举行婚礼，请您和张长官做我们的证婚人。”

“好，恭喜你们百年好合。”张夫人笑着说，“届时我们一定到。”

“我还备了一份大礼呢，不过现在先保密。”张发奎孩子似的一笑，“夫人，我们这次欧美行，叶先生已给我们计划安排好了，还说到法国时做我们的翻译。”

“那太谢谢您了，叶先生。”张夫人说，“国外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的，我们得仰仗你了。”

“不客气。我在国外有不少朋友，他们会尽力的。”叶绍振谦笑着。

那一晚的婚宴酒，张发奎喝得酩酊大醉，他可很少有喝醉的纪录。张夫人笑他，比自己结婚还兴奋。

有了叶绍振和在国外的四军老战友的帮忙，1932 年冬，张发奎夫妇离开中国，先到欧洲之英、法、德等国，考察列强三军的装备与军事教育技能。当时正是一战过后，欧洲经济处于上升期，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欧洲各国军事也在快速发展，武器装配不断改良。给张发奎印象最深的是德国的特种部队——如伞兵及装甲部队等之训练，配之与激昂的民族精神士气，使他深为感动。可惜后来被希特勒的纳粹所利用，成了世界一害。

1933 年冬，张发奎转赴美国，又考察了 8 个月，见闻益深，胜读万卷书。

在芝加哥时，张发奎由朋友介绍，结识一位美国医生，名叫雅伦。这

天，雅伦医生邀请来自东方的贵客到他家中吃饭。

席间，热情的主人端起一个大约可容半磅酒的玻璃酒杯，介绍说这是他的传家之宝。说着，他在杯中斟满了白兰地酒，站起来高声对张发奎说："张将军，我最恨日本人，相信你和我一样，如果你能将这杯酒一饮而尽，在我有生之年，你能将日本人打败，我就将这个传家之宝的酒杯子送给你作纪念。"

张发奎聆听之下，心中一震，二话不说，将这杯酒接过来，一饮而尽。

雅伦连声说好。

当时，日本正加紧侵华步伐，而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还是极度容忍，未有抗日的迹象，何时才能将日本人打败，张发奎心里真是一点把握也没有，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位美国人——医生的挑战，只是出于一时豪气的冲动和爱国精神的感染。






张发奎在欧美各国，均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在伦敦接受天津《大公报》记者采访时慷慨激昂地说："祖国在今日，已危如累卵。""吾人处兹非常时期，惟中备其力，迎头猛干，以救危殆。""苟有人愿牺牲一切，为捍外侮，余愿为一走卒，以从其后。""吾人之目的，厥在团结以救国。""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敌，期有报国仇于万一也。"

3年时光，一晃而过，依张发奎考察所得，过去的平面战争，已进步到立体战争，无空防即无国防。他还想留在美国、加拿大学习空军，回来后好发展自己的空军，可惜他体格检查不合格而未能成愿。此时，国内正风起云涌，华北危机日益严重，他接到蒋介石电召回国，才结束了为时 3 年之欧美考察生活。

应该说，这一段时光他远离政治与战争，是他最悠闲的时光，也是他潜心学习军事的最宝贵时光，为他以后指挥抗战奠定了基础。

1935 年秋，张发奎回到国内，在上海向报界发表讲话，表示决心抗日。不久，他到南京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客气地问他："向华，回国后有何打算？"

张发奎开门见山："今后中国出路，惟有抗战之一途。我希望为未来抗战之军职尽力。"

蒋介石说："好，好，好。日后抗日，我必让你充先锋。不过，现在正是'剿共'的关键时期，薛岳正指挥以四军为主力的第七纵队在'剿共'，

你先到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任总指挥一职吧。”

张发奎极力推辞未获同意，只好于翌年 1 月走马上任，心里总不是滋味。

回国不久，他接到张光弟从家乡寄来的信。信中说：我奉长官的命令，带领青年陈培兴、陈晓春等回矮岭村筹建学校，得到乡村父老的大力支持。此后，成立了校董会，由张长官任董事长，张光弟任副董事长兼校长，村上一些有名望的绅士任董事，现建校仅一年时间，校舍就基本建成，并设一至六年级 6 个班，300 多名学生。

信中还特地谈到学校的命名：村里饱经世故的老前辈不赞同学校以张发奎父亲的名字“竹溪”为名，认为始兴在历史上享有盛名的是张九龄，“九龄风度”天下传，逸斌（张发奎的乳名）在外做了大官，就是光宗耀祖了，相信他不会斤斤计较一定要用“竹溪”作为校名的。因此，校董张云峰老人见村里大多数人同意以“风度”为校名，便郑重其事地说：“写信告诉向华，说明全村人都赞同‘风度’做校名。”



1992 年 11 月 10 日，张发奎的夫人刘景容在始兴县参观新建的风度中学。张夫人在张发奎将军铜像前伫步凝视，十分感动

张发奎听说学校建成，非常高兴，把信转给夫人看，说：“我把校名来叫竹溪小学，只是对父亲他老人家的一个纪念而已，没想到容易让人误解，看来是有些不妥。”

刘景容看完信，说：“既然如此，那就顺从众意，叫风度小学吧。”

“夫人高见，就叫风度小学。”张发奎拍案叫好。

刘景容打趣说：“风度小学，大方气派，也显现出张长官的风度啊。我还有个想法，今年春节，我们干脆回乡过年，看看我们的新学校，看看还有什么困难？”

张发奎模仿粤剧，轻轻一揖：“遵命，夫人，小生自去安排。”





第十三章　喋血淞沪，中日大会战

一、抢筑工事，大战来临

远方传来琴声，那声音似从遥远的天际缓缓传来，在昏暗的夜色中低荡回旋不已。回过神时，张发奎循声望去，见十丈外一座小亭上，一青衣人正在凝神抚琴。

琴声低迷若梦，梦不完的江南旧事；幽幽如诉，诉不尽的恩怨情仇。在寂静的月色中，落花纷飞，织成一种梦一般的氛围。这琴声，在幽静中似伴随着轻风流水、竹声花影，有着几许难以形容的孤洁与寂寥。张发奎不大懂音乐，却被这琴声吸引住了。从小，他就在古诗中认识江南，在他眼里，江南应是小桥流水，十里荷花，应是秦淮风月，江月如花。这里应是和平安乐的世界。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陈诚爱才、用才是有名的。他的用人原则是不论派系、不分籍贯，只要能打仗，有才能，都可任用。陈诚见张发奎一心想抗日，对“剿共”之事并不热心，便保举张发奎去杭州，主持国防工事建设，蒋介石有点怕张发奎拥兵造反，稍有迟疑。陈诚向蒋介石保证，如果怕张发奎将军队拉走，“就让他指挥我的十八军好了”。蒋介石只好同意张发奎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陈诚也就让罗卓英带十八军，驻防浙赣边界，归张发奎指挥。

张发奎看来，这构筑国防工事，是中国整个对日作战计划中主要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它对日后的抗战至关重要，总比要他打内战强，便接受了。张发奎对陈诚知遇之恩非常感激，以后谈起陈诚来，总是带着尊重的口吻，口口声声称“辞修将军”，而称蒋则直呼“蒋介石”。







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发奎将军

淞沪地区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长江门户，其中上海市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金融贸易港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能使中国“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屈膝投降。因此，日本参谋部在准备入侵华北的同时，制订了华东地区的作战计划。

苏浙边区主任的驻地在浙江省嘉兴县，主要任务为构筑苏、浙边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镇之线的国防工事，以杭州湾及太湖为左右两翼依托，并与左翼之苏州（吴县）福山国防工事相联系。这是对日抗战前国防设施计划之一部分，也是为未来淞沪作战而准备的。张发奎预感中日之战随时都可能会全面爆发，一上任就不辞劳苦地制定缜密计划，经常分赴现场监督施工，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催促工期。此刻，他刚离开工地，回到寓所准备休息，忽然听到这一段平和的琴声，让其联想翩翩。

这是1937年7月7日深夜，是应该记入历史的日子。这一夜，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日寇侵略的枪声，掀起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巨祸，江南的平静也就此被打破。张发奎更是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有可能进犯上海，命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及张发奎所部秘密向吴县、常熟、无锡一带集结，以应付突发事件。7月21日，张发奎接到紧急命令后，星夜赶回嘉兴，迅速作出部署，要求国防工事必须在月底完成。于是，各县民工冒盛暑应征，日夜赶建。张发奎欣喜地看到，在广大民众热情支持下，国防工事得以提前完工。

战争如夏雨，说来就来。

8月9日下午5时30分，日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士兵齐藤要藏武装驾车，无缘无故硬要闯进虹桥机场。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员拒绝其无理要求，大山勇夫竟拔出手枪，打死保安队员时景哲。周围保安队员开火还击，两名侵略者顷刻毙命。上海市长俞鸿钧紧急与日方领事再三交涉，但日军早已处心积虑，必欲一战。8月11日，大批日舰开至上海，蒋介石下令集结京沪线各部队向上海推进。张发奎接到命令后，利用夜幕掩护，把辖下的部队秘密推进到上海附近，计划先发制人，采取攻势，首先歼灭上海驻留的日军，使敌人海上增援的部队没有登陆的立足点。

在长期军事实践中，张发奎一直主张，只有攻击才能保证行动自由而立于主动的地位，而奇袭乃战术上最卓越的行动。胜利之冠，也只有辉耀在攻击者的头上。所以他始终反对消极作战的手段，在北伐中他率领的第四军就是以善打攻击战而著称。这次，张发奎把辖区原属他指挥的两个师秘密向上海附近推进，以李松山的第五十五师进出浦东及右侧的沿海地带，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进出于上海龙华附近，他自己带直属部队在南桥设立指挥所。

大战来临，张发奎非常兴奋，憧憬着辉煌战果的来临，他觉得这个任务十分艰巨，但当国家民族危难之时，捍卫国家，乃军人应尽之天职，怯懦推诿，绝不是一个忠勇的军人。他决心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竭尽一己之智慧与能力来克服一切困难。

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紧张地静候着战鼓的擂动。

二、会战开始，“神炮”显威

8月13日，烈日将毒火挥洒江南大地，淞沪会战正式拉开序幕。国民政府命令沪杭甬沿线各县市戒严。张发奎任松（江）、嘉（兴、善）戒严司令。

随着战争的扩大，南京最高统帅部下达了淞沪方面军队的战斗序列：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九集团军，张治中担任左翼军总司令兼集团军总司令，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张发奎担任右翼军总司令，并以李松山、阮肇昌、刘尚志各师及张銮基的独立旅编为第八集团军，该集团军总司令一职也由张发奎兼任，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汇山码头；同时刘建绪之第十集团军也归入右翼军之序列。

张发奎立即命令张銮基旅推进浦东接替李松山师的防备，李师移动到上海方面，策应左翼军之作战，并以刘尚志师推进至松江附近，作为集团军总预备队，刘建绪部则由衢州向杭州推进，作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团。

中日首先进行空、海大会战，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前后持续4个多月。而在陆地上，主战场在左翼方面。张治中指挥左翼军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攻击，因没有摧破坚固工事的兵器，始终未能攻破敌人的整个防线。





张发奎的右翼方面，因为南市隔着租界，暂作缓冲地带，在浦东也因受黄浦江的阻挡，敌我均没有把它作为主战场，战况较为沉寂。张发奎见左翼吃紧，便积极支援左翼友军的作战，除派出第五十七师增援外，还运用炮兵奇袭，袭击敌之左侧，由此传出了张发奎的“神炮”之说。



原来，由于第九集团军攻坚乏术进攻受阻，蒋介石痛下决心，命令以“中国第一炮”著称的王牌炮兵部队——南京独立炮兵4个旅全部开往上海战区，以强大炮火压制敌人，摧毁敌重要目标和打击敌人水面舰艇，支援步兵进攻。其中，炮兵第二旅（欠第三团）归张发奎直接指挥。炮兵旅装备有从德国进口的“福卜斯”75毫米口径山炮，最大射程9千米，最高射速为每分钟25发，是当时中国陆军中口径最大最先进的优良炮种。由于该炮在国内战场上曾屡建奇功，令几乎所有地方军阀闻风丧胆。

山炮在手，张发奎亲自指挥。

8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大约11时，山炮第一次亮相显威。

当时上海地区阴云低布，雷声隆隆，大雨如注。张发奎令炮二旅6门火

炮借着恶劣天气掩护悄悄运动到江岸预设阵地。他指着雨雾弥漫的江面，对炮兵说："前方约7千米处的黄浦江面上停泊着3艘敌人驱逐舰，如果能够一举击沉或重创一艘乃至多艘敌舰，敌舰队势必不敢轻易进入黄浦江，这样就可大大削弱敌人炮火力量，有力支援市区我步兵的进攻。"

炮兵营长敬礼报告："报告总司令，战斗准备完毕，请指示。"

张发奎说："好，给我狠狠地打！"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各炮急速射击后转移。

观察哨兴奋地报告，炮弹几乎全部命中黄浦江上的敌舰，炮兵们全都大声欢呼起来，连一向稳重的张发奎也露出笑脸，以为敌舰必被击沉无疑。但是当天下午侦察飞机报告，敌舰仅受轻伤，经抢修后依然在江面游弋，原来"福卜斯"陆战炮弹的威力太小，无法穿透大中型军舰的装甲钢板。

一连几天，敌舰都朝岸上开炮报复，日本舰载飞机也成群结队轰炸浦东一切可疑目标，企图消灭中国炮群。张发奎便调整作战计划，把炮兵改为分散游击敌人目标。

浦西跑马场原为娱乐场所，日军攻占这里后就把赛马跑道改建为飞机跑道，供那些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短程舰载飞机临时起降加油装弹，对中国军队威胁极大。张发奎命令炮兵予以摧毁。指挥官们经过周密侦察和观测，决定出其不意夜袭跑马场。

炮兵位置选择在江对岸一幢大楼背后。紧挨英租界，距江边约300米，是敌人舰炮射击的火力死角。当晚10时许，6门"福卜斯"火炮隐蔽进入阵地，每炮配备炮弹100发，瞬发信管和碰炸信管各半。步兵事先封锁了炮位路口，炮兵随时进入战斗状态。

次日晨5时，跑马场上空升起3颗绿色信号弹，这是敌机将要降落的信号，跑道上顿时灯火通明。潜伏的炮兵观测镜看见许多敌人围着弹药库忙碌，几辆亮着大灯的加油车开进开出。等候一整夜的中国炮兵顿时个个精神焕发，大炮昂起黑洞洞的炮口，装填手光着膀子，炮弹引信全部装好待发。

大约一刻钟以后，20多架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本舰载飞机隆隆地从西边天际飞来，然后一架接一架在跑道上滑行着陆。当最后一架敌机刚刚降落，跑道灯光尚未熄灭时，从指挥部传来"各炮试射一发"的短促命令。

第一发试射的炮弹带着沉闷的轰响脱离炮膛，呼啸着飞向敌人机场，江对岸夜空里猛然腾起一团耀眼的火光。潜伏观察哨通过无线电报告偏离目标，经过修正，第二发炮弹击中敌人一辆油车，跑马场上空立刻被一团巨大

的火球映得通红。炮兵营长一挥手下令齐射，于是6门大炮一齐怒吼，浦东大地仿佛发生地震，一时间天摇地动炮声隆隆。英租界的人们都被这阵突如其来的炮声惊醒，附近房屋的玻璃都被震得粉碎。

可以肯定，这是一次成功的袭击，因为指挥官从望远镜里看见一架敌机试图起飞逃跑，但是一发炮弹追上并径直击中了它，于是飞机好像脆弱的玻璃瓶一样四分五裂爆炸开来，燃烧的金属碎片好像木屑一样飞溅到半空中。仅仅几秒钟后，敌入弹药库又被击中发生爆炸，浦西上空便如同绽开焰火一样五彩缤纷热闹非凡。

炮击持续8分钟，共有600余发炮弹倾泻在敌人机场里，敌人乱作一团，机场大火冲天。袭击完毕，各炮迅速撤离阵地转移到安全地带。

天亮之后，大批敌机飞临浦东上空轰炸报复，敌人军舰也向浦东盲目开炮，中国炮兵由于来去神速隐蔽，无一人一炮损失。事后得知，夜袭跑马场共击伤击毁敌机15架，敌人指挥系统完全被摧毁，跑道严重破坏，致使日军这个临时机场瘫痪达半个多月无法使用。

炮兵因此受到集团军和战区总司令的通令嘉奖。

随后，炮兵又成功地打击了敌人的“出云旗舰”，轰击了虹口的日军司令部，其炮火之威之准给敌军以重磅打击，使敌人遭受了重大的威胁和伤亡。由此，张发奎的炮兵被敌人誉为“神炮”。日军恨之入骨，运用各种侦察手段，企图毁灭该炮兵。

这天早上，张发奎翻开晨报，发现战地新闻版上，赫然登出上海几名新闻记者到竹林隐蔽的炮兵阵地里，采访“神炮”的消息，旁边还有一张炮兵营长与记者合影的照片。他把报纸一拍，大声骂道：“这不是泄露军事秘密吗？日本人看到，我的‘神炮’连渣都没有。”急忙抓起电话，命令炮兵营迅速变换阵地。

果不出他所料，当天中午，一队敌机把所有洋泾附近的竹林全部炸毁，其附近的居民也遭受了鱼池之殃，损失不少，所幸“神炮”因及时变换阵地，安然无恙。

事后，炮兵营长被撤了职，报馆受了查究，记者也被扣办。张发奎认为，此事的发生，给新闻报道一个很好的教训，而一个指挥官对于细末小节也应时刻留意，不能疏忽。

张发奎抗日爱国行动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同年10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刊登了著名记者夏衍采访张发奎专稿，并附有田汉对张发奎的赞

诗："把酒持螯咤战云，一时饮者尽输君。浦江两岸波涛壮，始信人间有铁军。"

郭沫若在浦东一次军民联欢大会上也说："我们的总司令是铁将军，在铁将军领导下的军队是铁军。我相信在铁将军领导下的民众一定是铁民。铁军和铁民团结起来成为一种铁的力量。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被打倒的。"

由此，张发奎与一批知名文化人建立了深厚友谊。此是后话。

三、主动撤退，建议遭否

战斗激烈之际，蒋介石莅临松江车站，召集前线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商讨淞沪会战之战略问题。宋子文、陈诚、白崇禧、孙元良和张发奎等均出席，宋美龄也由上海前来参加。

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方主张我军在淞沪地区采用持久战，以逐次抵抗消耗敌人兵力而保存国军实力，以利以后之长期作战，当时支持这一主张者颇多，张发奎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宋美龄认为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对这意见，亦有人赞成。蒋介石最后采纳了后一意见，尽力确保上海。

8 月 20 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实行全国总动员，政府转入战时体制，以大本营取代军委会。大本营最高首脑为陆海空大元帅，由他本人亲自担任。全国划为 5 个战区，其中上海、苏南、浙江为第三战区，由素以能打硬仗著称的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为战区总司令。转瞬之间，浙沪战场一下子扩大为战区，京沪、沪杭两铁路日夜不间断地奔驰，一师一师的部队逐次加入填补防线，中方兵力迅速到 30 万人。日军也迅速从日本本土调集兵力。

第三战区鉴于敌有以主力在吴淞、川沙登陆之企图，作战区域扩大，决定将长江南岸守备区编为第十五集团军，陈诚任总司令。

浦东第八集团军司令部。张发奎关注着战争的最新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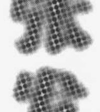
作战参谋向他报告："8 月 23 日，我淞沪围攻部队再次对敌发起总攻，并将攻击重点由虹口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改为汇山码头。经一夜激战，我三十六师突破日军阵地进抵百老汇路，一度进至汇山码头。但遭到敌海军炮火阻击，又因进展过快，对巷战地区搜索不严，以致敌便衣队与汉奸乘机纵火骚扰，攻击部队前后隔绝，失去指挥，形成混乱，官兵死伤达 2000 之众，

只得奉命撤回唐山路原守阵地。这使中方原来预期以攻势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顿挫，被迫变为一种纯粹的防御阵地战。”

张发奎听后眉头紧锁。

“更为严重的是，23日拂晓，日军第十一师团各部分别在川沙口、狮子林、芜湖等处强行登陆，占据吴淞炮台，主力向狮子林前进。24日，我第十五集团军各部先后到沪，陈诚总司令决定向登陆之敌发起进攻，将其压向江边予以消灭。敌我双方经激战，伤亡惨重，互相不得向前，只好对峙于罗店以北。”

张发奎听到日军成功登陆的消息，心里异常震动，他打断作战参谋的话说：“暂时别汇报，通知师以上官长，到司令部开会，分析敌情，研究对策。”






当夜，司令部里灯火通明，幕僚们开了半宿的会议，最后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我军必须主动在后方设立防线。也就是说，我军一口吞掉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已经不可能实现，为避免胶着和被动不利，必须主动放弃上海，然后在江南广大水网地带寻机作战。

张发奎沉默不语。

事实上，张发奎早已从日军登陆的讯号中敏感地看出战争走势的某种不祥端倪，认为必须向统帅部汇报，以避免在不利态势下与敌人主力决战。但是他又拿不准，建议撤退会不会被南京方面看作“抗战不力”，甚至给那些从来不干好事的政客们以可乘之机，日后落下一个话柄甚至罪名呢？

他想到第三战区总司令冯玉祥长官。

不料电话刚一挂通，冯玉祥的大嗓门就传过来；“向华老弟，日本人登陆了，你要给我好好地打啊，我要去北方战场，这边由委员长亲自指挥。”

张发奎觉得不妙：“这么说，上海方面决不打算放弃？”

“老弟是什么话？淞沪之战世人瞩目，委员长好容易下了决心，要给国人抗战做个榜样，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

“冯长官，你认为淞沪战事前景如何？”张发奎疑惑地问道。

“我看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攻势已经达到极限，别看那些飞机军舰热闹，其实没有多大能耐，最后解决问题还得靠步兵嘛！想当年，我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不是用大刀打败过小鬼子的飞机大炮吗？”

冯玉祥的盲目乐观愈发使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感到绝望。张发奎率直地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这段时间的战况分析，我认为，敌方新装备和战术技

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炮的盛炽火力，已在战场上获得优势主动的地位。而我军则在战壕里，而且只有临时构筑之野战工事，以劣势之装备，凭着血肉之躯与敌搏斗，其牺牲之大，是可以想像的。面对这危急情况，倘我军以大量的兵力投入该方面的决战防御，仍无胜算把握时，则我们的纯粹的防御计划，应否加以修正？实有考虑之必要。目前已经过了两旬的激烈战斗，欲将敌人歼灭或遏止其攻势，在我军之现有条件之下，恐难以达成。”

“向华老弟，你这人怎么变得畏首畏尾的？……我说过，敌人攻势已至极点了嘛！向你透露一个消息，老蒋正在召见他的得意门生陈诚，张文白作战不力，南京这边有很多议论……大敌当前，我堂堂中华军人当奋勇杀敌，焉能轻言后退呢？”冯玉祥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

受到申斥的张发奎呆立半晌，明白这场表面我占优势实际上敌我实力悬殊的战争不能不继续打下去的事实，不禁叹了一口气，然后振作精神重新部署兵力，对黄浦江以西增援日军发动牵制性进攻。

然而，张发奎还是不死心，打电话和张治中取得联系，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张治中被他说服了，同意具名向蒋委员长报告。然而，蒋介石否定了这个建议。其意见以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守卫这个地区。

蒋介石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当时日军从本土来的后续部队尚未全都到达，战况较为沉寂，因而不少将领包括冯玉祥等都为此而受眩惑，满以为敌人攻势顿挫。

转眼到了9月初，早上起来已有些凉意。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2个师团陷于苦战之中，伤亡达4000余人，进展十分缓慢。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为此向陆军大臣提出，由于2个陆军师团和海军陆战队久战之后仍不能击破中国军队的抵抗，因此要求“根据上海的敌情及地形，要给南京以大的打击，最小限度也需要5个师团”。于是，经天皇批准，日军参谋本部发布命令，从国内抽调兵力增援。

9月13日，日军重藤支队，第一〇一师团、第九师团先后到达上海。至9月中旬，日军在上海兵力已达5个师团，兵力10万以上，炮300余门，战车200余辆，飞机200余架。敌人在淞沪与我决战之企图，益加明显了。

张发奎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痛苦。

四、大场失守，金山登陆

中国军队于9月21日调整部署，第三战区分为右、中、左3个作战军。右翼作战军司令官张发奎，辖第八、第十集团军；中央作战军司令官朱绍良，辖第九集团军及第十八、六十一师，独立第二十二旅；左翼作战军司令官陈诚，辖第十五集团军及新编成的薛岳第十九集团军。

10月1日，日本首、外、陆、海四相会议决定扩大侵华战争，制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认为，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罗店西南战事呈胶着状态，从侧翼包围中国军队的企图无法落实，决定改为中央突破。计划于攻陷大场后进入苏州河一线，消灭上海以北之华军，然后向南翔进攻。

大场争夺战由此展开。

张发奎的右翼仍然不是主战场，他把其注意力仍集中到左翼的大场。

10月5日起，日军第九师团和新到达之第十三师团向蕴藻浜地区发动猛攻，8日，敌强渡蕴藻浜，我军与敌激战数日，损失惨重，未能将渡河之敌歼灭，以致日军构成宽约2里之桥头堡阵地，掩护其后续部队南渡，并进犯大场。由于大场形势关系全局，第三战区急令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向该方向增援。然而，第二十一集团军当面为日军主力，虽付出重大代价仍未获进展，左翼第十五集团军也未得手。21日，全线停止进攻，转为防御。

应该说，此段战斗，中国军队冲杀勇猛，每小时伤亡数以千计，其壮烈程度，为中国有史以来御外侮之罕见。中国军队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旅团长伤亡也达半数，部队不停补充，各主力师的补充数至少都在4次以上，每次都几乎是整团的兵力补充。

张发奎知道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主动与左、中路的陈诚、朱绍良两总司令联络，通过细察战斗状况，决定后撤，报蒋介石，蒋介石不允。三总司令报请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再报蒋介石，要求后撤。蒋介石又不允，严令死战："有敢擅自撤退者，军法从事。"

张发奎与陈诚、朱绍良不敢违逆，挥师又战。

10月25日，大场失守。

这一天，天空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上海深秋的夜风寒冷萧瑟，公路上行色匆匆的军队和难民大都默不做声地向西撤退。来自东方的隆隆炮声一阵

紧似一阵，战事已经逼近上海南郊的南翔镇。张发奎独自走出院子外，任雨点在其头上飘洒，他想让这清凉的秋风整理一下那有些混乱的头绪。

整个10月期间的主要作战，敌我均保持在左翼军方面。战地悲惨的景况，一幕一幕地呈现在他的眼前。中方增援部队源源不断由后方输送到达战地，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填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如雨点一样散布在我方阵地上，我劣势之炮兵，且因制空权掌握在敌方，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英勇之战士们用血肉筑成长城来抵抗敌之优势火力。

敌机一天到晚飞翔在我阵地上空投弹，没有立体作战经验的部队，又未讲求疏散与伪装，招致许多无谓的伤亡。我军行动以及军事部署，白昼均受限制，在夜晚实施，时间、精神方面都蒙受莫大的影响。同时长江三角洲的战地一片平野，其不能徒涉之河流，纵横交错，通讯联络倍感困难。各级指挥官对指挥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这时候各级干部士兵才认识到现代战争中科学的地位重要。

由于中央作战军正面缩小，第三战区决定将其撤销。战区正面分左右两路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张发奎指挥。中路军指挥朱绍良被调任甘肃省主席，所遗中央地区指挥任务，最高统帅部命令张发奎接任，将原来右翼方面指挥责任交由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接任。

战场上临时换将，实为兵家大忌。其时刘建绪集团的部队，正从杭州向前方推进。张发奎一面担心右翼沿海地带的侧背和刘建绪的部队能否实现接防，一面感于上海方面的战况，竭力考虑将如何去挽救这危殆的局面。此刻，心灵的焦虑，是他生命史上最难忘的记忆。

右翼方面，敌军虽多次企图排除中国军队在浦东对其侧背之威胁，但在张发奎严密的戒备下，敌人几十次登陆行动都无法得逞。不过，他也常顾虑，敌人如果在左翼军正面突破的企图不能达成时，可能会来个侧面迂回行动，因此右侧背一个叫金山卫的海滩最值得注意和警惕。

回忆历史上戚继光在闽浙荡寇时代，曾有日寇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我浙境记载，如果敌人以历史为师，则从金山卫方面附近登陆可能性甚大，况且，金山卫有40米以上的水深，具有利于部队登陆的沙滩可作为滩头阵地据点，确为一个理想登陆地点。

张发奎亲到金山卫实地考察，在该地配置了一营步兵和一连炮兵，构筑强固工事，并令他们编组了一队渔船，远出海面从事正面的搜索，保持海面与陆上部队之联络。

11月5日，一件数月来日夜焦虑的事不幸言中了。敌人以其第六、第八两个师团在金山卫、全公亭等地同时强行登陆，中方薄弱的守军未几即被击破。而刘建绪的部队行动迟缓，未能适时对敌人夹击，让敌长驱直向松江前进。张发奎忙要通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中将的电话，他向吴军长通报了日军大约两个师团今晨在金山卫实施大规模登陆的坏消息。

吴克仁曾留学日本研习炮科，为当时中国军队里为数不多的炮兵专家之一。第六十七军为原东北军四大主力之一，曾有过热河抗战的光荣经历。抗战爆发，第六十七军原驻守在华北，与侵华日军主力恶战于冀中平原的沧州、献县一线。后因上海战场吃紧，该军才奉命驰援，10月底刚刚抵达，担任张发奎右翼集团军总预备队。

“吴军长，南京统帅部已经给乍浦守备师下达死命令，务必阻滞登陆之敌，不得后退一步。另有两个师又一个旅正由苏嘉铁路紧急驰援。你部的任务是：连夜从驻地出发，限明日天黑以前进入松江、金山一线阻击阵地，不许敌人越过黄浦江北岸一步……此役关系重大啊！”张发奎谆谆叮嘱一番。






吴军长站在地图跟前反复琢磨一阵，觉得肩上这副担子重如泰山。现在他面临的成败关键在于，能不能抢在敌人之前占领黄浦江北岸，否则上海70万大军的处境将更加困难被动。

“张长官，我部情况你是清楚的，”他直截了当地同总司令讲条件，“我部在北方战场消耗过大，未及补整，恐难独力抗击登陆之敌……我需要集团军予以增援。另外请长官部马上派出汽车，十万火急输送我部，万无延误。”

“吴军长，你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张发奎听吴军长一说，叫苦不迭，“陈长官一来，就把右翼军主力都调到中路打反击，我这里长官部其实只是空架子。”

“张长官，金山卫防御战事关大局，如果我这里失利，恐怕长官部也没法向南京交代。”吴克仁坚定地说。

张发奎沉默了一会儿：“我派汽车营听你指挥，另有一个预备师在你的东面担任掩护。”

11月6日中午，第六十七军一〇八师提前抵达松江县黄浦江北岸布防，做好战斗准备。7日上午8时，第一〇七师步入金山县城，在未作防御的情况下继续向南急进，试图对登陆之敌发起出其不意的进攻。但是中国援军的动作不幸被敌人侦察飞机发现。

日军立即对孤军深入的吴克仁一〇七师实施包围。一〇七师仓促应战，

又遭敌各个击破，伤亡惨重，只好弃守金山县城。

直到此时，张发奎在指挥部方查明，登陆之敌不是2个师团，而是整整3个半主力师团约10万人！而吴克仁的六十七军只有1万7千人，其结果可想而知。但英勇的吴克仁硬是指挥部队与敌人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以身殉国，年仅43岁。

噩耗传来，张发奎悲痛不已。他掏出左轮，向空中连射数发子弹，表达对烈士的深切哀悼。

五、"乌龙" 命令，匆促撤退

9日，松江沦陷。至此，沪杭铁路已被切断，而北面日军也突破中国军队苏州河防线，淞沪地区中国军队陷于腹背受敌，退路将被切断的危险境地。张发奎心急如焚，他对来访的陈诚说："……从整个淞沪会战的战略上来看，自敌人强渡苏州河后，权衡当时的双方战况，我军适时退却，是不可迟疑的事。如不当机立断，后果不堪设想。"

陈诚说："我也有同感。但最高统帅部至今仍犹豫未决，我看咱们还是联名向副总长白崇禧报告，让他再向蒋委员长转告如何？"

张发奎点点头："只好如此了。"

其实早在11月5日，白崇禧就火急建议蒋介石下令有计划地撤退，蒋介石不允。他希望打到11月13日，这个时间是沪战整3个月的时间，他心中固执地有"3个月"这个时间概念。白崇禧无奈。前线官兵又战，日军前后攻击，又打了3天。白崇禧身处前线，亲见双方优劣已现，接到陈诚、张发奎的告急电后，感觉到中国官兵疲惫不堪已到极点，于是再度进言蒋介石下令撤退，蒋介石仍不允。

白崇禧认定蒋介石是意气用事，敢怒不敢言，又传令苦战。此时部队战线已乱，已到了最后关头，于是不顾一切三次进言下令撤退。蒋介石仍是不允！

白崇禧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军队，委员长再不下令撤退，就要完全崩溃了！"蒋介石无奈，只好下达撤退命令。但最好的撤退时机已错过。

11月9日夜，一个黯淡而悲惨的黑夜，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星光，没有月亮，紧密的枪声渐渐向司令部接近，后方人员呈露出匆忙的神色，附近的居民扶老携幼向西北方向逃避，人声像闹市一样的鼎沸，天空虽时有敌机轧

轧的声音，但禁止不了四周照耀黑夜逃亡的火光。这一切充分显露出极度的慌乱的情况，张发奎怀着万分焦虑的心情，注视着事态的变化。他放下手中的作战图，缓缓踱出司令部大门，想到门外透透风。

这时，一件让张发奎吃惊的事件发生了。

他发现，司令部门口的大路上，有一支前线部队大踏步向后撤退，他连忙叫参谋找来这支部队的指挥官，竟是他的部下俞济时。

俞济时当时直属第九集团军胡宗南指挥，而胡宗南则属张发奎指挥的。张发奎生气地问俞济时："俞军长，你准备带部队到哪里去？"

俞济时一听，觉得奇怪，反问："我部已奉命撤退，难道张总司令不知道吗？"

张发奎更为吃惊："我身任淞沪会战之中央军地区指挥官，怎么没接到撤退的命令，你们前线部队竟然先奉命撤退，这不是乱了套吗？"

俞济时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是直接接到胡宗南总司令的手谕才撤退的呀。没有他的命令，谁敢撤退？"

张发奎觉得这一定是下达命令的程序出了问题，只好让俞济时先走，自己马上派人与胡宗南取得联系。

不久，胡宗南派人快马加鞭转来了最高司令部给张发奎的书面撤退命令。

张发奎这才知道，南京最高统帅部对淞沪会战后失败之退却命令，是于11月8日未按正常指挥系统下达的，这命令并没有直接下达给他，而是由胡宗南转交，胡宗南先拆阅了命令，所以在张发奎还没看到撤退的命令前，他辖下的部队已先知道上级要撤退的意图，所以不再等他的指示，就开始撤退，出现了如此"乌龙"事件。

张发奎深深叹了口气，显然这是一种计划不周全而又不适当的退却。退却在战术上不是一个绝对失败的名词，在战史中许多战例，有计划的战略退却，仍可转败为胜。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官，对于战略与战术的能否巧妙运用而已。但现在南京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之错误，使他的总司令部处于十分被动和混乱的局面。尤令他不解的是，退却命令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之线，距离阵地仅约50公里，怎可作为百万大军之退却目标？

此时此景，说也没用，张发奎只好亡羊补牢，下达了3个集团军的退却命令，而他命令中的各种规定，恐怕已没有办法实施，因为各部队早于其命令下达之前而自动退却了。

部队在青浦、白鹤港无法立足，继续向吴福线退却，一时间狼狈不堪，伤亡极大。后来张发奎回忆起当时悲惨情景，仍心有余悸。

因通讯联络不当和不够灵敏等原因，造成这样的撤退“乌龙”事件，确实对淞沪会战造成了严重后果，何应钦在其所著《八年抗战之经过》一书中亦有所记述：

> 十一月九日晨，我淞沪之中央兵团，开始向青浦、白鹤港之线转移阵地，因当时之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准备未周，撤退秩序较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又于十一日不守。于是左翼兵团不得不与中央兵团同时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线撤退。当时以受敌机之威胁，掌握困难，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混乱，故吴福线又告不守，而向锡澄线转进。十一月二十四日敌逼至无锡附近。二十五日该处又被陷，二十六日我京沪各军为将来作战有利，乃以一部沿京沪线向杭州，主力向浙皖赣边境退却，江阴要塞由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一日与敌激战五日之久，亦因援绝被陷。该处守军突围向镇江方面转进。

松江沦入敌手后，张发奎虽奉令被解除中央军地区总司令的职务，恢复右翼军的指挥任务，但已不能从沪杭线归队，因须绕道，不能及时到达，他只有电令第十集团军迅速占领乍浦、嘉善之线既设阵地堵截敌人。

乍浦、嘉善的国防工事阵地，原是张发奎亲自监督完成的，这一带地形，他特别熟悉，希望在此线以最大的努力来迟滞敌人由沪杭线南下，便决心亲赴嘉善督师。幕僚们为张发奎个人的安全考虑，加以劝阻，他未予采纳，并于13日冒险赶到了嘉善。

但又一个“乌龙”的事出现了。

当张发奎在弹雨之下视察阵地时，他才得知保存国防工事图纸的人员与掌握掩体钥匙的乡保甲长全都逃跑了，部队打不开门。张发奎气得破口大骂。

本来，淞沪会战转入守势时，他曾和张治中向南京建议，若凭借和利用这些国防工事对日作战，至少可维持3个月。但最高统帅部并不重视，未予采纳，且对这些国防工事，缺乏严格管理，也未派部队来防守，竟把如此重要的国防工事交地方管理，掌管钥匙的保长们一听说打仗早已逃之夭夭。致

使造成现在的恶果，第一线部队退却到达该国防工事时，因找不到钥匙而无法开启坚固的铁门，难以进入阵地拒敌。这么辛辛苦苦建成的良好阵地，一点也未能发挥价值，这不仅影响太湖两侧地区的守卫，而且直接影响到首都南京的安全。怎么不让人感到惋惜？

此时此刻，仅有一师装备极差的兵力，在暴露的土堆上构筑临时野战掩体，准备在30公里的战线上，与拥有优势装备的日军第十六师团和近卫旅团之一部正面抗衡，结果可想而知。在这寡不敌众的状况下，乍平嘉国防线完全被日军轻易突破。守军被迫退向南浔、青镇、长安、海宁一线。

12月初，日军主力由朗溪北上进攻南京。12月12日南京沦陷，淞沪会战至此结束。



长达3个月的淞沪会战，破坏了日本侵略军的“速战速决”战略，中国军队英勇奋战，日军不得不增兵至30万，其中4万余人被歼灭。此次会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沿海工业内迁、保存经济实力赢得了时间。但这次战役，中国政府军事当局在战略指导上犯有错误，将70万大军集中于上海周围这一地势平坦、河网交错的狭小地区，使日军之长得以发



抗日战争时期张发奎将军（中）与薛岳（左）梁华盛（右）合影

挥。3个月时间，我军将士阵亡达12万余人，其中少将以上军衔者阵亡10余人。

对于淞沪战役，张发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 在远东的战史中，是日俄战争后最大的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最大的屠杀，作战时间将近三个月之久，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一切当代的兵器，都已搬上战场。我们在此役中虽然损失了巨量的兵员，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其稍堪告慰的，我们则由此而认识了现代战争的特质，获得了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增进了不少的各种战斗技能，同时惊醒国人救亡图存的观念，再接再厉，产生新、厚的丰硕力量，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去争取最后胜利。

南京失败后，中国军队在长江下游有体系的抗战已受挫折，转进中的疲惫兵团，只得进入皖北、皖南山区，一面整补，一面从事游击战与敌人周旋到底。

第十四章　九江之败，变相遭撤职







一、蒋下严令，死守九江

叽叽喳喳的噪音将张发奎从昏睡中闹醒。

昨夜破碎的记忆拼凑成鲜明的画面——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之夜，飞机起火了，巨大的气浪将他弹离，自己绝望地祈祷。他慢慢睁开眼睛：天很蓝，还有云彩。阳光有些耀眼，不过还能适应，而把他吵醒的声音，正是在九江码头起航的"突突突"的火轮和士兵在建筑战地工事的喊叫声。自从淞沪战役兵败之后，他整天处在战争的紧张和亢奋中，没睡一天好觉，眼睛常熬得通红，脸也消瘦了许多。

国民政府此时已迁到武汉，并以重庆为陪都，重新建立了作战的基础，在西南大后方整编生力军。最高统帅部于1938年春改组了适合于统辖全国军民作战的机构，把一切军政军令及外交内政诸职权，均由最高统帅部综合处理。这是一个新的战时国防措施，将全国划为一、二、三、四、五、八各战区，并于武汉设立卫戍总司令部。全国的总兵力共有210个步兵师，35个步兵旅，11个骑兵师，6个骑兵旅，10个炮兵团，8个炮兵营和其他特种部队。张发奎奉令在长沙恢复编组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机构，该集团军属于军委会直辖兵团，属下有5个步兵师，担任长江南岸鄂东一带的指挥职责。

5月，枇杷黄了的时候，日军把进攻的箭头指向武汉，并突破了安庆马当的江防要塞线，又于7月初进占了湖口，作为武汉门户的九江形势顿显紧张。

还在6月中旬，国民党最高统帅部就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指出："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故欲确保武汉并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

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为上策……”根据当时的情况，应当说国民党统帅部的作战意见是正确的。它的主旨就是在武汉的外围远方抗击日军。

最高统帅部将武汉及其他外围，划为第九战区，分4个兵团，以鄱阳湖



1938年，张发奎将军（图右二）与叶挺（右一）、郭沫若（图中）、陈铭枢（左二）、黄琪翔（左一）在汉口的合影

西岸南昌的方面为第一兵团，薛岳为兵团总司令；以长江北岸广济、黄梅、英山、罗田一带为第四兵团，王缵绪为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则任第二兵团总司令，仍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二十五、第六十四、第八、第七十、第五十四、第二、第四、第六十各军，负有确保赣鄂门户，守九江以西至蕲春长江两岸各要点的任务。由于日军集中在华陆海军最大的力量，采取沿江推进、疾进直取的战略方针，企图迅速夺取武汉，控制长江天堑，横断中原，以遂其切断中国南北交通之目的。所以，张发奎部所防御的地带，既是御敌沿江西进的要冲，又是阻敌战略迂回的屏蔽。

历史名城九江，坐落在长江南岸，位于从安庆到武汉这段长江的向南弯曲处，正是武汉以东外围防线上的一个要点，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待多言。7月10日，张发奎迅速率部队直奔九江。

张发奎与普通士兵一样，在烈日下徒步行军，戴一顶花花绿绿的、能防雨、防晒、又能防空的小斗笠，身穿一套布军服，腰扎一条小皮带，为了防汉奸，都不佩领章符号，只在左臂上戴一块布质三角形的“毅”字臂章。卫士们离他远远的，老百姓怎么也猜不出他就是赫赫威名的张总司令！当时，

张发奎有一个随行的湖北籍厨子，工资由他私人支付。副官处说厨子穿得土里土气，要发给他士兵服。张发奎听到了，说："找麻烦！他本来就是老百姓嘛，军服是公家的，不行！"

7月15日一到九江，张发奎就召开了作战会议。他分析道："我们将要在长江纵贯两岸湖沼地带的特种地形上战斗。江河和湖沼，原对防御有利，攻者则较为困难，但日军拥有海空优势，反而化不利为有利：水道成为敌人运输的大动脉，给其兵员输送和后方交通补给提供便利；长江两岸，可以任由敌人自由选择登陆地点；敌人在空中占绝对优势，确保了其在水上行动的自由安全。相反，我军被江湖的地障限制了兵力的伸缩使用，而沿江湖沼必须四处配备兵力；防不胜防。此外，在交通、通讯方面，我方也大受拘束。"



张发奎看了大家一眼，继续道："与我们作战的对头是冈村宁次，他已从东北调来就任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指挥的第一仗就是进攻九江，肯定要格外地疯狂。因此，我认为，敌人的企图有两种可能：第一案：敌可能避开九江的正面，以主力向星子附近登陆，进犯南昌指向长沙与岳阳、蒲圻、咸宁，切断粤汉铁路，以大迂回的战略行动来包围武汉；第二案：敌可能于姑塘、九江同时登陆，溯江直上进逼武汉。前者在战略上的收效较大，但必须有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才能保持遥远的后方联络线；后者虽犯了直接正面攻击的不利，但使用兵力较少，与后方水道交通联络的安全和补给较为便利。因此，我军的部署，应以前后两案为基准，前者我们须置主力于右翼，以便随时策应第一兵团的作战；后者，我们必须采用直接而纵深的配备，而控置主力于九江南侧地区。"





在与众幕僚研讨之后，张发奎最后选定了第二案的作战计划，理由是，敌人握有海空军的优势，他可以用直接正面攻击的战术行动，来弥补其兵力上的不足。后来的作战，证明张发奎的判断是正确的。

根据第二案计划，张发奎把兵团部署分为3个区分，以王敬久的第二十五军作基干为右地区队，守备星子、姑塘沿鄱阳湖西岸的地带；以第二十九军团李汉魂指挥之第八军、第六十军和第十五师为中央地区队，守备姑塘迤北至九江沿江湖西岸的地带，这是部署的重点，也是我军企图决战的方面。另以第三集团军所部3个师和第二军及第五十四军作基干为左地区队，守备瑞昌及其迤西沿江的南岸地区，作纵深配备。

为能及时掌握战况，便于指挥作战，张发奎把兵团司令部推进到九江附近。同时，他考虑到敌人火力强大，而我军素质较低、装备劣势，部队的防

务交接尚未完成等因素，为避免早早被敌突破登陆成功，影响以后作战，布置第四军、第六十师、第七十军作为强大预备队分置于马回岭、瑞昌和妙智铺一带，以便支援第一线作战。

张发奎把上述方案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见报怒曰："张向华未战已有轻弃九江之念，此断然有悖全线防御计划。"当即否决了此案，并交代张发奎：九江必须死守，决不能让日军攻陷。

张发奎深感压力之大。作为一名战将，他非常清楚九江乃武汉门户，九江不守，全线影响极大。而且外界舆论众口一词：九江外围地形对守军有利，守住九江应无太大问题。外界舆论越这么说，他越觉得压力大，心里越有气。

老实说，张发奎对守住九江没什么把握，九江外围虽说江湖地障对防御者有利，但这只是对旧式战争而言。如今他手上既无炮舰，又无战机支援，江湖只能限制自己，而冈村的部队沿江湖可以随意登陆，他为此还得处处设防、分散兵力。外界舆论的乐观估计和自己使命的艰难使张发奎坐卧不安，战斗还未打响，他的心就有些发虚了。

就在九江之战的前两天，张发奎带着参谋长、苏联顾问等视察江防。只见江面封锁线上，漂晃着千百颗银色水雷，江岸上蛛网似的工事纵横，八二迫击炮与捷克式重机枪跃跃欲试……

二、波田支队，姑塘登陆

对张发奎的名字，冈村宁次并不陌生；对九江，他也是熟悉的。1926年秋，张发奎的北伐部队在九江、南昌一带与军阀孙传芳作战，冈村宁次当时正以军事顾问的身份呆在孙传芳的九江前线司令部里。那次，孙传芳让张发奎部队打得节节败退，冈村宁次见势不妙带着偷来的华中地区军用地形图，化装坐小木船登上日本军舰，才捡回了性命。这次会战，他要打的首仗，又碰上了张发奎，心想此人不可小瞧。

冈村宁次预定进攻九江的先头部队为波田支队，后续部队为第一〇六师团，进攻时间为7月23日。

波田支队的实力相当于日军的一个旅团，但支队长波田重一的军衔却比一般旅团长的少将衔高一级，是个中将。该支队的官兵多为台湾青年，适应

亚热带气候，日军大本营把它从台湾调来，旨在让它在酷热条件下进行武汉会战发挥作用。而该支队也没有辜负日军头目的希望，连连攻下了安庆、马当等要点，其强悍、拼死精神毫不亚于日本的本土官兵。甲午战争后，中国战败被迫将宝岛台湾割给日本，台湾成了日本的“领土”，台湾人成了天皇的“臣民”，许多台湾人在日本当局推行的“日本化”过程中还起了日本名字，侵华战争中的日本军队有不少台湾籍官兵。

7 月 22 日晚，长江及鄱阳湖水面上，天空阴沉昏暗，大雨欲临，强风劲刮，大浪滔天。九江城内第二兵团指挥部里，张发奎有些心神不宁。两周以来，江湖上的敌舰和汉奸的扫雷行动，与敌空军的频繁侦察，表明敌军随时会强行登陆，他有种预感，这样的天气，正是日军偷袭的大好时机。他吩咐作战参谋：“今天天气不好，通知九江各岸口，尤其姑塘守军预十一师加强戒备，决不能疏忽。”






23 日零时，半夜的风更大了，鄱阳湖面，狂风掠过，掀起阵阵巨浪。大风的呼啸声、湖水的拍打声，淹没了数十艘正向姑塘扑来的日军登陆艇的马达声。波田支队冒着瓢泼大雨，已经偷偷抵进到距姑塘登陆地千余米处。

就在中国守军发现这一意外敌情的那一刻，湖中鞋山小岛上日军炮火铺天盖地地向姑塘守军阵地飞来。团团火球映红了姑塘黑漆漆的夜空。

日登陆艇迅速向岸边冲来。我预十一师官兵竭力抵抗，击沉敌艇 10 余艘，激战 3 小时后，预十一师全线崩溃，波田支队登陆成功。

张发奎得到报告后，急令预十一师预备队向登陆之敌反击，同时马上命令第八军的第十五师和二十九集团军的一部分机动兵力增援，务必于拂晓前将登陆的波田支队赶下湖去。



天渐渐发亮，张发奎战前的忧虑这时成了现实摆在面前。日军几十架次的战机在天空盘旋，轰炸扫射,地面和水面上，鞋山岛日军炮阵地及长江上日军舰炮把成千上万的炮弹倾射向中国援军。这是一次真正的立体进攻战，增援的部队被压在通往姑塘坑坑洼洼的道路上，根本靠前不了。预十一师的预备队虽靠近滩头，但兵少力孤、装备又差，几次反击逆袭都被波田支队打了回来。尽管张发奎在九江城跳脚大骂，但增援部队就是上不去。国军之脆弱如斯，可慨也！

23 日激战一天，24 日，冈村宁次令第一〇六师团进入姑塘，协助波田支队，使占领姑塘的日军兵力更加充实。

25 日白天一整天，张发奎又调集了 4 个师的兵力向姑塘方向反击，但

血肉之躯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飞机、大炮，4 个师损失惨重，反击失败。

三、九江失守，遭受指责

武汉军委会，蒋介石急得在屋里团团转。眼下闻知九江方向姑塘吃紧，他不由为九江而担心，生怕张发奎自作主张，放弃第一线阵地。当下，他给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二兵团张发奎各去一电，再次明示：九江一线阵地必须固守。

还是在 25 日这一天，姑塘之急未解，九江又被日军突破。日第一〇六师团和波田支队趁挫败中国军队反击姑塘之胜势，立即会攻九江。攻击前，日轰炸机先对九江城防阵地狂轰滥炸，九江街市一片火海。驻守九江城内的李玉堂部顽强阻敌，但仍未挡住。日军蜂拥入城，敌我双方展开激烈巷战，遗尸累累。

张发奎这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拼着全部兵力孤注一掷与敌死战，要么退守第二线阵地逐次抵抗。

依他平日容易冲动的个性，可能不顾一切地采取第一案，但仔细想来，个人生死荣辱事小，部队如无价值牺牲，则影响甚大。作为一位将帅，他必须客观而理智地分析以全力投入战斗后胜败的得失和战斗失败后对整个大局的影响，绝不能以一己刚愎，冒险行事。按当时敌我态势分析，这时候如果投入全部兵力与敌人决战，其胜算甚低。纵能不顾一切牺牲稳定战局，初期获得了局部胜利，也难保证最后能取得胜利。况且敌之后续部队仍在源源不断登陆，而他手中可以及时增援的部队，只有第四军一个军。

或许，蒋介石从武汉会战的战略全局考虑，守住九江城是对的，但具体到九江一地的仗怎么打法，却不甚高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曾这样评价蒋介石：他在战略方面的指导才能，优于他对一个具体战役上的指挥、指导。可这位最高统帅的一贯作风，偏偏又总是爱插手下面的事，有时甚至要过问一个师的作战部署，实在太累，还总是适得其反。

张发奎与蒋介石打过多年交道，深知蒋介石的脾气，撤退还是固守死战？决心难下。他担心这时撤走，蒋委员长会怎么说？尤其他手下号称“铁军”的第四军还没使用，而这个军又与他从北伐战争时就有长久的历史关系，是他的起家老本。不撤吧，部队打光了，九江恐怕还是个丢。

思前想后，张发奎咬着牙，一拳砸向桌子：“撤他妈的，天大的事老子

顶着！”

基于淞沪会战的前车之鉴，张发奎毅然采取了第二案，下达变换阵地的决心，选用持久抵抗的战法，以预备队第四军附第一五五、一八七两个师占领狮子山、张家山、两台岭亘塞湖之线为第二抵抗线，并兼负掩护兵团主力转进的任务。

26日晚，大雨如注，一身疲惫的张发奎率第二兵团全线后撤，向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山等阵地行进。九江陷落，同时，长江对岸的江防要地小池口也被日军占领。

不管怎么说，张发奎打的这一仗是失败了。九江在3天内就被冈村宁次拿下，标志着日军冲开了武汉外围中国军队的一线防御。






姑塘失守、九江失守，武汉门户被日军撞开。初战受挫，蒋介石在军委会痛骂张发奎：“娘希匹，张向华紧要关头心存私心。他把第四军藏起来，为什么不用？为什么不用？”

一旁的陈诚等蒋介石火气消了一些，上前劝道：“委员长，张兵团放置四军不用，也许是见大局难挽，怕被日军缠住脱不开身。如今全军安然撤至第二阵地，结局也还说得过去。不如给他个机会，让他在金官桥一线阻滞敌人，挽回影响。”

蒋介石“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急走两步，立住身，余怒未消地喊着：“失去九江，不啻给强敌一个立足点。南浔之战，徒增十倍艰难。对此目无军法之将领，决不能再放在前线。”

蒋介石对两广将领本无好感，对手下有私心之嫌的人更不能容忍：“让他回来，回来。我要让他说个明白。”

出师不利，蒋介石盛怒难平，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7月31日，张发奎接到最高统帅部电令：“南浔方面的军事即日起由薛（岳）、吴（奇伟）两总司令负责主持，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可也。”同时，蒋介石又严令，必须固守牛头山、金官桥、十里岭、鸡公岭及亘城门湖之线，如有退却者，就地枪决！

接到电报，张发奎呆愣了足有几分钟。放弃兵权，他并不在意，薛岳、吴奇伟都是自己多年的老部下。只是南浔线大战刚刚开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被削了兵权，他将何以对国人、对部下交代？几年来他一直是力主抗战的，今日他的脸面往哪儿放？张发奎一腔怨怒，交接了指挥权，并把所属部队及后方军务交代后，径直回返武汉自请军法裁断。

在陈诚的周旋下，蒋介石在武汉听取了张发奎在九江战斗经过之详细报告后，没有撤他的职，而是让他继续担任第二兵团指挥的职务。这无疑肯定了张发奎最后处理的正确性。

九江丢了。一场风波也算告一段落。张发奎心里，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同年8月7日，他在总结九江失利的原因时写道："一是交通线破坏太早，阵地未能预先完成；二是运输不良，兵站设施欠缺……；三是军纪不良，民众逃亡……；四是联络不确，未能协同；五是警戒疏忽；六是将领间缺乏自信心，中下级干部多无掌握部下之能力……"

张发奎对蒋介石的处罚也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 变相撤职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也是八年抗战中一件最悲痛而遗憾的事。……九江附近之撤退，我当时乃根据当面敌情，我军状况所下达之决心，不幸为蒋先生误以为我有保存第四军实力之嫌。实则我不仅对九江之战役毫无私见，即全抗日期间所有大小战役之过程中，莫不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全民利益着想，从未将私人利益的意念夹杂其间。固然，第四军与我有悠久的历史关系，远在北伐时，我首任该军军长，在指导作战时，任何配属我指挥之部队只寻求如何去部署完成任务，绝无衡量自己与其他部队之深浅关系，以保存自己实力之行为。假如有这种自私行为，第四军番号早就淘汰，哪有"铁军"之辉煌绰号见称于国人呢？九江战役后，未详细调查，即以"张总司令发奎即行调回"的命令变相撤职。我对职位视同敝屣，毫不足惜，但我是高级指挥官，有辱我的尊严，至为难堪。……退一步说，蒋先生当时越级处分，实欠考虑。如我有错，应由我的上级陈辞修（诚）将军处理，但蒋先生并未查明亦未接到我的上级呈报，就径自越级干涉，这是他常犯的毛病……

四、瘟疫爆发，撤离武汉

九江失守后，张发奎于9月1日在阳新重新设立作战指挥部，决心在庐山地区马回岭一线，与日敌一决胜负，以雪九江一败之耻。

张发奎分析，敌人对武汉进攻的部署，已判明以约6个师团之兵力沿长江南北两岸西进，配合其舰队溯江跃进，作直取武汉的企图；另以一部沿南

浔线南进，掩护其主力之侧背，一部进出大别山北麓攻略信阳以迂回汉口。因此，瑞昌以西山地及马头镇、田家镇两地要塞的确保，是这次战斗胜败最大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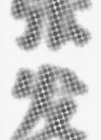
瑞昌以西，是连绵的山地，各山的标高均在500米以上，瑞阳公路蜿蜒于山坡之间，利于防守，沿线公路两侧之高地如能扼要据守，即可予以封锁。张发奎将这一带交由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负责，配属约10个师的兵力担任瑞昌以西一带之守备，以第五十四军霍揆彰担任马头镇之守备。

经过3周的争夺，敌人每一个山头逐次攻击，伤亡不少，尤其在沙帽岭、大脑山附近一带，被中方第十三军、第四军打击，伤亡更重，不过在敌人的水陆两路夹击之下，马头镇和富池口先后失陷，右翼的汤恩伯集团不得不向阳新附近地区转移。

9月25日，日军开始对阳新阵地攻击。28日，富池口之敌向半壁山渡河登陆，田家镇也同时遭受东北两面敌人的夹击，于29日失陷。坚守在半壁山的两个营的中国军队与阵地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刻全部牺牲，在战史上写下了壮烈的一页。日军随军记者九鬼丰二在九江所撰的战地通讯《江南山岭战——在德安途中》，真实地描述了这一带战斗的激烈：

……战争出乎意料之外地剧烈，可与去年八月由南口至居庸关的战斗相媲美。在华中最初一场山岭战，庐山连峰，屹然东立，若一座屏风。附近丘陵与高地重叠，中间夹着一条线长带的水田。中国利用这天然形势，构筑数条国防的阵地，其坚固有云：“足当百兵日军，而作战一年。”日军确实也遭极重的牺牲——田中部队长战死，茶村工兵部队长以下，尸横遍野，不知其数。一丘一壑，莫不洒遍了鲜血。

中国阵地半圆形，对日军团抱。日军除突破外，无术应付。然实施突破，中国由左右前后，甚至由头上射击，弹飞如雨。日本的飞机一来，中国兵便缩入山腹的洞穴，莫奈他何。用步兵冲锋更难，中国阵地的前端，道傍岩阵，布满地雷。一见日兵，便丢手榴弹，手榴弹丢完，继之以石块。中国兵众，轮值休眠，不时反攻或夜袭，总无机会可前。九月三日，好容易地突破成功，然而人困马嘶，士兵们个个一副黑暗的面孔，双目深凹，无光泽，马瘦如柴，拉出一团团冷粪。



战争，使沿江城市、乡村十室九空，只有暴尸荒野的人、畜的尸体，在炎热的空气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臭气。这是一幕只有在战争时期才能见到的地狱惨景。但没有人能顾得上改变它。

瘟疫、疟疾终于大规模地爆发了。这股黑色的幽灵飘到哪里，哪里便成了它的蔓延之地。孳生在草丛、水洼中的一群群黑色疟蚊，给中日两军带来的恐惧往往更甚于战场的恐怖。

冈村宁次可以小瞧中国军队，但却无法小视这些无孔不入的飞虫。最初，他坚决地回拒了参谋长请求休整的建议，限令各部队按时赶到前线。但疟疾却拖住了他的后腿。一〇六、一〇一师团苦战而不得通过金官桥、庐山，后续兵团虽拼尽全力，也无法按时赶到九江。第九、第二十七师团还未进入战场，临时医院里就躺满了昏迷的疟疾病员。每天，都有不少日军官兵病死在病床上。尸体刚挪开，马上又会躺上新的病员。第九师团的疟病减员达到了四分之一，这甚至超过了一场血战的伤亡代价。面对这个意料不到的"对手"，冈村宁次终于无奈地下令停止攻击。

战场的另一边，中国军队的日子也不好过。四处出没无孔不入的疟蚊见人就咬，它可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多雨潮湿的长江流域，守军呆在阵地上同样不能逃过这黑色幽灵的垂顾。大规模的疟疾、痢疾也在中国军队中爆发了。

前线大规模的疾病减员，最后惊动了武汉军委会。统帅部这才发现库存的药品少得可怜。别说阿司匹林，就是奎宁也没有多少。蒋介石不能眼看着部队就这么垮掉。他一面向民间征购，一面急电西方国家和国际红十字会，请求支援。很快，英国提供了1万英镑的疟疾药，法国领事代表法国红十字会提供了一批奎宁，美国也加入了这场援救活动。成车的药品运到了武汉，运上了前线。危急多少有些缓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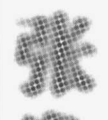
当几车奎宁运到江南第二兵团部时，张发奎犯了难。前线毕竟缺药，这几车奎宁虽如雪中送炭，可怎么分好呢？当有人建议分给已患病的官兵时，张发奎讲起了公道："这怎么行。你有他没有，下面还不打起来。现在弟兄们情绪很重要，决不能有什么不公平。我看，一人一丸，人人有份。"

军医们一听，哭笑不得，解释说："……奎宁丸的服用，必须两粒以上方才够药力。一人一丸，起不了什么作用。"

张发奎说："既然如此，由你们医生具体掌握。"

排市、阳新方面，全线都在进行激烈战斗，敌人的死伤相当惨重，我方处境也十分危急。为破坏敌人的速战速决计划，张发奎严令各军全力以赴，遏止敌人行动，争取在这一地带能坚守3周以上。他随即向最高统帅部报告，保证坚守3周时间。

张发奎治军严谨是有名的，对命令的执行尤其不苟且。“铁军”的荣誉就是建筑在他不苟的治军上。在作战时，他尤其有着广东人“硬邦邦”的精神。这次守卫阳新之战，更是严明军纪。当时，守卫阳新中央阵地的某军长有些犹豫。张发奎以最坚决的话语命令该军长：“坚守到底！没有兵增援，你也得死守到底，不许向后退一步！”后来，阳新守军一直坚守到石灰窑发生战事以后才撤退。






10月21日，张发奎保证坚守3周的时间已到，此时我正面和大冶附近的情况极度恶化，必须适时转移阵地。他当即报告最高统帅部，定于10月22日命令全线向金牛以东的太平塘亘梁子湖之线转移。

这一次战役经过50余天，始终在极度紧张和惨烈情况下进行，敌人攻略之目的虽已达成，但损失相当重大，已超出其预期作战时间及效果。中方除丧失约100公里土地外，还消耗17个师的战力。平汉路方面战况更为严重，日军大举南下，攻陷信阳，中方野战部队撤至桐柏山区，汉口北部已无险可守。为避免南京惨祸在武汉重演，蒋介石定下了疏散撤退的决心。8月3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发表文告，劝导武汉民众疏散。次日，湖北省党部发表《为疏散武汉人口劝告民众书》，要求市民百姓和除军委会外的政府其他机关从速撤离。接下来的几天，一股新的溃潮又在武汉泛起。

武汉会战，中日军队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5个多月，日军投入几十万兵力，会战期间又补充了五六次兵员，日军中央统帅部在会战后期，已无力再向武汉增援兵力。整个会战，歼灭日军20多万，使日本陆军大伤元气，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蒋介石也动用了几乎所有部队，所有参战部队都打得英勇顽强，为武汉会战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与敌倍之。中日战争至此进入相持阶段。

武汉沦陷后，情况发生变化，张发奎奉命将第十一军团和第三十二军团交罗卓英指挥，使其在粤汉铁路之北正面拒止敌人，他自己则率余部退驻湖南。

一个新的任务正等着他。

第十五章　回韶主持，粤北会战捷

一、广州沦陷，临危受命

正当张发奎在武汉会战中苦战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南传来，广州沦陷了。这犹如在他的头上猛然响起一个炸雷。

原来，1938 年 10 月 12 日凌晨 2 时一个月黑风高夜，日军为策应武汉会战，组成二十一军，另配 1 个飞行团，共约 7 万兵力，在几十艘军舰和 100 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突然在广东大亚湾附近登陆，进攻广州。当时虽然主力北调，负责广州防卫的第十二集团军余汉谋部尚有 8 个师 1 个独立旅和其他部队约 10 万人，但余汉谋事前没做任何防卫，日军骤然登陆，他慌了手脚，仓促应战。日军一路攻占了淡水、平山、惠阳，不费吹灰之力攻占了广州，前后只 10 天时间，开创了抗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面积快速失地的先例。

广州一失，这不仅影响武汉会战战局，同时中方由香港方面经粤汉路交通线也被切断，增加了开辟华南战场的兵力负担。作为广东人，家乡沦陷，张发奎心里更是多一份的沉重，他渴望能回乡参加战斗。

11 月 25 日，最高统帅部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第三、第九两个战区师长以上百余人参加，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应邀参加。这个军事会议一连开了 4 天，制定出第二期抗战方针。

会议根据敌我战线情况，重新划分了战区，设 8 个正面战场战区和 2 个敌后战区，其中，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辖广东、广西两省。为了简化部队指挥层次，又将原来的七级变为四级，即从“军委会–战区–兵团–集团军–军团–军–师”，变为“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取消广州、西安、重

庆3个行营，改设天水和桂林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北方和南方战场的作战。

会议期间，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张发奎。

“向华兄，你此去广东，责任重大。广州突然沦陷，军心、民心都不稳啊，部队士气很低。你是粤军名将，任四战区司令长官，最为合适。你一定要重振士气，确保南线安全啊。我想征求你的意见，让你同时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一职，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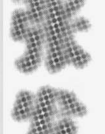
“请总裁放心，四战区一职，我会尽心尽责做好。至于省主席一职，本人从军出身，没有行政经验，而且责任过重，我看就不要兼任了。”

“那你认为谁合适？”

“要我推荐的话，伯豪是最佳人选。”

张发奎说的“伯豪”，是李汉魂的字。从1925年开始，李汉魂在第四军十二师任职，跟随师长张发奎参加东征、北伐和第二次北伐，直至1929年的蒋桂战争。因而可以说，李汉魂一直是张发奎的老部下和重要助手。蒋介石知道李汉魂是个文武之才，赞许地点点头。

南岳会议后，张发奎就带着直属部队乘火车南行，于12月21日来到韶关赴任。






二、到韶赴任，人事复杂

自从广州沦陷后，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退守清远、佛冈、从化、增城、翁源一线，总部驻翁源镇三华墟。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省党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北迁韶关，韶关成为广东战时省会，广州几十万商民随之北迁。一时间，韶关这只古老之“舟”，出现繁荣景象。

市区时有大小商店7000余间，尤以风度路、民权路、民生路最为热闹，广州等外地经营者甚多。商品以布匹、百货、中西药材及土纸、食盐、煤油、火柴、豆类等为主体。各行各业除在市区开店外，一直延伸到东河、西河、五里亭、十里亭等地开设商店，成为全省最大的贸易市场和货物集散地。

省政府来韶后，广东地区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为了平衡各派势力，张发奎把上任的一切仪式从简。

12月24日，他与新上任的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一起，来到三华墟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同余汉谋会商，听取他对当前情况的汇报。

三人把酒小斟，畅谈至深夜。然而，在背后，他们三人都有难言的矛盾。

1926年北伐军打到武汉后，第四军被扩编成两部分，留在广州的两个师被称为“老四军”，参加北伐的两个师另组建了“新四军”。1927年“张黄事变”后，新、老四军兵戈相见，矛盾较深。余汉谋是属于老四军系列的，与张发奎、李汉魂这些新四军代表人物有些格格不入。

余汉谋，字幄奇，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25年秋，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团长，后任副师长。1936年6月1日，陈济棠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揭起抗日反蒋旗帜，余汉谋公开拥蒋反陈。陈济棠见众叛亲离，大势已去，解职赴港，余汉谋接管陈济棠原有的军权，成为粤军新首领。在张发奎到任前，余汉谋一直担任广东第四战区司令官，由于广州不战而败，遭受记大过处分，被迫屈居四战区副司令长官。

不过，余汉谋对张发奎这位粤军名将还是敬重的，国难当头，表示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他指着大幅作战地图介绍说：“四战区当面之敌为日之第二十一军的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及海军陆战队之一部，共约4万人。我战区所辖的部队，除在粤桂南区第十六集团军夏威所属的第三十一、第四十六两军的6个师外，在粤境的部队，计有第十二集团军所属的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六之3个军共8个师和2个独立旅及战区直辖之第六十四军之3个师，如照编制的定额，应有约20万的兵员。事实上，除夏威集团的兵员比较充足外，其余残缺不堪，如第六十四、六十六两军是刚从武汉方面调回整补的，第十二集团军也刚经过广州的战斗，损失颇重，故实际上的兵力，不足三分之一。”

听完汇报，张发奎语气庄重：“基于当前敌我态势和最高统帅部的战略指示，我们只有从稳定第一线和整顿后方来着手工作，以确保粤北，占领英、翁线既设阵地为守势作战方针，以加强阵地工事，调整部署，训练部队，为作战做准备。”

第二天一早，在余汉谋、李汉魂的陪同下，张发奎出席了有各军师旅长以上军官参加的简朴欢迎会。军官们以一种敬重的心情望着这位有“铁将军”之称的张长官。

只见他，身材不高大却很结实，眼睛闪着锐利的光，不断地扫射着每个角落，注意着每个人。他说话时音色有点沙哑，但表达清晰，能切合各种不同听众的心理，语里话间饱含着热情诚挚。熟悉他的部下都知道，张长官的









仪容始终是整洁光彩的，“铁将军”铁一样的坚决态度，经常表现在他脸上。

当余汉谋代表全体官兵致欢迎词后，张发奎徐徐站起，扫视了大家一眼，缓声说：

“今天，我主要跟大家说四句话。第一，我张发奎是由粤军第一师出身的军官，你们十二集团军的部队也是由粤军第一师发展起来的。有此历史渊源关系，所以我被派来四战区当司令长官，指挥你们，相信你们也一定会服从我的命令。第二，我们粤军第一师从邓仲元师长建立以来日益发展，在两广和大江南北，经过无数次战役，从没有打过败仗，是国民革命最坚强的部队，不意这次你们十二集团军在惠广战役中，只和敌人作过几次小小的接触，就溃败下来，放弃了华南重镇广州市，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不仅是粤军第一师同人的奇耻大辱，也是广东人民的奇耻大辱。而且因为广州的弃守，而影响到武汉会战的失败，如果广州不失陷，武汉会战肯定还可能支持下去的。这次来粤前，我赴湖南、广西和四川等地考察，到处都是对你们的批评、指谪，我听了后都为粤军感到脸红啊。第三，我这次来当四战区司令长官，先要整顿部队，恢复作战能力，收复广州和其他失地。其次是整顿政治，增加行政效率，支持军事设施，消灭敌人。第四，我回广东工作并不是来争官做、争地盘，而是来协助余总司令振军经武，恢复名誉。待广州收复后，决将广东军政大权交还余总司令负责，绝不恋栈。”

张发奎这席开诚布公的训话，引来军官们雷鸣般的掌声。

1939 年元旦，张发奎正式宣告就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然而，最使他头疼的事，还是调整部队的部署。

这次，张发奎回两广任职，感慨诸多。广东是他的故乡，他在广西有数年的军旅生活，是其第二故乡，因而，他对两广了如指掌，这对于指挥作战有很多的便利。然而，战区须承担党政军各方面任务，责任重大，他惶恐万分，不仅要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还要确保整个华南局势，维持好社会秩序，处理好复杂的人事关系,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摩擦而影响团结。

第四战区的正面战场，西自桂越防境起，东至闽粤边境止，是一条漫长横广辽阔的战线，海岸线弯曲处很多，到处都是可能登陆的地点，在交通条件较差，而且所有的公路和电讯交通网，都和正面成平行状态，要求统一机动运用兵力，十分困难。当时的指挥系统也相当混乱，第九集团军



抗日战争时期的张发奎将军

总司令吴奇伟，仅有一个空衔的机构，没有明确的任务和兵力，第六十四军和几个保安团及税警总团担任西江的防务，彼此不统属，形成各自为战的状态。这些问题都必须解决。张发奎平素对于作战指挥，一贯喜欢确定职权和分层负责，他任第四军军长时指挥作战，每一个部下，都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和授予统一指挥的权力。因此，他首先向最高统帅部建议，调整本战区军事的意见：

甲、作战地区就原有区域划分为东南西北四区，每区以一个集团军任之。

一、东区——第九集团军吴奇伟指挥第六十五军、预备第六师及独立第九旅。

二、南区——第十六集团军夏威指挥原第三十一、四十六两军。

三、西区——将粤省保安团抽出八个团编为一军，加以第六十

四军邓龙光部合编为一个集团，以李汉魂兼任总司令，邓龙光副之。

四、北区——由余副长官指挥十二集团军之第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六军及独立第二十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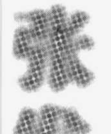
乙、由中央增援一个军控置韶关附近为总预备队。

丙、粤省保安队，除拨出八个团，编成一军，以保安处长邹洪任军长外，所余五个保安团，以吴迺宪任保安处处长。

丁、粤省税警总团，除留四个营仍任缉私工作外，其余三个团及一个营编为一个师，归西江方面之集团军总司令指挥。

最高统帅部基本同意了张发奎的意见，并颁布人事和分区的命令。

张发奎始料不及的是，当时有一部分军人却在背后批评，说他有意分割广东部队的统一，树立原第四军系统的势力，因为吴奇伟、李汉魂、邓龙光都是第四军中的将领，由于有这一种偏见和传闻失实的扩大，结果竟造成以后广东军人派别上的分歧，以及余汉谋、李汉魂之间的意见与摩擦。





粤军内部之间的矛盾，使张发奎相当棘手。抗战初期，华南的镇守任务，完全由第十二集团军担任，余汉谋自然而然成为广东权力的中心。广州失陷后，原在淞沪作战的李汉魂、邓龙光等各军相继开入粤境，有人认为这是分割了第十二集团军的势力。所以，在李汉魂的第三十五集团军成立后，使余、李两人在军政方面，在十二集团军与三十五集团军之间，都像有一种无形的鸿沟。因而，张发奎在作战指挥上，由于顾虑这些因素，不是须特别加以协调，便只能听之任之，而不加以过多的干涉，便形成了一种尾大不掉的情势。

同样的，两广之间也存在矛盾。夏威的第十六集团军，纯粹是广西的“财产”，广西一切的军政权力，都掌握在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三人的手上。广西是他们的家乡，十六集团军恰好担任守备广西大门的任务，这自然与他们的痛痒有关，自己家里的事，只有让自己来解决，旁人的干预是不合理的。因此十六集团军的指挥，和广西境内一切军事调动处置，都是由白崇禧一手包办。张发奎难以插手。广西之所以划入第四战区，和十六集团军编入战区序列，实际上只是一个指挥系统内的名词而已。最高统帅部也顾虑及此，另外成立了桂林行营统制西南一切的军政事宜，并将广西的一部划入桂林行营直接指挥。这就是说张发奎对四战区辖境，只能管广东这一半，广西

那一半归白崇禧的桂林行营管辖，幸好张发奎和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以往关系不错，彼此尚能推诚相见，遇事相互商讨，否则他这个司令长官不仅无事可做，而且实不能做。

当然，张发奎在处理人事上，也有快刀斩乱麻的果断。他上任不久就对守卫惠广前线失职的第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送交重庆军法执行总监审办，继而解除李煦寰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解除李洁之第四战区兵站总监的职务；还撤换了一些军长和师长。

三、声讨汪逆，义愤填膺

武汉失陷后，中华民族还有一大危机，就是敌人的政治攻势。日本决定以政治阴谋代替军事攻势。日首相近卫在明治节发表谈话，表示日本的行动是为“反共”而不是“反蒋”，如果蒋介石参加一个反共的新政府，中日战争就可以提早结束。他企图以亲善的假面具把中国拉入他的怀抱，由他来支配宰割，以实现田中奏折的迷梦，这是一个非常毒辣而阴险的圈套。这一个鬼魅阴森的“和平之门”，就是利用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兼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汪精卫来做傀儡。1938 年 12 月，汪精卫突然秘密离开重庆飞往越南河内，随后发表了投敌之“和平艳电”。

应该说，张发奎对早年的汪精卫还是十分尊重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汪精卫本身是革命者，是孙中山的接班人。早年的汪精卫曾是一名坚定的革命者和爱国者。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能够角逐党国领导人的只有胡汉民、廖仲恺和汪精卫（此时的蒋介石还不够格）。后来，廖仲恺遭暗害，胡汉民又走向极右，汪精卫自然走向前台。他此时也是响当当的革命“左派”，在 1927 年有如下言论：“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走开去。”

另一个原因是张发奎与汪精卫的历史渊源很深。1923 年，张发奎任粤军第一师下属营长。当时，第一师师长为李济深，独立团长出缺，逐鹿者多人。关键时刻，汪精卫推荐张发奎接任，请由大元帅委派，使张发奎风光十足。1926 至 1927 北伐这短短一年间，张发奎升任师长，继而副军长、军长，进而总指挥，一年未够，连升四级。固然，他有汀泗桥、贺胜桥赫赫战功使然，但他的发迹应自第三团团长始，而汪精卫对张发奎之拔擢却是关键。

出于维护正统和个人义气，张发奎对汪精卫始终有些感恩戴德，并认为汪精卫是孙中山的真正接班人，而蒋介石只是个夺权者。即使有人以为汪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也心甘情愿为之“搏命”。由于汪、张关系密切，在国民党闹宁汉分裂时期，对汪精卫，张发奎均惟命是从。因此，汪精卫搞宁汉分裂，打桂系，打特别委员会，护党救国，执行党纪，改组派，非常会议，扩大会议等风风雨雨，都靠张发奎的武力做本钱，可见张发奎实在是汪精卫的军事支柱。在1931年汪、蒋再次合作后，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以为张发奎已无多大利用价值，竟然躲而不见，张发奎才逐渐认清他的为人，与之保持距离。

汪精卫在抗战初期，先是一个焦土抗战论者，后来又是个对抗战持悲观态度者。他认为“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根本没认识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然而，当武汉危急的时候，张发奎曾见过汪精卫，他并没有对张发奎表露一点所谓和平的意见。他室内的陈设和满堆的书籍，也没有一点迁移的迹象，汪精卫的出走，令张发奎甚为诧异，他做梦也没想到，汪精卫竟然做了一个第一号的大汉奸，为国人所不齿。





张发奎对汪精卫之举可谓义愤填膺，立即与陈诚、薛岳、李宗仁、白崇禧、余汉谋诸将军，通电反对这个和平的提议，斥之所谓和平“艳电”无异是一个投降的哀号，足以沮丧我国军民的士气，无形中助长敌人加速灭亡我中华民国。

1939年7月23日，汪精卫酝酿成立伪中央政府，亲到广州，会见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利吉，乞求支持，并策划在广州成立伪政权对广东地区国民党军队进行诱降活动。8月9日，他发表广播讲话《怎样实现和平》，对张发奎、邓龙光等粤将施行劝降，许以高官厚禄。此后，汪精卫还数次到粤活动，进行劝降。他本以为张发奎等粤将领还会像原来一样，只要他“登高一呼”，就会云集响应，这回这狗汉奸大错特错了。

张发奎不为所动，在民族大义问题上，界限分明，他和其他驻粤高级将领和高级党政官员多次发表通电，驳斥和声讨汪精卫，表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胜利后，张发奎任广州行营主任，对汪伪大汉奸，毫不手软，给予严惩。

这时期，在韶关南雄县一个幽美僻静的乡村——修仁，成立了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其团长一职由蒋介石兼任，张发奎以副团长名义负责主持，余汉谋、李汉魂兼任团附。

在训练期间，张发奎常由韶关驱车前往南雄，到各班进行讲课。有时，他在这里小住一段，和学员们共同起居饮食。他常对学员们说，每个人都有错，但是不必害怕，只要在错误中求改正，便对事业对自己有好处。张发奎首先把自己过去的行为作一番坦白直率的检讨，以作示范。他说自己过去也曾有过许多浪漫的错误行为，但是后来自己觉悟了，便下定决心彻底改正，现在他认为已做到了“公诚廉毅”四个字，这是做人处事的基本要求。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每个人都能改过，便是最大的成功。”“要和蔼诚恳，虚心严谨，不高傲，不卑下，不暴躁，不浪漫，要多多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检讨和批评，随时改进缺点发扬优点，求得自身和工作的进步！”

这些坦诚的话语，感动了每一个学员。

干训团经过7个月的严格培训，先后共有4000余人毕业。在短短的训练期间，学员们异口同声地说：“最大的收获，是张副团长精神的感召！”

四、南宁会战，粤北大捷

1939年，自第四战区成立后的1至10月间，局面相对平静，除了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于2月间被敌占据，和鞭长莫及的潮汕在6月下旬失守外，广东主要正面战场，保持着对峙状态。张发奎正好利用这有利时机，做好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11月15日，日军登陆广西钦州湾，发动南宁会战，于24日，攻陷桂南重镇——南宁。桂林行营匆促应战，打响了有名的昆仑关争夺战，这次战斗一直持续到1940年2月初。

广西方面的作战，主要由白崇禧指挥的桂林行营负责，该方面的责任不属于张发奎，张发奎对此相当不“感冒”。

在张发奎看来，将桂南地区从第四战区拨交桂林行营指挥，是最高统帅部的一次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一来，不仅第四战区的指挥系统被破坏，辖境被割裂，而且第四战区的辖境，也起了实质的变更，名义上虽然他仍是统辖两广的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实际指挥的则不过只有广东一省，剩下的另一半广西却归白崇禧的行营指挥。这种权责不一，名不副实的不正常情形，不消说，在人事职权上发生尴尬尚在其次，更重要的还是对第四战区的作战影响。假如第四战区建制完整，他自可随时根据实际拟定作战方针，作适时适

切之配合。但桂南地区一被分割，所有协同配合均不易为之了。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一再电促张发奎到桂林开会。张发奎从大局考虑，于 12 月 8 日驱车来到桂林行营迁江指挥所，参加党政军高级会议。会后，为了配合桂南作战，张发奎即往西江视察。就在他巡察西江期间，广州日军为策应桂南作战，对粤北展开攻击。

粤北战事吃紧，张发奎只好中断西江之巡，于 12 月 27 日快马加鞭赶回韶关指挥作战。

作战参谋向张发奎报告说："日军 3 个师团约 7 万人兵力，分三路攻粤北：中路以近卫师团 3 万多人为主力，沿从化良口、佛冈迳头进犯翁源；以缨井兵团及根本、加藤、堀川、洼中楫等部 15000 人为右翼，沿增城、龙门、新丰之线进犯翁源我十二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以一〇四师团的一个旅团，加上松冈野联队和中野正碟大队等 15000 人为左翼，沿粤汉铁路攻银盏坳、源潭，经英德直犯曲江。日军这个部署，显然企图中间突破而席卷两翼，达到侵占韶关的目的。"

作战参谋指着地图介绍说："12 月中旬，日军沿粤汉铁路向清远银盏坳我第六十二军一五二师阵地猛扑，激战甚烈。其后该军的一五七师及六十五军的一五八、一八七师先后在银盏坳、伯公坳与及源潭等据点与敌反复争夺，激战 10 余天，据点得而复失，未能遏止日军北进。同时，日军主力近卫旅团在左翼向从化良口、牛背脊等地进犯，我第六十三军一八六师在良口以南抵挡了一阵，即放弃阵地。该师张泽深旅则固守良口西北的据点，在当地三甲乡民众抗日自卫团的配合下，同敌人展开血战。该军一五三师在北斗等地迎头痛击敌人，后又在上、下禾洞的碘磷山与敌发生遭遇战，都取得较大的战果。目前，敌左翼进至河源，右占翁源，进至官渡，来势凶猛，我第十二集团军总部已从三华撤至曲江大坑口，韶关异常震动，省政府已迁至连县，只留下李汉魂省长带少数随员坚守。在这种严峻形势下，经紧急联络，第九战区薛长官派出第五十四军前来支援。现在，陈诚、李济深两位长官也赶到韶关。"

张发奎眉头一皱："我军方面目前如何部署？"

"我军作战方针是固守既设防线，部队作守势防御配备。部署黄涛的第六十二军于右翼，守备清远、滘江、佛冈至水头之线；张瑞贵的第六十三军为左翼，守备从化良口、牛背脊，增城派潭、东洞，龙门地派，新丰梅坑之线；缪培南的第六十五军为总预备队，置于曲江乌石、马坝，翁源新江一

带，策应各地区的作战。增援的五十四军先头部队已赶到韶关，在沙口与河头之敌对峙。”

张发奎素来主张“以攻为守”的战略思想，以主动制敌的战术行动，对敌实行机动的攻击。他思考了一会说：“我看，我军的作战总体原则，以一部在铁路正面，另以一部进出广、花、增、从间地区，先行向敌方袭击，以摧毁日军的攻击准备，主力即集结于英翁线之山岳地带机动使用，并巩固曲江的基地，粉碎敌人北犯之企图。”

张发奎用指挥棒对地图一指道：“我们要以凌厉攻势来摧破敌人的企图，决不能令部队以守势实行逐次抵抗，因为曲江是战区的基地，距第一线不及100公里，再没有深广的地区可以逐次抵抗，必须以主动的攻击手段，把握时机，乘敌人突进分离、战线拉长的机会，予以各个击破。”

他放下指挥棒，果断地说：“我命令，第五十四军由曲江向大坑口、新江墟、翁源方向急进，向敌攻击；右纵队除第六十五军之一部扼守主阵地要点外，集结主力于佛冈、水头附近策应各方面之作战；第六十二军所部向从化、良口间钻隙迂回截击敌后，攻占从化、增城以北地区；左纵队以一部固守沙田、梅坑、新丰之线，以有力之一部尾击地派以北的敌人并把它歼灭。同时命令，东江指挥所主力由惠州向龙门、左潭、铁岗截击敌后；第二游击纵队积极袭击新丰、龙口、江村之敌；第三十五集团军暂二军，即由四会向清远沿北江西岸夹击敌人；第六十四军进击北江东岸，截击敌后之交通。”

下达命令后，张发奎对胜利怀着莫大的期望，如果我正面能拒止敌人，从中间突破，则敌人必将陷于分离状态，广韶公路方面之敌，必将受多方面之优势兵力压迫而崩溃。

最能领悟张发奎“化攻为守”战略意图的是第六十二军军长黄涛。

本来，六十二军先是接到十二集团军总部一个电报，命令六十二军从佛冈阵地北撤回上吹、下吹东西线一带山地，再行抵抗敌人。黄涛认为退守阵地，不能解决问题，因此马上用有线电话接到十二集团军总部找到余汉谋，向余汉谋提出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既是敌军倾巢来攻，广州必定空虚，我率六十二军直攻广州，这是上策；第二个主张，我率本军由佛冈水头墟附近向牛背脊、良口敌之据点攻击，截断敌之后路，俟攻击奏效后，再向吕田方面席卷而上，对沿翁源从化公路突入梅坑以上敌军后尾部队而攻击之，使敌之后方联络线完全陷于断绝，这是中策。

当时余汉谋听了这些主张，一时无法答复，只嘱黄涛暂时保持电话5分

钟，待其与王俊副总司令、张达参谋长商量之后，再做决定。5分钟后，余汉谋做出决定："进攻广州是攻据点，不容易的事。纵然攻入，亦不易守。不如就近攻击牛背脊、良口敌之后方联络据点较为稳当。就照你第二个主张行动可也。"

黄涛得令后，开始行动，从中线主动出击从化牛背脊、良口之敌。经过两昼夜激战，歼灭日军1900多人，收复了牛背脊，并把敌联络线拦腰截断，敌一部慌忙向南退窜，另一部则往北靠拢。29日进抵翁源、新丰之敌，又遇第五十四军合击，这样，敌人的中路和右路陷入了始料不及的被南北夹击的困境。

1940年元旦，一个个胜利的捷报与庆祝新年的喜讯同时来临，新丰、翁源公路方面的敌人，在我第五十四军的攻击下，已开始退却。英德附近铁路正面的敌人，也从县城撤至连江口。听到敌人退却的消息，张发奎甚感欣慰，这次主动攻击的处置无疑是正确的。他不禁打开一瓶香槟酒，和幕僚们举杯相庆。






李汉魂笑着说："在韶城最紧急之时，南华寺虚云方丈送来六祖代求之一签云：大地忽回春，无限真消息；目前生意多，管甚开荆棘！昔年会种善根来，今日仍然得其力……"

张发奎笑曰："感谢六祖保佑，胜利后代我敬一高香。"

此次战役于1940年1月26日结束，史称"第一次粤北战役"。该战役共打死、打伤、俘获日军3966人（此为国民党公布数字，日军公布说日方死伤1574人），中国守军也付出巨大的代价。第一次粤北战役的胜利，保卫了粤汉铁路和粤北地区，挫败了日军逼降的阴谋，支援了桂南的抗日作战。张发奎在此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十六章　赌气回乡，受命赴桂南

一、心怀不满，告假还乡

东方渐白，月影淡去。天色由穹顶的藏青向四围铺展，渐次褪成天青，直至天边的蛋青色。太阳还没出来，空中看不见以往朵朵耀眼的白云，只有一丝丝，一线线的流云浮游在天地相交的边缘。昨夜的重霜染白了大地，放眼望去，有星星点点，一丛丛的红色散布在山野林丛中，那是染霜的枫树与黄桷树。

山道上走来一行人，前面是两匹高大的军马，马上骑着两个军人，一个是副官模样，身上挎着只大皮包，胸间配支手枪；另一位个子不高，却精干壮实，英眉间透着逼人的锐气，身上的军装已洗得有些灰白，没佩任何军衔。他边走边不时回头，与后面两顶小轿子里的女人说上几句，几分悠闲，几分写意。普通人很难相信，眼前这壮汉子正是大名鼎鼎的司令长官张发奎。

张发奎一行人是今天一大早便起来赶路，直到下午4时多，才赶到始兴县司前墟。

司前墟说是一个镇，其实只有一条百米长的土街，街两边搭着低矮杉树皮的房子，住着二三十户人家。杉皮房子的前端开小食摊档（当地人叫中伙店），后半截是主人的住地。厅堂里安放三四张床铺，接待来往客商。

张发奎打量着这些杉皮房子，感慨地对副官说："这样的矮房屋，叫人怎么过活？人穷真叫屈。我们打生打死，就是要下决心把这种又穷又落后的社会改变过来。"

在乡公所门口，张发奎下了马，说："我们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电

话室打个电话。”乡公所的人知道这行人来历不凡，热情地把他们迎进房，忙着倒水沏茶。张发奎喝着浓浓的绿茶，环视窗外青山绿水，对身边的人说：“还是家乡的山水美呀，这大好的河山我们要好好保卫。”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跑进来，生得精灵健美，活泼可爱。张发奎走过去，抚摸着孩子的头和蔼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啦？”小孩畏生不语。张发奎逗着说；“生得这么靓，将来一定有出息，做我的儿子好不好？”这可惹急了小孩，以为来者想占便宜，不高兴地撇撇嘴，吐出浓浓的客家话：“你想得美，涯才不做汝个仔俚（意即我才不做你的儿子呢）。”孩子那充满稚气的样子，惹得在场的人们哄然大笑。孩子害羞地躲在爷爷的身后，也笑了。






张发奎喝完茶，来到电话室，见接线生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操作灵活，便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多大了？读过几年书？”少年抬起头，笑答：“伯伯，我叫官子明，是隘子官屋大围人，今年14岁，读过三四年书，因家里穷，无法再读下去，只好出来打工寻碗饭吃。”“当年我也是像你这样的年龄没有书读的啊。”张发奎同情地摸了摸少年的头，想了想，“你愿到我办的学校读书吗？”那少年反应灵活：“哦，我知道了，你就是张长官张伯伯吧。我早就想到您办的风度学校读书，可是我没钱啊。”

这张发奎果真是张发奎。他点点头，道：“没钱不要紧，只要你肯学。你可以到风度学校当工读生，每天放学后，帮学校和老师做些杂务，不仅一切学杂费用由学校负担，每月还可以给你零用钱。”官子明高兴地跳起来：“好，我去，我去。谢谢张伯伯。”



在乡公所稍稍休息后，张发奎带着夫人、妹妹和副官，又上路了，目的地正是他的家乡矮岭村。

离村还有一两里地，张发奎跳下马，步行回家。他的副官知道长官这个习惯，每次回乡总是便装而行，到村前先下马，再步行入村，毫不显扬。副官也跟着下马相随。

张发奎这次回乡，心里窝着一把火。本来，第一次粤北战役是他抗战以来打的一场大胜仗，虽然在全国战场不算有很大影响，但它确保了南线的稳定，自我感觉还是比较满意的。谁想到此时桂南告急，最高统帅部一纸电令，让他迅速到广西指挥战斗。

桂南战役打得比粤北激烈，就在1939年的最后一天，杜聿明率第五军

一举克复昆仑关，取得昆仑关大捷。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都以为敌人遭受此重挫后，暂时不会有所行动。谁料到1940年元旦刚过，日第二十一军就秘密由广东境内调兵西进，乘中国军队尚未部署就绪，对昆仑关突然发动袭击。昆仑关地区中国守军仓促应战，前来支援的第六十六军叶肇部，因行动迟缓，不能依期到达。日军主力在一周内，如狂风扫落叶似的连续攻陷了昆仑关西边的武鸣、思陇，北面的宾阳、邹墟、上林等地，切断了昆仑关后路，震撼了整个黔桂后方。桂林行营紧急应对，凡可使用的后方部队，包括尚在训练中的军校学生，都准备开赴前线御敌。

当桂南战况紧张而第一次粤北战役告一段落时，蒋介石迭次电令，敦促张发奎前往桂南指挥，同时又要他将西江、北江、东江之指挥权移交余汉谋。

张发奎对此命令甚感困惑和愤懑。

因为广东所属西江、东江、北江地区均属他第四战区指挥范围，余汉谋所辖第十二集团军又归他节制，他为什么要交出指挥权，不可以同时指挥广东省西江、东江、北江地区的战斗，而只能转去指挥桂南战斗？在此之前，为什么又可以指挥西江、东江、北江地区而不能指挥桂南地区？广东、广西都是他第四战区管辖的地盘，为什么他的权力只能管一半？

张发奎摇着那张电令，对身边的副官左洪涛说："说来说去，实在是一个笑话，我这个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名义上虽然指挥两广地区对日作战，实际上，蒋介石赋予我指挥的则始终只是两广地区之一隅。1月7日前，命我将桂南交桂林行营指挥，我所指挥的只在广东地区方面；1月7日后，又令我将广东地区交余汉谋，再把桂南地区交回给我，我所指挥的还是广西地区及广东省南路地区一隅罢了。我身任这样一个名不副实的司令长官，面对着如此异常凶猛狡黠的日军，怎样才能运用本战区的全部力量，去应付当面之敌人呢？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吗？试问，其他战区的司令长官有像我这样的吗？既然如此，还不如把两广分成两个战区得了。"

张发奎叹了一口气，又说："说实话，我对到桂南赴任感到十分踌躇，并不是因为桂南战况不利而想逃避失败的责任，也不是对于桂南战事抱悲观绝望的心理，这是一个指挥职责和效力问题。广西境内的军事，原是白崇禧领导的桂林行营直接指挥的，在这战况不利的时候，临时更换指挥官，是兵家之忌。你帮我参谋参谋，我是应单独担负起整个桂南战役指挥的责任呢，抑或与桂林行营共同负起双重指挥的责任？如果我单独负责，则前期指挥人

员，将产生何种感想？我又能否在这种条件下发挥什么作用？如果双重负责的指挥，我除将居于傀儡地位，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张发奎望着天空上一只孤独的老鹰，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老蒋既然不相信我，我不如回家种地去。我想通了，在遵命将指挥权移交给余汉谋后，便向老蒋请假，带夫人回老家住上一段。这仗他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左洪涛心知长官的难处，又不知如何劝说，只好说：“放松放松也好，我陪您回乡吧。”

张发奎辞职的事，也令他的搭档、省长李汉魂甚感忧虑。他在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



> 昨奉委座虞日电令，粤（除南路）军事归余副长官负责，桂及南路军事，归张长官负责。此固目下军事上之需要，惟各方关系复杂，各有隐衷，而党政权责未经划分，尤易发生纷扰。予固惟命是听，惟默察大势，深用杞忧也。向公昨已上辞呈，举幄（指余汉谋）以代，今日又主张划分战区，前途演变，正难预测。大敌当前，有此现象，殊可虑也。






张发奎要求辞职回乡的当天晚上，约李汉魂长谈。两人喝了一夜闷酒，也想不出什么好道道来。李汉魂只好劝张发奎稍为回家休息几天，再作斡旋而已。与张分手后，李汉魂在日记中感叹道：“战事尚未结束，有此现状，良非大局之福。予只有以大局为前提，以道义为依归，静看转移也。”



李汉谋的忧虑并非无中生有，张发奎离开韶关后，余汉谋独掌军权，他与掌握行政大权的李汉魂的矛盾更为尖锐，后来甚至为“广东省政府是否从韶关迁连州”而引发风波。

1月15日，张发奎夫妇乘吉普车从曲江官邸启程，先抵达翁源坝子。由于从坝子回清化没有公路，住了一晚后，张发奎便让夫人与妹妹乘轿子，自己连警卫员都不带，只带着左洪涛一个副官骑马而行，倒也悠闲。

二、安排赓靖，风度教书

一到矮岭村村头，如雷的掌声把张发奎从沉思中惊醒。他愣了一下，天寒地冻，村民烤火，学生放假，哪来的这么多人？

走前百步，只见左右两边，排着两支队伍，边拍手掌，边大声齐呼："欢迎张长官，回矮岭探亲！""欢迎董事长，到风度视察！"

张光弟、全赓靖春风满面地迎了上来，全赓靖的一对小儿女元鹤、元桐跑上前，分别搂着张发奎夫妇的腰腿，亲热地喊着："张爷爷好！""刘奶奶好！"天真无邪、幼稚可爱的童真，把张发奎抑郁已久的烦恼痛苦，暂时抛到九霄云外。

众人拥着张发奎一行来到"贵庐"。张发奎看着全赓靖忙里忙外，俨然像个女主人，心里舒坦许多。

全赓靖可谓是苦命人。她与叶绍振结婚后，两人感情甚笃，不久就相继生下一对男女，美满幸福。但好景不长，1935 年叶绍振因心肌梗塞而猝死，全赓靖痛不欲生。张发奎闻此噩耗后，也不胜悲伤。

抗战爆发后，不愿当亡国奴的全赓靖带着一对儿女回到丈夫老家——广东梅县大河背叶屋村。她娘儿仨千里辗转，风尘仆仆地到叶屋村，本以为会受到丈夫的长辈及亲属们的热情接待和亲切抚慰，谁料迎接她的却是人们的满脸冰霜和冷嘲热讽，还给她套上诸多封建的桎梏。全赓靖只好忍辱负重，在附近学校找了份教师工作，生活过得非常艰苦。

1937 年，张发奎到粤东视察，得知全赓靖在梅县，特地来探望。见到张发奎，全赓靖一如见到父辈，郁满于心的苦水尽情向他倾吐。张发奎开导说："我在家乡办了一间学校，你不妨去韶关看看，说不准有你用武之地。"全赓靖便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跟张发奎来到矮岭村。

全赓靖一到风度学校，便被这里浓厚的学习气氛和进步思想所感染，马上表示愿意留在学校。张发奎听说她愿意留下，高兴万分，专程派人把她的儿女从梅县接来，又安排她母子三人住进了他在家乡新建的楼房——"贵庐"。不久，他又安排全赓靖当了教导主任，后来张光弟离校后，全赓靖升为校长。

晚上，张发奎夫妇在家宴请风度学校的全体老师。酒过三巡，他话也多了，笑着告诉大家："我这次是和老蒋斗气才回来的，让他派嫡系部队去同日本仔打好了。我是个有名无实的光棍司令，只好回老家来洗洗温泉水，吸吸新鲜空气。不过，赌气归赌气，我的地盘是不会丢给日本仔的。他老蒋打不赢丢失了国土，他要负责。"

全赓靖风趣地说："长官呼吸新鲜空气可以解闷消愁，可我们快要把空气当饭吃了。"

张发奎闻言一愣："有那么严重？怎么不及时打报告？你且说说。"

张光弟说："我们都知道张长官对创办风度学校用心良苦，除投以巨资建校舍外，学校平时的费用，均由您拨款支付。学生多数出身贫苦人家，您特地交代免收他们的学费、书杂费等，对少数特困学生，还给予免收伙食费，享受工读生待遇。也正因为如此，学校开支很大啊。"

全赓靖接着说："学校扩展，教职员工、学生成几倍地增加，庶务主任日夜为口粮、开支发愁。动员高年级的学生勤工俭学，开荒种番薯瓜菜，教职员工也下田了。没有其他经济收入，学生又穷，学费收得很少，长此下去，师生都要勒紧裤带了。"

对于风度学校，张发奎一直非常重视。1936年春节，他听说学校即将建成，偕夫人刘景容专程回乡，在视察了校舍后，提出校舍应以成龙配套为好，待以后办完全小学和中学。为征用地皮扩建校区，夫人刘景容亲自挨家上户走访，苦口婆心做村民的工作，使村民答应让出自己的土地给学校建房用。

张发奎沉思片刻，说："这样吧，我回去后设法拨笔专款，用于购田买山，作为校产，用收租收息来补充学校的经费不足。"

全赓靖高兴地说："这样就更好了，有了田产，学校就能长久办下去。"

张光弟汇报说："学校自创办以来，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慕名到学校来执校，教师中有20多名是由中山大学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目前，校学生中有一半以上是来自外地的。今年夏天，首届高小毕业生将要毕业。"

张发奎连声说好："我们办学校就要有点气魄，有点风度，要坚持'教、学、做'的校风，广揽人才。你们要常把学校的情况告诉我，有什么难处尽管说。"

吴新民笑着向全赓靖介绍说："全老师，你或许还不知道吧，张长官虽是军人出身，对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重视。前几年，始兴文化教育界人士，为解决民众文化娱乐场地，建造了中山公园，同时将城隍庙改建为中山图书馆。馆建成后，吁请张长官购买图书。张长官慷慨解囊，捐赠了《万有文库》丛书、线装本《四部丛刊》和其他图书近4000册。"

全赓靖一听，眼睛一亮："这两部丛书，颇为珍贵，一定要好好收藏和利用啊。"

大家正说到兴处，村长走了进来："张长官，我们村来了个外地人，

跑到这里来种鸦片。”

张发奎最讨厌别人种鸦片、吃大烟，大声说：“你们叫人赶他走，铲掉他的烟苗。”

村长无奈说：“我们派人已赶过，这个人不知好歹，赖着不走。”

张发奎“啪”地一放酒杯，大怒：“他不走，就把他抓来，就地枪决；以后凡是本村敢抽大烟的人，都给我关起来，强迫戒烟后才放回家。”

三、电话频频，催上征程

张发奎告假回乡，各方甚为关注。蒋介石通过陈诚、白崇禧和张治中等频频电话电报催他回桂林行营指挥。李汉魂也设法从中周旋，做尽工作，但张发奎怒气未消，托病拖延。

有一天，电话又来催促，张发奎火了，大声骂道：“我是个无兵司令，谁有兵，谁上阵！你们小病大养，我真病也不能歇歇喘口气？”

过了一会儿，他用更大的嗓门说：“……什么？风度学校有共产党？我不管什么党，能办好我的学校的就功不可没！”扔下话筒，喘着粗气，倒头就往床上躺下。

晚上9点钟，初月如钩，晚风和拂。张光弟陪着张发奎到刚建成的“向华泉”去泡温泉，让他散散心。

说起这温泉，还有一段故事：

原来矮岭山脚下小溪旁有一烫湖（即温泉），水温适中，又靠近村庄，全村男女老少都喜欢来这里洗澡、洗衣服。起初，村民为遮身换衣，用杉树皮在这里搭起了简易茅棚，但男女之间只能轮流使用，很不方便。1939年春，在军务之余，张发奎约欧震军长、华振中师长等，由始兴县县长吴种石陪同，回乡给父亲扫墓。

扫完墓，张发奎一行兴致勃勃来到温泉中尽兴而浴。大家不断赞叹此地山色宜人，地灵人杰，而且还有这么好的温泉供人享用，认为确实是难得的“风水宝地”。吴种石随口提出，要是能在此烫湖上盖座洗澡房，那就妙不可言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发奎当即接上说：“此言极是，我是本乡本土之人，虽立志军旅，应饮水思源。此事也确是自己的一桩心愿，但办风度学校开支颇大，现已无财力了却己愿，很是遗憾！”欧震爽快答道：“既然如此，张长官只管吩咐操办好了，所需款项概由本人支付。”张发奎拱手道：

"欧军长，那我就代表乡亲先此道谢了。"

随后，张发奎将此事全权交由张光弟负责。半年后，一座建筑在烫湖之上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温泉浴室竣工。欧震以张发奎的字号定名为"向华泉"，并亲笔题名，县长吴种石还写了篇《向华泉记》，刻写在里墙上。

张发奎与张光弟二人在温泉泡了不一会，突然激动起来，愤愤不平地解释今天打电话的事："这次我回广东，老蒋明要我管广东广西的军政，暗地里又把我架空，广西，我针插不进，水泼不入，可桂南战况一紧张，他老蒋又电令我去指挥。这种任意分割建制、随便破坏战区划分的怪事，恐怕世界战史上也绝无前例。但话又说回来，日本仔还是要打的。回家前，我已安排莫雄等人组织地方武装力量，用游击战术，在日本仔周围搞袭击。我是一向主张坚决抗战的军人，最终我是要回到前线的。这次回到家乡，是想清醒一下头脑，老蒋却派那么多人来电话、打电报要我赶快回部队，电话中还说我的学校有共产党，要我注意。我当时十分气愤，丢下话筒就走了。"





他忽然严肃地对张光弟说："你是校长，你说，你们学校有共产党吗？你们是共产党吗？大敌当前，我们是爱国爱民爱乡的，共产党也主张抗日救国，所以我就回答他，我不管他什么党，你们能办好我的学校就是好的。"

两人边洗边谈，轻松愉快，张发奎上午的怒气也消了许多。

张光弟见状，不失时机地说："同日本仔展开武装斗争是全民的要求，矮岭虽地处偏僻山区，但村民爱国热忱高涨。去年，您拨给我们学校重机枪2挺、冲锋枪8支，手枪10多支，步枪300多支，子弹六七万发和手榴弹等军用物资一批，为给抗日救国保家乡做准备，我们想把矮岭周围各村的青年组织起来，集中到风度学校进行军事训练，并把现有的武器发下去，寓兵于民。您说好不好？"

张发奎爽快地回答："好呀，这个我支持。以后，可再运些枪弹回来。"

谈到兴头，张发奎不禁回忆起他跟随孙中山出生入死、努力奋斗的历史，有些动情地说："我能奋斗出来，完全是家乡贫穷落后受欺凌而逼出来的，当然，更是中山先生的人格和革命思想感召之结果。我这几十年来，追随中山先生，争取实现三民主义而深切感到，必须把全体民众团结起来，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惟有如此，方可成功。"

他用干毛巾擦了擦头发，继续道："我们矮岭村有张陈两姓，长期穷苦受人欺凌，主要是没有文化，知识少，见识短浅。这里是山区，开门见山，

世代干死干活，生活仍然是贫困落后。我所以办风度学校，就是想使家乡兴旺发达，希望大家共同把学校办好。现在办小学，逐步办中学，以后有条件要办大学，还可以选送成绩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把矮岭建成彩岭，这就是我对家乡发展前途的愿望。”

此后，家乡人们根据张发奎的意见，把矮岭村正式改名为“彩岭村”。

张发奎在家乡一共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前线频频告急，他便屏除成见，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怀着对家乡山山水水依恋之情，告别众乡亲和师生们，匆匆上路了。

四、签署撤令，平白担过

1月20日，张发奎只带了左洪涛一个机要秘书离开韶关，经衡阳往桂林，于1月26日随同陈诚及李济深等赶到柳州，翌日，到达迁江桂林行营指挥所。

张发奎做梦也没想到，在一切情况未明了之前，要他做第一件事，就是签署下达一个正面部队退却的命令。这个命令已经行营指挥所的人员预先拟定，好像是专等他来签署下达。白崇禧苦笑着告诉他：“向华，情况已到了不容丝毫考虑片刻，否则昆仑关附近的部队有被敌包围歼灭的可能。”

张发奎无可奈何，在命令上画下一个“奎”字，忍痛承担起这个失败的责任。

2月3日，昆仑关失守。中国守军受到沉重打击。

张发奎和陈诚、白崇禧等马上变更兵力部署，加强两翼，侧击敌后，以一部兵力占领左侧要点，企图阻敌北进；以主力由贵宾路方向迂回出击，企图切断北进之敌的后方交通线。但是，日军此次行动，旨在奇袭反攻，誓报“钢军”被歼灭之仇。他们在发动闪击战袭击，达到重创昆仑关中国军队之目的后，突然掉头南下，除第五师团等部仍留守南宁和附近主要据点外，主力则在钦州湾安全登船远去。这真是一次远距离漂亮的奇袭作战。

中国军队重新占领了五塘和昆仑关在内的战略要地。

2月23日，由重庆赶来的蒋介石在柳州召开主持军事会议，检讨桂南会战的得失和功过，参加会议的有：白崇禧、李济深、陈诚、张治中、商震、张发奎、薛岳、余汉谋以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及参加桂南会战的各军军长。蒋介石对当前战局发表了长篇讲话，指出如何克敌制胜的对策。大家一

致认为桂南会战失败的原因，在于上级指挥官的判断错误和处置失当，而第六十六军更犯了行动迟缓与不听命令之罪。

25日，蒋介石在会议闭幕前宣布了处分意见，陈诚和白崇禧两人均受了降级的处分，张发奎也被记了一次大过，六十六军军长叶肇则被撤职扣办。另外还有一长串处分名单。由于敌寇突袭七塘，张发奎匆赴迁江指挥，并没有参加下午的闭幕会。

张发奎一直对自己无故被处分甚感不满。回忆在淞沪会战初期，他原任右翼军总司令。但濒临该会战之末期，最高统帅部决定撤退时，他被调为淞沪会战之中央地区队之总司令，负担了淞沪会战的战败和撤退责任。这一次桂南会战，历史重演，他又被安排担任了签署撤退命令的角色。使他蒙受桂南失败的处分。

时任上校团长的李以劻回忆道：

> 一九四二年八月，我与区寿年、彭程三人由陆军大学毕业回经柳州时，向公和其夫人刘景容招待我们吃晚餐，向公在席间对我们大骂白崇禧乱指挥，破坏指挥系统，招致大败！在四战区作战序列，另行设一个指挥机构，越级指挥，古往今来世界战史上是无前例的等语。当时他的心情十分激动。





硝烟散去，张发奎对于自己被处分之事并不感到惭愧。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指挥过这场战争，何过之有？检讨起来，最高统帅部实犯有两次严重错误——第一次是根本不该把桂南地区的指挥权由第四战区拨交给桂林行营；第二次是根本不该把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对广东省西江、东江、北江地区的指挥权移交余汉谋。正是这种权责不明，双重指挥的紊乱的系统在桂南作战中造成极大的教训，他不能再为这个紊乱的系统而牺牲自己的责任，必须有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且对于两广地形和交通隔离的状态，与原战区地境的划分，也有调整的必要，否则顾此失彼，牵制丛脞，增加指挥上的困难。基于上述理由，他主动向最高统帅部提出特别建议：将两广划分为两个战区，其中，建议广东战区由余汉谋负责，他自己则专门负责广西战区。

张发奎事先征求部下和幕僚的意见，部属们纷纷表示反对："把四战区一分为二，张长官你这样做，无异削减自己的地盘和权力，有什么好处？"张发奎语重心长地说："国难当头，一个军人只有自忖自己的能力，去做可

能担当的事，为国家分忧。醉心权力的观念是一个英雄思想或军阀的野心。历史上许多庸才揽权的人，仅考虑私益，结果做了许多祸国殃民的事。”

张发奎不顾部下的反对，毅然向上提出划分第四、第七战区的方案。最高统帅部最初并没有同意，只是撤销了桂林行营，后来由于张发奎多次申述和请求，终于在9月间，将广东另外划出一个第七战区，任余汉谋为司令长官，张发奎仍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在把四战区司令部从韶关搬迁至柳州前，张发奎遥望故乡，考虑再三，做出了一个决定。

这天，张光弟在风度学校突然收到一封急电：“火速来韶。奎。”是凶是吉，是喜是忧？谁也猜不到。张光弟带了吴新民风风火火赶到韶关，在长官部见到了张发奎。

张发奎对他俩说：“世事多磨，难以预料，我要把四战区迁往广西了。以后山高路远，阻隔重重，我不能照顾风度了。你们千万小心谨慎，好自为之啊！趁战区调防的机会，你们要的武器，现在就批给你们。但话得说清楚，那是用来保护学校和彩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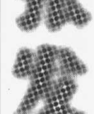
他亲笔写了批条，嘱咐他们到战区军需仓库领取，还一再叮嘱：“事不宜迟，小心行事！学校和我的私产，你全部给我管起来，每半年给我汇报一次就行了。诸多拜托。”

张光弟叫吴新民雇了两艘大木船，将几百件轻重武器、7万多发子弹和一批军用物资，沿浈江逆流而上，转向墨江，在始兴换了几条小船，星夜赶到了隘子，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搬到“贵庐”的地下室，掩藏起来……

后来，风度学校用这批武器成立了始兴县政府抗日自卫队风度卫校独立分队（简称风度队），1945年2月，始兴沦陷后，又成立了“始兴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成为活跃在粤北的一支抗日队伍。全赓靖也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是张发奎始料不及的。

第十七章　平静时期，柳州勤治军

一、战史旅行，向敌“学习”






桂南会战后，日军乘法国在本土被德国纳粹打败之际，于1940年冬大举侵略法属越南。他们主动放弃南宁，将龙州、南宁的部队全部由钦州湾登舰运往越南，法军不战而降，日军很快占领了越南。

日军全部撤走后，张发奎指挥部队迅速收复了南宁、龙州等要地，使广西南部重回祖国怀抱。此时，放眼望去，第四战区辖境已没有敌人的踪迹。这是战时一个难得的平静时期，但张发奎心里明白，这只是台风前的平静，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必须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做好一切准备，随时防范日军的再次侵入。

南宁光复后，最高统帅部把第四战区主力部队相继调离他处，四战区仅辖有一个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和该集团军所辖的第三十军。换句话说，张发奎手里仅有一个军，兵力有限，他只能把主力配置于中越国境线上，防备日军的随时进攻。

张发奎是个爱钻研的军事家，深悉“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之理，在主力部队调离广西前，他把各部队的将领们集中在一起，进行了一次“战史旅行”，到昆仑关、南宁各处的战争要地，考察日军留在战场上的工事阵地等。

他告诉众将领：“……这是极需要而又有价值的事，也是最好的战争教材。想想看，敌人以少数兵力据守南宁将近一年，我军用10倍以上的兵力对他攻击不下，原因何在？我们必须研究。”说着，他在实地分析道，“大家看，敌人的阵地是一个圆状据点式的构筑，每一个据点的周围环绕着许多卫星式的小据点，形成了要塞复廓式的形状。每一个小据点都能独立作战，

而且各据点之间的火力都有互相的联系……这和我们通常采取的阵地布置大为不同。因此，我们从正面去攻击，常常不会成功，即使深入其阵地内部，也不能撼动其阵地的联锁。除非把每一个据点逐一予以摧毁，否则不易收到决定性的效果。”

将领们点头称是。

有了这次战史旅行的收获，1944 年春，张发奎又举行了一次形式与战史旅行相同、而性质不同的入越参谋旅行演习。

原来在 1941 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英美部队对日宣战，这使中国军队看到了胜利的希望。1943 年冬，张发奎接到最高统帅部的一个训令，令他们拟定一个中国军队入越的作战计划，于是，他拟定了一个以 3 个军为基干的入越作战计划。为了预演该计划，他花费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组织了一次“参谋旅行”。所有预期参加入越作战的部队指挥官、主要幕僚和后方勤务人员，都参加了演习。只是在后来，日军突然发动桂柳会战，改变了整个战争局势，这个入越作战计划才未实施。

然而，正是因为这个计划，张发奎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革命党人有了联系。

二、支持越南，释胡志明

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同盟会时期。当时，正在日本筹组同盟会的孙中山两度与越南革命先驱潘佩珠会晤，揭开中越两国革命党人友好合作的历史篇章。其后，越南维新会改组为光复会，光复会改组为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党人的独立运动一直受到中国国民党的影响。

1940 年 6 月法国在欧洲战败后，日本乘机压迫法国，企图切断援华路线。在日军的武力威逼下，法越当局与日方正式签署了《日法越南协定》。《日法越南协定》的签订意味着越南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根据地。为防止日军假道越南进攻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驻守中越边境的第四战区开始采取相应的军事防范措施，张发奎调派在中国军队任职的越籍军官张佩公来柳州组织专门对越的情报机关。

当时，中国政府对越工作主要通过两个系统进行：一是军事委员会系统，具体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负责，主要在中越边境开展活动。二为中央党部系统，具体由海外部越南办事处负责，主要工作为策动越泰侨胞，

联络越泰军民，为军事反攻做准备。据曾天节（黄埔第六期学生，中共秘密党员）回忆，张发奎委他担任少将参谋兼第四战区特别训练班主任（内称为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主持越南抗日青年的训练教育工作。张发奎认为，扶持一个同种同文的越南民族的独立，是中国责无旁贷的任务。至 1942 年上半年，共培训越南青年学生 702 人，其中女性 36 人。这批青年成为后来中国公开扶助的越南革命团体——“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骨干力量。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越南划归中国战区，中国对越策动工作更趋积极。为了加强联络工作，第四战区还向越南革命同盟会派驻了指导代表。1943 年底，张发奎亲自兼任指导代表，并成立一个指导代表办公室，具体负责对越工作，主任为中将高级参谋萧文。

虽有中方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但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甚至因内部纷争不断，到 1943 年 7 月至 12 月底，完全陷入停滞的状态。这让张发奎苦恼不已，为了改善和切实加强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他决定改变扶植对象，加入胡志明一派的势力，重新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然而，他没想到，胡志明竟然被关在四战区的狱中。这是怎么回事呢？

越南共产党的著名领袖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又名阮爱国。1942 年 8 月下旬，他从越共的总指挥部北坡秘密来到中国。他这次来华目的，准备到重庆会见蒋介石，商量反侵略统一战线。临行前，他为自己印制了名片，名片中间写着化名“胡志明”3 个字。胡志明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8 月 29 日，胡志明越过中越边界，在前往天保县途中，被当地警察拘留，随即被押往靖西县城。靖西有关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有关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嫌疑犯，因而决定送交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审查。于是，胡志明被押往桂林，随后于 12 月被押往柳州，交第四战区司令政治部审查，被关押在长官部政治部军人拘留所的一间小房内。

惊悉胡志明被拘留，越南共产党迅速致电世界各大通讯社，呼吁给予援助，并致电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要求立即释放胡志明。在重庆，中共代表周恩来亲自找到爱国将领冯玉祥，委托妥为营救，冯玉祥便与李宗仁一同去见蒋介石，要求从国际反法西斯大局着想，释放胡志明。不久，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电令广西省政府和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尽快查明胡志明的真实身份。

张发奎接到电报后有些吃惊，命令政治部查找，果真在拘留所里有个叫

胡志明的，但由于胡志明的隐瞒，并不知道他就是越共领袖阮爱国。1944年1月23日，张发奎亲拟函致蒋介石、吴铁城，说明胡志明被捕的原因：

> 国际反侵略越南分会代表胡志明被派携函自越赴渝，拟谒钧（委）座致敬，向我中央请示抗日方针与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联络，于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路经广西天保县境，因其所携证件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会会员、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明书、本部军用证明书等，均民国二十九年所发，久已过期，被天保县属街长乡公所检查，疑有间谍嫌疑，经乡县专员公署钧（后委）会、桂林办公厅本战区政治部各级机关递解押讯。

在该函中，张发奎还恳请蒋介石，由他“俾予任务”，派遣胡志明“回越工作”。张发奎之所以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胡志明，主要因为：

一与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有关。据张发奎回忆：在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者。二与胡志明隐瞒真实身份有关。胡志明在中国境内从事革命活动时经常使用化名。被捕期间，胡志明仅承认是“越南革命干部”，并曾参加过共产党，但与中共无关。第四战区政治部经过半年多的多方调查，也只能证明他是“第三国际活动分子”。三是因为胡志明的个人能力和实力。张发奎对胡志明的印象颇佳，认为从“言语文字推断”，胡志明“似于三民主义抗日政策均有深切了解”，而且“才思老练，气度和平”，并强调指出，“其（胡志明）所代之分会，据其自称有廿余万民众”。

胡志明在柳州的活动总计达1年10个月之久。1944年8月9日，张发奎正式释放胡志明，并根据他所拟的“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同意胡志明率领18名越南战地工作总队队员入越开展工作，拨给入越经费7.6万元，此外还发给护照、公文和药品等，并拟援助武器。但胡志明回越后不久，10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便得知胡志明即是越共和越盟的首领阮爱国。张发奎上报的援助计划才未获批准。

其实，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张发奎如此扶持胡志明早有意见。张发奎是从“协助我方共同打击敌寇”的军事角度出发，主张扶植在越南境内有实力的越盟；中央党部则从党际关系亲疏的角度出发，主张扶植与自己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党。对于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改变扶助越南国民党的做法，遭到以

吴铁城为首的中央党部的反对。吴铁城曾致电张发奎，要求释放因“违反纪律”和“破坏革命同盟会”被四战区逮捕的越南国民党人严继组等。张发奎却列举出越南国民党的种种违纪行为，坚决拒绝了吴铁城的建议。

为了缓解第四战区与中央党部之间的矛盾，打破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僵局，1945 年 2 月 27 日，参与援越工作的中央党部、军统局、海外部等各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商议解决“严案”，结果同意释放严继组。会议还决定，将指导越南革命的全权暂时移交陆军总部作一过渡，将来再由陆军总部移交中央党部主管。但是令中央党部始料不及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很快又将指挥权交还给第四战区。

三、倾心创办，志锐中学

随着战事的平静，张发奎着手把他创办的志锐中学从韶关迁移到柳州。

早在抗战前，曾一度在第四军供过职的开平人氏张天爵，找到老长官张发奎，说自己想在广州办一所建国中学，主要招收第四军的子弟，希望得到张长官及四军同仁的支助。张发奎大为赞许，同意资助，并建议把建国中学改名为志锐中学，以纪念四军中阵亡的许志锐师长。他深情地说，许师长生前“勇于为人，严于治军，智轶其群”的治军态度和个人作风，深得四军全军上下的称赞。许师长的阵亡，是四军的一大损失，我们都十分悲痛和惋惜。

于是，在张发奎等四军上层人士支持下，志锐中学创办了，但当时规模不大，师生也不多。不久，因抗日战争爆发，张天爵被迫解散学校，带着校部北上韶关，拜见张发奎，提出在粤北复办志锐中学的建议。



张发奎说：我同意在粤北复办志锐中学，但一定要把它建得更为规范，做大做强。我们建校的目的，就是通过纪念许志锐师长，来纪念北伐战争中屡立功勋的第四军全体将士的业绩。要把该校办成为第四军的子弟学校，着重培养第四军的子弟及其遗孤，以造就一批后继人才，让“铁军”精神发扬光大。

张天爵点点头：我有个设想，打算成立学校董事会，请张长官您担任名誉董事长，请第四军欧震军长为董事长，请广东省府李汉魂主席和第九集团军吴奇伟总司令为副董事长，再请第四军其他上层人物担任董事。您看怎么样？

张发奎说：这个设想好。让大家都来出把力，先临时筹集资金5万元法币，作为首期学校开办经费。另外，还可以每月从第四军历年积存的公益金中拨出5000元，作为日常费用开支。

张天爵说：太好了，有了经费，下一步就是找老师了。

张发奎说：师资是现成的，我的战地服务队里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抽调到学校当教师，他们思想活跃，对学生会有帮助的。依我创办风度小学的经验，志锐中学的所有学生实行供给制。全部学生都在学校内食宿，一切衣裤鞋袜、被席蚊帐、伙食医疗、书籍文具，甚至平时用的卫生手纸、信封邮票等，均由学校包下来。

张天爵说：这更好了，学生与家长也就无后顾之忧了。张长官，您认为校址在哪建为好？

张发奎来回踱了几步，说：就在始兴县城的文庙设址吧。韶关是战时省会，日机常来骚扰、轰炸，不安全，校址设为始兴城郊，较为安全，你们还可经常与始兴县府保持联系，得到必要的照顾，有利于教学。

当然，张发奎还有一个理由没说出来，就是志锐中学设在始兴，可以繁荣自己家乡的教育，也让家乡的子弟受益。

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志锐中学不久在始兴文庙复办。学校是半军事化管理，抗日的气氛很浓，不少教师是从第四战区战地服务队调来的，有自己的文艺专长，平时，积极向学生灌输抗战到底的思想、教唱抗日救亡的歌曲。1939年冬，张天爵提出辞呈，张发奎便指派长官部秘书杨瑜接管志锐中学。其时，学校已增至初中部4个班，小学部3个班。

1941年夏，张发奎考虑到志锐中学再在始兴办下去，不利于加强联系和管理，也不利于学生见世面、长知识。于是，他电令学校迁往广西柳州大桥第四战区干训团所在地暂时上课，并着手在韶关市北郊的十里亭择地兴建永久性校舍。

1942年春，志锐中学从柳州大桥迁回粤北新校上课。谁知从柳州迁校韶关不久，日机经常轰炸袭扰韶关，新建成的校舍两度遭炸，校园内连中炸弹60余枚，房屋被炸塌，图书仪器被炸毁，损失达50余万元。消息传到柳州后，张发奎发来急电，对志锐中学全校师生员工表示慰问，表达了他要继续办好志锐中学的决心："敌人毁之，我必复之。"他及时地拨出110万元巨款，用作修葺炸坏的房屋和扩建校舍。

1943年冬，志锐中学已初具规模。许多校舍是原第四军的将领捐款建

造的。董事长张发奎所题写的“公、诚、廉、毅”的校训，要求学生们身体力行。每天的集会或开会，师生们都齐唱《我们是小铁军》这支由吉联抗谱曲、孙慎和声的校歌。其歌词是：

> 我们是小铁军，我们是小铁军，不怕风霜，不畏艰辛……铁的纪律，火的热情，踏上革命的大道前进。我们有好模范，我们有铁将军学习、学习！汀泗桥、武胜关，保卫民族、解放人群！革命需要我们，我们是小铁军！

1944 年夏，长沙、衡阳相继失陷，粤北形势顿时紧张。志锐中学遵照张发奎的命令，将小学部迁往广西柳州，中学部迁往始兴县城。1945 年 1 月 27 日，韶关沦陷，日军进犯始兴。迫于恶劣形势，志锐中学将学生疏散回家，剩下那些无家可归或与家庭断绝联系的学生则随同学校撤至张发奎的家乡清化。同年 8 月，志锐中学正式转为省立学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许多单位人员急于迁穗，铁路运输十分拥挤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担任广州行营主任的张发奎，命令铁路部门拨出一节“志锐中学复员专车”，将志锐中学的师生接到广州。






张发奎在广州行营召见了全体师生。当他看见眼前这一群饱经战争磨炼、衣服破烂、面容憔悴的师生时，硬汉子的他也忍不住眼圈一红，泪流满面。约沉默了 2 分钟，他才说出第一句话：“想不到我花了大量心血创办的学校。如今就留下你们这几十位员生……”说到这里，声音哽咽了，心情十分沉痛。接着，他鼓励同学们要振作精神，抓紧时间，刻苦学习，立志做一个“小铁军”；希望全体师生要牢记志锐中学的校训，把学校办得更好。



1946 年 8 月。广东省教育厅决定将志锐中学重新设于粤北，校址选定在韶关市区。张发奎得悉后，热情赞助。至此，志锐中学已成为粤北一所初具规模的完全中学。1950 年 2 月，志锐中学与曲江县立第一中学和省立韶州师范学校临时合并，定名为北江临时联合中学。同年秋，曲江一中和韶州师范分离出去，学校正式改名为广东北江中学，成为省内外知名的重点中学之一。

张发奎虽为军旅出身，却热心致力于教育工作，亲手创办了风度学校、志锐中学，为山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一直到张发奎晚年，志锐中学

校友们还亲切称他为董事长。

四、生活简朴，平易近人

在柳州的日子，总的来说还是较为平静，这里可以说说张发奎的日常生活。

张发奎身为二级上将和司令长官，却从不摆架子、不显阔气。他一生除喜欢跑马、跳舞之外，并无其他嗜好，生活十分简朴。张发奎有时去看市容，只有一个卫士跟着，部下担心他的安全，他却说不要紧。平日里，一天三餐多是与少校副官、少校秘书一齐吃饭，两菜一素一汤，没有特别的菜色。有客人来，最多加一两个菜。家里虽然放着山珍海味，却很少享用，只是在接待李济深、白崇禧、叶挺和蔡廷锴等要人与老友时才摆上酒席。在他的副官胡化中印象里，张发奎所穿的军服中，料子最好的是一套草绿色的哔叽呢。冬天跑马，有一件半身的黄呢军大衣护着膝部。

张发奎夫妇生活简朴，这对在机关和官兵中提倡节俭，都有着良好的影响。比如他去看戏、或听小提琴演奏，总是步行前往剧场。黄绍竑赠送他的那辆防弹小轿车，闲置得车轮几乎不转，急得司机屡来副官处要求试车。张发奎年轻时香烟瘾大，但已戒烟多年，酒量可不小，1941年“双十节”，他向苏联顾问捧起大杯，眉也不皱一饮而干；大家轮流回敬他，他也满不在乎。但他不常饮酒，更不滥饮，从没在酒后发脾气。他还十分讲卫生，不随地吐痰，碰上训话时间长，要吐痰就掏出手帕，吐在手帕上，包叠好放在衣袋。遇见有人随地吐痰的，他指着痰，眼一瞪，要那人自己马上采取措施。

张发奎不论寒暑，喜在凌晨跑马，极少间断。参谋长吴石也爱骑术，少不了双双驰骋，彼此角逐。一天，在一块草地上，张发奎正抖擞精神，两骑如飞；不意有一团石土飞起，碰上其马前蹄。马正风驰电掣，前蹄一栽，把张发奎摔落半空，卧床半月不起。夫人刘景容每日亲侍汤药，悉心护理。平素不爱发火的张夫人见丈夫伤得不轻，禁不住把新接手的马房刘副官叫来训了几句；又念起那个忠心耿耿、从马夫升到上尉的叶桂标。以往，叶桂标每牵出张长官那匹褐黄色高头大马，一定细查鞍辔，小心翼翼地紧随张发奎马后，一见“大王”扬鞭飞驰，总免不了扯起喉咙大喊：“慢！慢！”吴石见张发奎负伤，有一股说不出的负疚感，终日眉目不展。但张发奎毫不在意，伤愈后依然见他骑马出现在升旗场上。

在第八集团军、第二兵团时期，张发奎在前方督战，他把夫人刘景容留在始兴故里，到韶关任战区长官时，夫人才离开故里到韶关，住在本部后门外的“后山”。长官司令部移驻柳州后，他才把夫人从广东接来。张夫人刘景容与李汉魂夫人吴菊芳，都曾远渡重洋，到异邦求学，但志趣各异，刘景容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从不过问一桩机关人事问题，就是一般场合的露面，也是屈指可数。

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桂林成为大西南的文化中心，大批文化名人聚集桂林、柳州，使桂柳两地一度成为相对开明、活跃的抗日中心。中共也设立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张发奎一向与郭沫若、茅盾、田汉和夏衍等到进步文化人保持密切关系，对抗日救亡活动采取支持的态度。一次，茅盾先生路过柳州，张发奎盛情款待，茅盾即席赋诗赠他：






倭奴惊哭国人笑，常胜将军犹未老。
淞沪当年颂战功，南天此日载仁道。
英谋远莫制机先，惜士爱民倡导早。
勒马何时鸭绿江，引觥一掷乾坤小。

黄仁宇在其新作《黄河青山》中，写到久慕张发奎大名、特地去拜访的情景，写得非常有意思，不妨摘录一段：

> 如果田（汉）伯伯的个性可以从朋友中看出来，最明显的就是张发奎，国民党少数的一级上将之一。张将军曾震惊新闻界：在上海之战时，日军炮弹已打到他的总部门口，他照样有办法睡着。他的副官叫醒他时，他咆哮：“保持警觉，我说过了，每个人都要保持警觉！”他自己警觉了一下，又继续睡。当时还有一个因素没有明显提到：他前方是吴淞江上的日本战舰，他无法进攻，但在蒋介石命令下，他又不能撤退。因此他以自己的性命当赌注，作为手下的模范。在围城时，田伯伯拜访他两次，他们互相把对方灌醉。如果这起事件发生在西方的军队里，一定会引发军纪的问题。但在中国，却展现出豪放慷慨，符合传统文化的规矩。后来田伯伯发表了这篇在日军轰炸下饮酒的故事，附上一首情感充沛的诗，广为流传，深受好评。

在此之前的北伐期间，张发奎的军队赢得中国“铁军”之称。据说张对田汉说：“铁军？我不知道为何会变成铁军。我只有一种部署：让叶挺当先锋，贺龙打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方法！”不过，一个稍有见识的听者仍然会感觉到，这个简单的部署计划之所以能奏效，全都是因为指挥官和张将军的个性，让他们能带着幽默感和一丝淘气苦撑下去，有时又不免鲁莽躁进。他们有巴顿（Patton）将军式的迅速直接，却没有林彪不可理喻的残暴，在一个只能以农民为士兵、只能供应他们简单武器的国家里，难怪可以轻而易举赢得全国的民心。

我们向十四师报到的途中会经过柳州。我听了太多关于田伯伯朋友张发奎的事迹，于是向田伯伯建议：为何不让我们去拜会他呢？无论就何种标准来看，这个建议都不合常轨。不过，全权负责第四战区的张发奎将军，因为朋友田汉的一封介绍信，愿意短暂接见我们这三个未经世事的中尉。他个子不高，相当瘦，动作敏捷。不幸的是，一位伟大战士的魅力，就像剧作中的英雄一样，需要舞台来烘托，这可不是远离战场的一间小平房办公室所能做到的。张将军出来见客时毫不做作，当着我们的面揉眼睛，似乎刚从午睡中醒来。他的勤务兵端茶给我们。将军告诉我们，下级军官势必要走许多路，他年轻时，曾走遍中国的西南地区，没有一个地方不留下他的足迹。除此之外，整个拜会过程平淡无聊。但这次经验更让我相信文学界人士的力量及影响力。在大众心目中，英雄事迹要显得真实可以理解，前提是必须要有像田汉这样富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才能在纸上以浪漫和节奏感重新安排英雄的丰功伟业，最重要的是要有扣人心弦的舞台效果，例如吴淞江上乌云低垂，强风刮起长江上的波涛，战旗飘扬，战马嘶鸣等等。在联合阵线时期，郭沫若和田汉在这方面都贡献良多。可惜国民党并没有继续善用他们的才华。

四战区长官部驻地在柳江之滨的蟠龙山麓，是一个已迁贵州的兵工厂遗址，江边隐蔽有一条长约20米的中型水艇，这是张发奎惟一的水上公馆。在水艇上，张发奎接待过“铁军”老军长、时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夫妇，同时还接待了他的一位北伐时的至交、“皖南事变”中被捕的叶

挺。

1941年皖南事变中，叶挺被国民党扣押。陈诚千方百计对叶挺威胁利诱，却动摇不了叶挺的坚定信念和意志，便向蒋介石建议将叶挺从恩施转移到桂林，但蒋介石怕叶挺与李济深搞在一起，便改为到柳州四战区张发奎处。张发奎惟恐蒋介石藉口“借刀杀人”，面有难色；叶挺睹此情景，坚决要求到桂林。

因桂系插手了“皖南事变”，桂林方面一时乌云翻滚，阴霾密布，八路军办事处被迫撤销，一部分搞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的党内外知名人士也一度离开桂林赴香港。国民党各战区首脑纷纷发表反共通电，对新四军进行声讨，惟独张发奎和他的第四战区按兵不动，采取中立的态度，因而柳州局势基本上是平静的。这一点中共对张发奎有较高的评价。



张发奎虽然无法营救叶挺，但仍设法改善叶挺的生活条件。他时常邀请叶挺在其水艇上盘桓数日，两人同游漓江，共话友情，还请叶挺在纪念周上作了一次勉励官兵抗战的简短讲话。



一年多后，蒋介石认为叶挺还有可能会被软化，下令押往重庆。据当时的军统特务头子沈醉记载，叶挺下飞机时头发胡子都很长，手持一盏油灯。别人问白日为何举灯，叶挺回答说天还未明，对国民党的黑暗予以了辛辣的讽刺。



五、仓库爆炸，酿成惨案



长官部驻地内有个军械库，属于军政部管辖系统，该军械库保管着几万发炮弹，3000斤炸药，储藏在蟠龙山东面的一个大山洞，洞口紧对着特别党部。由于系统关系，不能强令军械库迁走。中校库长是何应钦的侄子，30岁上下，细皮白脸，不像军人。

1941年6月下旬，柳州阴雨连绵，山水奔泻，因司库员的疏忽，水溢进洞，炸药受浸，起化学反应，洞口喷出白烟，昼夜不息。但是这何库长，仍然麻痹大意。喷了几天烟，一天比一天浓，他才打算将炮弹搬出。由于为时已晚，洞内温度高，人不能进，他竟索性不理了。张发奎知道后，天天派人询问，副官处也几次去人了解，而何库长总是那一句“没危险”！

6月30日早上，张发奎因山洞喷烟，时刻挂心，在赴办公室开会途中，绕路来到洞口，见洞口浓烟滚滚，大惊，把何库长叫到面前，问：“有没有

危险？”岂料这库长到了如此危急时刻，仍连声说：“没危险！没危险！”张发奎不放心，眼一瞪，又追一句：“有危险，你负责？”何库长满不在乎地挥了挥手中的一本小册子《保管弹药须知》，答：“我负责！”

张发奎以为他定有依据，不好再问，眼看开会时间快到，急急离去。

山洞到会议室，不足一公里，以张发奎步子，只需一刻钟。就在他离会议室十几步远，猛听得身后山崩地震的“轰隆”一声巨响，刹那间天昏地暗，飞沙走石，蟠龙山笼罩在一片茫茫的硝烟中。官兵们相顾失色，以为遭到空袭，一齐向外跑，

张发奎脑子“嗡”的一下，暗叫不好，军械库爆炸了。他大步地跨进办公室，脸色惨白，不知是气还是急，声音有点儿发抖，大手一挥，下令：“赶快通知卫生处，到中山堂那边救人！”“快去把军械库长抓来，别给他跑了！”“快交代南门卫士，不准军械库出去一人！”话音一落，转身直向山洞方向奔去。此时官兵们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弹药爆炸。

副官得令后很快地把库长抓来，他已被吓得面无人色了。

清查此难，特别党部上校专员以下，死 12 人，轻重伤不计其数。

张发奎望着那堆聚集在一起的焦头烂额的残缺尸身，含泪伤心地说：“我不杀库长，对不起你们。”

张发奎即将爆炸情况，急电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军政部长何应钦担心他的侄子生命不保，于是函电纷来，一面表示从优抚恤死难官兵，一面着将该库长解送重庆，交军政部军法司依法讯办。

照理讲，军械库属于军政部系统，库长犯罪，交军法司也是理所当然。但张发奎决心既定，实难屈从，他想到，库长一解军法司，命就保住了，那还行！在一次高级的讨论会上，有人考虑到何应钦又是参谋总长，不好硬顶。张发奎听后恼了，把桌一拍问道；“怎么？我 12 条命，抵不上 1 个库长？他既亲口保证没危险，为什么先将自己家眷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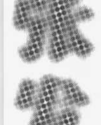
与会者听后默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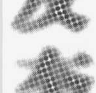
此事拖了很长的时间，对库长解往重庆的问题，张发奎毫不让步。何应钦最后以军委会名义来电，实际等于命令，但张发奎始终坚持到底。终于在柳州把这个库长处决了。从此事，可见张发奎嫉恶如仇，执法如山的一面。

在南卫门外一箭之遥的小山岗上，建起了一座由张发奎署名的“中华民国三十年六月三十日死难官兵纪念塔”，供后人凭吊！

第十八章　桂柳会战，全军大溃逃











一、全州失守，枪决军长

进入9月，早起已有些凉意。张发奎又是一夜没睡，前线战场的吃紧，使他感到平静的日子已经过去，暴风雨就要来临。

自1942年下半年起，随着中途岛、瓜岛战役和所罗门海战的失利，日军在整个太平洋地区所拥有的海空军优势便告消失，不得不转为防御。同时美驻华空军已在中国各战区普遍建立了空军基地，这给日军在海上交通与本土的安全，均造成莫大的威胁。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以主力部队进行一场贯通中国南北、连接南洋交通线及摧毁美在华空军基地为目的大规模战争。这个旨在打通大陆交通线被称为“一号作战”的计划在1944年1月底得到了天皇的正式批准。这一个攻势，在日军侵华的整个战略上说是被动的，但它的行动计划，使用兵力的强大和攻势之彻底，可说是它侵华以来规模最大的。

“一号作战”来势凶猛，在为期38天的豫中会战中，日军迅速击溃了中国第一战区的部队，攻陷了河南省的郑州、洛阳等38座城市，紧接着，日军开始了“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湘桂会战。

日军的进攻是从5月27日开始的，三路日军向薛岳的第九战区中国守军齐头并进，由于薛岳的轻敌和判断失误，坚守6年之久的长沙陷落，薛岳率残部败退湘南。8月8日，坚守了47天之久的衡阳孤城也被日军占领。

长、衡失陷后，日军又集中10余万兵力沿湘桂铁路向广西进攻，发动桂柳之战。为配合这次作战，驻防在广东的日军也从西江与雷州半岛两路，以分进合击态势向桂、柳突进。

最高统帅部命令第四战区一定要确保桂林、柳州的安全。

张发奎原来一直把第四战区的重点放在南线的中越边境，没想到湘北第九战区不到半年就崩溃，使广西失去了屏障，他不得不紧急把驻防中越边境的主力第三十一、四十六军迅速调往广西北面，日以继夜赶筑桂柳的城防工事，和黄沙河、全县的前进阵地。同时他向最高统帅部申述，要确保桂柳，至少要 7 个师的兵力，如果没有兵力增加，则他的一切的防守计划，均将难以实施。

日军第一个目标是拿下湘桂边界上的桂北重镇全州。此前，日第十一军攻陷衡阳后，所属各主力师团已兵分两路，沿湘桂公路两侧向广西境内扑来，仅 10 多天便奔袭 200 多公里到达全州城下，其间未遇到中国军队的真正抵抗。

全州，是中国军队在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补给点。武器弹药、被服粮食以及其他物资在这里囤积极多。此外，美军的汽油、杜聿明机械化部队——第五军的后方仓库物资，也在全州堆积。为了保住这个重要的交通要道和补给点，蒋介石在 9 月份两次电令张发奎等人“全州工事及其他作战诸准备应迅速完成”，“国军以乘敌突进予以打击之目的，决在黄沙河及全县附近夹击之”；并令第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杨森率第二十、第二十六、第四十四、第三十七军在全州西南 150 华里的道县集结，准备攻击来犯之敌的左侧背；该集团军副总司令李玉堂率第六十二、第七十九、新编第十九师等，转向新宁附近对敌之右侧攻击。同时，蒋介石急令陈牧农第九十三军退入广西边镇全州，在黄沙河一线布防，阻止日军进入广西；并对陈军长反复叮嘱，一定要死守全州，以争取广西全境主动。

9 月 8 日，一场秋风后下起了小雨，早上起来已明显感到清凉。张发奎从桂林驱车来到全州，与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一起，视察了黄沙河防御阵地。

张发奎指着铺在地上的一张军事地图，说道：“……据最新情报，日军方面，派遣军总司令官（烟）俊六新设了第六方面军司令部，任命冈村宁次为司令官。你军正面的敌情是这样的，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已经到达距广西省界 40 公里处；沿湘桂公路进犯的其他日军也进至零陵东北 20 公里处；另外，从永丰向宝庆前进之日军右翼兵团，已到达宝庆以东 30 公里处。以上各路日军估计将很快推进到全州。你的第九十三军新调来桂，是我们的生力军，主要担任全县及黄沙河的守备，这是我方的主阵地带，你要有充分准

备。另外，我部署第三十一军守桂林，并以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守备司令，以第四十六军第一七五师集结于柳州附近为机动部队。”

说到这里，张发奎突然问：“蒋委员长给你的命令是什么？”

陈牧农高声作答：“死守全州！”

张发奎苦笑道：“我不同意这个命令。当面日军的情况你都清楚了，第十一军平时一直保持36万5千人的兵力，而且都是日军中的精锐主力。现在，为发动湘桂进攻作战，又经过了充分补充扩大，还加上第五航空军助威，仅凭你一个军能守住全州？我若也命令你死守全州，无疑是置你军于死地。”张发奎对“死守”这个字眼十分不满。第四军军长张德能就是在奉命死守长沙上丢了老命的，他为此痛心疾首。在张发奎看来，长沙死守是失，不死守也是失，何苦要死守，以致全军覆灭呢？

陈牧农也感到死守全州难免全军打光，但又惧怯最高统帅的威令，不敢有半点犹豫。

张发奎说：“你既然已拨归本战区指挥，那么，我给你的命令是：有效地阻击迟滞日军。记住，要尽力阻击日军，时间愈长愈好。什么时间撤退和向什么地方撤退，必须等我的命令。”

陈牧农两脚跟一靠，响亮地回答：“是！”

9月10日，日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同时发动进攻，各方战报不断传到桂林张发奎的前进指挥所：广西东面，日军第二十三军主力第一〇四、二十二两个师团和独立第十九、三十三两个旅团，正从广东向广西边境压来；独立第二十三旅团则从雷州半岛北上，已占领容县，并快速向桂平地区推进。

全州方面的情况更令张发奎吃惊。10日夜间，日第十一军第十三师团仅以步兵第一〇四联队的第一大队，即轻易突破第九十三军黄沙河防线。横山勇中将指挥的日第十一军渡河后，于9月13日晨将全州包围。午后开始向守军阵地发起攻击。中央阵地被突破后，公路两侧地区也告失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第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自始至终没有把张发奎作坚决抵抗的命令放在心中，只作了些象征性抵抗，而且不等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就于14日擅自将全州城防撤守，退到了郊外。日军从东北门冲入全州市内，很快完全占领了这一桂北重镇，从而使广西的门户洞开。撤退前，守军焚烧了囤积的军需物资，全州城内外连天的大火，一直燃烧了十八日才告熄灭。

整个广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桂林开始紧急疏散。

张发奎急得团团打转，对陈牧农的行为气得七窍生烟，在桂林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将陈牧农扣押。他认为陈牧农临阵退缩，应杀无赦，电请蒋介石要求严惩。

几天后，张发奎打电话给副司令长官夏威叫他枪毙陈牧农。夏威心有不愿，推托说，没有接到重庆方面的命令，不敢行动。张发奎大声对着电话机说："发生什么事情由我负责。"正在此时，蒋介石即行枪决的电令到，夏威不得已，将陈牧农杀于桂林英武山。

张发奎力毙陈牧农后，震慑住了惊慌失措的部队，新任九十三军军长甘丽初指挥该军在兴安和大榕江地区，拼死抵抗日军第十一军的进攻，使广西形势暂时趋于稳定。

后来，张发奎在桂柳会战中苦战3个月，各军都不敢违令，做到了"败则出死力相救"，协同作战，这与张发奎整肃军纪是不可分割的。

二、桂平作战，计划落空

从9月12日起，张发奎在桂林的一周间，感觉异常痛苦，仿佛是一场噩梦。

全县的失陷来得如此突然，同时驻扎在广东的日第十九旅团，乘虚窜扰怀集、信都；雷州湾之敌第三十三旅团又同时蠢动，从粤桂边境窜容县，企图与怀集之敌合击梧州。而在桂林市，又有汉奸放火焚烧，使全市陷于极度纷乱状态。

10月初，蒋介石派白崇禧和作战厅长张秉钩飞抵桂林，协助张发奎指挥广西作战。

作战计划是：把日军第十一军堵在桂林以北；主动进攻西江，争取吃掉敌第二十三军一部，以此争取局势好转，打破敌军攻势。根据这一战略意图，把兵力调整为：以夏威的3个军担任桂林以北正面防守；以杨森的3个军担任桂林东面作战；以邓文光的2个师在西江正面迎击敌二十三军；以第四十六、六十四军集结于荔浦附近，作为机动部队。张发奎将战区指挥所设于荔浦。

此时，美国将军史迪威飞抵桂林。白崇禧拍拍自己的胸膛对他保证说："如果我们能得到更多新式的美国兵器，我保证桂林可固守3个月的时间。"

他反复强调如果敌人进犯桂林，桂林将在战史上成为远东的列日要塞。史迪威审阅了战区作战计划，认为还不错，表示同意，并令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运来一批美国新式炮火，分配给桂林守城的部队。

按照内线作战的战法，张发奎原来令杨森集团在荔浦、平乐间利用山地隘路作巧妙的部署，诱致敌人渡过漓江后而歼灭之。可是这一个计划并没有实施。

原来，10月中旬，日军第二十三军利用西江水运，向广西急进。其独立第二十三旅团于10月11日攻占桂平重地，成孤军深入状态，并从背后威胁柳州。张发奎征得白崇禧的同意后，决定以第四十六、第六十四军从荔浦南下，歼灭该敌。

第四十六、第六十四军得令后迅速南下，将敌独立混成第二十三旅团包围在桂平地区。

10月21日，在美军飞机的轰炸掩护下，中方第六十四军的3个师和第四十六军的2个师发起攻击，把在桂平敌人的第二十二师团约一个旅团的兵力团团包围，桂平的日军与冈村宁次和第十一军的通讯联络中断了。

负责指挥桂平攻击战斗的张发奎，越打越顺手，越打越精彩，这是他抗战以来第一次指挥陆空配合作战。有了美国空中的支持，他就用不着担心日军在空中狂轰滥炸，也不用发愁后方供给被断，粮草被劫，只是一味指挥地面部队发动进攻。

按照他原来的计划，中方应在3天内攻下桂平外围蒙墟据点，5天内攻下桂平城，但千算万算不如天算，攻击开始到第三天，想不到在秋季会出现霪雨绵绵的天气，这影响了空军与陆军的配合。因此他们在外围的攻打，就超出了3天的时间。

27日，张发奎正指挥部队扫荡了敌人外围的据点，继续向桂平城扩张战果的时候，一个致命的噩耗传来，桂林方面的战况陷于极度的不利，敌主力突破了我桂林外围阵地，到达了桂林东郊及平乐、阳朔、永福附近；夏威集团所部已呈不支状态；同时桂平左翼守势方面的第一三五师因脆弱无能，使敌人神奇地越过了石狗岭天险，柳州已受到直接威胁，空军基地的活动距离，缩短到不及150公里。

为确保桂林、柳州，张发奎不得不放弃继续攻击桂平，命令部队向桂柳增援，原打算在外围山岳地带以内线作战、达到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计划，被迫取消。

日军方面，也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10月28日，日第十一军推进到桂林外围，与中国守军展开激战。

11月2日，日第十一军司令部根据监听到的情报，得知中国军队正不断向桂平调动，因此判断：中国第四战区主力正向日第二十三军发起攻势。同时，他们还通过无线电侦听到驻在柳州外围的守军主力已不知去向，看来柳州只有一两个师的兵力。因而，日第十一军参谋长提出，抽2个精锐师团从桂林南下，这样既占桂林又占柳州，一举两得，可抢一大功。

日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大喜，当即批准此方案。11月3日，横山勇在已经命令第三、第十三2个精锐师团绕过桂林南下之后，才电告冈村宁次。

冈村宁次见电大怒。他认为横山勇这小子这一着完全打乱了他的整个战略意图。他的意图是在柳州西方全歼中方第四战区主力，这是日第六方面军此次广西作战的主要目的。现在，第十一军兵力分散，无法进行向柳州西面的大迂回包围。同时，过早攻占柳州，也会使中国军队主力受到威胁而溜掉。气得冈村拍着桌子大骂横山勇这个混蛋“越权”！

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地大骂一阵之后，马上给横山勇发去一道特急电报，命令他停止第三、第十三师团的南下柳州的行动，一切按方面军的原计划行动。横山勇看过冈村宁次的电报，不以为然，认为冈村宁次根本不了解目前已经变化了的战场形势。于11月4日夜里，复电陈述自己的随机处置是正确的。

冈村宁次气得七窍生烟，于11月5日夜，以“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亲启”发出急电：“余重视宜山胜于柳州。”横山勇见了冈村电报，认为这老头儿死脑筋，太固执，如今即使再申诉意见，也无济于事，索性不理睬他，也不回电。

至此，中、日两军战略企图都告失败。日军第十一军急功冒进，既攻桂林又打柳州，使冈村宁次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破产；也因日十一军快速突进，攻打柳州，使张发奎企图在桂平地区围歼第二十三军一部的计划落空。

三、桂林沦陷，放弃柳州

11月初，张发奎面对日军2个师团突然南下柳州，使桂平的中国军队侧背受到威胁，只好放弃正在进行中的桂平围歼战斗，率领兵团向柳州近郊

转进。

部队由积极的攻击，一变而为消极的防御。士气十分低落。张发奎向最高统帅部请求，如能将到达南丹附近的第九十七军推进于柳州，增加防御的力量，则对于确保柳州的安全，仍有相当的把握，否则只有在时间上努力，来拖延这次会战。

但统帅部却不同意他的请求。

张发奎只好重新考虑如何指挥桂柳两据点的防御，根据以往战史和最近据守衡阳47天而终于失陷的教训，他大胆地变更了统帅部的指示，把柳州的防御寄托于时间的争取，而不把数十万生灵关闭于死城之内作无谓的牺牲。他以为对桂柳的防御，固应竭尽我们最后的血汗，但到了绝望的关头，也只有忍痛地放弃。

柳州的防御部署，是一个河川决战防御的计划。邓龙光集团占领迁江至象县、红水河北岸、柳江两岸之阵地。杨森集团以一部联系邓龙光集团于象县、鹿寨，沿河西岸占领阵地，并以主力固守柳州；夏威集团联系杨森集团沿永福河西岸，由黄冕至百寿间占领阵地掩护侧翼。第四十六军为总预备队控制于柳州西侧，乘敌攻击柳州据点时，协同守备兵团转移攻势。





然而，这一个计划根本没有实施；因为在各兵团尚未完成部署时，夏威集团即被敌击溃了。千余名日军如一把尖刀，直取夏威第十六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永福，第十六集团军仅直属部队就有步、骑兵数团，但面对进攻却未作抵抗，慌乱中，总司令夏威及其部下纷纷跳河逃走。日军占领该司令部时，文件、地图散落得满地都是，未吃完的饭菜尚摆放在桌上。



11月5日，夏威和他的参谋长韩练成狼狈地来到张发奎柳州司令部，报告部队已脱离前线，敌人已由黄冕渡河向中渡柳城移动，有迂回柳州左侧背的模样，这使张发奎乘敌渡河施行决战的计划又告失败。

而桂林方面，守军战况更为悲惨。

早在9月上旬，张发奎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以第十六集团所辖第三十一、第四十六两军为桂林守备部队；令第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兼任桂林城防司令，负责全城守备。但最后实际留在桂林城里防守的，却只有第一三一师和几乎全都是由新兵组成的第一七〇师，另加第七十九军的一个团和榴弹炮一个连等。

日第十一军主力兵临城下时，谁料到防守桂林外围的第七十九、第九十三军等部却“为避免态势不利”而撤走了。守城的兵力过于单薄，官兵首先

在士气上受到严重打击，军心涣散，纪律废弛，但仍有心一战。

10 月 28 日，日军同时从北、东、南三面向桂林外围攻击。自 11 月 2 日起，桂林四面被围。桂林城核心的战斗已达白热化。11 月 8 日，敌十一军炮兵部队以轻型火炮 48 门，野战炮 109 门，重炮 42 门向守军集中轰击。日空军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守军以远程大炮回击敌人。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猛烈炮战。

11 月 9 日，仅存的一些守备部队眼看大势已去，决定冒死突围。第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不愿撤退，在绝望中自杀。城防司令韦云淞在电话中同张发奎说了一句“桂林已无法支持了”之后，一切电讯已经中断。11 月 11 日。桂林失守。

自日军 9 月中旬侵入广西境内以来，湘桂铁路沿线城池连连告失，柳州一时成了临时避难所。大量难民和南迁的机关、学校及企事业单位纷纷拥入城中，使市内人口暴增。当日军发动桂、柳作战时，人们又纷纷外逃。柳州火车站上整天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第四战区向重庆报告：“交通状况十分恶劣，公私物资、车辆梗塞道途，部队前进后退均受重大牵制，影响作战不小。”可蒋介石也是干着急没办法。

柳州本是第四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当 11 月 5 日前后日军逼近柳州外围时，张发奎便率长官部人员撤至宜山，行前指定杨森的第二十七集团军负责守城，但杨森缺乏必胜信念，部队士气低落。11 月 6 日，红水河、柳江及柳州、柳城各方面全线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所有部队的战力，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无法再作长久的支持，柳州的固守动摇了，如果不迅速命令脱离战斗，则杨、邓两集团恐将难逃脱敌人包围歼灭的命运。

面对这种情况，张发奎果断命令开始破坏柳州的机场和柳州附近的铁道，准备撤离。美空军司令蕴索将军对张发奎说：“在我的柳州指挥所没有移动以前，一小部的飞机仍继续不断翱翔于柳州的上空，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一种责任感和战斗的友情，令张发奎感动而惭愧。

9 日，柳州遭到日军四面围攻。留下的守军第二十六军于 10 日下午接到张发奎的电示：“应避免无谓牺牲。”便集结起来，向西突围，而留在城内的掩护部队则大多战死。

11 日，柳州为日军所占。这样，广西境内的两座主要城市几乎同时告失。

军史学家认为，横山勇过早打下柳州是个失招，由于没有预先占领宜

山，截住第四战区主力西退道路，使日军失掉了一次围歼20余师中国军队的机会。后来横山勇虽派几个师团向宜山方向追去，但张发奎主力早已西撤。这从另一方面反证了张发奎保存主力、不“死守”城池的正确性。

11月17日。日军突破宜山防线。两军在怀远一线展开激烈炮战。张发奎站在怀远桥头，用望远镜观察战况。敌人的炮弹呼啸而来，不时在近处爆炸。夜幕降临后，他才坐上指挥车从怀远向设在广西边境六寨的指挥所赶去。

这是一场充满混乱与悲哀的大溃退。大山莽莽，烟尘滚滚。难民们拖男带女、扶老携幼地向西地逃难，你靠着我，我挤着你，肩并着肩，日夜不停地向前蠕动，形成一个庞大而缓慢的“人流”。

弯曲的公路上填满了人，谁也走不快，谁也不知道到底要走到何方才是尽头，人人只是直着脖子呆呆地艰难地向前移动着，前面的人走不动了横倒在公路上，后面的就踏在他的身上走过去；有时先倒下的人将后来者绊倒，像倒骨牌似的一连倒下几个十几个。难民的脚肿得很大，就用破棉花包着，像骆驼似的，举得高高地，左右摇摆地走着。大人小孩饿死在路上，死后肚子却膨胀得大大的像一面“鼓”，横在公路上。父不能照管子，夫无法照管妻，我走我的路，你死你的，虽至亲骨肉，也难以料理后事。

后撤的部队也跟着这个“人流”争路，有时竟被“人流”阻隔成几段而联系不起来。张发奎的长官部也乱纷纷地往下撤，在难民的“人流”中乱打乱推找路跑。这些官僚们的“官体”也不能保持了，一律徒步，有的赤足，争先恐后地逃命，看谁跑得快，就算谁有本事。后面走不动、走得慢的难民被紧追上来的日军成批成批地集体枪杀。

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在公路上茫然地对着寒冷、黑暗的夜空，发出一声声揪心裂肺的哭喊妈妈的声音。小女孩在强烈的车灯照射下摔倒了，张发奎急令刹车。

他跳下车，扶起那小女孩，问：“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你妈妈在什么地方？”小女孩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儿，也不知道家在哪里，只会哭着要找妈妈，妈妈把她丢下自己走了。凛冽的寒风在小女孩可怜的脸蛋上肆虐，她被冻得嘴唇发紫，浑身打抖，眼泪也仿佛在她那张可怜的脸蛋上结成了残酷的冰凌。

张发奎的眼圈湿润了。他把她抱上自己的指挥车，带回家中交给夫人刘景容，给女孩取名“怀远”，以纪念他在怀远心情的创伤，但不幸在数月后，

这个小女孩也因病而死去。

四、美机误炸，六寨惨案

11月20日，张发奎遇到了从重庆千里跋涉前来支援的第九十七军，急令他们在金城江以北、南丹以南之间的主要山口——大山塘一线布防。

逃难的“人流”仍然向大山塘拥来，汉奸、间谍混杂其中，使人无法清查。张发奎的指挥车也被挤坏了，大黑天里他只好在两个警卫保护下，狼狈地爬上山，气喘吁吁地来到第九十七军的工事上。

在山顶，他看到本来在后面掩护的夏威的第四十六军也乱哄哄地撤下来，跑得比难民还快，气愤地命令九十七军缴掉他们的枪，可是九十七军因为他们是友军，又是广西的地方军，“地头蛇”惹不起，便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敌人的先头部队和便衣队混进“人流”中进入九十七军的警戒线，一线部队发现后，不问青红皂白地向“人流”开火，敌人的先头部队和便衣队被打下去了，但在混战中近千名难民也在乱枪中死去，呻吟声、哭叫声一片。

情况危急，必须尽快炸掉横跨在公路上一座250多米长的水泥墩、钢骨木料的大桥，防止敌人的进攻。炸桥时，士兵再三喊叫难民们“不要过桥啦，要炸桥啦”，一连喊叫了几十分钟，重复喊了上百遍，难民的“人流”还是不慌不忙涌上大桥，看来他们已走得昏头昏脑的，已顾不得这么多了，根本管不了炸桥的危险，也无法停下来。

情势危急。指挥官一咬牙，狠着心下令说：“丢那妈的，不管啦，你们炸了算啦。”

“轰隆”一声，连桥带五六百名百姓同归于尽，血肉横飞，惨绝人寰！

11月28日。日军进抵距贵州边境仅二三十公里的南丹镇。第九十七军从容后撤。

这天中午，17架奉命出动的美军第十四航空队B29轰炸机前去轰炸南丹、六甲地区的日军。可是，机场指挥处译电员却把“六甲”错译为“六寨”。于是，那些挂满炸弹的B29飞机，带着错误的出击命令，从成都地区的机场腾空而起，向广西北端飞去。

六寨，广西边境上的一个市镇，在这个长不及3里的街市上，聚集着数

万难民和许多后方机关人员。张发奎的第四战区指挥所也设在这儿。当17架两翼上标有五角星徽的美军飞机出现在六寨上空时，镇上的军民不知死神来临，纷纷涌到街头，欢呼雀跃。飞机呼啸着低空掠过小镇，先是撒下雪片似的传单，接着就把炸弹一个接一个地丢了下来。顿时，血肉横飞，哀声四起，人们夺命狂奔。

张发奎的指挥所被一颗重磅炸弹粉碎；战区司令部所有的作战资料、文件，连同他多年的日记，都化为了灰烬，本人也险些丧命。

在地动山摇的爆炸声中，战区司令部和附近部队里1个中将、2个少将、8个上校、200多名中校以下军官、800多名士兵，连同5000多名难民，都做了这场错误轰炸的冤死鬼。






张发奎泪流满面，伤感不已。这些久经征战的官兵和义民没有战死沙场，谁想到会被盟机夺去他们的生命？这是在战争中上演的又一出悲剧，当然，也是一出不应发生的悲剧。

桂柳会战，经历了3个月的时间，是张发奎在军人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战，他为之兴奋、忧虑、悲痛和愤恨。张发奎在回忆中是这样评价的：

> 桂柳会战是我在八年抗战中最值得回忆的战役。这是日军侵华战争中，在华南的最后一次强大攻势；也是我在伟大抗战中，于指挥业务上一件极富战术意味的事。此役特别包含了一个内线作战指挥运动的典型，一切的态势和地形交通，都好像为演习内线作战而特别选定的条件。会战虽然是失败了，但自认会战的作战指导来说，无论敌情判断、决心、处置，都吻合了战术的原则，如果在学校里练习应用战术的话，则我这样的答案，必能与教官的原案完全相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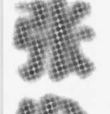
后来，民间流行一副对联，专门形容这次战败：

> 桂省府数次搬迁，宜山不宜，都安不安，百色百变，从此凌云直上，安居乐业；四战区再度撤退，向华失向，夏威失威，云淞云散，盼望龙光反照，气煞健生。

上联镶入宜山、都安、百色、凌云、乐业等地名，下联嵌入向华（第四

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夏威（桂系将领）、云凇（桂林卫戍司令韦云凇)、龙光（驻防钦州、防城一线的邓龙光)、健生（白崇禧）等人名，将日寇南进时广西省政府一搬再搬的地点和国民党将领一败再败的狼狈相清晰地勾勒出来，对仗工整，切中时弊，嘲讽怒骂的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第十九章　百色整训，凛然肃军纪






一、安顺肃纪，奔赴百色

安顺的严冬特别寒冷，早上起来大树上挂满了冰凌。张发奎的心也像这呼啸的北风，一阵阵地发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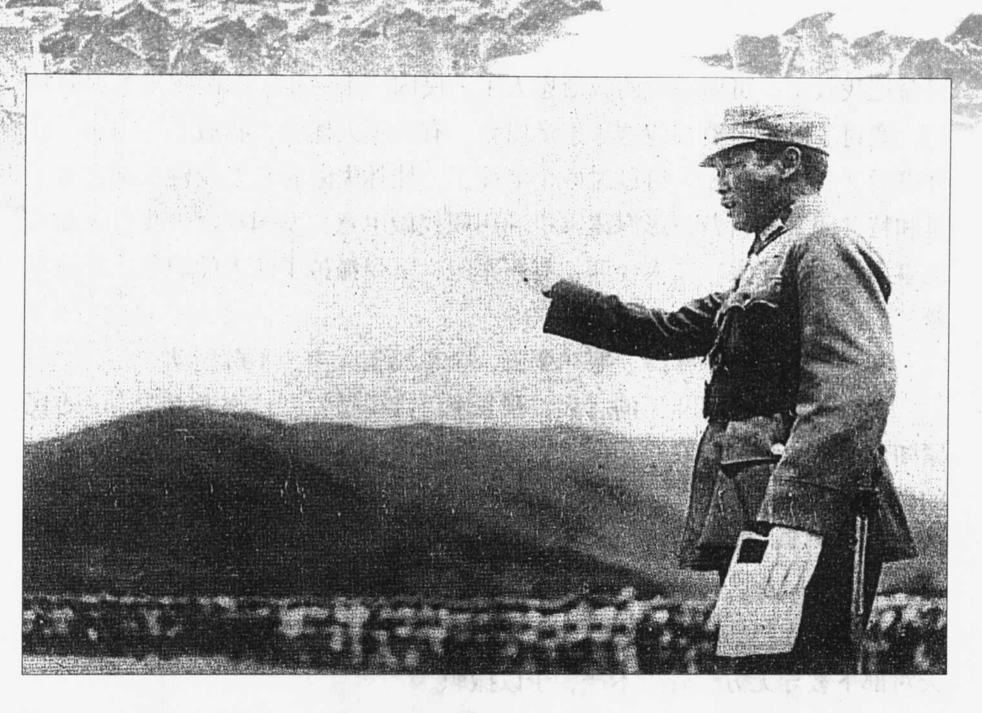
自从桂柳会战后，他带着部队节节败退，最后退到贵州的安顺境内，这才止了脚步。他打算在这里停留两周的时间，一边调整司令部的内部，收容残兵散将，一边与重庆联系，等待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其时，张发奎忧虑的是，部队新败，面对强大日军，司令部少数幕僚意志动摇。他们认为战区可能解体，队伍将留在敌后过艰苦的游击生活，心里只想着脱离部队，另觅出路，全无斗志。张发奎平生最恨这类人，认为一个人不能于危难之中过共患难的生活，就是没有气节和道义的表现。为此，他决定严肃军纪，坚决惩治这些意志动摇而又违犯军纪之人，哪怕他是自己身边的人。

张发奎叫来副官："传我的命令，令司令部直属部队全体官兵，在体育场集中，我要训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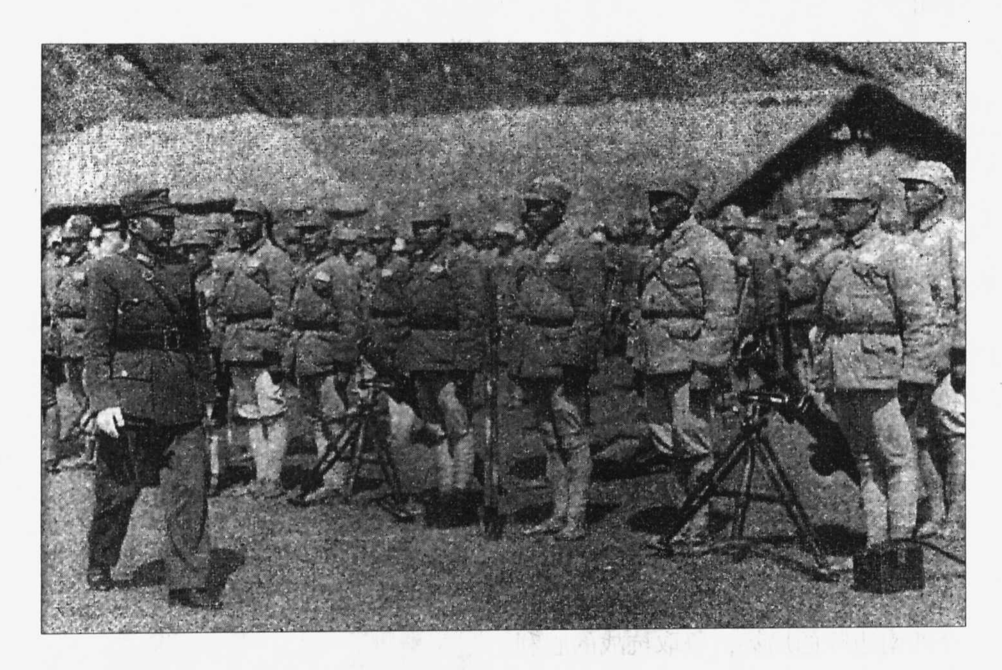
10分钟后，警卫团、特务团、运输团等4000余名官兵站在体育场的朔风中。

张发奎站在台上，左手叉腰，开始训话。他的口才不错，没用讲稿，从军人的职责是保国保民、决不能掳掠百姓的话头开始，深入浅出，足足讲了三四个钟头：

"……我一向以'公诚廉毅'为立身和治军的指南，常把这四个字贴在指挥部或办公室以教育大家。我也十分讨厌'嫖、赌、吹、逃'，凡违反者，决不轻饶。廖国辉是我当营长时就跟着我的老卫士，北伐时曾在敌人包围中



抗日战争时期张发奎将军在中国西南战区向受检阅部队讲话时的情景



抗日战争时期张发奎将军在中国西南战区某地检阅部队

拼命把我救出，可谓是我的救命恩人了。民国三十一年，廖国辉当了卫队长后，竟讨了两个老婆，他这样生活腐化，有失军人体统，我撤了他的职。这件事后，我的部下没人再敢讨两个老婆了。桂林失陷时，上校侍从副官伍千里和特务团第三营营长彭海涛乘机利用职权做生意，发国难财。我后来知道此事后，大为光火，军人经商，有损军纪，下令撤掉了两人的职务，开除军籍。”

安顺地方，山高水冷，寒风刺骨，全军鸦雀无声，不敢稍动。

望着体育场上黑压压的官兵，张发奎继续说道：“这次撤退途中，难民紧随部队流离失所，在广西河池，我们警卫团有三四个士兵趁乱抢了老百姓的财物逃遁。当地居民马上报告了长官部，这些士兵在兵荒马乱中乘人之危，抢人财物，不仁不义，与草寇无异，由于是在撤退中，我暂未处理此事。现在部队到达安顺，一切该有个了断。”





张发奎用眼睛扫视着官兵们，大声说：“现在我宣布，警卫团团长谢丽天对部下教导无方，管束不严，予以撤职。”

谢团长顿时声泪俱下，表示改悔，又托高级军官向张发奎说情，都无济于事。

特务团长曾洁见此情景，赶紧报告说，特务团有一士兵逃跑，已被抓回，请问张长官如何处置？

张发奎看了眼被绳子绑住的逃兵说：“当兵要爱国，逃跑是可耻。还有什么说的，按军法，就地枪决。”



刺耳的枪声，划过寂静的空中，全体官兵为之动容。

训话过后，张发奎回到司令部，参谋送来最新战报和重庆的命令：我军在何应钦、汤恩伯两将军指挥下，对孤军突进的日第三、第十三两师团展开反攻，于 12 月 8 日克复独山。优势的中国军队奋起追击，把日军驱逐出了贵州边境，直至广西河池。第四战区各部向广西百色转进，除杨森集团改归汤恩伯指挥外，夏威集团的第三十一、第四十六军，邓龙光集团的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均将转入桂西，受四战区的指挥，接受整编。

看完命令，张发奎满怀感慨，纷乱的 1944 年行将过去了，桂西是偏僻的穷山区，来年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激励部属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扭转这个西南边陲的局势，争取抗战的胜利。

临出发前，美军博文上校赶到战区司令部，对张发奎说：“张将军，我奉命组成一个美军战地联络团跟随战区行动，担任盟军的联络，并协助国军

作战，请示行动日期。麦克鲁将军原想派我去担任汤恩伯集团方面的联络主任，但我拒绝了。我感受到能够和张将军一块共事，是一件光荣而愉快的事。”

对这一位性情有点怪癖和面部总是铁一样冰冷的美国军人的诚恳与热心，张发奎甚感高兴，他表示十分欢迎与博文上校共事，但又解释说：“我暂把司令部设在百色，那可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山镇，恐怕会委屈你过着艰苦的生活。”

博文上校幽默地答道：“我想百色飞鸟的歌唱会比都市舞厅的爵士音乐来得优美，百色的月亮会比都市的电灯来得明洁而光亮。我想从百色去发现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好像如一颗石子投在水里。它的小小的波浪会掀起太平洋的汹涛，把我俩的相片刊登在全世界的报纸上受着人们的崇拜。”

两人握手大笑。

部队要从安顺到百色，必须首先恢复由百色经安龙、兴仁至沙子岭与黔滇公路衔接的黔桂公路。这条路，关系着部队行军和一切车辆物资的输送，而且将来战区与昆明、贵阳后方的联络，及所有军需品的供应，也必须靠这条公路来完成。

12 月 22 日，张发奎带着司令部的直属人员驾车离开安顺。数十辆汽车在冰天雪地中，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前行，目标是广西的百色。

次日，他们由沙子岭折向南行。在荒僻的山巅上，遍地是雪，树枝披上了皑皑白雪，像白珊瑚一样可爱；芦苇闪出光辉，短草有如银丝罩地，电线杆上的电线，凝着冰雪，像一条玻璃的真空管悬在空中。这一幅雪景，再好的画家都不易画出，张发奎被这大自然迷人的图画吸引住了，叫司机停车，下来欣赏这难得一见的美景。博文上校端着一杯热咖啡走过来，兴高采烈说：“这是我们南进的第一个收获。我用咖啡代酒，一同来欣赏雪地这个伟大的风光吧。”

当晚，他们来到安龙，正好是圣诞节的平安夜，当地政府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圣诞晚会。

晚会上，年轻的苗女们表演了古朴奔放的歌舞，使美国官兵赞叹不已。她们分别赠送美国朋友每人一件礼物，有的是一张豹皮，有的是苗女自己手制的刺绣品，都是本地的土产。美国官兵异常高兴，认为这是在战争中特别珍贵的纪念品，他们要把这些礼物郑重地寄回祖国，以显耀他们在远东的光

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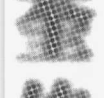
翌日一早，张发奎一行继续南进。整整一天，汽车均在下坡行驶。公路是新筑成的，路面狭小，路基不固，弯曲崎岖，汽车蜿蜒在山中，随时有可能陷入深渊的危险。

八渡是蜿蜒下坡公路的终点，也是黔桂两省的交界。一条约 20 米宽，其水深不可测的红水河天然地划分了两省的地界。两省虽仅隔着 20 米的距离，却景象奇异。河北岸的黔境是重山叠嶂，烟雾弥天，寒气逼人，一切都使人感到窒息；而河南岸的桂境，则一片平原，晴空如洗，和风拂面，使人感到舒畅。

过了八渡，就是桂境。张发奎因任务紧迫，在此略事休息后，即借着夜色继续前往旧州宿营。随部队出发的美国官兵，他们在黔境一月未见天日，现在仰望皓月当空，欢喜若狂，搭起帐篷决定在此过夜。帐篷里飘出电唱机播出的美国歌曲和热气腾腾的咖啡之香，他们高举酒杯，在明月照耀的河岸上载歌载舞。博文上校边舞边说：“我们从黑暗中找到光明了。”

12 月 27 日，张发奎一行终于来到了目的地百色。广西省政府也同时搬迁到此。久别重逢，众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





二、百色缩编，打造精锐

百色是桂西最大的城市，平时的人口约有 4 万，为桂黔滇各边区的交通中心。因为地处边陲，政府难以控制，又成为桂西及黔滇烟毒之集散地。桂西原为一个人口稀少、文化落后的地区，但因百色为烟商的聚集处，却成了一个小型的繁华都市。



百色在桂西好像在荆棘丛中特别爆出的一朵鲜艳的玫瑰花。这里有现代建筑的街市，有新式的洋房住宅，有规模较大的学校，有戏院、咖啡馆、西餐厅、电灯和女子理发院，还有三四百妓女聚居在河月之艇上的特寮里。一切现代都市的条件，这里都粗具规模，加以现在作为军政的战时中心要地，人口激增至 10 余万人，更增加百色畸形的繁荣。

1945 年的春节，张发奎就在这桂西的山城平静地度过了。

张发奎迅速在百色召开了一个检讨会议。会议得出了三个重要的结论：第一、拟定一个对敌人山地作战的对策，效法敌人编组若干特别装备的突击队，完全以飘忽敏捷的行动来参加战斗；第二、制定了一个减少番号充实单

位的缩编方案；第三、处分了一批官员。防守桂林的第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第一三五师师长严僧武和桂绥第二纵队司令唐纪，都公开受到了应有的处分。

4月1日，缩编方案得到了最高统帅部批准。它取消了原属桂军的第三十一、第三十七2个军及第一三五、第一五五、第一七○3个师的番号，只保留了以韩炼成为军长的第四十六军、以黄涛为军长的第六十三军和以张驰为军长的第六十四军。

这个缩编方案，遭到了桂系的非议与反对。因为被取消的部队大都是桂军，保留下来的3个军中，第六十三、第六十四两军是粤军，桂军只保留了第四十六军。张发奎为此表白说，这是依据战绩和部队状况而核定的。对于桂林的失守，第三十一军是应负责任的，虽然白崇禧把他的建制第一八八师临时抽出改归第四十六军指挥，是一个含有偏颇的错误处置（第一八八师长海况强是白的外甥），但第三十一军长贺维珍懦弱无能，指挥错误与掌握不确实等，都是应受处分的。

张发奎觉得这个整编方案是公正的，自己没有任何私心，所以在确定这个方案和处分几名失职的将领之前，都没有事先向白崇禧征求意见，即直接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建议。这自然引起了广西一些将士和白崇禧的不满。

这天，美国顾问博文上校突然来访，张发奎忙上前迎接。

博文开门见山地说："张将军，我有一个建议，趁这次整编，我们美军帮你训练几个特种部队，叫突击营，如何？"

"怎样组建突击营？"张发奎问。

"突击营交由美军直接编训，所有的兵器器材，除步枪外，全由美军总部装备。我原来计划是在贵军每一个师编组一个突击营，但考虑到经费和装备的关系，先在两个集团军各编一个吧。突击营由两个步兵连和一个输送连编成，具有很强的机动性和持久性。每个步兵连有4个排，3个战斗排、1个弹药排。"

张发奎觉得突击营的编组富有创意，马上表示支持："好，将军，你就全权负责吧，我做你的后勤保障，突击营除了配置完备的装备外，我特批每个士兵的副食费增加两倍。"

博文乐了，补充道："突击营属于战区直接使用的部队，战斗的指导可由我们美国军官协助，保证两个月内就可把突击营训练出来。"

三、委曲求全，张炎牺牲

豫湘桂战役后，蒋介石将全军战斗序列作了重要调整，他自己仍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军委会委员长，由何应钦任参谋总长，下分10个战区，即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战区和冀察战区，十战区外另设驻印军。同时，为了联络盟军对日军转移攻势，特地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由何应钦兼任陆军总司令。

1945年3月，美国为迅速结束远东战争，应允以大量的装备和充分的炮火，来装备中国西南的30个步兵师，并计划在装备完毕之后，配合美海军，在西南沿海地带，转取攻势。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军事委员会又把西南各战区诸部队缩编为比较含有积极作战意义的方面军，即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另在昆明设防守司令部，司令杜聿明。

这个计划颁布之前，张发奎曾到昆明，何应钦事先透露给他这个计划内容的意旨，但对于各方面军的具体人事和区分却没有说。等到正式命令颁布，张发奎才知道各方面军司令官具体人选，并规定滇越方面为第一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黔桂铁路方面为第三方面军的作战区域，湘西为第四方面军的作战区域；第二方面军则仍是原区域。在兵力部署上，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军各指挥十五六个师之多；第一、二两方面军则各指挥八九个师，而据所得到的内幕消息，美国的装备，将优先装备第三、第四两方面军的部队。

该方案颁布后，引起大哗，一些军政大员大为诧异，认为其有失公允，纷纷为张发奎抱不平。他们以为张发奎的资望最高，经历又深，且是现役上将，不应与资历尚浅而又无特殊战功的王耀武和常打败仗的汤恩伯等同列。张发奎也感到自己受到莫大的藐视和羞辱，情绪异乎寻常。依着性子，他本想向蒋介石提出辞职，推荐夏威出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职位罢了。但转念又想，个人之名位事小，而救国卫民事大，军人只有服从。国难当头，应努力克己自励去争取军事的胜利，才是军人本色，不应与之计较。这才慢慢平静下来。

张发奎指挥下的第十六、第三十五两个集团军，与方面军的建制同时撤销。夏威、邓龙光两位集团军总司令调任方面军副司令官。各军直属于方面军的指挥。

3月初，风雨如晦。传来一个不幸消息，张炎在南路起义失利被捕了。

张炎，又名巨炎，字光中。桂柳会战前夕，他被委任为国民党第四战区中将参议，派回广东南路视察，发动民众抗日。他回到吴川后，暗中与中共南路特委合作，发展地方抗日武装。1945年1月14日，他与原吴川县长、时任电梅吴挺进司令的詹式邦率部起义。张炎将起义部队改编为高雷人民抗日军，公开宣布拥护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同年2月1日，张炎部队遭到国民党顽军的袭击，起义受挫。他带着10多个随从人员进入广西，想找李济琛、张发奎联系，不幸在博白英桥墟被当地顽军逮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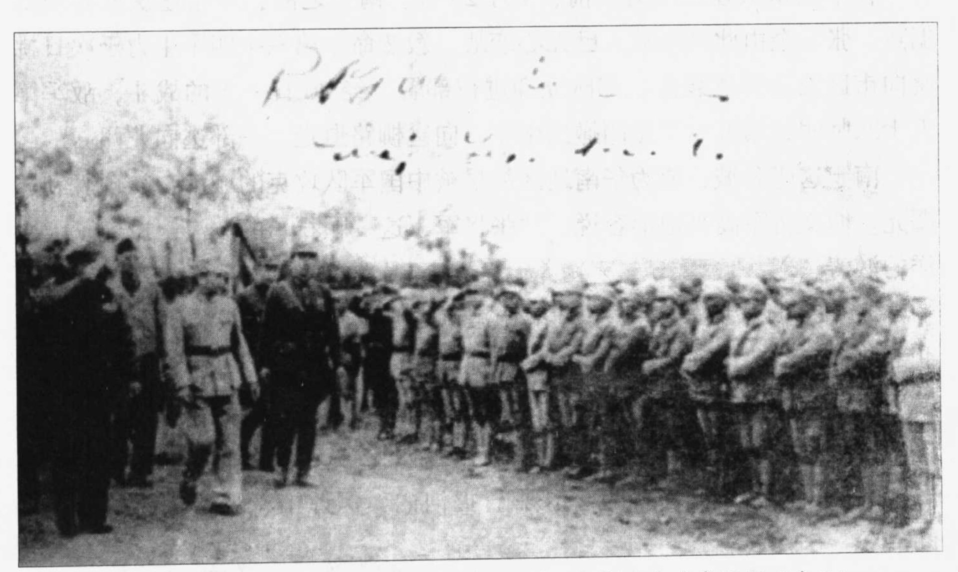
张发奎得知张炎被押解到玉林后，急电玉林专员梁朝玑营救，但谁知蒋介石的格杀令先他一步，3月22日，梁朝玑执行蒋介石命令，将张炎杀害。

张发奎听到该消息后，喝了一夜的闷酒。

四、收复失地，迎来胜利

4月，是百色最美的季节，映山红开过以后，满山一片葱茏，山谷里回应着布谷鸟有节奏的欢叫声。

在美军顾问博文等的协助下，经几个月的休整，部队渐渐恢复了元气，战斗力有所提高，将士无不跃跃欲试，准备反攻广西，收复失地；经过美式



抗战后期检阅部队，张发奎（左四）与美军指挥官麦克鲁将军（左二）

特种训练的突击营，配带着全新的美式武器投入战斗，他们深入敌后，侦察敌情，骚扰敌人，让鬼子不得安宁；而天上，盟军取得了绝对的制空权，不间断翱翔于上空的盟机，足以使敌人感到万分的惶恐。

这天，前方侦察人员送来了有关南宁敌情的颇有价值的情报。参谋立即把它送给张发奎。张发奎放下手中的报纸，示意参谋念。

参谋把情报原件认真地读了一遍，并分析说："……从这些情报中得知：南宁敌人第二十二师团的主力，正向越南秘密移动，仅留置不及两个团之兵力于南宁及其附近各据点；从被我突击营所击毙的一个少佐军官身上搜获的文件，有第二十二师团长对南宁守军的训令，其中有'如受压迫，得向谅山撤退'的指示。"张发奎点了点头："看来日军准备放弃南宁，我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迅速制定一个反攻计划，并提早给予实施。"






一场黄梅雨后，转眼已是5月初。张发奎不等陆军总司令部的指示，着手实施他的反攻计划。他果断下令说，命令两个突击营集中于邕龙路的两侧地区，以切断在南宁的敌人与越南的交通；命令第六十四军之一部秘密渡过左江，在南宁侧后活动，并令该军主力推进于南宁近郊，以压迫的态势，严密监视敌人，伺机攻击南宁；同时派出一支便衣部队，利用情报人员，潜入南宁城内，伺机内应。他看了眼墙上的军事挂图，继续说，令第四十六军主力推进于上林宾阳附近，对邕宾路敌之各据点作游击式的攻扰。

在中国军队强大压力面前，5月25日，南宁之敌，开始逐次放弃城郊据点。张发奎由此判断敌人已无心恋战，毅然命令第六十四军主力于次日拂晓向市区发动突然袭击。部队立即进行部署，经26日一天的战斗，敌军第五十八师团的第五十二旅团撤出南宁，向邕柳路退走，一部逃向龙州。

南宁这座名城，成为华南地区最早被中国军队攻克的城市，初现胜利的曙光。博文将军高兴地形容说："张将军，这一颗石子的波浪，掀起了太平洋的汹涛。"

5月29日，张发奎由百色来到南宁，他决心痛打落水狗，乘势向越南北部前进，给敌人一个无情的追击。他迅速命令第六十四军之一部向越南边境追击，穷追敌寇；另令第四十六军切断向邕宾路逃窜之敌，并乘势向柳州攻击。命令下达后，张发奎乐观地估计：柳州的克复只是时间问题；至于越南北部的行动，当然不能期望长驱直捣河内，但谅山、高平的占领却有可能。

前方捷报不断传来，第四十六军之一部于6月7日克思乐，8日克明

江，7月3日克龙州、凭祥，7月5日进占镇南关，把日军驱逐到国境以外。

正在指挥湘西会战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听说张发奎要进兵越南，赶紧下令制止，认为这是轻举妄动、急于功利的冒险行动，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不能轻率行动，应暂停止于国境；第四十六军不能单独行动，应撤回来宾、武宣、红水河地区，以掩护第三方面军对柳州的攻击。

张发奎接到这个命令后，和博文都表示不满，与何应钦争议一番无效后也无可奈何。

何应钦命令汤恩伯第三方面军主力，从雪峰山南麓地区挥师南下，会同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迅速包围了柳州之敌，经数日激战，攻取了该城。第二、第三两个方面军乘胜北上，包围了桂林。桂林之敌勉强抵抗了一下，便夺路而逃，退入衡阳地区。

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原来计划到1945年秋才开始对敌反攻，现在看到张发奎的提前行动，使南宁、柳州相继克复，而湘西会战一举击溃了20多万日本精锐部队，从而扭转了华南局势，因而为预定的秋季攻势——华南发动攻击计划有提前实施之可能。于是南宁、柳州变为策划攻势的基地。

陆军总部推进到柳州，并在南宁设立指挥所。全副美式武装的孙立人新一军首先由缅北空运到南宁，入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序列。紧接着，第五十四军、第八军也由滇境陆续开入桂西，张发奎一下新增加了3个军。同时，南宁、北海飞机场均大肆加以扩充，成为作战空军的基地。这时士气之振奋，是抗战以来罕见的。

7月中旬，陆军总部下达向广州攻击的命令。根据这个作战指导的规定，张发奎负责对广州攻击的主作战方面。

张发奎原定是在8月5日开始进攻的，计划对雷湾攻击，应使用5个基数的弹药，但要运输这么多弹药，必须在攻击开始前，开辟一条运输线，选择水陆运输，把弹药囤积在廉江附近。博文上校一听这个水陆运输方法，连说："NO，NO，NO。这样太慢了，我们有飞机，何不改作空运？既可节省人力，又可节省时间，一下就运完。"他伸出关节凸现的手指比画说，"运用空运，是现有水陆工具运输速度的10倍，5个基数的弹药只须一天空运，就可完成。"张发奎看看阴郁的天色说："现在是夏季，天气反复无常，会影响和限制飞行。"博文乐观笑答："上天绝不会5天之内没有一天晴空的吧？只要有一天，我就够了。"

谁知上天就是不给博文一点面子，从8月5日至10日每日都是阴霾低雾，使他们攻击开始的日期，不得不延迟一周的时间，博文上校无奈地耸耸肩，承认他的计划失败了。

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就因为一个计划时间失误，却避免了一场恶战，救活了千万的生灵，因为恰巧张发奎在8月15日下令开始攻击的时候，传来天大好消息，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他忽然感到，这好像是上天好生之德和冥冥中之天意。

张发奎永远记住8月15日这一天，收音机里播出了日本天皇正式颁布投降令消息后，室外传来沸腾嚣叫的欢呼声、锣鼓声，继而是轰天震地的鞭炮声。他冲出门外，只见七彩的烟火在天空中交错飞舞，人们奔走相告，大街小巷，锣鼓齐鸣，鞭炮放过的纸屑，在地上竟积了厚厚一层。

张发奎欣喜若狂，提着两瓶威士忌酒，率领所有的高级幕僚，跑到总司令何应钦的行馆，高举酒杯，在狂欢中互祝抗战的最后胜利。

胜利、光荣、幸福，一切都摆在张发奎的眼前，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





第二十章　神采飞扬，受降广州城

一、受降主官，肩负使命

1945年8月21日上午10时，骄阳当空，万里无云。在盟军3架银色战斗机的引航下，一架深绿色的双引擎日本军机徐徐降落在芷江机场。日机着陆后，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机翼两旁各挂着一条作为降机标志的红绸。

机舱门打开了，头戴硬壳帽、脸架黑边眼镜、肩佩少将军衔的今井武夫出现了，随后是他的7个随员与机师。围观的中美军人和记者们顿时骚动起来。身任驻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是作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乞降特使前来芷江与中国方面洽降的，他表情麻木，装出驯服而又矜持之态，一扫其往日傲慢而骄纵之气。

张发奎在不远处的木楼上注视着这一切。

张发奎先今井一步从南宁乘小型飞机来到湘西这个美丽的县城芷江，与他同行的是美军联络部博文上校和第二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李汉冲，他们是奉何应钦总司令的命令，前来参加洽降典礼的。

洽降典礼安排在芷江机场盟军招待所的一个小会议室。下午3时20分，洽降仪式开始。按照军阶对等的原则。负责洽降的主角是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肖毅中将、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和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翻译官王武上校。张发奎、卢汉、王耀武和杜聿明等中高级将领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

今井武夫呈献了日军驻中国大陆、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越南区内所有日军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及指挥系统区分等各种图表。肖毅要今井转交给冈村宁次一份何应钦总司令授予的第一号备忘录。该备忘录指示日军投降应

行准备的事项。今井恭敬地接过备忘录，俯首帖耳地表示服从。

从乞降代表携来的一整套资料中，张发奎不但弄清了敌人在中国的全部兵力部署，而且很详细地明了广东方面敌人的情况：日军投降前，南支派遣军的作战计划，原以阻止美军在沿海登陆和固守广州为目的，部队多配备于沿海地带，并在广州近郊四周及增城、花县一带，构筑有以广州为核心之据点工事。从他们防御广州之部署与阵地各种设备，令张发奎有些心惊。如果他进攻广州的行动在其未投降以前实施，诚不知须花费多大的心力和牺牲多少的生命。

在芷江，何应钦分别任命了15名全国各地的受降主官，张发奎接受了接收广州、香港、雷州半岛及海南岛等地的受降官任务。张发奎衔命返南宁，当即拟定受降及接收计划之步骤要领。张发奎所属的部队由作战的态势迅速地向指定地区前进，除原在越桂边境的黄涛的第六十二军，改归卢汉的第一方面军指挥，进入越南境内，向河内海防担任受降任务外，其余队伍日夜兼程，向东行进，顺利地开进指定地区，没有遭遇任何抵抗。

9月1日，张发奎派遣参谋人员飞赴广州，与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取得联系，做好受降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9月初，陈诚、何应钦先后来到南宁。他们来的目的，一方面与张发奎商谈关于受降等事宜，另一方面，是商谈张发奎今后之新的任命问题。陈、何两人都拿着任命这张牌竞相拉拢张发奎。何应钦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张发奎一向是亲陈疏何的，现在他眼看到何应钦多方拉拢他，担心有人把这种情况传到陈诚耳里，于自己不利。一次，他在宴请何应钦以后，带着几分酒意走回办公室，对自己比较亲近的幕僚高声地说："我与辞修（陈诚的别名）公谊私情都很好，对敬之（何应钦的别名）没有什么好感。"

张发奎原定是于9月3日在南宁举行正式受降的，随后奉陆军总部命令，改在广州为正式受降地点。因此，他设立广州前进指挥所，令中将高级参谋张励为主任，率领200多名官兵乘8架盟机由南宁飞广州打前站。不久，张励从广州打来电话，报告说："……在前进指挥所与新一军部队尚未到达前，广州曾有一度极其紊乱之状态。指挥所与新一军到后，社会秩序才比较稳定一些。"

张发奎问："现在情况怎么样？"

张励道："新一军之先头部队已于9月7日入广州，另由粤汉铁路南下之第三方面军汤恩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也于9月9日到达广州。我已令孙

立人统一指挥所有广州部队，包括徐光英的别动军和伪军等；令第十三军推进广九线，执行与新一军同样之任务。同时，我令广州日军先行集中在河南之南石头及芳村花地一带，候令缴械进入集中营。至9月11日，日军在上述各地集中完毕，在广州市内绝迹。”

张发奎默默算了一下，自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开始至日军投降最后一批撤离市区日止，广州被日军盘踞共6年又10个半月，这胜利得来不易啊。他对张励交代说：“我决定于9月15日上午，乘飞机飞往广州主持受降。”

张发奎离开南宁赴广州前夕，正是他49岁生日，按虚岁记，则为50岁大寿，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借此机会为他举行了一个祝寿茶话会，邀请张发奎夫妇出席。

茶话会上，司令部附属学校的几位男学生撰写了“祝词”，颂扬张发奎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立下的赫赫战功，决心跟随他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几位心细的女学生把两本书——一本是苏联小说《夏伯阳》，一本是苏联作家高湟楚的剧本《前线》——作为生日礼物，捧到张发奎的面前，祝他生日快乐！张发奎欣然接受，孩子们甚感高兴。

二、荣归广州，主持受降

飞机穿过云层，开始下降，俯瞰下空，碧绿的越秀山与蜿蜒的珠江就在眼前。张发奎自1930年与广州别离已有15年之久，第一次戴着胜利之冠荣归故乡，不禁感想万千。

广州，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城市，这里是他少年时离开家乡第一个踏足的城市，也是他军校毕业后第一个工作的地方；1926年，他带着第十二师从这里出发，踏上北伐征途；北伐胜利后，他梦想着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不惜发动“张黄事变”，结果使他的事业急转直下；粤桂战争，他兵至广州城郊，谁料功败垂成；1938年，他在武汉会战的前线，猛听得广州一夜之间沦陷，脑子一片空白……

他示意驾驶员别急着降落，先让座机在广州上空盘旋两圈。他俯视着这个熟悉的城市，念这一片锦绣山河，和数百万中华儿女们久受敌人的蹂躏，他心头涌起了无限的伤感。

飞机缓缓降落在白云机场。仪仗队奏起了欢快的进行曲。张发奎检阅了

欢迎行列及仪仗队后，乘车从机场经中华路（今解放路）至长堤，沿途严密布置警戒，以新一军新三十八师全副武装为行列，举行入城进军的盛大仪式。

新一军是全套美式装备武装的军队，威武整齐。汽车纵列前行，随后是高大的骑兵部队，继而是身穿崭新制服的步兵，他们以雄壮胜利的姿态，通过庄严而辉煌的凯旋门，巡行在市区的主要街道。张发奎和已晋升为准将的博文以同盟国并肩作战的象征，站在吉普车上，沿途受到广大市民的夹道欢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张发奎将军凯旋返广州，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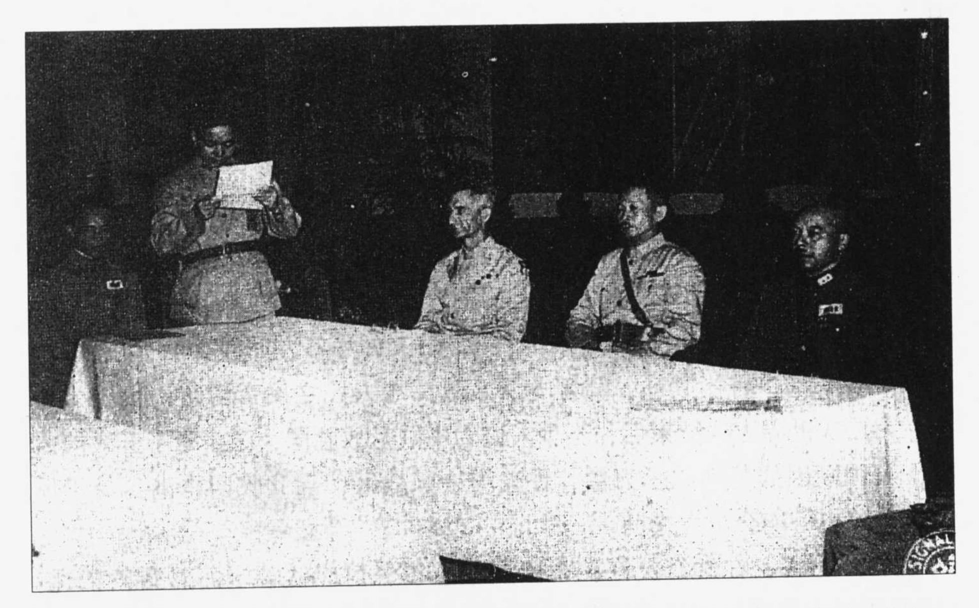
处处张灯结彩，国旗飘扬，爆竹之声，不绝于耳。这情景不但使张发奎心潮澎湃，博文也被这东方式的热情所激荡，认为这是其毕生第一次的愉快和光荣。

9 月 16 日，天高云淡，艳阳高照，受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

上午 10 时，代表广东地区投降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参谋长富田和海南岛日军指挥官代表肥后大佐三人，步入礼堂，向站在中央的张发奎鞠躬致敬。受降时，张发奎上座南面，左右为博文与参谋长甘丽初，面对日军投降代表田中久一及海南岛日海军代表肥后大佐宣布受降第一号命令，由李汉冲以国语宣读，再由翻译译成日语。



1945年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上，上方的长桌是受降席，下方的长桌是投降席，张发奎将军端坐上方长桌旁，指示日军将领田中久一在降书上签名



1945年9月16日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的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上，桌前正中坐者为张发奎将军，其右为美军联络官博文将军

该命令规定：日军受令后，应即就现集中地，依中国军队指定之仓库，按先重武器、后轻武器之顺序，自动卸下一切装备，纳入仓库，随即将武器、弹药、车辆、航空器材、海军舰艇以及人员、马匹和其他军需物资、现存财物等，分别造具结册各5份，呈送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由司令部派员按份清点等。田中久一的降书内，则载有“如不执行命令或违犯命令，愿受惩罚”等词句。

田中久一等挺直地立在张发奎的面前，沮丧地聆听着命令，继而战栗地用随身携带来的毛笔签署了降书。此刻，张发奎心中在想，站在面前的敌酋，他们的内心是悔悟，抑或是愤恨？我固无从推知，但我看到的，是玩火者的悲哀，玩火者的收场。

事后，张励报告说：“……广州日军于9月23日开始解除武装，29日进入河南之南石头、石涌口、白砚壳等集中营；源潭、新街之日军独立第八旅团则于10月10日进入芳村集中营；大良、东莞、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各地之日军，也自9月27日起至11月中旬止，先后缴械集中完毕。至于分散各地的日侨、朝鲜侨民及台湾籍人等，则于广州市内和海南岛之海口、榆林港各地分别集中管理。日军缴出大小武器等约17万余件，另一小部分飞机和海军舰艇。至此受降工作告一段落，受降过程中尚未发生骚动及重大破坏情况。”

直到此时，张发奎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了地。

三、英美作崟，未收港澳

这次受降，张发奎最为遗憾的是对香港、澳门的接收。

香港（包括九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自被英帝国主义侵占后，百年来，英国便以其作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侵华的远东基地。广东毗邻香港，首当其冲，蒙害尤深。故广东人民之反帝情绪，也较为强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少人以为中国是战胜国，已跻身于五大国之列，英国则因战争削弱了力量，香港为中国战区，乘此收回香港，易于反掌，美国也可能会出力相助。

8月21日，在湖南芷江，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曾当面对张发奎说：“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所划定之受降区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应为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包括越南北部、台湾及香港，除东北归苏

军受降接收外，香港划为广州受降区，应即以一个军进驻香港办理受降接收事宜，运输所需船只，已请求美军负责，希即按此实施。”张发奎返回南宁后，美军联络官博文准将也将此事转告，并说美军所负担之运输船只，将尽早提前于9月上旬供应使用，登船地点指定在广州湾与北海两地。

张发奎和第二方面军的官兵们对能够接收香港，异常兴奋，都以为港九从此可以收回，但事隔一周，忽接何应钦电告，香港已于8月30日由英国舰队司令哈科特少将率领舰队捷足先登，并已令香港日军向英军投降，至于香港受降接收权究竟归谁问题，何应钦令另候指示，部队暂行中止运输。

这个变化，不仅张发奎甚为诧异，博文事先也未接到美军总部的任何通知，均对英军行动表示不满。后来，两人分电何应钦、美军总部了解，才得到香港已经最后决定改归英军受降接收之复电。事后，博文告诉张发奎，事变原因，实因英国怕香港受降接收权划归中国后，将影响英国对香港的殖民地统治权，甚至造成中国收回港九的已成事实，故利用海军行动速度快，不待麦克阿瑟的最后同意，即先对香港下手。博文又说，麦克阿瑟起初不同意英军这种行动，曾向英国提出香港归英军占领，九龙归中美两军驻守之折中办法，但英国坚不让步，麦克阿瑟以英军占领香港已成事实，才不得不作此变更，最后只好以日军武器装备交还中国，作为维持中国面子的条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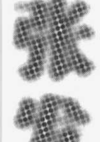
国民党外交部两广外交特派员郭德华也说，美国本想自己派兵占领香港，因恐英国不同意，才把香港划入中国战区，假借中国军队驻守香港为过渡办法，将来中英两国对香港主权发生争执时，美国好出面调停，将香港变为美国的委任统治地，这样，美国攫夺香港的野心就较易实现。即使麦克阿瑟最后决定将香港交回英国接收后，美国与英国也尚订有秘密之条件，美国在香港保有特权等。后来，证实美国在香港设有特别庞大之领事馆及其他机关等情况，此说亦属可信。

对于此事，张发奎在其回忆中写道：

> 对于香港受降任务，我特别感兴奋。香港在我国人心中，是一个国耻的创伤。在过去，它是罪犯的避风港，资本家官僚们的乐园。广东风气的败坏，以及广东政治的商业买办化，多直接间接受香港的影响。盟军最高统帅部首先划定香港地区归中国接收，根据战后领土主权完整及民族愿望的观点，是有充分理由的。英国政府借此时机将香港归还中国，未始不是外交上明智之举。但唐宁街的

> 绅士们却见不及此，致使中英邦交在战后仍保留着一种暗淡的友谊。在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总统本来想使香港归还中国，并使之成为一个自由港。波茨坦会议对香港战后的地位，亦有同样的建议，但均受英政府的反对。中国接收香港的规定，遂因之而中变。

英军虽然捷足先登，但中国方面仍有不甘。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进入广州受降时，社会舆论即强烈要求收回港澳，报纸纷纷发表收回港澳的言论，广东省参议会也发出了收回港澳的宣言。国民党的军队特别是中下级官兵，同样具有一种反帝的要求，都主张以强硬态度对付香港，有些人还提议实行武装占领，把事情扩大起来，以便为收回香港做资本。此时中国军人出入港澳有一个口号："我们不是进入外国地区，而是在自己家乡走动。"又鉴于战时之经验，以为英军不堪一击，只要一个师就可以占领香港。人民情绪可见一斑。





张发奎等上层人士也有一种想法，他们以为对香港采取强硬做法，可以博得社会的同情，增加自己的威望，有利于对广东的统治。同时，张发奎对美国也存有幻想，他不止一次地说："美国为扩张其太平洋势力范围，必须排斥某国在远东的势力，因而它也不愿意英国占据香港，如果我们对香港发生了事件，美国暗中一定高兴，决不会出面来支持香港，英国此时如无美国的支持，当不敢单独对我们有所动作，因此，我们对香港的任何地方纠纷，都不致酿成为国际的争端。"





于是，张发奎对香港采取了"寻求机会、制造借口、纵容部属、扩大事态"的方针，同时将矛头指向当时军警不满1000人的澳门，因为蒋介石没有提到不收回澳门，而中国外交部曾电饬驻葡公使，向葡萄牙政府表达中国收回澳门的意愿。

10月，邻近澳门的中山县县长张惠长和国民党驻军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在张发奎的暗示下，策动了一次反对葡萄牙人占据澳门的运动。首先，他们通过国民党澳门支部在澳门街头发动集会、游行，表示不满意葡萄牙继续统治澳门。这些行动引起了澳葡当局的恐慌，他们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名，封锁了关闸，限制内地人民进入澳门，禁止澳门居民集会宣传，严厉取缔澳门居民的反葡活动。澳葡的措施激起了广东省人民的义愤，广州当局顺势以澳门仍藏匿有日本人为由，要求澳葡当局马上引渡日本人，还声明中国军队保留入澳搜查日本战犯的行动自由。

11 月，张发奎下令国民党部队自石岐进驻前山，封锁粤澳边界，切断内地对澳门的粮食供应，并令中国军队在湾仔、前山等地进行夜间实弹演习，使澳门的中国居民纷纷返回内地避难，而逃入澳门的日人和汉奸仓皇逃往香港，或转赴外国。澳葡当局看见中国军队采取断然措施，一时十分恐慌，一方面致函张发奎表示愿意妥协，一方面通过港英当局向南京政府求情。澳葡当局表示，愿意把所有在澳门的日本人驱逐出境，交由中国处理，并引渡汉奸战犯，查封其资产；中国军民可以自由出入澳门，不受任何限制；设立广州行营驻澳联络专员和肃查委员办理引渡案件；允许中国方面的一切党团（主要指国民党澳门支部）可以在澳门公开活动；澳门中国居民有集会、游行的绝对自由等。同时派人向中国方面表示道歉。

张发奎便于 12 月下旬按南京政府的指示，撤除了前山边境的武装封锁。

1946 年 2 月 5 日，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率武装警卫连进入澳门，受到近万名澳门居民的热烈欢迎。刘绍武还在澳门各界招待会上重申了中国应迅速收回澳门的意愿。可是，国民党中央政府在答复各省参政会要求收回澳门的建议时，批复道："经交外交部核办，据称：目前国际形势之下，此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就这样，错失了收回澳门的机会。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与中共争夺东北，发动内战，广州受降伊始，即将张发奎所指挥的部队主力，通过九龙登船北运，逐次北调，准备对东北共军攻击。从 1945 年 10 月开始至 1946 年 8 月止，先后在九龙过境的国民党北运部队，有石觉之第十三军，李弥之第八军，孙立人之新一军，阕汉骞之第五十四军和驻日占领军第六十七师戴坚等部，总共不下 10 余万人。张发奎的广州行营在这样长的时间和如此大规模的部队从九龙过境中，自然与港英当局接触频繁，因而也就发生了许多事件。

1945 年 10 月下旬，张发奎派李汉冲为行营代表赴港，与港督菲士丁协商，最后制定以下几条协定原则：

（一）过境部队每一回次的人数不超过五千人的规定。（二）候船逗留时间不超过七十二小时……（三）部队在候船逗留时间，可以在九龙地区范围内自由活动，但不能渡海到香港……（四）共同组织混合纪律执行队。另由行营指派驻港联络专员一人，负担中英双方高一级的联络任务。（五）部队在规定活动范围以外行动

时，士兵一律不佩带武器，一般军官可以携带自卫枪械。（六）为保持军人特殊之荣誉，中国军官在任何地区行动，除受纪律执行队之约束外，不受其他军警之检查盘问。又中国军人在港九境内发生任何有关法律事件，均由中国军法处理。（七）协定由双方制成命令，分饬所属部队执行。

张发奎完全同意上述协定，随即以命令付诸实施。于是，中国军队在九龙，耀武扬威、横冲直撞。有一次，新一军的吉普车在街上碾死过两人，英方没有过问；接着又发生行营宪兵数人围殴英警一名，因重伤致死的事件，英方也未提出什么要求，只责令纪律队将该宪兵数人调回原部队处理而已。

1946年1月间，广东省在港参议员数十人及各界代表等，向来港的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公开请愿，要求立即收回港九，这才引起英方特别注意，认为这是触及香港主权的违法行动。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出来说话。他在接见美国合众社社长白里时说明："近来港澳连续发生地方事件，深为遗憾，除令地方军政当局注意敦睦邦交外，中国拟循正规外交途径，与英国解决香港问题。"张发奎到台湾考察，路过厦门时，对记者发表"香港不收回，走私无法绝迹"之谈话，也受到由外交特派员郭德华转来蒋介石的斥责警告。

嗣后，又因发生中国军官在港鸣枪伤人之事件，广州行营竟允英方之要求，限制中校以下军官，非持有行营发给之携带枪械特别证件，一律禁止携带武器入港。于是作茧自缚，中国军人在港之自由权，遂逐步丧失。

四、惩治"劫收"，铁腕肃奸

受降任务完成后，蒋介石派出的接收大员空降羊城，大发"胜利财"与"劫收财"，藏匿埋没，折扣报销，贵贱调换，敲诈勒索，层出不穷；土匪、"别动队"、流氓、恶棍也趁火打劫，广州等大中城市，人心惶惶，治安混乱；加上物价波动，货币贬值，弄得民不聊生，饿殍遍地。

一些广州市民在四牌楼（今解放路）挂起瓦饭煲，贴上："抗战八年无米煮，和平三日吊沙煲。"在市民中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睇错老蒋（指蒋介石），迎错老张（指张发奎），搭错牌楼，烧错炮仗！"这反映了广东人民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怒的心情。

其实，张发奎对"劫收"人员的贪污腐败也恨之入骨，深深地感到：

"我们虽赢得了胜利，但我们先哲遗下来的羞耻观念，却已荡然无存了。"并认为，接收的混乱与黑暗，是战后行政的最大污点。因而，他决心杀鸡儆猴，而首当其冲的是陈诚的亲信莫与硕。

当过中将军长的莫与硕是陈诚多年的老部下，是中央特派接收人员，被任命为军政部广州区特派员办事处中将特派员，负责接收日军物资财产，其接收范围与物资数量最广、最多。刚开始时，张发奎见莫与硕是代表陈诚的军政部前来接收的，还多方面支持他，可是后来听说莫与硕贪得无厌，贪污最多，据说不下数百万港币，已成为接收中的众矢之的，决定拿他开刀。

这天，情报人员密报说，莫与硕与办公室主任李节文一起，将接收过来最新式尚未启箱使用的数千支步枪、机枪，卖与中山护沙总队，乃至黄角乡一带五龙堂的地方土匪恶霸。同时，他又请广东省府主席罗卓英任命李节文为护沙总队长，这样，既可树立自己的武装势力，又可借李节文为卖枪械之掮客，一举两得，势利双收。今天晚上，李节文将在天字码头连夜用轮船装运枪械，并与五龙堂有图谋不轨之行为。

张发奎闻之大怒："如此胆大包天之徒，给我抓起来！"他叫来六十四军一五九师师长刘绍武，命令其亲率一支队伍前往侦查进剿。果真当晚在天字码头，刘绍武设下埋伏，当场将赃物取获。张发奎即将莫、李扣留，呈请何应钦指示处理。

此案引起陈诚与何应钦争斗。陈诚力为莫与硕庇护，何应钦则主张严办，相持不下，案子拖延多时。1947 年 2 月，张发奎趁何应钦到广州视察，再次请示何应钦。何应钦最后以陆军总司令名义，手令张发奎将莫与硕、李节文二人在广州执行枪决。

在惩治腐败的同时，肃奸工作也引起张发奎的关注。

一位副官在向张发奎汇报时，提醒说："张长官，您在做好接收工作的同时，还要多多关注肃奸工作。"张发奎有些诧异："对于汉奸的处理，中央不是指定各地军统负责人员为肃奸专员，组织办事处以专司其职，严制其他机关人员插手过问吗？""是啊。广州肃奸专员为军统负责人陈劲凡，可这个陈劲凡办事极为不力，对群众检举的大汉奸迟迟未做处理，各地民众激于公愤，纷纷要求撤换陈劲凡。我们已收到大量民众的信件，要求长官您亲自过问肃奸工作。""这样啊。"张发奎边翻看群众的请求信边说，"那我得想个办法，把这个肃奸权先拿过来。"

当天下午，张发奎召陈劲凡到行营，以退为进地说："……外面对肃奸

专员办事处的闲话很多，肃奸专员办事处名义上是我长官部的一部分，外界对肃奸处的指责，就是对我的指责，而事实上肃奸处不是归我管辖的，我既无权管辖而又要承担名义，我怎能负责？因此，要求今后即将肃奸处脱离二方面军和行营，由你们自己负责；或者确实归我管辖，不是挂一个虚名，如此则必须将肃奸处改组，邀请在广州的党政机关参加，由我主持，但业务仍可交给你办理，你可向雨农（军统局局长戴笠别字）报告，过几天我也会直接打电报给雨农征询他的意见。你回去考虑后，将你的意见告诉我。”

陈劲凡听后，只好答应。

几天后，以戴笠名义答复张发奎的回电和军统局批复陈劲凡的电文都到了，同意将第二方面军肃奸专员办事处改为广东肃奸委员会，由张发奎任主任委员，不再隶属于军统局。掌握肃奸的权力后，张发奎开始了他的“铁腕”肃奸，态度甚为坚决。



这时，副官报告说：“张长官，根据您的指示，我派人对目前住在广州的几个大汉奸进行了秘密调查。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伪广东省政府主席褚民谊及其民政厅长周应湘、财政厅长汪宗准、建设厅长李荫南、教育厅长陈良烈、参事徐义宗、高齐贤和汪精卫的女婿何文杰等一群大汉奸，向与军统有所勾结，为陈劲凡等暗中所保护，秘密藏匿于番禺之沙湾，以待尔后设法潜逃，但事后为人举报，陈劲凡始不得已借口‘事先监视’，将其交出。现在对这些大汉奸该如何处置？”





“这个陈劲凡果真与汉奸不清不楚，要是在战时非枪毙他不可。”张发奎说，“至于那几个大汉奸，先将他们拘禁于豪贤路的别墅里，静候中央处理吧。”

“还有一批汉奸，如伪海军司令兼广州伪警备总司令招桂章、广州市伪警察局长郭卫民等大汉奸，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声言‘起义’。由于得到军统出面庇护，至今均未加以逮捕，仍在广州市到处活动，郭卫民还经常穿上白色警察制服，指挥伪警，到处请客，有些市府新贵，也与之周旋。”

张发奎一听，把桌子一拍：“哼，当汉奸还不知廉耻，立即派人把招桂章、许廷杰、李辅群和郭卫民4个汉奸给我抓起来，将他们押到第二方面军特务团部，严加看管。”

副官又低声说：“陈璧君说，她与张长官的关系向来不错，听说您来广东主持工作，便与褚民谊一起给您写了几封信，要求见您，并说有委曲相陈。”

张发奎凛然说："汪精卫做汉奸前，我与陈璧君等都是旧交，本该一见，但他们做了汉奸后，性质已变，在民族大义前已无丝毫商量余地，不见也罢。"

不久，陈璧君等大汉奸转解南京，褚民谊被判死刑，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

而在广州，军事法庭决定，判处招桂章5年、许廷杰3年徒刑。报告打到张发奎处后，张发奎对此不同意，斩钉截铁说："……战后法国枪毙了数万的奸伪人员。国家的正义与民气必须伸张，文天祥的浩然之气，实足以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条件。奸伪的政治主张，虽有其不同的角度，但卖国求荣的行为是罪无可逭的。我们必须以严厉的法律来处理奸伪人员。"他大笔一挥，将招桂章改判10年，许廷杰改判5年。

对于伪和平救国军总司令、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吕春荣被处死，张发奎特地召开记者招待会，并在会上表态说："……肃奸必须雷厉风行，我虽与吕有旧交亦决不徇情，仍将他从清远解来，并为大快人心起见，特在天字码头执行枪决示众。"会后，张发奎即下令处决了吕春荣、陈修爵、范德星、李剑琴、符永茂等汉奸。

紧接着，张发奎又根据何应钦的命令，对广州区的6万多名伪军进行逐次编遣，将各部改编为5个暂编支队，撤销先遣军名义，以平民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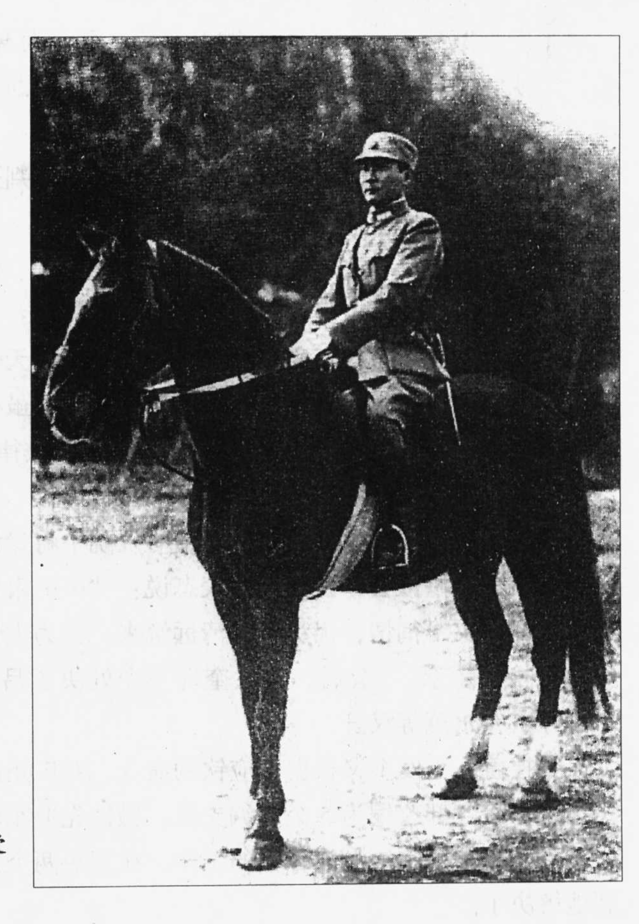
肃奸，本是一件最为棘手的工作，在短短两个月内的时间，张发奎却顺利地解决了。

五、处理日俘，严惩战犯

另一个困难的工作，是13万7千余名日俘的处理问题。

广东地区的日军，自1945年9月16日开始分区集中后，于9月24日实施解除武装，进入指定的集中营，施以战俘的管制。张发奎成立了一个日本官兵管理处，并在琼州、东莞、顺德分设3个分处，派中将参议廖鸣欧为该管理处处长，负责管理战俘之生活补给、纪律维持与遣送回国等工作。

日军解除武装进入集中营后，即解除原有军制，不准佩带军阶符号，但仍可穿着制服。战俘在集中营禁止外出。战俘在身份上，官兵一律同等待遇，但生活待遇上则有所区别，伙食分为将、佐、尉和士兵4个等级，由战俘管理处会同日俘联络部向后勤机关领发。



1945年9月16日接受日军投降后的张发奎将军



战俘管理处长廖鸣欧前来请示说：“对于这批俘虏中的台湾人和韩国人该如何处置，是否和那些日俘一样？”

“不，对于韩、台籍之战俘，你们要给予特别优待，把他们与日籍军民隔离，不要以俘虏的身份待之。”张发奎说，“还有，传我的命令，拨还他们个人所有的财产。”

廖鸣欧不解，说：“可是，这一处置，有不少人认为不合理，这些韩、台籍人，在华南的罪行，较之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应受日俘同样待遇，更应严究其罪行，加以严厉的惩处。您看，打九江的波田支队，大部分就是台湾人。”

想起九江之战，张发奎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痛，但他仍然以为这是种短视的见解，台湾是中国国土，台人是祖国同胞，他们受了50年的奴隶生活，受着日人教育和思想上的鞭笞，如果他们有助桀为虐的行为，也是祖国放弃

了他们才养成的罪恶。韩国为我们兄弟之邦，他们和台人同样过着亡国生活，我们为扶助弱小民族，为争取今后的建国，对他们都不能与日本人作同样的看待。

1946 年 3 月 21 日，第一艘美国自由轮由虎门开出，船上登载日侨 4000 余人。以后每次均以 4000 人为基准陆续遣送。4 月 25 日，10 余万名日俘日侨全部遣送完毕。

战俘登轮回国时，一个个欢天喜地，有人甚至跪伏码头向中国部队叩头致谢。其中有的说，他们回国后，将不再服军役，永不与中国为敌等语，情绪相当激动。

对于日本战犯，张发奎绝不手软。

南京当局于 1945 年冬宣布战犯处理条例，命令各受降区实施办理。同时美军驻华总部要求张发奎将华南之战犯，于 1946 年 2 月以前调查完毕，以便将有关美军之部分，由美军法庭提审。张发奎立即组织“日军战犯调查组”，进行日军在华南之具体罪行调查。1946 年 1 月间开始逮捕第一批战犯 21 人。至 4 月止，前后宣布逮捕战犯 6 批共 622 名，其中有将官 7 名，校官 19 名，日本驻广州领事也在战犯之列。将官中有特务机关长松井真二少将，宪兵队长重胜宪文少将，第一三〇师团长近藤新八中将，独立第二十三旅团旅长下河边宪二少将及田中久一等。

张发奎对华南级别最高的敌酋，广东第一号战犯——田中久一的处理最为关注。

田中是张发奎的老对手，他在抗战后期以第二十三军中将军长兼南支派遣军指挥官的级衔，派来广州指挥侵华战争的，曾于 1944 年指挥所部侵犯粤北和桂南，策应长沙、桂柳两战役敌主力方面之作战。日军投降后，他初为广州、汕头两受降区的日军投降代表，后为日军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直至 1946 年 3 月始被列为日军战犯而受逮捕。

张发奎对田中有所了解，他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一个以军职为终生职业的军阀，个子矮小，小唇留有小胡子，此时他 50 余岁，面部虽有点苍老，但皮肤黄黑而结实，态度沉着，表现出一个顽固凶狠的军阀本相。他喜用毛笔写字，在代表投降签字时，还用裤腰上随身带的与墨砚连在一起的日本毛笔来签字。他在狱中的生活很大部分是用毛笔写字和阅读佛经和中国古典诗词。据他自己说，研究佛经是他日常的主要生活之一部分。

当南京宣布凡负责一个战区以上之日军最高指挥官，均得以战犯论处，

田中始被列为战犯，撤除其善后联络部部长之职权及原有军长的各种优待，逮捕拘禁于南石头太古码头原日俘集中营内之一间小洋房内，张发奎要求监管人员要注意田中的身体，防止他自杀。

作为一个与日军打交道多年的将军，张发奎对田中之流还是保持相当警惕的。他听到这样一件事，田中被列为战犯在押，一个叫涂思宗的中国军官，原与田中有师生关系，涂思宗特去访他。他见涂思宗即傲慢地问涂思宗是以战胜国军官身份还是以学生身份见他。涂思宗答以学生身份。田中便说："日本战胜而投降真不服气，且看十年之后，谁执亚洲牛耳。"说时竟做狞笑。

1946年9月，经美军之要求，田中转解盟军上海国际法庭审理，美军控以田中军部曾杀死被俘之美空军飞行人员，判处死刑。初拟即在上海行刑。张发奎获悉后，认为田中在广东作恶多端，应押回广东来审判才能解民恨，便发动广东各机关团体联名向南京要求，解回广州。

10月，由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判处田中久一死刑；于1947年3月17日经核准，将田中久一押赴广州流花桥刑场正法。







六、战前诺言，今日实现

这天，张发奎的四弟、时任广东陆军总医院院长的张勇斌兴冲冲走进张发奎的办公室，高兴地说："哥，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啦?"说着，他从皮包里掏出一只精美的酒杯。

"酒杯?"张发奎觉得这酒杯好像在哪见过。

"上个月我赴美国芝加哥开会，遇到一位叫雅伦的美国医生也来出席会议，他对我说，他正四处访查一个叫张发奎的中国将军，他俩在抗战前打个赌，只要张将军能打败日本人，他就把珍藏的传家宝一个酒杯送给张将军。"张勇斌说，"我曾听你说过，你战前到欧美考察是与一个美国人打过赌，便自豪地说，你找的张将军正是我的胞兄，他现在在广州。雅伦一听，非常高兴，马上邀请我到他家，将那个杯子交给我，请我带回中国给你留念。"

"没错，就是这只酒杯，这事你不提，我早把它忘了。没想到，时隔多年，异国朋友仍能重视诺言，真是值得钦佩。但我觉得此事，颇为巧合，好像冥冥中早有安排，因为饮酒当时，完全没有抗日战争这回事。而抗日战争的指挥官，谁能预料会由我来担任一方面呢?"张发奎端详着酒杯，啧啧称

奇，“至于我当时接受饮酒的挑战，可以解释是一种一时好胜的豪举，而事实上果然获得最后的胜利，却非好胜的豪举所能决定。我觉得最为巧合的是，雅伦医生竟能遇到你，并将那杯子交给你带回给我留念，完成诺言。真是有趣之至。”

勇斌插话说：“也许，这是上天对你坚持抗战的一个赞许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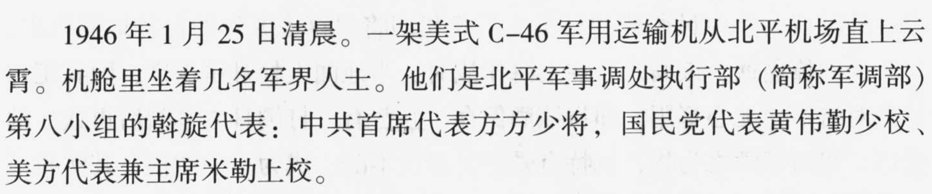
张发奎长叹了一声：“或许吧。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愿望，我也不能例外。我追随国父参加革命的志愿，就是扫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其中扫除军阀，我已经尽了不少力量，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也悉力以赴，与敌人周旋到底。当抗日战争得到最后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将等三人卸除武装，步入礼堂签署降书，同时田中久一并以其本人的佩剑、手枪、望远镜、军马及皮绑腿长鞭等呈献时的那一刹那间，内心的快慰，非语言所能形容，确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日子。当晚我即将保存了8年的白兰地酒取出，与我的同僚痛饮。该酒乃我在上海作战时，当地闻人杜月笙送来，因我正与日敌对峙中，无心享用，即将该酒保存，并曾有‘打倒日本军阀后再饮’的豪语。我对于酒之为物，也特有爱好，多饮不醉，成为军中话柄，其实我平时并不饮酒，不过遇有良朋知己或参加宴会时，酒兴即起，相互交杯，从不后人。现在夙愿终于实现，其快乐之情可想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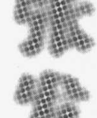
张发奎把玩着手中的酒杯，继续道：“‘7·7’抗战全面开始，我适逢其会，得以参加杀敌，达到我早期献身革命立志打倒帝国主义之夙愿，内心极为兴奋。在此八年长期抗战期间，幸而能够全始全终地领导一方面，甚至最危险之一方面的战争指挥重任，且能忍受一切痛苦，排除万难，配合各友军与盟军联合作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此无他，皆我全体军民热爱国家，不甘奴役，因而全民团结奋斗所奉献的伟大力量的成果。说至此，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于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应邀到莫斯科举行庆祝大会时在胜利致词中的一段话：‘现在这里代表每一个国家的男女，皆凭其能力在岗位上出过力，且由于每一个人的努力，才争取到现在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对每一座光荣的坟墓致敬，并对不能生而看见今天的光荣之同志们家属，寄以慰望。’他这种胜不居功，而以谦虚、友善、仁爱为怀的德性，深得我心。”

说到这里，张发奎有些哽咽了。

第二十一章　潜伏十年，身边藏“特支”

一、公然“宣称”，粤无共军











1946年1月25日清晨。一架美式C-46军用运输机从北平机场直上云霄。机舱里坐着几名军界人士。他们是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第八小组的斡旋代表：中共首席代表方方少将，国民党代表黄伟勤少校、美方代表兼主席米勒上校。

上午10时，专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平稳降落，军调部第八小组的5名代表缓步走下舷梯，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国民党广州行营主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的高级代表王衡向各位代表握手表示欢迎。

当夜，张发奎在行营设宴，为军调部第八小组洗尘。宴会上，他表示：“我是一个职业军人，但从不愿打仗，今天诸位代表莅临广州执行停战和谈，我代表政府表示欢迎。”许多记者纷纷要求美国和中共代表就和谈问题发表意见，中共代表方方指出：“共产党人一贯主张言行一致，张将军既已表示愿意和谈，今天就要看看行动了。”

在宴席上，张发奎说的并不是真心话。对于军调部第八小组的到来，他心里颇为复杂。这几个月来，他一方面忙着处理接收广州的工作，一方面关注着国共谈判。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矛盾再次浮出水面，围绕着接收抗战胜利成果和将来的战与和的政治格局，两者的交锋必然尖锐。蒋介石以为，攘外大局已定，安内之计务必实施，但不可造次，一来内战工作尚未准备充分，二则也不想落个光打内战的名声。于是，他接连3次致电毛泽东，邀其赴渝磋商“战后国内和平建国事宜”。为了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的阴谋，尽一切力

量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前景，毛泽东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亲临陪都重庆。

谈判期间，蒋介石竟然下令阎锡山部进犯解放区，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坚决歼灭来犯之敌，取得了上党战役的胜利。蒋介石不得不在谈判桌上有所收敛，和中共签订了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调的《双十协定》。同时，中共代表还对解放区土地和人民军队数量等问题做出不伤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要让步，其中包括把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 个解放区的部队撤退到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1946 年 1 月 5 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决定于 1 月 13 日生效。为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同年 1 月 7 日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国民党代表为张群，美方代表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

根据停战协议，由国、共、美三方成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为叶剑英，国民党代表为郑介民，美方代表为饶伯逊。军调部先后派出 36 个小组到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进行调处活动。第八小组（也称华南小组）此次广州之行，正是旨在监督广东当局执行停战协定和解决华南抗日游击队北撤问题。

张发奎对国共和平谈判并不在意，因为就在《双十协定》签订后 3 天，他就接到了蒋介石下达给全国的“剿匪”密令。根据这个密令，他在广州召开了粤桂两省“绥靖会议”，策划对广东解放区全面进攻，打算在两个月内“肃清匪患”。会后，他在全省共投入正规军 8 个军 22 个师的兵力，采取“网形合围”、“填空格”等战术，对东江、琼崖、粤中、西江、粤北、南路解放区进行分进合击，反复“扫荡”。

1946 年 1 月，第二方面军奉命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简称广州行营），张发奎任行营主任。就在 1 月 13 日停战命令生效的第二天，张发奎再次接到蒋介石的密令，限期于 1 月底消灭广东中共部队。于是，他以一五四师为主力，分三路向惠阳、东莞、宝安游击区进攻，妄图在第八小组执行到达广州之前，将他们消灭。

在第八小组到达广州后的第一次小组预备会议上，国民党代表黄伟勤肆无忌惮道：“据政府军方报告，广东没有共军，更没有东江纵队，仅有小股‘土匪’杀人越货，祸害民众。”

面对黄伟勤的挑衅，方方义正词严地说：“少校先生，我绝不同意你不负责任的说法。你应该明白，曾生、林平二将军领导的东江纵队，是中共驰名中外的一支抗日部队。华南进攻政策的受挫，香港政府人员被营救，华南

地区广大人民的安全，难道与这支部队的英勇奋战，流血牺牲可以分开吗？如今贵党政府无视人民抗日武装的历史事实，颠倒黑白，诬蔑我东江纵队是‘土匪’，为剿灭我军制造借口，天理难容！”

第一次谈判毫无进展。

2月5日，张发奎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称广东没有中共领导的部队存在，不存在执行停战命令的问题。

这一表态，犹一石激起千重浪，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中共代表方方和助手陈华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张发奎声称的广东只有“剿匪”，没有内战，是重庆政权从上到下的反共策略。否认中共部队，实质上是否认了谈判对象，为消灭中共部队制造舆论，这无疑是当前谈判的主要障碍，若不排除，曾生、林平就不能来广州参加谈判。而排除障碍的关键是在调查中摆出人证、物证，迫使张发奎承认华南游击队，然后再图东纵北撤之计。

2月12日，东江解放区路东总农会致电军事调处第八小组，要求从速调处，制止国民党军队暴行。第八小组因而分向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及重庆三人军事委员会请示，旋获复电，确认广东之中共部队为东江纵队。第八小组即于是日赴大鹏半岛实地调处及监督实施停火命令。张发奎早有准备，以“安全”为名，命令参谋处长李汉冲派一群特务组成接待班子，限制中共代表与东江纵队代表的联系。

张发奎的这一“毒招”，急坏了他身边工作的一群中共地下党员。

也许，张发奎做梦都没想到，在他身边不仅有中共地下党员，更有一个潜伏多年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特别支部。而这个特别支部的主要负责人正是他最为信任和重用的左洪涛。

二、成立“战队”，布下棋子

南国早春二月，已呈现万紫千红的景象，但一股倒春寒，又使早开的桃花处于冷冻中。看着张发奎态度突然右转，左洪涛不禁思绪难平。

左洪涛是湖南省邵阳市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1927年在张发奎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工作，同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先后3次被捕，两次坐牢达6年之久，受尽折磨，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抗战爆发后，他受中共党组织派遣，到由张发奎担任司

令长官的国民党第八集团军司令部、第四战区司令部、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做统战工作，长期担任中共派到张发奎部活动的特别支部书记和领导人，公开职务是战地服务队征调股长、张发奎的秘书、副官处科长和代理处长等职。

他清晰地记得，8年前，也即是淞沪战争打响后，张发奎听说郭沫若刚从日本流亡回国，担任上海救亡总会会长，特地登门拜访。

双方寒暄一阵后，张发奎问："先生，回国后有什么打算？"

郭沫若扶扶金边眼镜："我刚写了一首诗，正代表此刻的心情。"说着，开口吟道：

>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 欲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张发奎拍节叫好："好一个'投笔请缨'，好一个'哭吐精诚'。先生，可曾记得，当年北伐战争，您出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党代表，我那时是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对先生的才华与组织能力非常敬佩。此次登门拜访，我有一个请求，想请先生出面，为第八集团军建立一个类似当年北伐军中的政治部，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均由先生挑选，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郭沫若沉吟了一下，说："国难当头，正需要大张民族正气，鼓动官兵士气，重振当年铁军声威。将军这个意见很好，我个人表示赞同，待我与文艺界的朋友相商后，再作定夺。"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郭沫若会同上海中共组织的负责人刘晓、潘汉年、钱亦石、夏衍等，动员了一批进步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青年，到国民党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帮助张发奎筹建政治部，但蒋介石、陈诚并不同意张发奎在部队中正式建立政治部的设想，张发奎只好不打政治部的招牌，改称战地服务队（简称战队）。

就在战队成立前夕，潘汉年邀请夏衍、钱亦石、杜国庠和左洪涛讨论加强中共对战队在第八集团军工作的领导问题时，潘汉年说：恩来同志在庐山和蒋介石、陈诚谈判时，有一个口头协定，即国共双方都不在对方军队中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但张向华同国民党中央军一些高级将领如陈诚、罗卓

英等有区别，加上张向华对郭沫若十分钦敬，私交颇深，且战队本身又非正式的国民党军队，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我党独立自主的领导，遵照恩来同志的指示，拟相应地在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建立一个秘密的战斗堡垒——中共特别支部。

与会者对此一致表示赞成和拥护。

1937年9月25日，战队正式成立，首先开赴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后方——嘉兴，全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个队最初的成员有钱亦石、杜国庠、左洪涛、张健甫、石凌鹤、刘田夫、何家槐、林默涵、唐瑜、张凌青、孙慎和杨应彬等34人。第一任队长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著名革命活动家钱亦石。同年10月12日，在南桥地区，上海党组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立起中共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特别支部（简称特支），左洪涛出任特支书记，当时共有10名党员，要求所有党员严格保密，不能暴露党员身份和党组织，也不能和所在地区的党委发生横的组织上的联系。这样，特支就成为战队的领导核心，战队则成为特支的外围组织。






特支初时直属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长江局撤销后，改由以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实际上特支一直受周恩来直接领导。

上海失守后，战队随第八集团军从浦东经松江、嘉兴、杭州、建德、衢州等地一直撤退到浙江的江山。同年12月，钱亦石队长积劳成疾，离队回上海秘密治病。不久，第八集团军撤销，张发奎调江西训练新兵，战地服务队暂时拨归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代管，由江山开往金华。

张发奎惊悉钱亦石于1938年1月29日病逝上海，不禁哀痛万分，他亲自倡导，为钱亦石举行追悼大会。

钱亦石病逝后，队长职务由杜国庠代理，特支内部，改由刘田夫任支部书记，左洪涛负责全面工作。同年4月，张发奎调往湖北就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后，他又把战地服务队全部调去武汉，改为第二兵团战地服务队。

暮春的湖北，到处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这个时候也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抗日的高潮时期。武汉实际上是当时的战时首都，中共中央长江局也设在这里。一个黄昏，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在长江局办事处，秘密接见了特支的10名同志。这时日机突然夜袭武汉，全市灯火全部熄灭，警报长鸣。周恩来仍沉着地主持特支一个特别会议。

针对有的同志要求到延安去、不愿做国统工作的思想情绪，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张向华所属总司令部这个据点，是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

据点，撤出去容易，要再进去就难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据点，要坚持下去。”

有的同志说：“张发奎为了争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承认战队的合法地位，动员我们战队同志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去接受短期训练，我们不愿接受这个建议。”

周恩来表示：“我赞成张向华的建议，你们应该去。你们既然要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特别是坚持在国民党军队工作，就有必要取得合法的身份来掩护自己，而进‘战干团’对坚持在国民党军队工作有利，党组织批准你们去。”

大约一个星期后，邓颖超又找特支中吕璧如、方兮、沈丹凤三位女同志谈话，再次阐明在张发奎总司令部这个战略据点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并告诫她们在张向华所属总司令部工作，要遵守组织纪律，坚守工作岗位，注意隐蔽，不要同国民党军官谈恋爱。

周恩来的谈话不仅表明中共对张发奎的基本态度与看法，也指明了特支的任务与作用。

张发奎对战队队长的人选比较慎重，杜国庠调离战队后，他考虑再三，决定由其舅父官其慎担任。官其慎曾留学日本，任第二兵团总司令部少将参议。此人在思想上对马列主义是持怀疑态度的，但对战队同志却相当亲热，表示钦佩。特支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对官其慎采取既团结又斗争，而以团结为主的方针，一定要同官其慎搞好关系，做好他的工作，这对做好张发奎的工作有利。

左洪涛在特支会议上告诫大家，张发奎过去是反蒋的，蒋介石不信任他，但因他在北伐时声望卓著，资格又老，在国民党军队中有影响，蒋又不能不用他，故曾授意陈诚多方面拉拢他，给他一个空头司令，不给予实际兵权和地盘。这点，张发奎是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的。为此，他就更需要我们在他那里工作，表示自己是个“开明将领”，以期在军队中，在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和各阶层人士中提高自己的威信，多搞点政治资本。官其慎是看张发奎的颜色行事的。张发奎主张团结抗战，我们拥护他，他由此会更接近我们，信任我们。

1938 年 12 月，张发奎抵达韶关，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队也随同前来。

这时，碰到一个问题，按照规定，第四战区是必须成立政治部的。过

去，战队实际上是代替第八集团军政治部、第二兵团政治部在那里工作的。于今，余汉谋所属的第十二集团军政治部已提升为第四战区政治部，而作为具有政治部性质的战地服务队，就势难与之并存了。张发奎知道战队的人都不肯并入四战区政治部，他自己也不愿意这么办。于是，他想了个办法，提出名义上将战队“解散”，实际上所有成员仍留在战区长官部另行安排工作。

就这样，左洪涛和张敬人、何家槐、孙慎、沈振黄、柳倩分配在长官部担任秘书；刘田夫、杨应彬等分配在长官部警卫营、卫士队当教导员和指导员，其他成员也做了相应的安排。稍后，左洪涛和何家槐调任张发奎的机要秘书，随同张发奎工作。不久，周恩来派南方局秘书长李克农与特支联系，把左洪涛介绍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建立联系。

特支成员是经郭沫若介绍进入张发奎部队的。对由郭沫若介绍进来的文化人，张发奎一般地知道他们是左翼分子，但是他们是否是正式的共产党员，却仍在猜疑之中，当然他更不知道有个特支。这年夏天，张发奎邀请叶剑英到韶关做客，张发奎故作漫不经心地试探说：“……你们那里也有好几个同志在我这里工作！”叶剑英说：“没有吧，我都不知道呢。”

叶剑英后来对左洪涛谈起此事时认为，张发奎当时还不能肯定战地服务队员中有正式的共产党员，更没有料到在他自己身边有中共党组织。张发奎那样说，是试图向他摸底的。

作为张发奎的身边人，左洪涛等容易直接与张发奎谈话。他们就利用这种特殊条件，摸准他的思想情况和政治态度，从中做工作，影响其言行，促其进步。张发奎的讲演稿和公开发表的文章，绝大部分是由左洪涛、何家槐等人撰写的，他们就巧妙地把中共提出的政治主张融合进去，变成张发奎的讲话，其内容基本上是宣传坚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坚持全面抗战，全民抗战和坚持持久战。

他俩还把张发奎的讲演稿和发表的文章汇编成《张发奎将军抗战言论集》（1~3 集），头两集是在郭沫若为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救亡日报》社出版发行的。这样，既宣传张发奎坚持团结抗战，也具体地宣传了关于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张发奎对此也感到满意。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因国民党严加封锁、限制，能够在华南地区发行的数量极其有限，中共广东省委因而决定创办《新华南》半月刊，要求特支做好张发奎的工作，取得张发奎的赞助和支持；同时确定《新华南》以统一战线的面目出现，邀请各方面有关人士分别担任赞助

人、特约撰稿人和编委等。

《新华南》从1939年春创刊至1942年春被国民党顽固派封锁，坚持出版了3年。它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揭露敌人，打击敌人，孤立反共顽固派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影响所及，不仅在广东，而且扩展到西南各省乃至东南亚和美洲一些爱国华侨。

1939年前后，蒋介石秘密颁发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并由国民党中央通令国统区党政军各部门所有人员要一律加入国民党。特支对此坚决抵制，有的同志痛哭流涕地要求到延安去，到八路军、新四军去。

张发奎一再向左洪涛催促说：“我知道国民党腐化、你们不愿意参加，其实你们参加进去，不就可以帮助和推动国民党革新进步？我要亲自介绍你们参加。”左洪涛婉言推托说：“青年人爱自由，加入进去怕受约束，故不愿参加。”因此拖了很久，形成僵局。

在这关键时刻，李克农转来周恩来指示，强调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投降危险、分裂危险和倒退危险，是当前时局中最大的危险。我们的任务是协同一切爱国分子，充分发动群众，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对日反攻准备力量，创造条件。为了掩护自己，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积蓄力量，在被强迫加入国民党时即加入之，不宜久拖，越拖越暴露；对不愿加入者，要讲清道理，打通思想，耐心说服。”

这样，除刘田夫调离外，其他特支的同志由张发奎介绍，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这年秋天，韶关基督教青年会设立了一个时事讲座，邀请左洪涛去做一个题为“民主与宪政”的讲座。在事先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后，左洪涛欣然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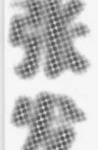
那天上午，听讲的人特别多。左洪涛从爱护国民党，要求国民党改弦易辙这一良好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专制独裁、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背离孙总理遗训、违反“抗战建国纲领”等种种劣迹，吁请各界爱国人士敦促政府认真实行政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反对汪精卫卖国投降，坚持团结抗战到底，才能使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真正付诸实施。

这次讲话，得到广大听众欢迎，反应强烈。但时任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

的丘誉，却暗中派《阵中日报》主笔谢寿南混入场内监听，随后就在该报连续发表两篇社论，指名道姓攻击左洪涛“言论荒谬，有危害党国之嫌”。左洪涛随即和张文彬研究对策，张文彬沉着地指出：“张向华会给他们好看的，我们不要和这班家伙打笔墨官司。”

果然不出所料，数日后，由战区司令长官主持的每周一次党政军各部门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如期举行，张发奎吩咐左洪涛不要随同他去参加。就在这次会议上，张发奎指着丘誉的鼻子训斥说：“左洪涛秘书应邀到青年会演讲，是我同意的，他的讲话提纲也经我审阅过。他是我的秘书，你们攻击他就是攻击我。你们对团结抗战的宣传动员工作横加诽谤，是何居心？”丘誉木然肃立，连声称是认错。随后，丘誉即将《阵中日报》主笔谢寿南撤职，并向左洪涛赔礼道歉。不久，丘誉本人也灰溜溜地调离了四战区。

1940年初，第四战区长官部从韶关搬到广西柳州。






三、出面保护，身边人员

桂南战役接近尾声时，张发奎要左洪涛抽调原战地服务队人员组成一个宣传慰问团，代表他和战区长官部到昆仑关、上林、宾阳前线进行宣传慰问工作。左洪涛在桂南工作了一个月，张发奎有一天突然派官其慎来接替他的工作。左洪涛向张发奎汇报时，不解地问为何调他回来？

张发奎说：“广西省长黄旭初打了个电话来，说我们宣慰团在桂南有的宣传搞的不大适合，如提出清除托派汉奸之类，他们有意见，所以就调官其慎去，调你回来。”

左洪涛说：“托派勾结日寇，充当汉奸，在桂南一带搞了不少对日妥协投降的宣传活动，为什么不清除他们的影响？”

张发奎说：“那是广西方面的事。我们何必去管它，你回来工作不是一样。”

正在此时，李克农指示左洪涛要做好第四战区党政军方面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从长远考虑，设法派员打进到国民党真正的核心部门、要害部门去，掌握军队或军事秘密。同时，他建议特支挑选一两名年轻有为、政治上完全信得过的同志，由张向华保送到军校、陆大去学习。左洪涛推荐了杨应彬这个合适人选。

于是，杨应彬通过张发奎保送到贵州独山国民党军校第四分校学习，时

间是1940年5月至1942年10月底，为时两年半。

杨应彬是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参加军校学习的。但入校半年后，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外面有几个同志写信给杨应彬，讲了一些进步的、发牢骚的话，给军校的人查到了，开始秘密监视杨应彬。杨应彬即托人带了封用汉语拉丁话写的信给女友郑黎亚，要黎亚赶紧告知左洪涛设法解围。左洪涛得知此情况后，向张发奎汇报说："应彬在四分校，无论学课、术课，考试成绩都取得第一。"

张发奎感到自己很有面子，十分高兴，当即嘱咐左洪涛代他写两封信：一封是给张发奎的老部下、四分校主任韩汉英的，主要是赞扬杨应彬年轻有为，勤奋好学，成绩优异，务期多加爱护培养；另一封信是给杨应彬本人的，主要是赞扬杨应彬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不胜欣慰！四分校那些家伙一看到这两封信就怔住了，杨应彬也算解了围。

1942年，杨应彬回到张发奎部，担任警卫团机枪连连长。有人在张发奎面前攻击说："你让杨应彬当机关枪连连长，不要再来个广州暴动啊！"刚好，陆军大学参谋班招生，指定军校各总队前三名都要去学习，左洪涛极力主张杨应彬趁此机会到陆大参谋班去学习一年半载，"好再镀一次金"。杨应彬随即参加了陆大参谋班，半年后回来，在参谋处当作战参谋。

从1943年开始至1947年，杨应彬和左洪涛利用工作关系，了解到不少非常有价值的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情报。这些情况特支获悉后，即先后转报南方局和香港党组织。

1944年，正当桂南会战大溃败时，中统驻柳州负责人密电蒋介石侍从室，控告张发奎身边的麦朝枢、黄中廑、左洪涛、何家槐等人思想左倾，行动可疑，请予查究。蒋介石侍从室即以蒋名义密电张发奎查询麦、黄、左、何的思想情况。

这时，黄中廑、何家槐已后撤，张发奎即召见麦朝枢和左洪涛，一面出示蒋之密电，一面郑重其事地说；"你们的言论行动要注意，不要授人以柄啊！"经过恳切交谈，张发奎指示左洪涛以他的名义复电蒋介石，谓麦、黄、左、何随他工作多年，经考察，思想纯正，云云。

当日寇进迫桂林时，大批党内外从事文化工作和民主运动的知名人士，纷纷从桂林撤到柳州。柳州火车站已被国民党军队守卫，老百姓要买一张火车票，真比上青天还难。

当时由桂林撤到柳州的，有田汉、安娥、邵荃麟、葛琴、金仲华、沈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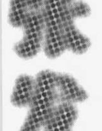
远、熊佛西、焦菊隐、宋云彬、胡希明、陈残云等一批文化人士，左洪涛等特支成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千方百计地给他们弄到了免费的火车票、汽车票，甚至整个车厢和整辆汽车，使他们得以安全转移。是年终，左洪涛在贵阳见到了田汉，田汉对此表示无限快慰："张长官够朋友！有机会请他喝酒。"

四、赓靖之死，心口挖刀

1945年3月百色整军后，张发奎由战区司令长官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国民党一些军政要员大为张发奎抱不平，认为张发奎是堂堂铁军名将，且系现役上将，不应与汤恩伯、王耀武等庸将平起平坐，同列为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内心也十分不快。



左洪涛看准时机，和黄中廑乘此向张发奎进言："……可否与李济深、龙云、蔡廷锴等商量，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在大西南地区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搞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张发奎点头表示："可以搞。"



黄中廑和左洪涛便邀集麦朝枢、张励、吴仲禧等人，同张发奎一起在黄中廑的办公室开了个会，正式建议张发奎与李济深、龙云、蔡廷锴及其他进步势力，主要是中共联合起来，坚持民族团结抗战，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大西南地区开创个强大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搞出一个新的局面来。





张发奎当即表示赞成和支持，但叮嘱几个与会人员，暂时先不要公开以他的名义去活动，而应作为各人自己的意见暗中与各有关方面商量进行。

会上，根据张发奎的指示进行了研究讨论，并分了一下工。确定麦朝枢、张励、吴仲禧与李济深、蔡廷锴、谭启秀等联系，黄中廑与中共方面联系。左洪涛与民盟、龙云方面联系。张发奎表示同意。

会后，左洪涛陪同张发奎回办公室。两人在路上边走边谈。

张发奎对左洪涛讲了一些牢骚话，说共产党不相信他，对不起他，不好合作。当时，他主要列举了三件，头一、二件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张发奎说，这两次暴动，事前都没有和他商量，不相信他。第三件是中共在始兴起义，他说："我早就知道邓文礼是从延安抗大学习回来的共产党员，吴新民也是共产党员。但我仍然相信他们，信任他们，可是，他们却在始兴暴动，把我的家也抄光了，枪也拖走了。"

左洪涛笑着向他解释："1927 年夏末秋初时，武汉国民政府实际上已和南京政府合流，汪精卫自食其言，公开反对孙总理确定的三大政策。把矛头指向共产党，他们在行动前，怎么敢和你商量？依我之看，他们不是不和你商量，而是不敢和你商量，但仍然邀请你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至于始兴事件，起因于中统特务杨瑜为了镇压当地青年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肆意制造谣言，搬弄是非，煽惑当地党政负责人首先将县参议长张光弟扣留起来。随后又要收吴新民他们的枪，这样就把这些抗日救亡青年'逼上梁山'，始兴事件，杨瑜应负主要责任。"

张发奎听了，不置可否，只是说："他们不能把矛头对着我呀。"

上面所述的"始兴事件"，确实在张发奎心口上挖了一刀。

前面说过，遵照张发奎的嘱咐，张光弟回到始兴彩岭村，办起风度学校，先后聘请陈培兴等一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来校任教，将爱国抗日列为学校教育中心内容。张发奎离开韶关到广西赴任时，送了一批足够装备一个营的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给风度学校，用作抗日保乡之用。张光弟等利用这批武器，对高年级学生进行军训，并在周围农村组织起一支民众抗日武装。

张光弟调离后，张发奎任命全赓靖为风度学校校长。全赓靖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进步很快，在校内大搞教育改革和抗日救亡活动，遭到当地顽固势力的诽谤，并向张发奎密告。

在柳州，张发奎经常收到全赓靖的来信，从中了解家乡的情况，他不想让全赓靖与共党搞在一起，便把她调到自己身边，任志锐中学小学部主任。桂柳会战前夕，全赓靖重新取得张发奎的信任，重回风度学校任校长。

1944 年 6 月，中共始兴临时工委经与国民党始兴县政府协商同意，以风度学校学生为骨干，组建始兴县政府抗日自卫队风度学校独立分队（简称风度队）。国民党始兴县长江锦兴想向风度学校"借"枪，被全赓靖以张发奎之名挡了回去。

1945 年 2 月，日寇侵占始兴，国民党正规军望风而逃，躲进赣南的"三南"地区，国民党县政府也随之逃到山高林密的清化桃树坝。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中共始兴县临时工委成立了前线工委，以陈培兴为书记。前线工委率领风度队开赴到八约地区，以外营村为前哨基地，与共产党员郑屏领导的武装力量相配合，联合各地的民众抗日自卫队，在县城东南郊、南韶公路沿线和浈江两岸打击日伪军，屡战告捷。

然而，始兴县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大义，密谋策划反共，妄图消灭抗日武装。他们玩弄阴谋，企图解除郑屏的兵权。面对突变的形势，中共始兴临委果断指示，郑屏率队起义，开赴外营村与风度队汇合。始兴县长江锦兴大怒，调动军警围攻外营村，风度队和外营村民兵奋起抵抗，将前来围攻的国民党顽军打得落荒而逃。

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已公开分裂反共，中共始兴县临委和前线工委于5月13日在北山新屋场召开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始兴人民风度抗日自卫大队(简称风度大队)。风度大队由吴新民任大队长，周耿光为政委，陈培兴为政治处主任，邓文礼为参谋长。下辖两个主力中队，共500多人。风度大队成立后，国民党始兴当局公然拘捕张光弟等抗日进步人士，追逼风度学校校长全赓靖交出吴新民等人，企图以人质迫使风度大队就范。



6月29日，风度大队围攻桃树坝，将驻扎于此的国民党始兴反动县政府和县党部摧毁，解救出张光弟等被捕人士。但这一举动，也暴露了风度学校，刚被批准入党的全赓靖等一批师生随队进入八约游击区，从此经办10年的风度学校停办了。



7月23日，风度大队联合南北山民众抗日武装将始兴县城层层包围，日军提前弃城逃往韶关。风度大队乘势推进，一举解放了始兴县城，并推举吴新民为始兴县县长。



解放始兴县城的第二天，国民党六十三军一七八师张光琼部和一六〇师温淑海部从“三南”地区扑来。当日黄昏，敌军占领了县城外东北山头制高点，欲向县城发动攻击。风度大队面对强敌，于深夜分两路撤出县城，安全转移到八约和北山。

国民党正规军没有善罢甘休，继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驻外营村的风度大队第一主力中队杀出重围向北山撤退。敌占领外营村后，大肆烧杀抢掠，杀死112人，一个四五十户的村庄在熊熊大火中变成了废墟，惨不忍睹……这就是震惊粤北的“外营惨案”。

风度大队在敌军围追堵截中，遭受重创，副大队长郑屏等壮烈牺牲，张光弟、全赓靖等抗日爱国人士相继被捕。

全赓靖是8月1日在始兴县花山村被捕的，她被作为“要犯”押送到到驻南雄的国民党军师部。敌师长抓到全赓靖如获至宝，但因她是张发奎委派的风度小学校长，师部无权处理她，只好把她押解到江西寻乌绥靖公署，交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兼公署主任余汉谋处置。

余汉谋与张发奎素有矛盾，他见全赓靖无论是面对威逼利诱还是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便决定来个“借刀杀人”。他知道全赓靖与张发奎关系密切，心中不由得沾沾自喜，认为这是“将”张发奎一“军”，向蒋介石讨功的好机会。于是一面电告张发奎，征求他如何处理全赓靖的意见，其实是给张发奎施加压力；一面又向蒋介石告发张发奎包庇、支持“共匪”。电文中有一段话：“据查始兴共匪风度大队的武器，是张发奎拨给的，他派去的女校长全赓靖是异党分子。”这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匕首，令张发奎脚下出现十级地震。

张发奎自从获悉风度学校起义后异常愤怒，又极度惶恐，因为起义队伍不仅拿走了他的枪，还把他珍藏在“贵庐”的3000瓶白兰地一扫而光，这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所以为了摆脱“通共”之嫌，他不承认起义队伍是中共游击队，而称他们是“土匪”，而今，他最信任和欣赏的全赓靖又落入余汉谋手中，不禁心神不安，思前想后，他最担心蒋介石老账新账一齐算，但要他亲自签发“就地处决”的复电，又实在下不了手。

当时，左洪涛通过在司令部最机要的部门——译电室工作的郑黎亚、方兮、吕璧如得到全赓靖被捕的消息后，曾通过张发奎的高参，去向张发奎说



张光弟



全赓靖

情。张发奎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风度大队造反，全赓靖落在余汉谋手上，把柄被人拿着，我也无可奈何啊!"

余汉谋迟迟得不到张发奎的复电，便亲自签发了枪决令。

刽子手杀气腾腾地将年仅36岁的全赓靖押赴刑场……

不久，张光弟也在始兴英勇就义。





第二十二章　阻拦北撤，一波三又折

一、杨郑新婚，欣喜来贺

1945年9月，张发奎到广州受降，就任广州行营主任，特支成员左洪涛等仍留在行营工作。中共广东区委派到广州做统战工作的李嘉人与左洪涛取得了联系。

特支一直关注着重庆国共谈判的情况，并为第八小组的到来做着积极准备。左洪涛提醒杨应彬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在这国共谈判重要时刻，我们要坚守岗位，不能让行营内一小撮坏家伙'挤走'我们。应彬，现在抗日胜利了，你和黎亚的婚礼也该办了。我建议，你们正式举行一个讲点排场的结婚仪式，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茶话会，请行营一些高、中级官员参加，并请大王做证婚人，请吴仲禧、李汉冲、高若愚等做介绍人、主婚人，让周围气氛缓和一下。"

杨应彬拍手叫好，他与未婚妻郑黎亚筹备好后，便手牵着手去请张发奎做证婚人。

张发奎自然很高兴，但看着他俩，忽然想起一个问题，问："你们两人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如果两个都不是，可以结婚，两个都是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杨应彬沉着地回答："我们从小出来跟你打日本仔，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还不相信我们呢？我们俩都不是。"

郑黎亚笑着说："大王，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我们真心地请您出来做证婚人。"

张发奎当时已答应，但被行营参谋长甘丽初捣鬼，改叫甘丽初做证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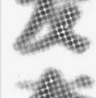
人，他本人则答应到场并讲话。

杨应彬、郑黎亚的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的，这是抗战胜利后行营内的一件喜事，大大小小的官员到了200多人。

张发奎也偕夫人到场祝贺："……应彬、黎亚从小从东战场跟随我抗战8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有作为，有成绩，我与夫人祝愿你们白头偕老。"

二、反对"调处"，平惹众怒

第八小组到广州后，由广州行营副官处负责后勤接待，他们被安排在沙面原苏联领事馆一座红砖砌成的别墅里。可参谋处长李汉冲别有用心，他把副官处的人员遣回，而从参谋处情报科和情报队抽调大批特务另行组成一个接待班子，里里外外、大大小小都是特务，严密监视和封锁中共代表人员。



左洪涛得知这一切情况后，心急如焚，他必须寻求对策，与方方取得联系。

恰好这时，张发奎要左洪涛陪同他乘车到西关去看望廖夫人何香凝，左洪涛乘此时机，问张发奎："对三人小组的饮食、招待、清洁卫生、警卫、交通以及经费开支审核等等，副官处究竟还要不要管？"张发奎不在意地说："当然要管啊。"左洪涛说："如果要管，我要不要去检查一下那边的接待工作情况和看望三人小组成员呢？"张发奎说："当然要去。"

这样，左洪涛就把"尚方宝剑"拿到手里，可以理直气壮地进出三人小组招待所。

这天上午，左洪涛叫一个姓廖的上尉副官随他乘车到沙面。他一踏进那座别墅，就对廖副官说："今天中午我要陪同三人小组的人吃饭，你去吩咐厨房弄几个好菜招待他们。"

把廖副官支开后，左洪涛赶紧跑到楼上方方的住所，一面同方方握手并自我介绍，一面将一张纸条递给他，告知他招待所所有大小人等都是特务化装的，要注意防范。方方早从周恩来那里知道左洪涛的身份，紧紧回握着他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方方低声说："……张发奎奉蒋介石之命公开发表谈话，说广东没有中共部队，拒绝谈判，并以'安全'为由，断绝了我与外面接触。你要想办法让我与东纵的曾生、林平取得联系。"左洪涛说："曾生、林平已派何鼎华

来广州，并住李章达家，你设法与何鼎华会见。”方方点点头。

左洪涛走后，方方借口外出，机智甩掉跟踪的特务，来到李章达家，与何鼎华会见。方方要何鼎华转告曾生、林平不要依赖谈判，主要应立足于打，打赢了就好谈判。

当天晚上，杨应彬来见左洪涛：“有个重要情况。我在参谋处作战科，分管兵力驻地，我得以见到蒋介石关于打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的命令和广州行营的部署。蒋介石想在北撤之前，把东江纵队等主力全部消灭在广东。”

左洪涛说：“你这个情报十分重要，必须马上送出去。现在张发奎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一个劲儿地不承认广东有共军，其实质就是想把我们的人就地消灭，不让北撤。”

杨应彬恨恨地说：“这个大王，怎么这样蛮不讲理?!”

第八小组的谈判也是异常激烈。

刚开始谈判时，一方说“有”（指部队），一方说“无”，态度比较文雅，常常是不了了之。以后是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最后发展到拍桌子打板凳，剑拔弩张，大有“鸿门宴”的气味。有一次，方方一把火上来，拍桌子与国民党代表黄伟勤、王衡吵得厉害，几乎要打了起来。

国民党自恃在华南的兵力要大于东江纵队的10倍，要吃掉东江纵队易如反掌。因此，谈判、停止双方的敌对行动，就对共产党有利；国民党一口咬定在国共合作时没有这支部队，也常常将共产党代表弄得有理无处说。但有部队毕竟是客观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为此中共方面一面叫曾生带领东江纵队高级将领10余人驻进第八小组，以证明有这支部队；一面又呼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起来作证。

于是，港澳同胞，国外华侨，国内各民主党派纷纷写信打电报发表评论，以声援共产党。不仅证明有东江纵队，而且还歌颂东江纵队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国民党元老何香凝，民主人士蔡廷锴，民盟南方总部负责人李章达，香港会督何明华等知名人士也先后发表声明，呼吁停止内战，停止对东江纵队的军事进攻。何香凝老人还带来不少电报和信件到第八小组，亲自证明有东江纵队。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共武装部队给予坚决还击；对张发奎破坏谈判的反共言行，给予坚决的揭露和驳斥。周恩来在重庆向国民党军事最高当局提出了强烈抗议。方方致电“军调部”指出，广东国民党当局，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连续两次向我大鹏岛解放区作大规模进攻，阴谋迅速占领该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张发奎将军

区，将我军一举歼灭，然后让执行部广州小组前往观察，以证明其“在东江无中共军”的谎言。

延安《解放日报》和重庆《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华南抗日游击队的功绩》一文，用铁的事实驳斥国民党反动派的谎言。中共中央发言人也针对张发奎不承认广东有中共武装的阴谋，公开发表谈话予以揭露和驳斥。3 月 11 日，中共广东区党委书记兼东江纵队政委林平，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详细介绍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当局在广东发动内战，否认广东中共武装部队的存在，使军事调处执行小组无法开展工作的罪行。3 月 18 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破坏停战协定的罪行。

就在林平飞抵重庆时，张发奎也奉蒋介石电召来到重庆。

蒋介石面见张发奎时，说：“向华，中共方面已告到马歇尔那里，马歇尔又告到我这里，说你破坏调处。我考虑再三，把你请到重庆来，希望你遵守调处，别把矛盾激化了。”

张发奎问：“总裁，我想不明白，为什么本党要与共产党妥协，举行政

治协商会议？”

蒋介石来回踱了几步：“跟你说实话吧，政协会议集会的3个星期以来，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但为什么还要开政协呢？我们有四条理由：一是军队疲劳与空虚：二是官兵精神松懈，士气消沉，纪纲废弛，漠视命令；三是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动荡；四是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基上原因，不能不举行政治协商会议啊。”

他顿了一下，指示张发奎说：“这个会议可说是一种政策，吾人应当遵守。至于今后怎么办，我自会有考虑的。”

张治中也在一旁规劝说：“向华，鉴于目前和平形势，你还是承认广东共军，遵守调处吧。美国特使马歇尔要我转告你，准备约你晤谈。”

张发奎断然拒绝：“我对马歇尔的‘调处’计划不感兴趣，还是不见为好。”

回到住所，张发奎便接到一个电话，是他的老朋友叶挺打来的。叶挺在电话中热情地说；“向华，我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听说你到了重庆，准备前来拜访，咱俩叙叙旧。”

张发奎在广州时就知道叶挺要被释放，3月上旬，叶挺夫人李秀文从广州飞赴重庆前夕，张发奎夫妇还特设家宴祝贺叶挺夫妇团圆，并给了她一张广州行营特别专用机票，用自己的专车送她上飞机。如今叶挺说来拜访，理应接见。但他认为，叶挺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所谓前来拜访，不过是来谈广东方面调处问题的借口。

他婉拒道：“希夷，祝贺你出狱，只是我刚到重庆，军务缠身，没有空，真是对不起。下次，你有机会到广州，我一定当面赔罪，自罚三大杯如何？”

当晚，被国民党作为政治犯释放的廖承志也打来电话，要求来看他。因廖仲恺生前与张发奎关系一向很好，廖承志一贯称他为“张伯伯”。张发奎猜测廖承志是为广东中共军队曾生、冯白驹两个纵队的调处而求见，便当即在电话中拒绝会面。

第二天，张发奎被安排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见面，双方没谈几句，便吵了起来。

王若飞是个急性子，指着他说：“曾生率领的东江纵队、冯白驹率领的琼崖纵队，明明是中共军队，为何说是土匪？”






其实，张发奎早就知道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存在，1939年东纵成立不久，作为四战区司令长官，他曾派由秘书何家槐等12人组成一个长官司令部战时工作队，开赴惠州、东莞工作。当时，叶挺跑到韶关来找张发奎、余汉谋，要求到东江去组织抗日队伍，张发奎还打算送几百支枪表示支持。只是后来蒋介石知道后，强烈反对，此事方作罢。但此时，张发奎猴脾气上来，拒不承认错误，反而拍桌和王若飞大吵大闹起来。

周恩来英眉一扬，严正地说："张向华！你不要以为蒋家天下是铁打江山，老实告诉你，这个天下究竟是蒋家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尚未定局。你也不要以为蒋先生就是你的终身靠山，你这个行营主任是铁饭碗，须知蒋一张条子可以给你当行营主任，也可以随时写个条子把你从行营撵出去。你应当有自知之明。"

张发奎早在东征时就认识周恩来，一向对周恩来非常敬佩和信服，听了这番忠告后，顿时默然无语。

张发奎从重庆回到广州后，心中郁闷不快，他这次重庆之行，不仅被迫承认广东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存在，并签订了北撤协定，而且得罪了一批老朋友，在社会上得了个反对"调处"的恶名。他在广州行营举行的全体官员参加的一次纪念周大会上，坦率地承认了在重庆谈判时出现的不愉快的情况。他叹口气说："在争论广东究竟有没有共军时，蒋委员长早就定了调子，硬要我说没有，而张文白（张治中的别名）则妄做好人，要我承认客观事实。我有什么办法呢？是听蒋委员长的还是听你张文白的？当然，我只能听蒋委员长的。"

言下之意，他否认广东有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非出自愿，其所以说出这种违心之言，实有不得已之苦衷。

三、闪击东纵，计划流产

3月30日，中共代表廖承志、国民党代表皮宗阚、美方代表何夷组成"重庆三人小组军事代表团"来到广州，会同第八小组与广东军事当局谈判北撤的具体问题和措施。

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经过约50天的谈判，5月21日，"三人小组"终于签订了北撤协定；承认华南有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解放区，北撤人员名额为2400名，部队集中时间从开始调查起，

以一个月为限；北撤路线是由广东宝安县的沙鱼涌出发，由中共方租用美国3艘登陆舰做运送工具，从海道北上山东烟台登陆。

5月23日，军事调处执行部第八小组在广州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北撤协议公报。

国民党虽然被迫达成东江纵队北撤的协议，但蓄意消灭人民武装的野心不死。何应钦下达命令，限令广东国民党当局乘东纵北撤之际消灭之。6月2日，江北部队一部集中行至增江河畔沙塘墟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第一五三师1个营的袭击，东纵江北部队8人牺牲，7人被捕。东纵北撤部队为顾全大局，忍痛继续执行南下集中的协定。

集中北撤最困难的是粤北部队。当时，粤北部队分散在始兴、南雄、仁化、和平、连平、英德、翁源、佛冈、新丰等县和湖南、赣南广大地区。当粤北部队刚开始集结时，国民党就指使南雄县大队在界址袭击东纵粤北部队的短枪队，队长刘锦进（刘黑仔）、指导员苏光等英勇牺牲。

当北撤部队登船日期快到时，美国方面突然来电说：因飓风袭击，3艘登陆舰迟到。与此同时，广州行营密令其参谋处绘制国民党驻扎淡水、龙岗、宝安的军队进攻王母墟、葵涌中共部队的路线示意图。广州行营参谋长得意忘形地说："中国有两句成语，一句是'瓮中捉鳖'，一句是'一网打尽'。东江纵队虽然冲破了这次南下的几个关口，现在他们集中到了这里，就等于鳖入了瓮。"

国民党这个阴险毒辣的计划，被杨应彬、左洪涛、郑黎亚等及时掌握，左洪涛急忙找到正在广州办事的香港《华商报》总经理萨空了，要萨空了于当天下午赶回香港，把这个特急情报交给中共驻港办事处连贯，转交方方。方方闻讯后非常气愤，马上和曾生、林平商定：立即报告周恩来、叶剑英，向三人小组和军调部揭露国民党的阴谋；由方方向第八执行小组提出抗议；动员香港大小进步报刊，揭露和谴责广州行营的阴谋罪行。各民主党派和进步人士得知这一阴谋，当即动员起来，纷纷斥责广州行营的卑鄙行径。

6月15日，军调部第八小组三方代表及工作人员离开广州，经香港抵达沙鱼涌，执行监督北撤工作。方方一到沙鱼涌，即去看望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各路将士，并与指挥员们迅速制订对付张发奎的破"网"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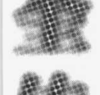
美方代表米勒对广州行营出尔反尔的行为极为反感，这位"和平使者"发急电致北平军调部主任并南京马歇尔将军，转述方方的呈文，内容是：谴

责国民党军队违反协议进入中共集结地，声明由此而产生的所有恶果均由政府方面负责。

此时，适逢香港新闻记者团来到大鹏半岛采访东纵北撤新闻。方方和曾生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张发奎的“打尽”伎俩。方方郑重指出：“广东中共部队为了全国的和平忍痛北撤山东，如果有人认为我们这次的忍让是怯懦，企图破坏协定，闪击我军，捞一把油水，那是办不到的。记者先生们可以告诉国民党当局，共产党人一定奉陪到底！”

在军调部中共代表严正抗议和社会舆论压力下，张发奎这位“撒网人”无可奈何地中止了他的阴谋。至此，由蒋介石策划、张发奎导演的最后一幕闹剧匆匆收场了！





6月29日下午，蛋黄似的夕阳刚被海洋吞没，西方映照着一片红光，从遥远的海边忽然隆隆地驶来了4艘军舰。由一艘驱逐舰导航，585号、1026号、589号登陆舰逶迤而来，泊在沙鱼涌的浅滩上。

国民党军队代表照着北撤人员花名册逐个点名。由于水深及腰，队形逐渐变乱，国民党无法逐个复查。此时，有100多名不愿复员、又没有北撤名额（国民党限北撤名额2400人）的小鬼、战士和运输员等，便在各船战友的引导下，“混”上了船。这样，北撤的实际人数为2583人。

30日清晨，船艇慢慢驶离沙鱼涌，船上，传来了战士们高亢的《北撤之歌》。海滩上，方方与米勒热烈握手，互相庆贺第八小组胜利完成东江纵队北撤的任务。



而琼崖纵队，根据重庆三人小组谈判协定，原计划1900人北撤。后来，由于国民党广东当局拒不承认琼崖纵队，妄图把琼崖纵队留在孤岛待机消灭，结果琼崖纵队北撤山东烟台未能实现，但这却为3年后解放海南岛留下了一支队伍。

四、国共决裂，“礼送出境”

1946年夏，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张发奎眼看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全面内战即将爆发，在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较量、大拼搏中，他过高地估计美蒋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有美援，共产党就一定打不赢美蒋。于是，他已开始有意识地回避左洪涛他们，不听他们的善意规劝和忠告了。

广州的形势也日益紧张。5月4日，以“三青团”为骨干的少数反动学生组织反苏游行。一小撮乔装学生的特务捣毁《华商报》、《正报》之广州分社及兄弟图书公司。5月10日，蔡廷锴、民盟南方总支部主席李章达、张文为广州特务捣毁《华商报》、《正报》之广州分社及兄弟图书公司事件，联名致函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广州市长陈策，要求追查凶手并赔偿受害者所受损失。

周恩来鉴于内战即将爆发，特支的处境愈益艰险，为了保存力量，指示特支成员“相机撤退”。

在此危急之际，张发奎仍然算是理智、重感情的，对于云集在广州一大批从事和平民主运动和文化工作的党内外知名人士，采取“礼送出境”的方式。

当时在云南昆明的演剧五队和在广东韶关的演剧七队，遵循周恩来的指示，拒绝到反共前线，张发奎没有追究，把五、七两队调来广州。两队在广州市教育路南方戏院连续两个月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演出，轰动了全市，效果很好。

由于军统特务对他们进行疯狂压制和迫害，不能继续坚持在这里工作，左洪涛和两队负责人经过仔细研究，决定采取合法方式，要求集体复员回家探亲、结婚、升学或另谋职业等等。特务们从中阻挠，阴谋陷害。于是，左洪涛同广州行营中将高参、办公厅主任高若愚商量，请他先将两队的要求提出来同张发奎谈谈。高若愚欣然应允，并向张发奎阐明；“这些男女青年从小出来跟随你团结抗战，现在日本已经投降，应让他们复员回家，好来好去，各奔前程，务安生计。”张发奎表示：“完全赞成他们集体复员，好来好去，并保证不伤害在广州的文化界人士任何一个人。”

左洪涛拿着两队要求复员的报告陪同两队负责人去见张发奎，向他反映军统特务不让两队复员的情况。张发奎当即表示：“我批准两队复员，我发给两队复员费。”同时，同意左洪涛的建议请两队聚一次餐，开个告别晚会。

聚餐和告别晚会如期进行，张发奎偕夫人刘景容和行营一大批高、中级官员欣然参加。在晚会中，当两队代表朗诵一首告别诗时，张发奎及其夫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坐在张发奎旁边的军统特务黄珍吾气急败坏，喃喃自语：“不能放虎归山呀！”

张发奎横眉怒对，严加训斥：“你胡说八道，你想干什么？”

6月下旬的一个早晨，演剧五、七两队辞别五羊城。

中共特支同志也分别打报告请长假，相继安全撤离广州行营。左洪涛于9月撤到香港。

杨应彬、郑黎亚是最后走的，坚持到1947年8月。他俩接到组织上的撤退命令后，向张发奎请假，其理由是：在广州生活费用高，一家老少难以维持生活。杨应彬打算到南洋投靠亲戚做生意。张发奎信以为真，不同意杨应彬到南洋去做生意，但准了他们一个短假。后来，张发奎因杨应彬借假不归，非常失望，下了个通缉令，要通缉杨应彬。但通缉已经晚了，杨应彬早已回到组织怀抱，上山打游击了。

应该说，特支成员和党内外知名人士能成功撤出，也得益于张发奎“好来好去”的“礼送”政策。张发奎后来在其回忆中说：“我一直钦敬中共党员的学识与艰苦奋斗精神，譬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基于这一理念，从北伐至今，张发奎一直对中共保持友善的态度。1948年冬，毛泽东圈定第一批43名“战犯”时，张发奎就榜上无名。翌年2月，他讲义气为李宗仁扛下陆军总司令重任，中共才把他列入第二批“战犯”名单，但他只做了几个月就辞职赴港定居。这是后话。



第二十三章　大势已去，黯然离大陆

一、深夜长谈，直抒心怀

为了打一场现代化的全面内战，蒋介石搞了一个土洋结合的战时内阁。1946 年 5 月 30 日，他主持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撤销已经设置了多年的“军事委员会”，仿美国的体制，在行政院下设立国防部，掌管军政、军令事项，并委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任命陈诚为参谋总长，蒋介石没有忘了给自己弄一个三军总司令的头衔。

蒋介石可能出于偏爱，对各战略区的招牌，却不愿意改，但又不能不听美军顾问的建议，于是，就出现了一面沿用 30 年代就已经启用的什么“行营”、“行辕”、“绥署”和“绥区”等体制，同时还用了带有现代战争味道的“战区”字眼。具体情况主要是把 12 大战略区划分为行辕、绥靖公署两种。其中广州行辕，由张发奎任主任，共有 3 个军、9 个师。内战打响后，蒋介石给张发奎的任务，就是迅速剿灭广东游击区和海南岛的中共部队。

张发奎得令后，趁中共东纵部队北撤，立即布置“清乡”。粤北、赣南率先成立了“清剿工作团”。张发奎还跑到江西省大庾县主持成立“湘粤赣边区绥靖公署”，由六十三军军长欧震负责指挥“清剿”。但北撤后留在地方的中共游击队的骨干们，依靠人民群众，与之展开殊死斗争，他们不仅没有被清剿完，反而越剿越多，到 1947 年 9 月，全省人民武装由北撤后不到 2000 人，发展到 1 万多人，粉碎了张发奎、罗卓英的“拔钉”计划，这令张发奎甚是头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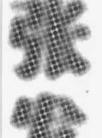
张发奎虽然在广东反共颇为积极，但蒋介石并不器重他，尤其是怕他在广东拥兵自重，建立独立王国。1947 年 11 月内战正打得热闹时，一纸命令

下来，免去了他的广州行辕主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只给了他一个闲职——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又把他挂了起来。接替他的是“国舅”宋子文。

原来，宋子文因遏制通货膨胀、物价暴涨不力，造成经济危机和腐败成风，在全国一片谴责声中，被迫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蒋介石兼任。但宋子文并不在乎，行政院长不做，他可以去做地方官，他看中了广东省主席这个肥差。蒋介石为把华南经营成支持全国内战的基地，支持宋子文出任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广东省保安司令，替代了他并不信任的张发奎。张发奎气得没话，只能在喝闷酒时骂几句“光头佬”。

这天夜晚，月近中天，米兰飘香。广东省保安司令部保安第十团团长陈一林来到张发奎沙面的寓所，拜访老长官。

陈一林在抗战时曾任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参谋处上校情报课长，深受张发奎的重视和信任。张发奎被免职后，门前冷落鞍马稀。欣闻老部下来访，张发奎自然喜欢。他拿出一瓶珍藏多年的白兰地相待。两人把酒长谈，由晚上 9 点聊到深夜 3 点，几乎无话不谈。





陈一林深信张发奎的为人及过去彼此的亲密关系，便大胆向张发奎提了 3 个问题：

“张长官，你会不会通电起义，拥护共产党?”

“我不会通电，我仍然是过去那种‘不事二主’的态度，我是孙中山的信徒，对孙中山不能变节。”张发奎品了一口酒，回答说。

“那么，长官，你会不会再次出国，到美国去？在美国的华侨都很崇敬您这位爱国将军。”



张发奎摇摇头，自斟了一杯酒：“我是中国人，不会到别国去了。”

“蒋介石独裁、排除异已，腐败无能，我们不能跟他走了，共产党对国民党起义将领高树勋、吴化文等非常宽待，信任，我们要抓紧时机，弃暗投明。”陈一林深信张发奎对他的言行不会举报，所以直言不讳。

张发奎看了陈一林一眼，明朗地说：“你还年轻，有你自己的事业和前途，我理解。”

这 3 个问题，后来果然成为张发奎最后选择香港定居的重要理由。

1948 年，陈一林在湛江地区毅然率领广东省保安第十团全团官兵起义，得到了共产党和人民的谅解、信任和欢迎。

二、选举拉票，大闹报社

内战越打越激烈，国民党的部队却越打越糟。

这时，在华东战场打了败仗不仅没撤职反而升职的薛岳被调到中央，出任国民政府参军长。薛岳对这个职位高而无实权的参军长并无多大兴趣，他心里想的是回广东，当广东省政府主席，但他又如何争得过"国舅"宋子文，只好暂且从命。或许是同病相怜的缘故，张发奎离开广东后，闲居在上海，他的主要政治活动之一，就是经常与参军长薛岳、陆军总司令余汉谋等粤籍要人面晤，研究"粤人治粤"的方案。

转眼到了 1948 年 4 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

不甘寂寞的张发奎与余汉谋、薛岳、香翰屏、李扬敬等粤籍将领成立竞选小组，为同是广东人的孙科竞选副总统统筹经费，拉选票。经非正式协商，他们还内定了一个孙科的影子内阁：张发奎为国防部长，薛岳为参谋总长，余汉谋为军政部长，陈策为海军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钟天心为教育部长等。想得还是真美。

有意思的是，桂系的人也来找张发奎，希望他支持李宗仁，张发奎开门见山地说："请你原谅，并请报告德公，论关系我应该帮德公的忙，但我有一个地方的责任，即我是广东人，要投广东人的票。其他如薛岳、黄镇球都是一样，你不要同他们说了。"来客见他说话痛快直爽，没有半句敷衍的话，只好说我体谅你，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

4 月 19 日，蒋介石被选举为"行宪"后第一任总统。

4 月 23 日，选副总统。各代表入场时，奇怪地发现每个座位摆着一份《救国日报》，代表们细看报纸，第一版头栏赫然刊着孙科与蓝妮的丑闻，不禁窃笑不已。

蓝妮原是孙科的如夫人，抗战初期，与孙科住在重庆"国庐"。后来，她潜往上海、南京敌后城市，同陈公博、周佛海等大汉奸往来密切。抗战胜利后，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没收了一批德国进口的染料，作为敌伪财产处理。可是孙科却致函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说这批染料为"敝眷"蓝妮所有，要求发还。洪兰友又写信给中央信托局局长，说蓝妮是孙院长（立法院）的如夫人，要他看在孙院长的面上将染料发还她。不知怎样，这些材料落到素有"龚大炮"之称的《救国日报》社长兼主笔龚德柏手中，龚德柏把它当做

炮弹发表出来。

张发奎等广东代表看着这张报纸，当时就变了颜色。两小时后，选举结果出来了，得票前三名是李宗仁、孙科和于右任，但三人均不足法定当选票数。依选举法规定，将得票较多的前三名进行第二次投票。主席团在散会时宣布，次日举行第二轮选举。

大会一散会，薛岳最先跳起来，大声说："走，我们找《救国日报》'龚大炮'算账去，谁不去谁是衰仔！"张发奎自然怒发冲冠，也应和着："走，别以为我们广东人好欺负！"

说罢，张发奎、薛岳便率广东国大代表，气匆匆直奔《救国日报》社，乒乒乓乓乱砸了一通，把该报一楼的排字房和门面砸得稀巴烂。紧接着，他们又要冲上二楼编辑部。龚德柏也不是吃素的，拔出手枪，把守在楼梯口，说谁敢上来，我就和他拼命。张发奎等人见他手中有枪，不敢上楼，便和龚德柏隔梯对骂一阵，愤愤而去。

这是竞选中一幕滑稽剧。但是不管怎样，孙科的助选团终究挽回不了孙科在竞选中的颓势，最后还是李宗仁当了副总统。

三、粤人治粤，爱将投共

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权夺利，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大规模反攻，特别是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国民党主要军事力量被消灭。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当代总统。

为了保住大西南，蒋介石不得不倚重胡宗南、白崇禧和粤籍将领，他下野前，不仅任命薛岳为广东省主席，还任余汉谋为广州绥署主任，并同意张发奎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职务，基本满足了张发奎等"粤人治粤"的要求。

其实，蒋介石本是希望张发奎主政海南岛的。1948年8月，立法院通过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海南人士也恳切希望张发奎能到海南来。因而在下野前，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特别行政区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委会主任委员，张发奎因他提出的"有兵"、"有粮"、"有权"等先决条件不能解决，未肯就任，而改任为陆军总司令。然而，张发奎、余汉谋、薛岳也深知经营海南的重要性，极力推荐已被蒋介石冷落近13年的陈济棠，陈济棠欣然应允，

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孙科都表示支持，于是行政院先后任命陈济棠为特别行政区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委会主任委员、海南特别区警备总司令。

张发奎对薛岳出任广东省主席寄予很大期望，因为薛岳不仅是个军事奇才，在抗日战争中屡立战功，特别是“长沙三捷”威震天下，而且他也是个行政高手，在出任贵州省主席、湖南省主席时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他主持湘政6年期间（1939~1945），取得了良好的政绩。如今薛岳入粤主政，必能大显身手，因为广东是个富庶之地，发展起来大有可为。

与张发奎相比，薛岳在政治上似乎更老道些，他早在1948年12月初就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但他迟迟未去广州赴任，而是不动声色地住在他的老家乐昌，原因何在呢？薛岳来广东接任，虽雄心勃勃，但困难重重，因为他来广东是赤手空拳的，一来无人，二来无粮，三来无钱。因此，薛岳决定上任前，首先要前任宋子文吐出一大笔钱来。宋子文正陷入困境中，因此也就顾不得薛岳狮子张大口，薛岳要1300万，他就答应了1300万。一直等这笔钱到手，薛岳才于1949年初赴穗上任。

紧接着，薛岳找钱的第二个手段是将广州市政府转制，掌握广州市的财政支配权。

广东省本来经济比较发达，但经过8年抗战和3年内战，造成经济萧条，全省的财政收入，地方微乎其微，主要依靠广州市的工商税、关税和其他税收。然而，广州市为国民党直辖市，财政收入悉归中央支配。薛岳上任后，便联合余汉谋、张发奎、李汉魂等力争将广州市改制为省辖市，任命李扬敬为市长。但此举并未成功，反而遭到蒋介石的训斥。

有了钱，还得有人。在人事方面，薛岳主动征求张发奎、余汉谋、黄镇球的意见，考虑和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在张发奎等的支持下，薛岳上任之初，就把一批粤军老部下任职于广东省各个要职。如李扬敬、欧震都在省政府任要职，吴奇伟任广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洁之任梅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龚楚担任韶关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

这天，薛、张、余三人又坐在一起商议。

薛岳说：“……要保卫广东，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宋子文在任时，在广东武装了15个保安团，这远远不够，我想再编练5个师，每师辖4个团，配以必要的重型武器，以便参加大兵团作战。”

张发奎说：“伯陵这个主意好，我支持。我还有个想法，我们不妨向国防部长何应钦、参谋总长顾祝同申请，将在前方的粤军第六十五军全部调

回广东，并将已被打垮的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四军重新组建，把这3个军调回来后，分别布防湛江、韶关和海南岛。”

“还是向华有谋。”余汉谋一拍桌子，高兴地说，“这样的话，广东的正规军和保安部队共有10多万人，再加上驻广东、赣南的李弥、胡键、刘安祺等3个兵团，我们广东的军事力量还是相当雄厚的。只要广东人内部团结一致，精诚无间，手中又有了实力，进而和广西方面紧密合作，我相信事情还是有可为的。”

薛岳乐观地估计道：“我看共军占领东北、华北、中原等广大地区后，必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现在，李代总统正与中共和平谈判，希望能实现‘划江而治’。这样，广东至少有二三年好搞，那么将广东建成一个牢固的反共基地也就不是空话。”

张发奎说：“到那时，我们‘粤人治粤’的计划也就快实现了。”

1949年1月27日，代总统李宗仁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意以毛泽东1月14日所提“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李宗仁事先未经提请国民党中央常会讨论，也未交号称“责任内阁”的行政院长连署。这一来，行政院长孙科发火了，不同李宗仁商量，悍然把行政院搬到广州去。于是李宗仁在南京，蒋介石在溪口，孙科在广州，各自为政。国民党内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

白崇禧看到这样一个局面，认为国民党内分崩离析，不利于李宗仁的领导地位，主张李宗仁向溪口、广州妥协，以谋内部团结一致，共赴艰险。李宗仁纳其议，自乘“中美”号专机飞广州移樽就教，敦促孙科返京。李宗仁此举得到张发奎、薛岳、陈济棠这些广东实力派的支持，孙科就范了，答应行政院迁回南京。

3月7日，孙科回到南京，适值立法院在南京复会。孙科擅自离开南京的行动，不为立法院所谅解，准备向孙提出严厉“质询”。孙科看到前景不妙，当晚向李宗仁提出辞职，继任人选，由白崇禧提出由何应钦继任。何应钦经商请溪口蒋介石的同意，勉强应命，组成新的内阁。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往北平，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进行和谈。4月20日，李宗仁拒绝在和平谈判条约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便于次日突破长江防线，迅速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

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到6月1日止，先后攻占了上海、杭州、武昌、汉

口、南昌等大城市，解放了江南大片地区，前锋部队已到达闽北和赣中，直接威胁广东。国民党部队如此不堪一击，连张发奎也始料不及。更让张发奎感到意外而伤心的是，5月14日，他的旧部和亲信吴奇伟、肖文、曾天节、魏鉴贤、李洁之等率保安第十二团和第十三团在粤东起义，这给张发奎精神上予以沉重的打击，使他真的感到大势已去。

四、固守华南，要扣老蒋

一场夏雨过后，田里的禾苗开始抽穗。

何应钦带着行政院撤到了广州，可是李宗仁却心怀对蒋介石的不满，独自跑到桂林。张发奎、白崇禧等以为如李宗仁赴粤主持，蒋介石则势难立即复职，便主动到桂林劝李宗仁到广州。结果李宗仁在陈济棠、白崇禧和张发奎等的积极敦促之下，于5月8日从桂林飞粤。

李宗仁到广州不到半个月，何应钦就鉴于财政问题没法解决，坚辞行政院长职务。李宗仁只好同意。6月2日，李宗仁屈服于CC立法委员的压力，改提阎锡山为行政院院长。最后，立法院以200票赞成、50票反对而通过。

李宗仁在与阎锡山商量组阁名单时，提出以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李汉魂为内政部长、张发奎为侨务委员。第二天，阎锡山赴台北请蒋介石批准，蒋介石否决了白崇禧、张发奎两人入阁，而以徐堪出任财政部长。这意味着蒋介石以钱袋为后盾，支持阎锡山；阎锡山则以蒋介石为后台，自兼国防部长。这是蒋介石破坏两广团结、破坏白崇禧与张发奎等粤将合作、共同保卫广州的第一着。

6月18日，一场暴雨过后，天气清凉了许多。李宗仁在绥署楼主持国民党中常委会讨论军事问题。

粤籍中常委吴铁城听完报告后第一个发言；“国防部没有保卫广东的决心和计划，汤恩伯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为什么调去福建而不调来广东？从青岛撤出来的刘安琪兵团3个军为什么调去海南岛而不调到粤北？国防部只准备防守沿海一些岛屿，而对如何保卫广东则根本不在它的设想之中。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一个根本问题。”

吴铁城明知国防部的兵力部署，都是出自蒋介石的决定，所以进攻矛头，实是针对蒋介石。吴铁城的讲话，正道出了张发奎等粤籍要人的看法。

肖毅肃起立答复；“将来保卫广东，只能倚靠白崇禧长官所属的广西部

队3个军。”

顾祝同补充说：“所有兵力部署和调拨均出自总裁的决定。”

人们因而看到，还是蒋介石在幕后调度一切，那有什么好说呢？尽管如此，张发奎、白崇禧、薛岳和余汉谋等仍然想坚守华南，保卫广州，以待时变。他们幻想只要能坚持半年，美苏大战就会爆发，美国就会出兵中国，中国的局势就会逆转。他们的计划是以粤北为中心，南自江西三南至广东翁源，北自湘西辰沅衡宝之间，建立了一条弧形防线。在这条线上共布置了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的8个兵团28个军，加上广东的保安部队，共约40余万兵力。粤北战场，以韶关为中心，正面以南雄、大庾边境之小梅岭地区为第一线，以曲江之周田地区为第二线，布置了刘安祺兵团的第三十九军，和广东部队的六十三军。各县市的地方部队都归正规部队统一指挥。

蒋介石已无意守广州。他注意到白崇禧想率部入粤，便于7月14日亲率蒋经国、谷正纲等访粤，在广州举行一系列的重要会议。



下午4时，蒋介石在东山梅花村32号召开中央非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西南、东南两个分会，以张群为西南分会主席，以陈诚为东南分会主席。同时，蒋介石又在会上提出以陈诚为东南军政长官，直辖闽、浙、台、粤、海南岛等地区。蒋介石把广东、海南岛划归陈诚管辖，意味着白崇禧不能染指岭南。





9月22日，蒋介石从重庆绕道昆明飞抵广州，他稍事休息，便邀白崇禧到黄埔闭室密谈。蒋介石对白崇禧提出了他的防守西南计划：“……我打算以从陕西后撤的胡宗南部保卫川东，以宋希濂部屏障川东；华中所属黄杰兵团增援贵州，使川黔能与两广联系起来；华中张徐兵团、徐启明兵团和鲁道源兵团则兼顾湘南粤北；驻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可调两个军到广州驻防。”

白崇禧心想，依照你蒋介石这样的部署，实际上不以保粤为重点，即以守川为重点，并且兵力分散，弱点毕呈。但是，白崇禧此时所掌握的部队，有战斗力的仅为广西的3个军，而且还要兼顾湘粤，力量有限。他只好开诚布公地对蒋介石说：“委座，我最初打算以主力先击退进犯粤北之敌，然后回师衡阳。但李代总统认为，现在是强弱悬殊，此举过于冒险。我最后决定置2个军在衡阳做机动使用，以1个军置乐昌、仁化间以助粤。”

蒋介石道：“广州能守则守，守不住就把国民政府西迁到重庆，再作长远打算。”

后来，因刘安禧兵团仅有一个军从雷州半岛北上，这无异使广州成为一

个不设防的城市，蒋介石蓄意放弃广东，明若观火。即使这样，蒋介石仍不满足，他知道要逼李宗仁就范，还须从根本上拆散粤桂联盟。他令毛人风派人监视张发奎的行踪，并分别召见粤系将领薛岳、余汉谋、李汉魂等，声色俱厉地警告他们："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吗？反对我就是背叛党国！谁敢与我作对，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

蒋介石破坏保卫广东的毒计，勾起了志在保卫两粤的各界人士，尤其是粤籍将领的普遍愤懑。张发奎便是反蒋最激烈的一个。

"真见鬼！他又从幕后杀到前台来，大打出手了。"李宗仁对蒋介石来广州的举措也是愤慨至极。

"德公，现在情况相当明白，蒋先生决难坐视两广单独成一局面，继续反共。因为两粤将领在四、七两军早期革命的传统上，对蒋都曾有过不满。如今蒋政权瓦解，两粤如在德公您的领导之下，支撑下去。自非蒋所能容忍。我们如果要保卫两粤，必先清除蒋在背后的掣肘。"张发奎把手一握，向李宗仁建议道，"趁老蒋在广州，我们干脆把他扣起来算了！"

李宗仁虽然愤恨难耐，但他明白，眼下已不是当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时代了，即便是把蒋抓起来，也丝毫改变不了国民党在大陆最后失败的命运。"向华兄，把蒋扣起来，最多使你我出口气，除此之外，又有什么用呢？"李宗仁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摇头叹息，"他的兵，我们调不动，他存放在台湾的钱，我们取不出，扣压他只能使我们徒招骂名啊！"

"管那么多干吗？只要把他扣起来，一切便会有办法的。"张发奎坚持自己的主张，"你虽是代总统，但也是国家元首，就以'颠覆政府'治他的罪，即能服众。我们两广团结合作，若实在不行，还可退保海南，争取美援嘛！"

李宗仁说："向华兄，问题不这么简单哪！你不在其位，当然可以随便幻想，你若在我这个位置上，也不会同意这样干。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局面已定，我们既有'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雅量，就应任其全始全终。不必于败亡前夕，做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笑！"

张发奎见李宗仁这般态度，忿忿地说："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你'李猛子'啥时变得如此前怕狼后怕虎？那就只有屈居下风，甘心忍受欺辱……唉，妈的，两广算是完蛋啦！"

而在此时，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正在赣州主持会议，部署广东

战役。

9月22日，张发奎接到家乡飞报来的消息，始兴县县长饶纪绵在中共地下党的策划与指挥下，率该县自卫团队3个营和2个中队起义，并消灭了第三十九军和六十三军各一个团，始兴县地处国民党第三十九军、第六十三军防线结合部，饶纪绵的起义，无疑是首先在国民党部队的粤北防线打开了一个缺口。

饶纪绵是始兴水口村人，高中毕业就投军，当过教官、团长等职务，深为张发奎赏识。1947年3月，张发奎任命饶纪绵为始兴县县长，想让他好好把家乡经营好。刚上任时，饶也曾踌躇满志，积极组织“戡乱建国委员会”，不断扩充自卫队，想在一年之内肃清所谓“匪患”，“绥靖”地方。但事与愿违，中共始兴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力量越来越大。他因而5次向国民党省政府上书请辞，但未获批准。正在他进退维谷之时，原国民党六十四军副军长、时任粤中师管区司令的张显歧，受中共地下党的委托，前来做工作，饶纪绵因而最终决心弃暗投明，率部起义。

饶纪绵的起义，无疑给张发奎又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他没想到防卫广东的口子竟在自己家乡撕开。

10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第四兵团、四野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共22万人，在陈赓、邓华的指挥下，在广东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分两路向广东进军，迅速突破粤北防线，10月7日，人民解放军攻占韶关，14日解放广州。

就在粤北解放前夕，张发奎带着深深的失望，离开大陆，到香港定居。此一别30余年，他生前再也没有回来过。

从此，大陆对于张发奎，近在心里，远在天涯，一个永远难以醒来的梦。

第二十四章　寓居香港，闲淡书晚晴

一、“第三势力”，一枕春梦

硝烟远去，一切已尘埃落定。

张发奎坐在香港公馆宽大的书房里，悠闲地翻看着报纸，心中却波澜起伏。

李宗仁借治病为名，远走美国；白崇禧能征善战的桂军大部“灰飞烟灭”；薛岳在海南岛精心打造的“伯陵防线”土崩瓦解；李汉魂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也跑到美国去了；躲在台湾小岛的蒋总裁正整治着他的残军败将；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处在百废待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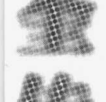
早在20年代后期，张发奎就在香港置买房产，把它作为一个“避风港”，一旦失意，他都会在这里小住一段时间，图谋东山再起。抗日战争时期，香港属于中国战区范围，由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统辖，日本投降后侵港日军向张发奎投降，当时张发奎慨允英海军少将与中美将领共同主持受降，顾及了英国的面子，故此后历任港督都对他十分敬重。大陆解放后，张发奎是惟一获准携枪抵港的国民党军人。时任港英警务处处长的麦金托早在张发奎任广州行辕主任时就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张发奎在蓝塘道的公馆，长期享有不受搜检的特权。据张发奎自述:“我拥有国际知名度，许多人知道张发奎的大名，他们知道我为国家效劳，永远不会无视国家利益。”

正因为张发奎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各方面都派人来拉他，在台湾，蒋介石多次来电或来人劝他到台湾“归队”，共商光复大陆之计；在广州，新上任的广东省省长叶剑英不计前嫌，请他回广州，为新中国的建设出谋献策。但张发奎哪里都不想去，均婉言拒绝了。对于蒋介石，他一直就没

有好感，蒋介石也不会信任他，回台湾只能是自投罗网，后来白崇禧、薛岳等被打入“冷宫”证明了他的判断；而回内地，“不事二君”的传统思想，又使他踌躇不决，他一直认为，自己是国民党人，回大陆就是向共产党“投诚”。然而，张发奎此时毕竟才53岁，正当年盛，就这样离开政坛，离开历史舞台，他又心有不甘。在彷徨之际，“第三势力”向他伸出了“热情”的手。

说到“第三势力”，这还得倒溯到1949年8月4日。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对国民党政府采取袖手静观政策。一时组织“第三势力”的呼声，甚嚣尘上。8月15日，顾孟余应代总统李宗仁之邀，从香港来到广州，就组织第三势力问题，与美使馆顾问何义均、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具渭等反复交换意见，并将可能采取的方案提供李宗仁考虑，结果李宗仁主张，由顾孟余出面领导，而由他从旁予以支持，并指定程思远负责居中联系。





张发奎对组织“第三势力”非常热心。原因是广州岭南大学校长 Dr. Henry（香雅阁）在解职过港返美时，曾对他说，蒋介石已不中用，要张发奎组织“第三势力”。张发奎曾一度想参加顾孟余为首的“自由民主大同盟”，后来因童冠贤、黄宇人反对吸收军人而作罢。而今经过香雅阁的鼓动，他又雄心勃勃、跃跃欲试。



送走香雅阁后，张发奎找来李宗仁驻香港的代表程思远，劝告说：“德公在美长期住下去也非良策，不如自动辞去‘代总统’，以在野之身份推动‘第三势力’运动。”说着，他拿出一份材料，继续说，“从目前形势来看，美国对台湾的蒋介石不抱希望，杜鲁门总统已发表声明：美国不采取足以涉入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程思远点头道：“这些情况我们大致都了解。黄旭初先生从香港电李宗仁先生，请他‘辞职组党’。可是，李先生复黄旭初先生电云：组党尚非其时。”

张发奎叹了口气：“看来德公暂无意组党，这事先由我和顾孟余牵头吧，只要得到美国的支持就好办。”

顾孟余原是汪派代表人物，与张发奎关系一直不错。这回，由于张发奎有香雅阁在背后做靠山，顾孟余自然主动与他合作，号称“张顾联盟”。

美国人热心于支持中国“第三势力”，由来已久。1947年1月7日，杜

鲁门特使马歇尔以调处失败离华返美时曾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把调处失败的责任推给国、共“双方之极端分子”，而认为“此项情势之挽救，惟有使政府中与小党派中立自由分子居于领导者的地位”才有可能。他的这种观点被美国无任所大使杰塞普接过去，就变成了积极发展“第三势力”的理论根据。1949 年夏，美国使馆驻广州代办克拉克通过使馆顾问何义均怂恿李宗仁组织“第三势力”。

1950 年 1 月 17 日，杰塞普从台北飞抵香港，指示驻港美国总领事馆有关负责人员，设法支持海外“第三势力”。于是逃到海外的军政人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举行座谈，酝酿组织，蔚然成风。同年 12 月，李璜向张发奎提出，日本人想拨出一个军港作为自由港，让香港工商界前去投资，并可以在那里进行政治活动。

张发奎以为不妨派人去看看，便让程思远前行了解。

程思远在日本呆了一个多月，查实并无此事。1951 年 1 月，他从东京回到香港，适值农历春节，便到张发奎家拜年，顺便报告此行的经过。

张发奎说：“现在有了新的发展。香雅阁介绍东京盟军总部代表哈德曼到香港，我同他见了一面。哈德曼说，他此行的任务完全是为帮助建立“第三势力”。我看此事关系重大，希望你把顾孟余先生约来，我同他谈谈。”

“什么时间见面？”程思远问。

“大年初六吧，”张发奎随口说道，后来想起初六那天是人日，又改口说，“还是初七吧。”

正月初七那天，程思远陪同顾孟余如约来到张发奎的公馆。这是张、顾到香港后的第一次会晤。不久，顾孟余与那位从美国来的哈德曼见面，建立了由张发奎、顾孟余、伍宪子三人组成的最高领导体制，参加决策的只是张发奎与顾孟余。

本来，“第三势力”的前身“自由民主大同盟”是李宗仁拨款 20 万港元创立的，但张发奎坚持把李宗仁与桂系势力赶出大同盟，“战盟”成立后也不让李宗仁加入。显然，他已对李失去了信心。

为了筹建组织，张发奎与顾孟余决定办一份周刊，取名《中国之声》，并聘张国焘为社长。原来，中共大叛徒张国焘自投奔国民党后，虽然在反共方面比较卖力，但国民党人对他总有防范。张国焘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携带着妻子和 3 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张发奎早在北伐时期就认识张国焘，见他有反蒋的意图，便把他拉了进来。

台湾当局一直注意着“第三势力”。他们知道顾、张联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做后台，便施计取得证据，向美方提出抗议，说华府正在支持台湾，另外又支持张、顾在在香港搞“第三势力”来破坏台湾。美国当局不得已把哈德曼调回去，加以申斥。几个月后，哈德曼回到香港，对张发奎、顾孟余发牢骚说：“你们说没有钱不好办事，但有了钱又闹纠纷。”言下不胜感慨，从此，所谓在海外建立基地的宏伟计划就被束之高阁了。

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终于在1952年10月10日正式开张。同日，台湾国民党召开第七次全体大会。“战盟”选择这一天露面，意味着同台湾唱对台戏。该盟以顾孟余、张发奎等七人为中央委员；以甘家馨为秘书组长。这些人都是年前“自由民主大同盟”的人马。不久，出现分裂，甘家馨等五人都被“战盟”开除，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来接替。



说来张国焘被免职的原因似乎有点好笑：他把家里的女佣都列到《中国之声》的员工薪酬册中，缺席会议也不请假，还反问张发奎：“向华，为什么你把政治弄得这么严肃呢！”张发奎气得叹息：“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而张国焘成为张国焘了！”



在“战盟”公开不到3个月，顾孟余蓦然失踪了。



1953年1月15、16两日的《东京新闻》发表了顾孟余与日本新闻界耆宿阿部真之助的谈话。当阿部问到“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时，顾孟余说：“我们发起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已有3年，为要慎重，故未发表，直到最近，始出宣言。暂时以张君励、张发奎两先生及鄙人三人之名出面，宗旨则在反共反独裁。”意思是两面作战。

其实，顾孟余离开香港，不是自愿的。张发奎原来向顾孟余打了保票，说是香港政府会买他的面子，不会给顾孟余找麻烦。可是一天，香港政府的政治部一名英国人请顾孟余去谈话，问他是否在香港搞政治活动。顾孟余说：“没有。”又问他是否常去张发奎家开会。顾孟余答：“不认识他。”这名英国人有备而来，知道顾、张已有10多年的关系，现在顾孟余空口说白话，有意骗他，十分生气，很不客气地向顾孟余说；“倘若你再在香港搞政治活动，我们就把你驱逐出境。”事已至此，顾孟余只好灰溜溜地带着老伴离开香港，来到日本。

顾孟余到日本后，“战盟”决定再增加中委四人，由盟员分组投票选举。此时，台湾特工人员已经渗入，选举结果，当选的，不是台湾特务，便

是与他们有关的人。顾孟余认识到不能再干下去了，只好从东京写信给张发奎，声明退出。那几个当选者找到张发奎，张发奎虽然没有明白表示退出，但藉口“顾先生退出，我也没有办法”，即停止经济供应。《中国之声》只得停刊。于是“战盟”无形解体了。

回顾“第三势力”失败的教训时，张发奎慨叹道：“初时我崇拜偶像，认为我们必须拥有一些名人，如顾孟余、张君励、李璜、童冠贤、张国焘等担任我们的领袖，靠他们筹集经费，催生一支真正的力量。抱着这种目的，我专心致志促成他们的合作。然而，我发现，所有这些人同常人无异。我的理想幻灭了。”

事实上，朝鲜战争后，美国出于“冷战”思维，重新支持台湾，停止了对“第三势力”的支持，张发奎已难以再有所作为。

张发奎在香港搞“第三势力”，还牵连到他在台湾的两个老友——白崇禧和薛岳。1950 年 10 月，白崇禧、薛岳这两名上将的寓所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遭到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抄家，连地板都被翻开搜查，真是前所未有，不可思议。原来，蒋介石怀疑他俩与李宗仁、张发奎两人有秘密联系，白、薛二人有苦难言，只好忍气吞声。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1950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在台北复总统职，李宗仁心有不甘，便在美国公开宣称，他在华南有几十万游击队均已交张发奎统率，随时可以反攻大陆。张发奎不想打破他与港英之间的微妙平衡，埋怨李宗仁在大洋彼岸说话太鲁莽，遂在报纸上辟谣，否认李宗仁的话。张发奎从此对搞政治有些心灰意冷。

二、客属联谊，担任会长

晚年的张发奎仍然保持爱喝酒的习惯，经常呼朋唤友到香港豪华酒楼豪饮痛喝，不醉不归，倒也洒脱自如。

1957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试办成立，开始对流亡海外的国民党政要进行口述访问，陆续完成了对胡适、李宗仁、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张发奎、蒋廷黻、陈光甫、蒋彝、吴国桢、李汉魂、何廉等人的口述访谈。张发奎是在 1958 年接受采访的，夏莲荫女士到香港访问张发奎 400 多次，将记录整理为英文稿，中译《张发奎回忆》全稿共 21 章，约 50 万字，由杨天石翻译，分期刊登于台北《传记文学》杂志



1958年1月8日张发奎将军与夫人刘景容在香港合影

上。

后来，张发奎又主持撰写抗战回忆录，特请彭程加以整理，并请黄宗潮审阅，编次成书，名为《抗日战争回忆录》，此书正拟付印时，他病濒于危，逝世前夕，仍一再叮嘱此书不可散失。1981年，该书终于在他病逝后一周年出版，为后代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张发奎是个家乡观念较重的人。早在1945年9月，他到广州担任受降主官后，立即派遣副官李三余为接收广州前进指挥所先遣组成员，先期到达广州，与几位粤北同乡一起，将位于广州解放中路云台里的“南韶连会馆”从日本人的手中接收回来。在广州，他虽然日常公务繁忙，仍经常抽空来到会馆与粤北同乡叙谈。一次，他以粤北同乡的身份参加并主持了南韶连留穗同乡会会员大会。他在致词中谈到，粤北虽然很穷，但粤北是块好地方。粤北人要团结，要为粤北出力，大家都为建设粤北出力，家乡就有希望。因而，张发奎寓居香港后，有不少海外华侨团体邀请他参加各种公益活动，他欣然参与。

香港的客属组织，首推香港崇正总会，该会成立于1921年9月29日，原名“旅港崇正工商总会”。1925年正式更名为“香港崇正总会”，旨在崇

尚正义，崇正黜邪，象征客家人刻苦、耐劳、勤俭、敢作、敢为、敢当、团结互助、爱国、富于创造、崇尚正义、威武不屈的精神。该会在 1922 年至 1940 年期间，先后创办了 4 间崇正义学，其经费概由著名实业家胡文虎先生赞助。张发奎虽已退出政坛，但他永远是客家人的骄傲。1971 年 9 月 29 日，为庆祝该会成立 50 周年暨“崇正大厦”落成，邀请了世界各地 47 个客属社团 250 多名代表举行隆重的庆典活动。该次大会选举张发奎为会长、黄石华任理事长。与会代表决议将这次规模宏大的世界性客家社团活动定名为“世界客属第一次恳亲大会”，并决议每隔两年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会议。从此，恳亲大会一直坚持召开至今，在海内外有很大的影响。

张发奎任会长后，秉承崇正总会先贤赖际熙、胡文虎等“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的遗训，大力弘扬客家精神，敦睦乡谊，服务社会，造福民众，关心和积极支持祖国的公益事业，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为海内外客家人的团结、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三、眷念故乡，香港逝世

“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着花未?”



张发奎将军 (图右二) 与夫人刘景容在纽约华侨欢迎宴会上

在香港，张发奎对故乡念念不忘，随时注意中国大陆的变化，希望能够出现他认为适合的时机，以便能够返回故里。闲时，他喜欢翻看老照片，把志锐中学毕业学生的照片一张张整理好，有学生来拜访，他便端出来一起欣赏。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的历史环境，张发奎返回大陆的愿望，一次又一次化成了泡影。此种心情如元散曲中所唱的：

>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徐再思《双调水仙子　夜雨》)

张发奎与蒋介石的关系特别微妙，也十分能表现蒋、张二人的待人处事风格。早在孙中山桂林北伐时，他就与蒋介石认识了，特别是在1925年蒋介石率黄埔军东征时被围于惠州五里亭，张发奎光着身子率一营卫队突破敌阵转败为胜，此后蒋氏一直感念他救驾之功。在北伐后，宁汉分裂时，张发奎是拥汪反蒋的，由此他政治上一生有三次反蒋的记录，但蒋介石却很欣赏张发奎的军事才能，在抗战时委于重用，但在具体实施时又不让张发奎掌有



张发奎将军与夫人刘景容在美国拜会宋美龄（中）时合影

实权。大陆解放后，张发奎对蒋政权十分失望，坚决没去台湾。然他公私分明，虽在政治上反蒋，但在私谊上对蒋介石十分怀念。1975 年 4 月 5 日蒋介石去世，张发奎手中并没有入台证，但他仍然偕夫人购机票赴台闯关吊唁，让蒋的家人十分感动。

1976 年 10 月文革结束后，大陆实行了改革开放，政治面貌一新，张发奎看到了回家的希望，谁想到岁月不饶人，他的身体越来越差。1980 年 3 月 10 日，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在其香港寓所，悄然去世，终年 84 岁。



1972年张发奎在香港与志锐中学校友合影。前排左四为张发奎，左五为张夫人刘景容

据说，张发奎临终前，交代他妹妹说，有机会的话，你回家乡去看看；如果父母的墓地还在，就把我的骨灰葬在他们的旁边；如果不可能，就把父母的灵骨带到香港，好好厚葬。

张发奎逝世后，新华社发了消息。3 月 13 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致电张发奎的亲属，唁电全文如下：

香港

张向华将军家属礼鉴：

惊悉向华将军逝世，不胜哀悼。乡情旧谊，时所萦怀。特电致

唁，尚希节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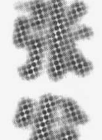
叶剑英

蒋经国先生也对张发奎这位老将的逝世表示哀悼，颁发褒扬令赞他“执节怀忠”。

台湾始兴同乡会曾开会追悼，并献上一挽联：

望出曲江，绪承风度，千载道范，先后献身邦国，古今辉映；
声扬咸宁，威镇华夏，一代名将，从此撒手人寰，中外同哀。

当年抗日战争时期，始兴中学有一副嵌有“向华”二字的鹤顶格对联：“向东抗敌惊三岛；华南功高第一人。”




四、叶落归根，魂归故乡

张发奎一直是中共重点统战对象，改革开放后，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派人与张发奎家人取得联络，消除他们的疑虑，获悉张发奎病逝后有“回家”的愿望，又与韶关、始兴等部门联系，积极落实政策，做好周密安排。坚冰过后是春天。统战部门的真挚努力，家乡人民的一片热情，打动了张发奎亲属的心。

根据张发奎的遗愿，他的妹妹终于踏上了回始兴彩岭村老家的路，家乡人以满腔的热情欢迎她回来。张发奎的妹妹见父母的墓地保存完好，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哥哥的灵灰可以回来，和父母葬在一块。

由此，张发奎夫人刘景容女士为遂将军“回家”之愿，多次奔跑于广州、韶关、始兴等地，商讨着一切细节。家乡人为迎接将军回乡，拿出了一块最好的风水宝地为其建造墓园。

这一努力长达12年之久。

1992年11月6日，天高云淡，年逾八旬的刘景容，携定居美国的儿子张威立、女儿张丽芳等亲友与旧部，将张发奎的骨灰，从香港奉回家乡始兴安葬。他们一行经过广州时，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萧耀堂亲到火车站迎接护送张发奎骨灰“回家”的张夫人及其亲属、旧部。当晚，省政协设宴为张夫人一行洗尘，吴南生主席致欢迎词：



1992年11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先生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亲切会见张发奎将军夫人刘景容女士和公子张威立先生等

张发奎将军是广东人民所熟悉的一代名将，他在北伐战争中，率部英勇奋战，痛歼北洋军阀，战功卓越，勇冠三军，以‘铁军’称号享誉海内外。在抗日战争中，他支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率部力抗敌寇，厥功甚伟。张将军的这种热爱祖国、以民族大义为重的高尚情操深为后人所赞颂。这次张夫人不顾高龄，路途劳顿，亲自送将军灵灰回粤北故乡安葬，以遂将军落叶归根之愿望，这种行动和精神，我们深为敬佩。

次日上午10时，广东省各界人士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隆重举行缅怀张发奎将军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与刘田夫、吴南生、杨应彬等省领导出席。张威立发表讲话，代表母亲和家人，向出席仪式者表示最高的敬意。

11月9日，张夫人一行护送张发奎的骨灰终于回到始兴隘子镇彩岭村。陪同前往安葬的有：原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郑华、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杨应彬，以及韶关市、始兴县的有关领导等，共计50多人。

家乡父老乡亲如同过节般，扶老携幼前来迎接，按照当地风俗设灵堂迎接张将军骨灰，并举行简朴的祭拜仪式。

一时间，鞭炮齐鸣，香烛高燃。

祭拜仪式结束后，一行人浩浩荡荡前往新建的墓园，张威立手捧父亲的灵灰走在前面，后面是一青年手捧张将军身穿西装的标准遗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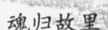
张发奎的墓园，坐落在彩岭村对面的半山坡上。前方视野开阔，可以远眺彩岭村全景。长方形的墓室，安置在汉白玉铺成的大石坪内侧。他们在墓地前隆重举行了灵灰安葬仪式，全体向张将军遗像致三鞠躬。张威立亲自将父亲的灵灰放入墓中，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正是深秋季节，墓园四周，黄叶一片，碧云万里，归雁长鸣。

张发奎的墓园由几部分组成，除了他本人的墓地外，在西侧山梁上，还有张发奎父母的合葬墓，墓碑是李济深于 1937 年题写的，下方署名：张发明、发奎、发萱（加黑框）、发荫立；还有为纪念东征牺牲的弟弟张发萱（字贵斌）所立的“贵斌亭”和他的衣冠冢。另外，在 1992 年 11 月，志锐中学校友会为纪念张发奎本人，集资建了一个双层飞檐（上层四角、下层八角）的琉璃八角亭，正面上方，携刻着“向华亭”三个字；后墙上是一幅《张发奎将军事略》石刻。

安葬仪式结束后，张夫人一行参观了张发奎亲手创建的风度学校，并于次日在始兴县城参观了新建的风度中学，张夫人在张发奎将军铜像前驻步凝




魂归故里

视，十分激动。

11 月 12 日，广东省委、省政府设宴款待参加安葬仪式回到广州的张夫人一行。

时任省委副书记郭荣昌致祝酒词。祝酒词中说：

> 张发奎将军是为世人赞誉的一代名将。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战争中，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率部英勇奋战，力克顽敌，为推翻北洋军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张将军所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也以‘铁军’之名扬威中外。铁军中的一批优秀共产党员，与张将军紧密合作，在北伐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抗日战争中，张将军严词拒绝汪精卫的拉拢引诱，保持凛然大义的民族气节，率部艰苦奋战，力抗强寇，厥功甚伟。他坚持团结抗日，保护了一批在其部队中工作的进步人士。在皖南事变中，他是惟一没有发出反共通电的。张发奎将军的历史功绩和识大体、重大义、顾大局的高风亮节，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省政协主席吴南生、省委副书记郭荣昌的祝酒词代表了中共方面对张将军的历史评价。

将军“回家”，在海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外传媒纷纷给予报道。一年后，始兴县人民政府、政协始兴县委员会、始兴海外联谊会 3 个单位在风度学校联合设立了“张发奎将军简要事迹纪念室”。现在，每年都有不少中外游客，慕名前往张发奎将军的故居参观。

1996 年 9 月 1 日，广东海外联谊会在广州珠岛宾馆举行“纪念张发奎将军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刘景容女士、张威立先生等回粤参加了张发奎将军诞辰 100 周年纪念活动。他们于 9 月 2 日回到彩岭村，在张发奎墓碑前举行祭奠仪式。

在创作本书前，笔者特意与几位友人来拜谒张发奎将军墓。那天，我们的车刚到彩岭村村头就下起雨来，且越下越大，只得躲入一间大屋子里休息。女主人冒雨从山上摘来一篮新鲜的杨梅款待客人。望着鲜红欲滴的杨梅，我们食欲大快，抓起来就往嘴里塞，也顾不得是否酸得掉牙。我忽地觉得，在杨梅红了的季节到这里拜谒将军之墓，真是一个机缘。

雨渐渐地小了，我们擎着雨伞冒雨登山，沿着一条光滑的石阶蜿蜒而








位于张发奎将军陵墓左侧的向华亭

上，两旁是湿绿的松树，浅黄的山花，格外衬托出将军的墓园肃穆宁静。

站在“向华亭”上，凭栏而望，迷蒙中，可以俯看整个矮岭村全貌，依稀可辨张发奎当年出资捐建的风度小学、故居“贵庐”，以及将军每次回来都喜欢泡一泡的温泉“向华池。”

将军回来了，这次他再也不走了。他安静地躺在父母的身边，与家乡的山水融和在一起，永远守望着自己的家乡，守望着自己的父老乡亲。

斯人已去，功过自由后人评价。这里不妨以当年志锐中学的一首歌词，来表达对张发奎将军的一份纪念：

黄花落，黄花开，
斯人一去不复回。
但愿全国同胞齐奋起，
踏着革命前辈的脚步，
振兴中华，
光大中华，
大中华永生。

张发奎生平活动简表

1896 年

9 月 2 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张发奎出生于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城太平镇。祖居地为始兴清化矮岭（今隘子镇彩岭）张村。张发奎原名逸斌，字向华。其父张居之（字竹溪），其母为萧氏。

1904 年（8 岁）

张发奎入私塾。

1907 年（11 岁）

张发奎在县立高等小学堂就读。

1910 年（14 岁）

夏，张发奎与一群同学到墨江游泳，其中一李姓同学不幸溺水身亡。其父李淑是当地有名的豪绅恶霸，一口咬定是张发奎所为。张居之深恐儿子张发奎为李淑所害，让他出走到广州，投靠一个姓张的亲戚家，打杂工。

1911 年（15 岁）

年初，张发奎在增步工艺局当学徒。

1912年（16 岁）

4 月，张发奎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堂学习，成绩优秀。

1914年（18岁）

4月，张发奎经革命党人邓铿介绍，正式加入国民党。

9月，张发奎陆小毕业后，考入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

1916年（20岁）

在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因革命需要，张发奎回广东参加第二次反袁之役。

1916年（20岁）



张发奎在广东士敏土厂任事。

1919年（23岁）



夏，张发奎到福建漳州，参加援闽粤军，初任督战队长。



1920年（24岁）

9月，张发奎随邓铿的粤军左翼部队作战，在攻打惠州城时，任敢死队长，闯入敌群，夺获新式步枪两支，首立军功。



11月下旬，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命邓铿兼任第一师师长。张发奎初被任命为师部上尉副官，旋升少校，后又调任李安邦部警卫游击第二十七营营长。



1921年（25岁）

8月，邓铿受命组建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的游击营被改编为第三营，仍任营长。

12月4日，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北伐大本营，张发奎负责警卫。

1922年（26岁）

5月6日，张发奎和薛岳率警卫营护卫孙中山前往韶关。

6月16日，陈炯明部发动叛乱，开炮攻击总统府。孙中山幸离险境。张发奎坚守韶关北伐大本营，等待北伐军回援。

11月，张发奎部被编为粤军一师辎重营，调驻肇庆，改隶第一师第二

团，编为第三营，他仍任营长。

1923年（27 岁）

1 月 3 日，邓演达在封川豆腐坑率全营起义。张发奎闻悉后，与第二团团长卓仁机等在幡龙水阵地举起义旗。

1 月 16 日，广州收复。张发奎随粤军一师回到广州。不久，第一师离开广州，来到江门，积极进行整训。

7 月，粤军一师改编为粤军第四军。张发奎升任第一师独立团团长。

9 月 10 日，卓仁机、张发奎率部奉命赶到博罗，解了被叛军围困多日的许崇智、邓演达部之围。

11 月 19 日，张发奎所属的粤军一师与其他援军挫败进攻广州的叛军。

1924 年（28 岁）

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改编为第十二旅，任陈铭枢为旅长，张发奎独立团改称第一团，他仍任团长。

张发奎回乡与刘景容结婚。

1925 年（29 岁）

2 月 1 日，建国粤军组成东征部队讨伐陈炯明。张发奎所属的建国粤军第一旅作为后续部队，在淡水之战后投入战斗。

3 月 13 日，张发奎部赶到河婆，解了蒋介石的右翼军之围。

7 月，张发奎的三弟张发萱（字贵斌）为了掩护战友转移脱险，壮烈牺牲。后来，张发奎在老家矮岭村斥资建了一幢新楼，取名“贵庐”，表达对贵斌的深切思念。

8 月 26 日，国民政府将所部粤、湘、滇军，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共有 6 个军。张发奎升任第四军第一独立旅旅长。

9 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再次东征陈炯明。张发奎率部在汤坑、双头取得胜利。

11 月，张发奎奉命率部参加讨伐南征邓本殷叛军之乱，并升任第十二师副师长。

1926年（30岁）

1月15日，张发奎率部成功登陆海南岛，在数天内即将邓本殷部完全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终告统一。张发奎升任第十二师师长。

6月15日，第四军陈铭枢的第十师、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在广州举行北伐动员大会后，乘坐火车至韶关。

7月4日，第十二师到达湖南攸县，与第十师汇合，张发奎推举陈铭枢为第四军临时指挥，代理军长，统一指挥第十、第十二师。

8月27日，攻克汀泗桥、咸宁。

8月28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电嘉陈可钰、陈铭枢、张发奎。



8月30日，攻克贺胜桥。

10月10日，攻克武昌。









10月20日，张发奎率四军主力到江西参加讨伐孙传芳战斗。蒋介石特地从高安发来“嘉勉张发奎千里驰援电”。

11月2日，张发奎与李宗仁部攻下德安。

11月4日，张发奎率部在马回岭孤军作战，化险为夷，取得马回岭大捷。

11月26日，张发奎被任命为第四军副军长兼十二师师长。

1927年（31岁）

1月，张发奎升任第四军军长，副军长由黄琪翔升任，所部辖第十二、第二十五两师。

1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为表彰第四军的功绩，特铸一铁盾，正面镌有“铁军”二字。张发奎代表第四军将士接受这一荣誉。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张发奎成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之一。不久，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去职，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张发奎兼任第十一军军长。

4月19日，第二次北伐誓师典礼在武汉南湖举行，唐生智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任唐部第一纵队司令官。

5月16日，上蔡、东西洪桥之役，张发奎所率北伐军与敌苦战三昼夜，终将奉军中号称“铁军”的第十一军全军击溃。

5月27日，北伐军与奉军在临颍决战，双方均伤亡惨重，共歼灭奉军

万余人，第四军伤亡达万人。

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等在郑州与冯玉祥合商，决定河南军政交由冯玉祥负责，唐生智、张发奎部退回武汉。第二次北伐结束。

7月15日，宣布与共产党分家后，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蒋，将唐生智扩充为第四集团军，张发奎任该集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及暂编第二十军。张发奎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礼送”的政策。

8月1日，南昌起义。上午9时，选举产生了新生的革命政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张发奎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

9月20日，张发奎、黄琪翔率第二方面军，与南昌暴动的贺龙、叶挺部队平行而进，互不侵犯。

9月21日，黄琪翔以代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部队进入广州。李济深派员到香港，迎接张发奎回广州主持军政。

11月16日，在张发奎的策划下，黄琪翔采取军事行动驱逐桂系。

11月17日上午，广州政治分会任命张发奎为广州军委会主席。张发奎、黄琪翔发动的这次以“护党运动”为名的政变，史称“张黄事变”。

12月11日，广州起义开始。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指挥部队镇压起义。

12月13日，张发奎所部薛岳会同李福林部，分三路向市区进攻。广州起义宣告失败。

12月18日，张发奎将四军军长一职交给缪培南担任，与黄琪翔离开广州，取道香港，到日本考察。

1928年（32岁）

1月15日，张发奎好友许志锐在五华阵亡。四军兵败，退至江西，投入蒋介石麾下。

9月中旬，第四军缩编为第四师，缪培南任师长，朱晖日任副师长。

这一年，张发奎从日本回国后，闲居香港、上海。

1929年（33岁）

4月7日，蒋介石重新启用张发奎，任命他为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并拨其嫡系部队朱绍良、陈继承两师归张发奎指挥，率部讨伐桂系。



7月初，张发奎解决桂军后，指定各部在荆州附近集结休整待命，并兼任鄂西绥靖主任。

9月17日，张发奎发难反蒋，解决了曹万顺师两个团的武装。

9月下旬，张发奎在湘西发出两个通电，内容都是反蒋，并提出三项护党主张。同时，将“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的番号改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汪精卫任命张发奎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

12月6日，张发奎的第三路军与广西第八路军如期会师，李宗仁在广东清远下达了总攻击令。花县一战，张发奎损失实力二分之一强，他将部队重新整编，恢复第四军番号，分为第四、第十二两师，自任军长兼十二师师长。



1930年（34岁）

3月16日，第四军在北流与粤军会战中损失奇重，张发奎将两个师的残部缩编成3个团，取消第四师番号，只留第十二师番号，张发奎自任军长兼师长。



4月，李宗仁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反蒋，将在广西的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自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任总参谋长，第一路指挥官为张发奎，白崇禧兼第二路指挥官，黄绍竑兼第三路指挥官。



7月1日，张桂联军回师攻打粤军，兵败衡阳，经东安仓皇退回广西的全县。这是张发奎从军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张发奎萌生解散四军的念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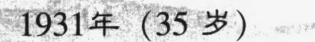


8月，李宗仁、白崇禧为保留四军，拨给张发奎几千官兵，分驻柳州、柳城两处。张发奎重新编组，编成6个团，分为第十、第十二两个师，以薛岳、吴奇伟分任师长。第四军得以继续坚持。

9月1日，“护党救国青年军团”在柳州广西银行里秘密诞生。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为中央常务干事。张发奎担心第四军干部被桂系同化，先在第四军内部秘密组织了“国民党护党同志会”，规定凡先参加“护党救国青年军团”的人必先参加这一组织。

10月上旬，张桂联军在南宁和平马之战，打败滇军获胜。

10月下旬，张发奎再次进行整编，将薛岳的第十师并人吴奇伟的第十二师，全师编为第三十四、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团，他本人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任职。



1931年（35岁）

5月11日，李宗仁在广西率诸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并派白崇禧、张发奎作为特使赴粤。

5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立。广州开府后，两广军队改编为第一、第四两个集团军，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两广合作反蒋局面正式形成。

9月，张发奎随汪精卫赴上海，并在国民党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11月17、18、22日，张发奎在上海3次分别电致广州四全大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请准他率第四军北上援助黑龙江马占山将军抗日。

12月28日，第四军发出通电、向广西全省党政军民告别。

1932年（36岁）

3月6日，蒋介石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军委会的名义下令，指定四军经衡阳、醴陵，到江西“剿共”，军饷由财政部拨付。张发奎被派往上海协助军事。

3月10日，第四军离全县进入湘南，结束了它两年多以来与桂军并肩战斗的历史。

12月，蒋介石拨给张发奎10万大洋，让他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名义，赴欧美各地考察军事，作为建军之参考。张发奎偕夫人刘景容先后到英、法、德、美等国考察。

1933~1934年（37~38岁）

1933年冬，张发奎经欧洲考察完后，转赴美国，见闻益深，并在芝加哥，结识美国医生雅伦，留下一段佳话。

1935年（39岁）

秋，张发奎回到国内，在上海向报界发表讲话，表示决心抗日。不久，他到南京晋见蒋介石，表达抗日决心。

1936年（40岁）

1月，张发奎任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总指挥。

春节，张发奎率夫人回家乡彩岭村探亲，看望由他捐资兴建的风度小学的师生。

8月，张发奎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驻地在浙江省嘉兴县，主要任务为构筑苏、浙边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镇之线的国防工事。

1937年（41岁）



7月底，国防工事完工。

8月13日，淞沪会战正式拉开序幕。张发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右翼军总司令。他发挥“神炮”威力，支援左翼。



9月21日，中国军队调整部署，第三战区分为右、中、左3个作战军。右翼作战军司令官张发奎，辖第八、第十集团军。



9月25日，张发奎所属的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正式成立。中共党组织在张发奎身边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



11月5日，敌人以其第六、第八两个师团在金山卫、全公亭等地同时强行登陆，中方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中将阵亡。



11月9日，最高统帅部下达撤退命令，出现“乌龙”事件，中国部队退却，一时间狼狈不堪，伤亡极大。

12月初，淞沪会战结束。张发奎率部撤往江西。

1938年（42岁）

春，张发奎奉令在长沙恢复编组第八集团军的指挥机构，该集团军属于军委会直辖兵团，担任长江南岸鄂东一带的指挥职责。

6月中旬，张发奎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

7月26日，张发奎率第二兵团全线后撤。九江陷落。

11月25日，最高统帅部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张发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辖广东、广西两省。

12月21日，张发奎来到韶关赴任。

12月，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了一个日本所提和平建议的“艳电”。张发奎与其他将领通电声讨。

1939年（43 岁）

1月1日，张发奎正式宣告就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一职。

9月，在张发奎支持下，志锐中学在始兴文庙复办。

12月27日，粤北战事吃紧，张发奎中断西江之巡，赶回韶关指挥作战。

1940 年（44 岁）

1月7日，蒋介石迭次电令，敦促张发奎前往桂南指挥，同时又要他将西江、北江、东江之指挥权移交余汉谋。

1月13日，张发奎把权力移交后，以有病为由，回家乡住了10天。

1月27日，张发奎到达迁江桂林行营指挥所。

1月26日，“第一次粤北战役”胜利结束。张发奎在此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月，张发奎移指挥部于柳州指挥，获昆仑关战役胜利。

2月23日，蒋介石在柳州召开主持军事会议，检讨桂南会战的得失和功过。陈诚和白崇禧两人均受了降级的处分，张发奎也被记一次大过。

9月，最高统帅部撤销桂林行营，并采纳张发奎的意见，将广东另外划出一个第七战区，任余汉谋为司令长官，张发奎仍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

冬，日军大举侵略法属越南。乘日军撤走之际，张发奎指挥部队迅速收复了南宁、龙州等要地，使广西南部重回祖国怀抱。期间，他组织了“战史旅行”。

1941 年（45 岁）

6月30日，柳州一军械库爆炸，造成很大损失。张发奎力杀失职的军械库长何某（何应钦侄子）。

1944 年（48 岁）

9月初，蒋介石两次电令张发奎等人要死守全州，以争取广西全境主动。

9月14日，日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三军同时发动进攻，全州失守。张发奎怒杀失职的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

11月11日，桂林、柳州失守。张发奎率部撤退。

11月28日，由于译电员译错地方，17架美军飞机误炸六寨，造成惨案。

12月初，张发奎率部到达贵州安顺。

12月27日，张发奎率部到达百色。

1945年（49岁）

3月，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

5月26日。张发奎实施反攻计划，收复南宁。

7月中旬，陆军总部下达向广州攻击的命令。张发奎负责对广州攻击的主作战方面。



8月1日，风度校长全赓靖始兴县花山村被捕，张发奎为避嫌，未实施营救。全赓靖最后壮烈牺牲。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张发奎进攻广州计划因而取消。



9月16日，受降仪式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举行。张发奎作为受降主官接受了代表广东地区投降的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等的降书。

1946年（50岁）



1月，第二方面军奉命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简称广州行营），张发奎任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1月，张发奎组织“日军战犯调查组”，进行日军在华南之具体罪行调查，逮捕第一批战犯21人。至4月止，前后宣布逮捕战犯6批共622名，其中有将官7名，校官19名。

2月5日，张发奎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称广东没有中共领导的部队，不存在执行停战命令的问题。

2月下旬，张发奎改组成立广东肃奸委员会，亲自领导肃奸工作。

4月25日，广东地区的10余万名日俘日侨全部遣送完毕。

5月，张发奎任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

1947年（51岁）

11月，张发奎被免去广州行辕主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的职务，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其职务由宋子文担任。

1948年（52岁）

4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张发奎与余汉谋、薛岳、香翰屏、李扬敬等粤籍将领成立竞选小组，为孙科竞选副总统拉选票，大闹《救国日报》社，结果孙科落败。

8月，立法院通过将海南改为特别行政区，蒋介石任命张发奎为特别行政区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委会主任委员，张发奎未肯就任。

1949年（53岁）

1月，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同年8月辞职。

9月，张发奎向李宗仁提出，软禁在广州的蒋介石，李宗仁不同意。张发奎失望地离开广州，到香港定居。

1951年（55岁）

1月，张发奎与顾孟余正式会晤，在美国势力的帮助下，从事“第三势力”活动。

1952年（56岁）

10月10日，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建立。该盟以顾孟余、张发奎等7人为中央委员。

1953年（57岁）

1月，顾孟余被迫离开香港，张发奎停止了对“战盟”的经济供应。《中国之声》停刊。“战盟”无形中解体。

1958年（62岁）

张发奎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夏莲荫女士采访。后来，张发奎主持撰写其《抗日战争回忆录》。

1971年（75岁）

9月29日，香港崇正总会选举张发奎为会长、黄石华任理事长。

1975年（79岁）

4月5日，蒋介石去世，张发奎偕夫人赴台吊唁。

1980年（84岁）

3月10日，张发奎在其香港寓所去世。

3月13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给张发奎的亲属发去唁电，表示慰问。

1992年11月9日，张发奎夫人刘景容女士，携定居美国的儿子张威立、女儿张丽芳等亲友与旧部，将张发奎的骨灰，从香港奉回家乡始兴隘子镇彩岭村安葬。







主要参考资料

1. 官建生：《张发奎将军编年表（上)》，韶关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2. 官建生：《抗日名将张发奎将军传略》（未刊稿）

3. 《张氏族谱》

4.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

5. 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6. 李守鹏等著：《孙中山全传》，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7. 王俯民：《蒋介石全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5年2月第3版

8. 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2版

9. 中央档案馆编：《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10月第1版

10. 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粤军史实纪要》，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

1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合编：《特支十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12. 钟卓安：《陈济棠》，暨南大学出版社

13. 王成斌等主编：《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五集），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1月第1版

14. 刘秉荣：《北伐秘史》（上、下），知识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15. 广东、韶关、始兴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16. 《广东军阀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

17. 尹永林主编：《薛岳传略》，韶关大学学报编辑部，1995年8月

18. 志锐校友会编：《巍巍铁将军》，1996年

19. 广东志锐中学同学会：《张发奎将军诞辰100周年纪念画册》，1996年

20. 始兴县志办公室编：《始兴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21. 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重庆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22. 何邦东主编：《广州抗战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

23. 杨天石著：《张发奎谈南昌起义——读张发奎口述历史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24. 李大光：《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真相》，见《武汉文史资料》，2004年第1期

25.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99页

26.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2000年12月第1版

27. 李奇中：《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黄绍竑：《滇桂战争》，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重印

28. 刘斐：《两广"六一"事变》；黄绍竑：《一九二八年粤桂战争》，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重印

29. 陈劲光：《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广东的几起几落》；龚师曾：《追随孙中山北伐回忆录》；李洁之：《邓铿之死》；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战争》；陈其尤：《一九一九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黄绍竑：《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重印

30. 巢威、黄梦年：《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记》；曹福谦：《湘桂黔大溃退目击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






4月重印

31.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张文鸿：《李明瑞倒桂投蒋和倒蒋失败的经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重印

32. 黄琪翔：《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文史资料选辑·第九十四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4月重印

33. 宋希濂：《和谈前夕我接触到的几件事》，《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6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34.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中国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第1版

35. 文昊：《蒋介石的政治对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36. 王学庆 、赵洪昌著：《蒋介石与陈诚》（网载）

37. 罗敏：《抗战时期的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38. 徐焰著：《血潮——广州起义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39. 易宇、祥林、徐雁著：《惊雷——南昌起义纪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

40. 《广州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5年

41. 朱振声编纂：《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一册），1975年5月初版

42. 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9月版

43.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44. 邓贤：《淞沪大决战》，当代，1995年第1期

45. 中共韶关市委党史办编：《北江革命人物》（第一辑），1989年3月出版

46. 杨天石：《张发奎谈南昌起义》，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2期

47. 左双文：《张发奎与北伐战争》，广东社会科学 ，2002年第3期

48. 左双文：《论大革命后期张发奎与中共的离合》，史学月刊，2003年第10期

49. 补臣、向国双主编：《山明水秀芷江城》，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50. 卢权、禤倩红著：《叶挺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

51. 华英：《水魄山魂风度人》，漓江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52. 李文生、徐有荣编著：《一个人和一方天——方方传》，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53. 黎白：《贺龙元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54. 解力夫：《越南战争实录》（网载）

55. 刘凤舞：《民国春秋》（网载）

56. 《张学良口述历史首次曝光》，人民网2001年10月29日

57. 《周恩来选集》（网载）

58. 孙挺信：《中日大决战》（网载）

59. 黄仁宇：《黄河青山》（网载）

60. 《广州市志》（网载）

61. 张发奎：《广州暴动之回忆》，见司马璐《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第6部，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网载）





后记

夜色下，三岁的小女露露坐在桌子边，轻皱着眉头，在细心地堆砌着积木，五颜六色、七形八状的小木块在她的小手摆弄下，堆砌成一座别致的大厦。我忽然领悟，手里这部刚刚完稿的《张发奎传》，也像是用历史的“积木”堆砌成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摆法。

十年前，我创作长篇纪实《南岭黑风》时，第一次遭遇“张发奎”这个名字，并把他作为一个国民党高官写进了书中。不久，在一个旧书摊，我偶然翻到了一本《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买回来细阅，才知道张发奎是一位民国历史上不可忽视的人物。说来惭愧，在此之前，孤陋寡闻的我，接受的是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上的教育，一直以为北伐时期的“铁军”，指的只是叶挺领导的独立团，没想到在此背后还有一个“铁将军”张发奎，更没想到南昌起义、广州起义，都与张发奎有渊源。期间，我又偶然借到一本回忆录《特支十年》，书中的当事人都是张发奎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想到的是，他们是中共派到张发奎司令部的地下工作者，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这几个“偶然”与“没想到”，使我对张发奎这位传奇人物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搜集有关他的资料。

在搜集资料期间，令我再一次没想到的是，海内外竟然没有一本有关张发奎的个人传记，史学界研究张发奎的资料也不多，在国内，除了那本《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外，就是韶关大学官建生副教授完成广东省高等教育厅科研项目的成果《抗日名将张发奎编年表》和《张发奎将军年谱》。在海外，则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夏莲荫女士根据对张发奎进行口述采访，而记录整理的《张发奎回忆》，以及张发奎本人主持撰写的《抗日战争回忆录》。大约是1999年冬，我去拜访官建生先生时，与之商量

合作撰写《张发奎传》。当时，我以为，官先生是始兴人，比较熟悉张发奎，掌握的史料也较多，我只要在他的年谱上进行文学加工，写一部《张发奎传》应该不难。官先生欣然同意，便把他编写近十万字的《抗日名将张发奎编年表》和《张发奎将军年谱》电子文件拷贝给我，并把手头的《粤军史实纪要》等参考资料给我。回来后，我阅读完这些资料，才发现我原来的设想太过天真，毕竟写一本人物传记是个浩大的工程，单靠这些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手里这些资料所反映的只是人物活动概要，缺少细节性的东西。何况写一部人物传记，对作者的历史知识的认识与判断要求极高，而张发奎将军又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在此之前，我从未涉猎过传记文学，历史知识也有限，自知尚无如此把握，鉴于历史知识所限及上述缘故，便把这个写作计划搁置一旁。

从1997年至2000年，我与沈涌、李迅等挚友合作，先后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锦江的辉煌》、《五岭鏖战》，同时我也忙里偷闲，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枪与玫瑰》。转眼到了2001年初，在拟订新世纪创作计划时，我想起了“张发奎”，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便与官建生先生商量，是否继续。官先生虽然全力支持，可是他忙于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根本无暇应付此书的写作。我只好勉为其难，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书写出来。这时，刚认识不久的游加慧先生，听说我要写张发奎，甚表支持。他是张发奎的老乡，特地开车带我到张发奎故里始兴隘子镇彩岭村走了一趟，拜谒了张将军的墓，李迅、王建喜两兄长随行，最为感激的是始兴的官桂根、陈方畴先生为我提供了不少素材。也正因为这个缘分，我与游加慧等成了挚友，彼此相见恨晚。正是在此推动下，《张发奎传》已在弦上，不得不发。

2001年下半年，我一边通过各种途径，重新搜集、补充了近百万字资料，考证了许多史料的真伪，并发现不少珍贵材料；一边开始了《张发奎传》的创作。在创作中，我遇到的最大困惑，就是该如何把握全书的整体风格。从现有的人物传记来看，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史料为主，强调其真实性，偏重于客观评述传主的主要活动经历和重要事件，突出传主在历史中的作用；二是以刻画人物为主，调动多种文学手法，重点凸显传主的性格、个性和传奇经历，展现传主在各个历史事件的悲喜命运。前者显得较为客观、真实，但叙述平淡，特别是著者本人的主体性较弱，可读性不强；后者显得较为生动、具体，人物较为丰富，著者的主体叙述性能得以充分展现，但由于强调文学性，有一定的想像成分，对史料的取舍也较多，容易挂一漏

万，给人不真实之感。中国社科院历史学教授杨天石就认为："纪实，就不应虚构。"我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以文学手法来表现是我所长，但考虑到我是写《张发奎传》的第一人，除了确保史料真实外，要尽可能地包容各方面，切忌让人有不真实之感，同时又要保证书的可读性。我一直主张，一本好书首先要好读，其次要耐读，书不"好读"，读者自然少；书不"耐读"，则只是一个"速食品"，没有保存的必要。

正在我为创作左右为难时，文友荣笑雨出了个主意，说他看过一部写犹太人的外国作品，一边是很强的作者主体叙述，文学意味浓厚，一边是大量引用当时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给人以现场感和真实感。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使人顿悟，就在创作本书时引入这种"超文本"叙述，使书中既有浓厚的文学描写，如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和风景描写等，又有不少史料与回忆录的直接引用，方便不同读者的阅读需要，对于直接引用的资料则用仿宋体来印刷。当然，值得说明的是，即使是书中的文学描写部分也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运用当事人的亲历来进行加工的，目的是重现历史，增加氛围。

创作此书目的，不是想给张发奎树碑立传，而是想从一个历史人物的切入来诠释中国现代史。期间多次与官建生先生交换意见，官先生根据搜集史料详谈了自己对张发奎的思想、认识、形象、语言的感受。对张发奎这个传主的评价自然是件艰难之事，由于人物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是动态的，不是就以"好"、"坏"二字能概括的，我尽可能让事件来说话，让事实来说话，让当事人来评价，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当然，作者在写作中也应有自己的态度。文中自然添加了笔者对传主的评价，并吸纳了一些研究者如左双文等的学术意见，供读者参考。

本书创作中有个遗憾，一是未能采访到张发奎的亲友和一些熟悉张发奎的当事人，我虽然请韶关市委统战部的同志联系，但由于张发奎的亲友大多数在海外，张夫人刘景容女士已是九十多岁高龄，卧病在床，不能接受采访；所以对张发奎的很多细节尤其是早期和晚年的活动掌握不够。我原想找机会填补这个遗憾后再出版此书，但考虑到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明年又是北伐战争八十周年，此书已放了这么长时间，还是先作简本出版（原稿约有四十万字）。由于笔者水平实在有限，书中自然有不少错漏之处，正好向诸位方家请教，以后再版时补正吧。

十年如梦。本书从1995年开始酝酿，至2005年6月最后定稿，正好十年，其中滋味只有自知。这里得说一连串的"感谢"话。首先得感谢官建生

先生，他提供了他的研究成果——《张发奎将军年谱》，此书原本是与他合作的，只是他太忙了，才由我独立完成，但他对张发奎的研究和对我的支持是功不可没的；其次得感谢韶关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部、市文联、市残联、始兴县的领导，感谢文联郭福平主席，他们一直在关心着本书的创作与出版；再次，得感谢李迅、游加慧、王建喜、欧新华和荣笑雨等朋友，他们在我创作最困难的时候，总是及时在我身边鼓励我，甚至还设法为本书的出版奔走；还得感谢向我提供资料的朋友，以及写作本书时所参考、引用书刊资料的众多作者，由于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列出，本书所采用的照片皆出自广东志锐中学同学会所编的《张发奎将军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画册》和《挥戈跃马满征尘——张发奎将军北伐抗战纪实》，在此一并感谢提供照片的张发奎的亲友和志锐同学会的先生们。再次，得感谢珠海出版社的罗立群总编、李一安编审、姜蓓编辑等，他们的慧眼和努力工作，确保了该书的如期出版。最后，由衷地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女儿和弟弟、弟妹们，感谢一切爱我和我爱的人们，他们的关爱是无处不在的。





诗书画家刘国玉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他获悉我完成此书后，欣然为本书题写书名，让我感动。刘先生赠我的其个人诗集《井观居诗稿》中，有一首《谒张发奎将军墓》，正好代表我的心情。今录于此，聊作结尾：

江东霸业不堪残，无奈楚河隔汉山。
将相一门光北阙，星辰百代曜穹寰。
中原逐鹿人何在？海上屠鲸迹已斑。
铁血军魂彪史册，青云长伴护乡关。

王心钢

2005年6月28日于碧水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张发奎传
作者=王心钢著
页数=332
SS号=11558230
DX号=
出版日期=2005年11月第1版
出版社=珠海出版社